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9 772096 337223



09>

2022/5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征稿重点

一、参考主题

- (一) 统一战线基本理论、范畴与话语研究
- (二) 统一战线百年发展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研究
- (三) 统一战线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究
- (四) 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
- (五)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 (六) 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 (七)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研究
- (八) “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
- (九) 国际社会热点事件的统战视角研究
- (十) 统一战线(含各领域)学术史梳理与述评

二、相关说明

本刊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研究统一战线，鼓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鼓励交叉学科研究，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的说理文风。

本刊选稿的基本原则是：正确导向、质量标准、问题意识、视野宽广、学理阐释、结构完整、论述规范。对参考主题范围内稿件，本刊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

来稿敬请关注以下基本要求：

- (一) 内容要求。导向正确，主题突出，逻辑清晰，结构规范，论证深入，文字通畅。
- (二) 规范要求。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重合率不高于15%。每篇论文参考文献一般不低于2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一般不少于10条。
- (三) 结构要求。论文须有问题提出、文献评价部分，开展精到的文献述评。
- (四) 体例要求。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2 000字。对照《〈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体例要求，完整准确著录参考文献信息。
- (五) 征稿时间。2021年11月—2022年11月。
- (六) 投稿方式。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联系电话：（023）62874725。
- (七) 本刊开放获取地址：<https://www.cqsy.org/?Tongyi/Zhanxian/>。
- (八) 本刊微信公众号：tyzxxyj。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2 年第 5 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 委：王英津 冯玉军 朱陆民 华正学
 齐鹏飞 许建英 严安林 李春玲
 李 捷 李路路 杨 恕 肖存良
 吴志成 邹平学 沈桂萍 宋 俭
 张献生 张 建 张 峰 陈先才
 陈奕平 范柏乃 罗振建 罗来军
 周 勇 周淑真 袁廷华 莫岳云
 钱再见 殷啸虎 郭春生 郭朝先
 袁 征 黄天柱 蒋 锐 蒋德海
 韩云波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夏晓华

主 编：何晓栋

执行主编：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2年第5期（总第35期）

双月刊

2017年创刊

第6卷

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研究

01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对外话语建构：逻辑与路径

/ 陈奕平 关亦佳

10 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团结机制与实践图景 / 吕鹏 毕斯鹏

22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国复兴的团结底色 / 李应瑞

35 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海外认知与中国应对

/ 原晨珈 李凯林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研究

48 后疫情时代平台经济如何稳就业：机制、现状与策略

/ 李磊 钱育成 马欢

62 中国共产党关于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演进与经验启示

/ 陈晓仪

“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专题

79 “一国两制”的香港样本、法理要义与发展前景

——对习近平总书记在香
港回归2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的理论解读

/ 田飞龙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 ◎ 中国终身教育学术研究数据库总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91 香港通识教育科的最新发展与未来展望

——基于香港青年学生国家认同的视角 / 王飞

101 香港回归25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影响

/ 郭永虎 王卓亚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113 大变局下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干涉：意图、手段与特点 / 杜哲元

126 美国涉疆议题框架建构与中国应对 / 姜禹维 戴继诚

136 基于框架理论的新时代涉疆对外传播路径优化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相关报道为例 / 吐尔孙·艾拜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147 历史与认同碎片化：乌克兰国家建设的困境与镜鉴 / 刘显忠

158 21世纪以来的欧美极右势力：历史溯源、发展趋向与影响镜鉴

/ 俞凤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征稿重点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2 No.5(Sum No.35) Vol.6

- 01 Foreign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Patriotic United Front in the New Era: Logic and Path CHEN Yiping&GUAN Yijia
10 The Unity Mechanism and Practice Picture of the Patriotic United Front in the Yuan Universe Era
LV Peng&BI Sipeng
- 22 United Front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oad:The Background of Unity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Powerful
Countries LI Yingrui
- 35 Cultiva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Power of Knowing China and Being Friendly to China:Overseas Cognition of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China's Response YUAN Chenjia&LI Kailin
- 48 How to Stabilize Employment of Platform Economy in Post-epidemic Era: Mechanism, Current Situation and Strategy
LI Lei&QIAN Yucheng&MA Huan
- 62 The CPC's Cognition Evolution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n Capital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 Rules
CHEN Xiaoyi
- 79 Hong Kong Sample, Legal Essence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IAN Feilong
- 91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Young Students in Hong Kong WANG Fei
- 101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Hong Kong Affairs in the 25 Years
Since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GUO Yonghu&WANG Zhuoya
- 113 U.S. Intervention in China's Xinjiang Affairs under the Great Change:Intention, Means and Characteristics
DU Zheyuan
- 126 The Framework Construction of U.S.Related Issues of Xinjiangand China's Response JIANG Yuwei&DAI Jicheng
- 136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Xinjiang'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Path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Framework
Theory—Take Saudi Arabia's Arab Newsfor Example Tu Ersun • Aibai
- 147 Fragmentation of History and Identity: The Dilemma and Enlightenment of Ukraine's National Construction
LIU Xianzhong
- 158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Far Right Force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Historical Origin, Development Trend and
Influence Mirror YU Feng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对外话语建构： 逻辑与路径

陈奕平 关亦佳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话语建构。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在国内语境中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认识，而在对外语境下仍面临美西方国家的话语挑战，亟须加强对外话语建构。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对外话语传播要坚持通约性、共通性、互动性三大理路，完善理论、历史以及实践层次的话语建构路径。在理论逻辑上，应结合治国理政、民族复兴和共同体建设等理论，从中外对话、政治文明互鉴角度阐释中国统一战线。在历史逻辑上，要重点回答统一战线领导权、目的、同盟者利益等问题。在实践逻辑上，要加强阐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共同体意涵、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思维和中国国家治理的合作性特征、中国对外关系治理的互惠取向，实现更深入的话语互动。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对外话语建构的总体目标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话语建构；叙事体系；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5-0001-09

DOI: 10.13946/j.cnki.jcqi.2022.05.001

作者简介：陈奕平，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主任兼首席专家，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关亦佳，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海外华人社区中华文化遗产研究”（16ZDA220）

引用格式：陈奕平，关亦佳.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对外话语建构：逻辑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5）：1-9.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话语建构。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同样面临迫切的话语建构任务。2022 年 7 月 29 日至 30 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的正确方向,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要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促进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鉴^[1]。

中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问题已经得到学界的关注。一是分析统一战线与话语权建设的关系。有研究指出,西方话语霸权和话语攻击集中指向中国统一战线的相关领域,统一战线是中国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场域、争取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源泉、增强中国话语自信的重要条件和加强中国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力量^[2]。有研究指出,统一战线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国际话语权争夺的前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3]。二是分析统一战线领域话语建设的历史实践。有研究采取个案分析方法,探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特殊话语表达^[4]。三是分析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话语建构路径。有研究指出,应从增强统战话语主体的统战意识、创新统战话语内容、提升统战话语传播效力、营造良好的统战话语环境四个方面推进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话语权建构^[5]。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在国内语境中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认识,而在对外语境下仍面临美西方的话语挑战,亟须加强对外话语建构。现有关于统一战线话语建构的研究聚焦国内语境和实践,政策建议指涉对象主要是国内受众和党政部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人类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中国对外话语构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愈加突显^[6]。对于最新国际形势尤其是美西方对华开展意识形态战略竞争、“妖魔化”中国统一战线的国际舆论战,以及对外话语“不可通约、不便通约”等难题,相关研究对统一战线领域的中外学术对话、舆论引导底层逻辑的探讨有待深入。为此,有必要从国际传播和国际话语建构角度探讨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

二、通约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话语的理论逻辑

中国国内语境下,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聚焦“要不要统一战线”“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建设统一战线”三大核心问题,即统一战线的“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问题,涉及统一战线的动因、目标、内涵和方式等。中国围绕统一战线三大问题的话语建构需要做到内外统一,既展现新时代中国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特殊性,又阐明中外交流语境下统一战线的“普遍性”和“正

当性”等通约性理论逻辑。具体而言，应结合治国理政、民族复兴和共同体建设等理论，从中外对话、政治文明互鉴角度阐释中国统一战线的通约性逻辑。

其一，从国家治理和政治整合的角度看，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凝聚人心和力量是古今中外政治的通则，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形态和不同国家中存在效能差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把统一战线的理论、理念和思维贯彻到国家治理和制度体系中，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合作型政治和政治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1]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取得显著成绩的重要制度安排。其实，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政治运转中也存在政治联盟的现象，比较显著的是政党结盟。当然，这些国家多采取竞争型政治逻辑，其政治联盟的功利性特征非常明显，往往导致政治上的“团结合作”无法长久维系。合作型政治与竞争型政治的逻辑分野，形成中国和一些国家在政治结盟效能上的显著差异。但是从共同逻辑看，这也表明国家建设中实施相应的政治整合机制具有通约性。

其二，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的角度看，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具体实践中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特点，不断完善民族政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有关民族工作的系列原创性论断，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动员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7]。民族权益边界的显性化与中华民族共同性增长并存，中华民族作为凝聚各民族、培育一体化共同体的基本政治观念与政治社会机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面向^[8]。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面对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1]。统一战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显著意义在于，把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为一体，维护国家一体、增强国家认同。把个体联合为整体、推进国族建设，是多民族国家的重大任务。20世纪以来亚非拉国家兴起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民族独立、统一和发展。其成功的关键是基于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基础之上的各民族形成凝聚力。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狭隘民族主义的兴起带来严重的后果。民族分裂主义“不仅严重影响有关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而且对地区安全、国家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都构成重大威胁和挑战”^[9]。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运

用大团结大联合机制建设民族共同体、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通约性。

其三，从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团结合作的方向看，国家统一和国家富强是中外民族国家建设的共同性目标。中华和合文化和“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价值基石，也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思想的文化基础。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和谐理念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共同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10]和合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追求的是多样性中的统一、差异性中的和谐。正是因为讲求和而不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不断迁徙融合，在交往中寻求生存发展，自在自为地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在格局，和谐共处中国疆域内。“大一统”思想的萌发有悠久的历史，而明确提出是在战国和秦汉之际^[11]。自秦朝以降，“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保留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沉淀了中国道路的文化底蕴。2019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12]让人民过上安宁富足的生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梦想，统一强盛是不同民族国家进行国家建设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亚非拉国家尤其是曾经经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兴国家，其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团结才能实现统一、发展和人民幸福，现代国家建设对团结合作的需求具有通约性。

三、共通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话语的历史逻辑

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重要法宝地位是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经验的总结，建构统一战线对外话语要讲清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外话语建构的历史逻辑主要涉及领导权、目的、同盟者利益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符合后发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需要。后发现代国家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不同政治社会力量有机整合起来，首先需要加强政治整合、形成政治秩序、确立政治权威。这就要求形成具有权威影响的领导力量，而这种领导力量的确立和巩固关键在于能够把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广泛地团结起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面对民族压迫和民族危亡的危急形势，中国社会各阶级、集团和先进分子进行顽强的斗争和积极的探索，但最终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其失败的原因很多，指导思想的局限性和政治领导力的不足是根本因素。中国共产党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领导力量的过程，也是其坚持统一战线团结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的过程。在

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超强的政治整合能力和领导核心地位在完成重大历史任务的实践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和认可。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在大团结大联合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历经反复检验、比较后的历史选择。在中国国家建设过程中，人民共和是中国现代转型的必然选择，将民众整合为有机整体则是重要前提，统一战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3]。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团结“多”为“一”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人民共和的现代政治精神，全面融入国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重要内涵。在这个意义上，统一战线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共通性方式。

西方国家主张从政治理性化入手，通过建立“一元性国民身份”实现从王朝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跨越。这种跨越往往缺乏对不同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以“政治国家”为名将不同社会力量聚集在一起掩盖了彼此间的矛盾。同时，为实现财富利益积累以及稳定发展，西方国家内部不同社会力量也以“国家”名义在国际活动中追逐利益。当国家的社会经济出现动荡或国家发展不稳定时，西方国家社会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矛盾就容易被激化，甚至出现分离思想，面临治理困境。一些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国家建设时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不仅掩盖了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还忽视自身的历史发展实际，最终导致在国家建设的最初阶段就面临失败，无法真正地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和稳定、发展。在面临国际动荡、社会撕裂、族群冲突、弱势群体抗争等挑战时，不少西方国家束手无策，其重要原因是整合政治力量的能力不足，不存在比较稳定的核心领导力量。在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的环境中，西方国家中的政治联盟充满功利性和短暂性。西方国家的这种政治现象不是否定政治联盟的重要性，而是由于无核心领导力量而无法用好“统一战线”法宝。美西方有关国家为转移内部矛盾而攻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了西方国家政治整合实践存在无法克服的困境。中西治理效能比较显示，核心政治力量与团结多样政治社会力量的制度安排有效科学与否尤为重要。

其二，实现民族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追求。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战略方针，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内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富强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救国、富国、兴国、强国创造有利条件。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是：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事实上，近现代以来亚非拉一些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也广泛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广泛联合反对殖民统治的力量。坚持内部团结、促进内部合作，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共同路径。从这个角度看，中外在统一战线促进国内共同体建设上具有历史经验共通性。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具有对外维度，对人类社会和平发展具有积极价值。统一战线对外话语建

构仅聚焦国内视野和民族复兴是不够的，还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利他”价值。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外交流与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独特贡献。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致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统一战线。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加强各国的合作与交流，以实现共同进步和发展的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旨在实现关乎整个人类的“世界梦”、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本身就内含了以“和”达“合”的实践途径与价值追求^[14]。在实践中，统战工作同样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要求“引导华侨、归侨、侨眷致力于祖国现代化建设，维护和促进中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致力于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合作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促进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鉴^[1]。这些实践和论述表明，统一战线对外促进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合作，促进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统一战线历史和现实的实然，也是中国统一战线未来工作要求的应然。

其三，注重合作共赢和相互促进体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治伦理。统一战线是不同政党、民族、宗教、阶层等群体基于共同利益结成的政治联盟，其成败的关键机制在于能否照顾同盟者利益。在百年统战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照顾同盟者利益。“中国共产党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内容、力度、方式，随不同历史阶段、同盟者具体利益和社会发展而变化，但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原则、路径和保障始终坚持不变。”^[15]统一战线追求合作共赢，反映了现代国家共有共享共治的政治伦理。中国共产党不但在大陆范围内联盟中强调合作共赢和相互促进，也在大陆范围外联盟中强调照顾同盟者利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要求“保护华侨正当权利和利益，关心华侨的生存和发展”，“推动和谐侨社建设，教育引导华侨遵守住在国法律，尊重当地文化习俗，更好融入主流社会，为住在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我国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秉持对中国、华侨华人和住在国三方有利的原则，积极贯彻“有利于海外侨胞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有利于发展我国同海外侨胞住在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方针，实现了三方合作共赢。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三大因素叠加下的国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16]新型国际关系主张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和创新，将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思维和理念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主张和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这种主张和行动彰显中国共产党促进国际团结的努力，致力实现国内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协同共进。

四、互动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话语的实践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对统战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推动统战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统一战线呈现出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巩固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要完整准确全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和重要使命，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凝心聚力。加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对外话语建构，需要进行良好、有效的国际传播与中外互动，重点阐释好如下方面的实践经验。

其一，阐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推进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经验，分享中国政治实践的有效方案。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是中外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它不单是新兴国家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美西方国家面临的现实难题。当前，一些美西方国家面临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的困境，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内部各方面的关系存在激烈的冲突因素，政治共同体中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丰富了统一战线话语中鲜明的“共同体”意涵，对新时代巩固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重要遵循，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加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对外话语建构，要深入挖掘我国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经验，展示中国政治实践的有效方案。

其二，阐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思维，展现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智慧和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发扬“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1]。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是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原则。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团结与斗争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蕴含的调节政治秩序的重要机制。这种重要机制既具有实践意义，也具有话语价值，有助于通过各领域统战工作实践对外传达我国治理智慧。鉴于华侨华人群体的多样化，尤其是国籍和认同的差异，以及受住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应分类施策、因地制宜，防范美西方有关国家对我国统一战线的污名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海外的建构，与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的建构有所不同，重在文化认同与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族群认同与民族谱系的构建以及跨国互动、共享社会经济网络的完善。

其三，阐释中国国家治理的合作性特征，讲好统一战线协商性和合作性的故事。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统一战线在参与和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理念、制度、主体、方法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具备协商建言、利益整合、民主监督等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各个方面融入国家治理之中，彰显了丰富的合作治理色彩。对外建构统一战线话语，要进一步讲好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统战故事”，

善于以“统战小切口”讲清“国家治理的中国风采”。

其四，阐释中国对外关系治理的互惠取向，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性互动。进入新时代，我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服务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随着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要更加关注“世界视角”，找到共有历史和观念、共享的利益和愿景，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建构广泛的朋友圈，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凝聚更多力量。我国可以通过中华文化的传承传播、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鉴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同时，对敌视中国、污名和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力量，要积极联合海外侨胞和友华力量予以坚决的批驳和回击。在具体实践中，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对外话语建构要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统一。

五、结语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可分为国内语境和对外语境两个向度。在国内语境下，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和有效实践路径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认识，而在对外语境下其仍面临话语挑战和话语重构的问题。在对外话语建构中，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国际话语传播要注重逻辑和路径建设，坚持通约性、共通性、互动性三大理路，完善理论、历史以及实践层次的话语建构和传播路径。加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对外话语建构，需要进行良好、有效的国际传播与中外互动。我国既要展现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特殊性，又要遵循中外统一战线推进政治力量整合的“普遍性”“正当性”等通约性理论逻辑；既要强调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作用的特殊性，也要阐明中外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叙事的共通性历史逻辑；既要加强阐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共同体意涵和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思维，也要加强阐释中国国家治理的合作性特征、阐释中国对外关系治理的互惠取向。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对外话语建构的总体目标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2-07-31 (1).
- [2] 罗振建, 林华山. 统一战线与中国话语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7 (1): 32-40.
- [3] 卢勇, 陈思. 统一战线话语权构建的现实困境与理论求索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6): 46-51.
- [4] 樊亚平, 李向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特殊话语表达——抗战时期范长江在国统区的公开言说与话语策略 [J]. 国际新闻界, 2018 (10): 157-176.
- [5] 丁俊萍, 颜苗苗.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权建构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3): 1-14+181.

- [6] 肖开容.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探讨：以林纾“融合”话语为鉴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80-190+214.
- [7]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2021-08-29（1）.
- [8] 朱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治理意蕴 [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2-16（7）.
- [9] 刘泓. 全球化与民族分裂主义 [J]. 人民论坛，2020（5）：125-127.
- [10] 习近平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2014-05-16（1）.
- [11] 郝时远. 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 [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20.
- [12] 高长武.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思想智慧 [J]. 瞭望，2022（21）：6-10.
- [13] 肖存良，林尚立.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 [14] 何虎生. 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指针——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N]. 光明日报，2022-08-04（6）.
- [15] 刘陶林. 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变”与“不变”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6）：16-19.
-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5.

责任编辑：林华山



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团结机制与实践图景

吕鹏 毕斯鹏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5)

摘 要: 随着新技术发展和社会形态持续变迁, 统一战线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和实践创新。无论是在网络社会、数字社会还是元宇宙社会, “爱国”精神都是统一战线的核心逻辑。在元宇宙时代, 将爱国精神转化为精神文化产品, 是新技术赋能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机制创新。基于元宇宙技术, 实现“爱国”精神文化的产品化、形象化、实体化、泛在化、沉浸化, 有利于提升民族自豪感和社会团结度。首先, 应建立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元宇宙生产机制, 包括个体级、群体级、国家级元素与产品的形成。其次, 应优化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元宇宙运行机制, 涉及“内循环”“间循环”“虚实循环”三重子循环机制。其中, “内循环”机制包括产品投放、产品使用、反馈与强化等过程, “间循环”机制包括国内元宇宙社区融入、华人元宇宙社区融入、国外元宇宙社区融入等, “虚实循环”机制包括数字孪生、虚实相融、虚拟原创、虚拟成真等逻辑过程。深入认知和前瞻布局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 有利于促进新时代统战工作创新发展, 更好地完成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 巩固中国人民大团结。

关键词: 网络强国; 元宇宙; 统一战线; 数字统战; 爱国精神; 文化产品; 中国人民大团结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5-0010-12

DOI: 10.13946/j.cnki.jcqi.2022.05.002

作者简介: 吕鹏, 中南大学社会计算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 之江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智能社会治理),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毕斯鹏,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8VXK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技术应用背景下数字社会特征研究”(19ZDA143)、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项目“符号亲附、品味杂食与阶层流动: 青年微信朋友圈‘晒结婚’”(2021zzts0006)

引用格式: 吕鹏, 毕斯鹏. 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团结机制与实践图景[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5): 10-21.

一、问题的提出

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责任；要做好网络统战工作，走好网络群众路线^[1]。当前，人类社会正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给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乃至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也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和国际政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顺应信息革命发展潮流，高度重视、统筹推进网信工作，推动网信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中，党中央着眼在信息化时代更好地实现国家团结，高度重视建设网上统一战线，推动统战工作创新发展。

2021年以来，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深度整合，人类开始进入元宇宙时代，这对国家、民族、认同产生重大影响。元宇宙的发展离不开区块链技术等底层支撑，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3]元宇宙作为区块链技术应用集成，是重要的社会发展方向^[4]。元宇宙在我国的发展具有雄厚的经济社会基础。2022年8月3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互联网基础建设全面覆盖。

元宇宙空间将成为统一战线的未来活动场域，这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开放空间，也是拥有各类思维意识、文化信仰、价值观的群体聚合空间。元宇宙技术将深化人类社会思维意识、价值观念、整体意义的整合实践。元宇宙的核心特征是在个体物质生活之外，创造独立的精神生活场域。元宇宙在激发个体、社会活力等方面可以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可能给社会带来深远的结构性冲击与运行风险，涉及社会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重大议题。元宇宙可能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可能会解构民族历史与文化自信，可能会解构国家政治权威。面对元宇宙这把“双刃剑”，我国要积极推动元宇宙治理，充分发挥新技术的团结效能，防范新技术的解构风险。鉴于此，有必要深化对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前瞻性研究。

此前，学界对元宇宙将在诸多层面服务国家发展已有一些论述。相关研究论及元宇宙时代的国家主权概念^[5]、国家战略创新^[6]、国家机构法律监管^[7]、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8]、政党政治^[9]、技术治理^[10]、数智治理^[11]等方面。学者们还关注了网络统战与数据安全治理^[12]、网络统战的生成逻辑和构建机理^[13]、数字统战^[14]、网络统战工作中量子化生存和离散式联结^[15]、网络统战与信息地缘政治^[16]、县级融媒体中心网络统战工作^[17]、民族地区的网络统战工作^[18]、网络统战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19]等方面。但是，目前对网络统战工作模式的研究具有局部性、个案性、碎片化特征，缺少涉及直入人心、生态优化、整体意义方面的研究视角。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是对未来统一

战线发展的理论前瞻，以网络统战工作为雏形阶段。网络统战工作的探索，为元宇宙时代统战工作前瞻提供了实践经验。网络统战工作需要向元宇宙模式稳健变迁、进化，因此相关研究需要前瞻元宇宙时代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爱国”是爱国统一战线的底线共识和公约数。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通过对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循环，有利于增进社会共识、达成最广泛的团结。本文使用的“爱国精神文化产品”概念，是指通过元宇宙技术实现产品化、形象化、实体化、泛在化和沉浸化过程。本文以“爱国精神”为核心视角，研究通过虚拟影响现实的机制，增强爱国精神和民族信仰。其中，本文重点研究元宇宙时代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机制和运行机制。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元宇宙生产机制，包括个体级元素形成、群体级元素整合和国家级产品形成。元宇宙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运行机制存在三重子循环，即“内循环”机制、“间循环”机制、“虚实循环”机制。

二、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元宇宙生产机制

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统战工作如果仅面向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对象，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通过工作机制创新，增强“对人的影响”，实现工作效果最大化。依托元宇宙空间，统战工作的“代表人士—所联系群众”影响力传递机制将得到极大加强。这是因为，元宇宙空间可通过“虚拟化身”影响到每一个人。在元宇宙空间，核心角色内容主体是“虚拟化身”（Avatar），即“虚拟数字人（Metahuman）”^[20]。虚拟化身是现实世界中的人在虚拟世界中的延伸与映射，是综合利用数字技术对人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全方位模拟^[21]。虚拟化身更适应对虚拟空间的体验，促使个体与他人分享对虚拟环境的共同认知。元宇宙中的数字身份与现实世界的社会身份存在对应关系。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的信息来源于现实空间的复制与输入，以及虚拟世界中各种交互活动的产出，这些信息的交互形成了虚拟数字人在元宇宙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记录，亦即“数字记忆”^[22]。基于记忆数字人设计“虚拟数字人”数字记忆产品，有助于从社会、文化层面构建虚拟数字人（真人数字人、原生数字人）身份认同和元宇宙价值体系。元宇宙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循环生产机制，就是“虚拟化身”的“数字记忆”形成、收集、整合、设计和制造过程。

（一）个体级元素形成：爱国元素的继承与叠加

个体级元素形成阶段是“虚拟数字人”和“数字记忆”形成过程，能实现个体爱国元素的继承与叠加。爱国统一战线的核心机制是增进团结、形成共识，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元宇宙技术能够促进这一意识共同体和力量共同体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意识也是物质的一种”^[23]观点将在元宇宙社会得到更加直接和充分的证明。人的意识作为一种可存储、可调用、可修改的数据性存在形态，将成为元宇宙社会的广泛算法实践^[24]。人类已经进入“万物互联”时代^[25]，正在进入“万脑互联”时代。“万脑互联”实现物质的大规模联系后，将开启个体生命“意识”的大规模存储、处理和联系。因此，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将重点围绕“爱国”意识的存储、处理、联系，实现价值观协同。各党派、各民族等各方面的智慧将共同上传至元宇宙，全体中华儿女将同步共享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成

就。全体中华儿女的意识将最大限度地长久存在于元宇宙社会空间之中，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之不朽和永生^[26]。从传统社会到元宇宙社会，传承先辈遗志、铭记历史使命将不再只是间接性传递，而是直接将中华民族意识输入子孙后代的思想意识之中。这不仅是意识的技术性突破，更是文明的传承性变革。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需要不断收集、整理、上传、保存和输送团结奋进、坚强不屈的爱国精神，赓续中华民族文化火种与中华文明基因。

（二）群体级元素整合：爱国文化的互动与互补

群体级元素整合是“虚拟数字群体”的“群体数字记忆”形成过程。在元宇宙社会，个体或群体之间产生大量互动，促进共同知识（爱党、爱国、爱中华民族精神）乃至公共领域（爱国行动等）的形成。要将群体互动纳入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机制之中。除了人类化身群体外，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机制还涉及智能机器人群体。要深入人工智能领域，在研发、投入使用等阶段就将爱国精神纳入底层逻辑和思维意识中^[27]。将“元宇宙人工智能”“元宇宙机器人”“元宇宙NPC”等^[28]纳入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是重要内容。个体间在元宇宙的社会关系将形成两种群体互动类型：一是元宇宙个体间生命互动形成的群体互动，包括组建团队、完成任务、建立社交纽带等新的交往形态，将爱国精神放在团队精神的重要位置；二是元宇宙个体间意识互补形成的群体互动。两个个体的意识互补至少涉及四个生命单元，即彼此的真实生命和元宇宙生命，而多个个体的意识互补将更为复杂^[24]。元宇宙空间能够在意识传递过程中，将爱国精神深深地刻入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意识与生命过程之中。

（三）国家级产品形成：爱国精神的编辑与定制

该阶段是“虚拟数字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数字记忆”形成过程，能够实现国家层面爱国精神的编辑、定制。爱国元素文化产品的开发与设计，能够借助智能穿戴全覆盖插上创意的翅膀。元宇宙用户借助智能穿戴设备进入产品剧本，便能感受到身临其境的现场感^[29-30]，从而提升爱国教育、爱国元素文化产品设计的新境界。比如，《红楼梦》跨超本“口袋书”、腾讯和故宫博物院联合创作的故宫文化VR电影、国风手游^[31]等，都是可以进入“元宇宙工厂”并进一步融入民族精神而再创作的文化产品。首先，在精神内涵层面，通过元宇宙技术对目前文化产品的爱国精神内涵进行深入挖掘，从内涵与精神层面进行解读与呈现^[32]。其次，在形式展现层面，通过元宇宙技术将文化符号通过多种方式融入人们的元宇宙工作、学习、生活和娱乐等活动中，破除同质化现象，展现不同领域不同剧本的鲜明特色。最后，在形象设计层面，既要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展现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魅力，建立“中式审美标准体系”，又要便于传播和进行国际化创作，符合流行和时尚的审美标准，激发消费者的购买和体验欲望。要通过文化背景赋予产品的品牌价值，打通元宇宙分销渠道，利用特色品牌产品，让元宇宙消费者与产品之间产生共鸣，在个体和群体的全面参与中形成国家层面的爱国精神文化产品，形成从微观到宏观再回到微观的生产循环。就真实物理世界而言，精神文化产品不再只具有装饰性、延伸性，而具有独立性、自主性。

在元宇宙空间，国家应掌握爱国精神的编辑与定制的技术权、阐释权、领导权。个体将存在对生命的编辑、定制、改造等精神需求，元宇宙技术为其实现提供多种可能性。一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个体的生命价值，但另一方面存在导致“精神”缺失的可能。由于生命可以被存储为数

据形态,并通过“脑机接口”技术进行下载、上传、计算、交互,元宇宙生命也可以被修改、编辑、定制。编辑之后的元宇宙生命数据,通过“脑机接口”设备,再次输入到个体大脑意识,完成对生命个体的状态更新。在此过程中,元宇宙公民的思想和意识存在被恶意篡改的可能性,因此牢牢把握个体“生命历程数据库”,将民族精神“火种”数据保存并传播开来,保障元宇宙时代国家和民族能够形成团结、合作和认同的意识共同体的统战目标实现,是“元宇宙中国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这是应对元宇宙空间可能存在“记忆删除”风险的需要。元宇宙可以发展记忆敲除技术,元宇宙生命也可以删除某些特定时间的序列数据。假如“元宇宙中国公民”被恶势力定向删除民族记忆和民族精神,那么中华民族将失去精神脊梁,影响国家长远发展。当然,由于还可能出现类似群体记忆错乱问题,元宇宙生命数据可能在某些时段被嫁接、调换。因此,对于生命数据的绝对掌控是摆在“元宇宙政府”面前的重要科技资源和精神文化命脉,不能落入别国或势力、集团、个人手中。“元宇宙政府”应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保证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的数据“火种”行稳致远和发扬光大。

三、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元宇宙“内循环”机制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规定:统战工作范围包括 12 个类别;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为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实践中,统战工作主要按身份、区域等属性分类开展,通过代表性人士发挥对所联系群众的影响。线下空间的传统统战工作模式具有面对面的直接特点,有利于体现亲和力和直接性。但是,传统统战工作模式由于受到时空条件限制,存在对工作对象的立体特征和现实动态了解不尽全面、统战工作对象转化为“统战工作主体”的主体间性不强等不足。

面对这种不足,元宇宙“内循环”机制能够使工作对象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沉浸,调动统战工作对象的自发性和自主性。“内循环”机制作为第一重循环,代表每一个元宇宙内部的精神元素循环。一个元宇宙就是一个独立的精神系统综合体,有完整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循环形态。在理想状态下,无需参与其他元宇宙或现实世界的交互,内部循环可以保持长时间稳定运行。同胞之间通过爱国精神文化产品可以产生大量的互动过程,使得不同民族、性别、年龄和宗教信仰的同胞彼此加深理解、增进友谊、强化联系。爱国精神文化产品“内循环”可以实现民族、性别、年龄等同胞属性的生命互换,完成更为深刻的生命互动和生命体验。另外,设置元宇宙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还可以扩展元宇宙工作机会。剧本是元宇宙空间内容性、本质性定义^[33],是设置联合任务的基本框架。通过元宇宙剧本、内容、角色等设置联合任务,“元宇宙中国”能够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建设,打造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元宇宙技术将通过一系列剧本角色设计来设置联合任务,提供公共精神文化产品,实现个体属性状态的自由切换和选择。融洽元宇宙身份属性关系,有利于加强全体中华儿女的内在交流、合作与互助,完成联合任务,深化“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团结感、归属感、幸福感以及不同属性同胞之间的联系。

(一) 爱国精神文化产品投放:国家和机构提供

在元宇宙时代,对文化产品原生空间的重塑不是简单复刻与原样呈现,而是重构。这种文化产

品的活化不会对爱国精神的原真性构成威胁，因为爱国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承载爱国精神的实体空间滋养了原真性的两个侧面，并使其不断对话。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一生的栖居之地具有原初特点，同时新一代人又不断为自身创造特色。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作为场景分析的三个要素^[34]，也可以作为元宇宙时代爱国精神文化产品原生空间重构的重要抓手。具体地讲，可以在洞察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在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空间体验过程中融入探险、竞技、悬疑等多种元素，塑造能够满足用户探索真我、表现自我及培养使命感的故事化文化场景，将爱国精神文化产品制作与表演体验任务化，并形成主动分享机制，以需求带动产业，实现爱国精神文化产品原生空间的活化与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转化。

（二）爱国精神文化产品使用：个体和人群享受

随着 5G、VR、AR、AI、数字孪生及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元宇宙将从需要佩戴多种 VR 配套设备的初级阶段过渡到通过脑电信号使人脑与机器相连的高级阶段，这为爱国精神传承的产品化提供了更优的解决思路。从口语到手写、从报纸到广播、从电视到互联网，媒介的更迭不仅是时代巨变的重要标志，也颠覆并重构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元宇宙的出现将继续扩展人体延伸的范围，改变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将为爱国精神的活态化传承、数字化生存提供技术支撑。在爱国精神文化产品使用阶段，元宇宙技术模拟多重感官，重塑爱国精神原生空间；元宇宙技术从虚拟现实到脑机接口的发展，营造拟真爱国精神体验。一般的图片、文字、音视频等只调动视听感官，而元宇宙可以通过 VR 辅助设备和脑机接口增强用户参与感，使其获得多种感官感受，实现文化产品的体验式发展。VR 通过设备轻量化和多感官拟真发展将在元宇宙获得更广泛的应用，如嗅觉、触觉、力感等将得到更好的体验。在元宇宙空间，爱国精神文化产品使用也是统一战线的团结和引导过程。个体和群体深度接受和体验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能够使各党派、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等各方面力量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在元宇宙空间的大团结大联合。

（三）爱国精神文化产品反馈与强化：一种双向互动

在产品使用阶段，数字孪生和 VR 等技术实景化呈现不同地域的自然风光、模拟不同时代中华民族生活的场景，以特定的地域空间唤起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自豪感，以情感为纽带提升青年人对爱国精神传承的使命感。元宇宙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能够通过实现远程群体聚集，打造爱国精神互动仪式，突破地域限制，实现远程共在。人是爱国精神传承的核心与关键。在元宇宙时代，国家主体不仅要为用户构建沉浸式的爱国精神体验情境，还要打造互动仪式链，激发用户对爱国精神的情感能量，从而使其产生自觉进行爱国精神传承的道德感。在元宇宙时代，打造互动仪式链的特别限制条件将得到满足，用户有机会通过脑机接口进入虚拟的爱国精神仪式情境当中，并在这种虚拟仪式情境中实现远程的群体聚集，远程参与爱国精神活动。在互动仪式之后，用户出于获取社交货币的需要及对爱国精神文化的道德感，会自发传播参加爱国精神活动的感受，这有助于带动更多用户进行爱国精神体验。另一方面，要发挥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交功能，建设一支积极向上的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队伍，引导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

成功打造爱国精神互动仪式链，还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注意将传统仪式和双向互动相结合，使用户在参与某项爱国精神仪式的过程中可以与其他爱国精神仪式的体验者进行互动，发挥即

时社交功能，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为爱国精神体验注入情感价值。第二，要招募对爱国精神文化具有高度情感能量储备的个体，塑造爱国精神体验的代表性人士，引导他们既创造关注焦点，又激起他人对爱国精神共有的情感。当爱国精神体验代表性人士与消费者共同参与爱国精神互动仪式时，他们的号召力就可以激发人们的从众心理，催生集体兴奋。这有助于互动仪式的成功开展，实现消费者情感能量的累积，从而达到增进团结、形成共识，更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

四、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元宇宙“间循环”机制

网络社会、数字社会快速发展，虚拟世界对主观精神的影响作用巨大，也给国家安全发展、社会秩序稳定造成了不小的挑战。线下统战工作模式难以触及部分个体和群体的思维意识深层，而元宇宙“间循环”机制能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实践方案。元宇宙“间循环”机制刻画的是不同元宇宙社区之间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互通。随着区块链、加密货币使用的普及，元宇宙能够走出封闭循环，变成彼此连接的开放循环，使跨元宇宙的文化产品互通变为可能。一方面，元宇宙用户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介入元宇宙政策的制定，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以群体智慧促进元宇宙社会的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元宇宙空间可能存在数据霸权现象，即逐渐形成少数拥有海量数据资源的寡头，控制多数元宇宙个体数据，实现思维意识和价值观念操纵，形成分裂、对抗、反对的意识形态，这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将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融入元宇宙“间循环”，是发挥元宇宙公民智慧来防范数据霸权的重要机制，是精神公共领域长期保持和谐健康发展的核心要件，也是保障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一）国内元宇宙社区融入：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维护国家政治权威

元宇宙在带来贴近传统精神文化产品更深层次沉浸式体验的同时，也能使消费者体验到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便携性。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借助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数字化采样进行景观化呈现并映射到虚拟世界中，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元素打造的虚拟形象与线下社区的结合，虚拟文化社区的社交圈、文化人物服饰等货币交易^[11]，都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在元宇宙时代，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统一战线，融入统战思维。一方面，元宇宙爱国精神文化产品促进群体的爱国互动。现实世界由于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群体间开展工作和活动受到资源限制、时空限制、人口数量限制，能够深入直接参与精神活动的群体数量有限，多数个体无法深刻、自如地体验爱国精神文化产品带来的精神产品补给。而在元宇宙爱国精神文化产品使用中，这些限制将在最大程度上得到破解，趋于无限的时空环境（元宇宙空间）可容纳更多的公民（用户）实时体验爱国精神文化产品，为国家政治在元宇宙空间树立权威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元宇宙爱国精神文化产品促进爱国力量的团结和谐。元宇宙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使用主体是全体中华儿女。元宇宙爱国精神文化产品可以将全部成员纳入，实现大团结大联合。

（二）华人元宇宙社区融入：优化有机团结氛围，增强中华民族自信

元宇宙爱国精神文化产品有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全体中华儿女的自豪

感、幸福感来源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包括面对外来侵略救亡图存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这些精神要素需要在元宇宙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在元宇宙空间，虚拟空间的劳动和互动更容易给个体带来归属感、幸福感，实现虚拟货币、元宇宙财富、元宇宙社会等级的增长。不良的剧本将导致物质化、庸俗化和狭隘化，消解作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和幸福感，甚至带来分裂、对抗、反对的意识形态，导致解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自信、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风险。为此，必须将爱国精神文化产品作为华人元宇宙社区的重要应用产品，充分激发元宇宙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吸引力，赋予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和增进团结、形成共识的统战意义，确保元宇宙发展遵循正确的轨道。向华人元宇宙社区投放爱国精神文化产品，可使全体中华儿女全身心体验“中华民族属性库”各种类属，增进同胞间的友谊与认同；团结各类爱国团体，组织爱国主义活动，增强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自信。

（三）国外元宇宙社区融入：抢占虚拟意识空间，反击历史虚无主义

爱国精神文化产品完成国内元宇宙社区、华人元宇宙社区融入后，将进入国外元宇宙社区融入阶段。元宇宙可以实现个体的生物属性自由和社会属性自由^[35]，这可能导致元宇宙公民的历史虚无主义。元宇宙公民可能不再关注过去和历史，只关注当下的主观感受。一方面，人们可能不再关注过去发生的历史，因为这会带来记忆负担、占用大脑内存^[36]，而且与当前体验并无直接关系。面对两条道路、两种制度延续到线上虚拟空间的全方位斗争趋势，着力防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线上空间对我国的渗透风险，有必要将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积极融入国外元宇宙社区。这有助于化解资本主义国家元宇宙剧本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的负面影响。受到资本逻辑的驱动，资本主义国家元宇宙剧本为了获得最大化利益，可能会为了商业利益而专注个体最大化虚拟时空体验，进而提供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剧本。这类剧本不能客观表达与现实世界相一致的历史事实体验，可能出现扭曲中国历史、抹黑中华民族等负面话语。另一方面，受资本恶意控制的元宇宙产品，倾向于促使人们不再深入思考，进而给元宇宙公民提供缺乏营养的精神快餐。个体意志的沉沦可能带来民族精神的消解，使国家竞争力遭受重创。为此，要将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融入国外元宇宙社区，树立、维护和强化国家形象、中华民族形象，防范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外部输入和渗透。

五、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虚实循环”机制

当前，网络统战工作主要发生于信息传播、工作联络、数据统计等初级场景，传播力、互动性不强。顺应数字时代的全面到来，信息时代的统战工作需要融入数字形态思维，实现创新发展。元宇宙空间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第三重循环，重点在打通线上和线下传播的壁垒，形成面向代表性人士和相关群体统战工作的全天候、全生命、全周期覆盖，实现元宇宙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虚实循环”。伴随着增强现实、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虚实之间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容易。爱国精神文化产品在不同时空、主体和领域的生产阶段中分别完成，最终实现虚拟产品对现实世界的塑造。在“虚实循环”机制下，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中“领导与团结”“代表性人士与所联系群众”“统战工作对象的主客体互转”等关系将发挥更大的效能。

（一）数字孪生：现实映射虚拟阶段

元宇宙可通过图形建模、拟态仿真等技术在虚拟空间复制爱国元素（历史人物形象、史料、节日活动、民族服饰、非遗、现代人物形象、场景等）。在网络虚拟空间再造一个与物理世界匹配、对应的孪生世界，数字化同样可模拟现实世界空间内爱国元素。未来在元宇宙空间将存在一个与物理空间中物理实体对象完全一样的数字孪生体，进而形成产品数字孪生体。比如，物理世界的人民英雄事迹有对应的人民英雄事迹数字孪生体，通过进一步艺术化加工而形成爱国精神文化产品数字孪生体。具体来说，爱国精神文化产品数字孪生体是指爱国元素物理实体（历史人物形象、物料、视频、场地等）的运行过程和活动状态在虚拟空间的全要素重建及数字化映射，是一个集成的多物理、多尺度、超写实、动态概率仿真模型^[37]所形成的虚拟现实只读数据包。爱国精神文化产品数字孪生体基于元宇宙产品设计阶段生成的产品模型，并在随后的产品制造和产品服务阶段，通过与爱国元素物理实体之间的数据和信息交互，不断提高自身的完整性和精确度，最终完成对爱国元素物理实体的完全和精确描述。比如，元宇宙空间可以技术孪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光辉历程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丰富的人物、典故、事迹等，发挥这些具有丰富统战元素的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教育、团结、引导功能。

（二）虚实相融：虚拟与现实交互阶段

当元宇宙发展达到成熟阶段，现实空间信息与虚拟空间信息高度联通融合，虚拟空间将反作用于现实空间。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虚实相融体是指爱国元素物理实体在虚拟空间的全要素重建及数字化映射形成爱国精神文化产品数字孪生体后，进行开源设置，增加可编辑、可操作、可创造的功能所形成的虚拟现实可编辑数据包。其可用来模拟、创造、改变、完善爱国元素物理实体在现实环境中的活动过程和行为状态。民族节日和民族文化产品虚实相融体是虚实相融阶段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展现形式。物理社区的民族节日活动首先完成第一阶段的数字孪生，生成对应的社区民族节日活动数字孪生体，进一步加工形成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虚实相融体。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元宇宙中，用好民族节日产品虚实相融体，有利于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比如，可在元宇宙体验和编辑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节日产品虚实相融体，或者壮族的“三月三”、布朗族的厚南节、傣族的泼水节等节日产品虚实相融体；还可以体验各种非遗文化表演、特色民俗竞赛和各民族优美歌舞等民族文化产品虚实相融体。元宇宙将中华各民族文化通过产品虚实相融体的形式传播到全社会和全世界，并提供可编辑、可创新的开源数据包，有利于各族人民加深了解，增强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的认同感，增强爱国精神文化的持久性和生命力。

（三）虚拟原创：虚拟超越现实阶段

将第一阶段的爱国精神文化产品数字孪生体和第二阶段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虚实相融体，加入物理实体未有的元宇宙原创爱国元素，进行可感知、可编辑、可交互的功能设置，能够形成不同爱国精神文化产品剧本，以及分装整合成数据包、剧本包、剧本集和剧本库等不同量级的爱国精神文化产品数据库。爱国精神文化产品数据库形成虚拟原创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设置大团结大联合任务，有利于实现虚拟超越现实。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也是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本质内核。一方面，元宇宙赋能现实统一战线组织和团体，丰富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虚拟原创体框架，有利

于激发元宇宙中同胞参与任务执行。元宇宙技术可以跨越时空障碍，使得各党派和各族各界人士能够更加畅通地参与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虚拟原创体的创作。另一方面，元宇宙建立“爱国者联盟”，以其作为生产原创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虚拟原创体内容的机构，吸纳国内外同胞进入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虚拟原创体的使用 and 创作中，从而催生出新的爱国元素和爱国情感。个体通过参与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虚拟原创体的创作，有利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为爱国者的智力、才能和爱国品质的充分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和空间。元宇宙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虚拟原创体的生产和使用，有利于汇聚全民族同心奋战的洪流，齐心协力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

（四）虚拟成真：虚拟影响并改造现实阶段

人工智能、计算机仿真等技术推动虚拟空间的真实性不断增强，爱国精神文化产品不再仅仅参照现实空间环境的模本，而是从被动映射变为主动创造，从虚拟空间生成的原创爱国元素通过积累转化，最终成为影响现实社会的现实爱国力量。元宇宙爱国团体和爱国运动是这一阶段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虚拟成真体的重要展现形式。爱国团体和爱国运动在本质上是维护国家主权、维护人民利益的团体和运动^[38]，是在危难之际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在发展之中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有序开展活动的区域性、全国性或全球性团体和运动。“元宇宙人民”通过对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虚拟原创体的使用，运用“元宇宙爱国者联盟”，能够进一步创作出各类“元宇宙爱国团体”等原创产品，自行设置“元宇宙爱国运动”等原创任务，并从线上扩展至线下，最终形成虚拟影响现实的联动目标。通过对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使用 and 创作，生活在当下的“元宇宙人民”可以真实体会、理解爱国团体和爱国运动的背景、使命、任务和影响，将爱国精神融入个体的身心，并设计创作新的“元宇宙爱国运动”，吸引元宇宙成员参与“元宇宙爱国运动”的剧本展现和任务执行。当然，元宇宙爱国团体和爱国运动等爱国精神文化产品，要始终保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只有坚持爱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元宇宙爱国团体才能更加有序开展“元宇宙爱国运动”的剧本设计和任务设置。只有将元宇宙产品的使用和反馈设置为虚拟影响现实的联动运行机制，才能更好地起到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的现实作用。

六、结语

展望元宇宙时代，在现实世界中作为重要法宝的统一战线，将在元宇宙场域中发挥出更大的团结效能。元宇宙技术实现爱国精神的产品化、形象化、实体化、泛在化和沉浸化，形成爱国精神文化产品，实现虚拟影响现实，有利于增强中华儿女的爱国精神和中华民族信仰，巩固中国人民大团结格局，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要尤其注重“精神”的具象化，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爱国精神”产品化、形象化、实体化、泛在化和沉浸化，巧妙融入人们喜闻乐见的产品之中。无论是影视剧作品、服饰产品，还是生活用品、儿童玩具、文创产品，抑或虚拟世界的“数字人”，都可以成为“爱国精神”载体，吸引人们体验产品的同时，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连接人们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工作和生活，连接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情感，连接历史与当下。这些都将是新时代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有益探索。

当然,元宇宙空间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和风险。元宇宙时代是精彩纷呈、色彩斑斓、虚实结合的时代,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定力和信念,人很容易沉迷其中,因此应在适当时机建立“元宇宙反沉迷机制”。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实践意义,包括时刻提醒人们不要沉醉其中,及时唤醒个体和群体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着眼元宇宙时代个体和群体互动形态的发展变化和新趋势,要通过爱国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运行,从传统的个体、片段、填鸭式灌输思维转向系统、整体、全周期、沉浸式创生思维。元宇宙技术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技术特征,正快步向我们走来。深入认知和前瞻布局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促进新时代统战工作创新发展,更好地完成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巩固中国人民大团结。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2-07-31 (1).
- [2] 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 [N]. 人民日报, 2018-04-23 (1).
- [3]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 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N]. 人民日报, 2019-10-26 (1).
- [4] 赵星, 乔利利, 叶鹰. 元宇宙研究与应用综述 [J/OL].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1-13 [2022-07-04]. <http://libdb.csu.edu.cn:80/rwt/CNKI/http/NNYHGLUDN3WXTLUPMW4A/kcms/detail/42.1812.G2.20220629.1127.002.html>.
- [5] 张爱军, 周杨. 元宇宙与虚拟空间共同体的建构 [J]. 行政论坛, 2022 (4): 21-28.
- [6] 翟崑. 元宇宙与数字时代的国家战略创新 [J]. 人民论坛, 2022 (7): 26-29.
- [7] 季卫东. 元宇宙的互动关系与法律 [J]. 东方法学, 2022 (4): 20-36.
- [8] 唐远清, 张月月, 赖星星. 媒介视域下元宇宙未来研究的要求及展望 [J]. 新闻界, 2022 (6): 57-64.
- [9] 孙会岩. 元宇宙政党政治: 议题、风险与治理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 96-105.
- [10] 董扣艳. 元宇宙: 技术乌托邦与数字化未来——基于技术哲学的分析 [J]. 浙江社会科学, 2022 (8): 113-120+160.
- [11] 任兵, 陈志霞, 胡小梅. 时空再造与价值重构: 面向未来数智治理的元宇宙 [J]. 电子政务, 2022 (7): 2-15.
- [12] 范玉吉, 张潇. 数据安全治理的模式变迁、选择与进路 [J]. 电子政务, 2022 (4): 114-124.
- [13] 郭振雪. 新时代中国网络统一战线的生成逻辑和构建机理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12): 190-194.
- [14] 谢静. 数字统战前瞻: 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新型建构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3): 1-8.
- [15] 谢静. 新媒体时代的量子化生存与离散式联结——论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统战工作创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3): 17-23.
- [16] 马立明. 从信息全球化到信息地缘政治: 互联网思维逻辑的演进与趋势 [J]. 国外社会科学, 2021 (6): 84-95+158.

- [17] 谢新洲, 杜燕. 县级融媒体中心舆论引导的三个核心问题: 对象、内容与方式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10): 26-30.
- [18] 李京桦, 华锋. 新时代民族地区网络舆情治理效能提升的创新逻辑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1 (4): 69-75.
- [19] 聂智, 肖皓文. “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学习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 (8): 27-32.
- [20] 铁钟, 夏翠娟, 黄薇. 元宇宙中的数字记忆: “虚拟数字人”的数字记忆产品设计思路 [J/OL]. 图书馆论坛: 1-9 [2022-08-0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20420.2100.002.html>.
- [21] 衡书鹏, 赵焕方, 范翠英, 周宗奎. 视频游戏虚拟化身对自我概念的影响 [J]. 心理科学进展, 2020 (5): 810-823.
- [22] 谢新水. 虚拟数字人的进化历程及成长困境——以“双重宇宙”为场域的分析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 (6): 77-87+95.
-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23.
- [24] 吕鹏. 元宇宙技术与人类“数字永生” [J]. 人民论坛, 2022 (7): 21-25.
- [25] 王义桅.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基础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2 (7): 14-17.
- [26] 刘明. 论先秦时期“不朽观”的嬗变及其在思想史中的地位 [J]. 云南社会科学, 2007 (2): 122-125+129.
- [27] 蒋军营. 智媒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分析 [J]. 新闻爱好者, 2021 (10): 76-79.
- [28] 郭艳. 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制度难题及破解 [J]. 中国出版, 2018 (12): 67-69.
- [29] 张磊. 元宇宙图书馆: 理论研究、服务场景与发展思考 [J]. 图书馆学研究, 2022 (6): 9-17.
- [30] 石磊, 张笑然. 元宇宙: 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场域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 (3): 36-42.
- [31] 许瑞齐, 姜天馨, 白建强. 元宇宙背景下传统丝路文旅产品的研究与发展 [J]. 商业文化, 2022 (13): 16-18.
- [32] 冯刚, 陈倩. 解构与重构: 元宇宙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其应对 [J]. 探索, 2022 (3): 166-175+2.
- [33] 吕鹏. 国家“元宇宙社会”治理前瞻性研究 [J]. 科学·经济·社会, 2022 (4): 1-12.
- [34] 尼尔·亚伦·西尔, 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 场景: 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 [M]. 祁述裕, 吴军,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46.
- [35] 吕鹏. “元宇宙”技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J]. 产业经济评论, 2022 (1): 20-27.
- [36] 邵国松, 杨雯. 情绪管理理论的起源和应用 [J]. 国际新闻界, 2012 (2): 26-29.
- [37] 庄存波, 刘检华, 熊辉, 等. 产品数字孪生体的内涵、体系结构及其发展趋势 [J].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2017 (4): 753-768.
- [38] 李永胜, 李威威.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经验 [J]. 中州学刊, 2021 (10): 1-6.

责任编辑: 林华山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强国复兴的团结底色

李应瑞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产物，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蕴含着深厚的统一战线底色。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经历了团结救国、团结兴国、团结富国、团结强国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积累了宝贵经验，体现在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以推进理论实践创新为不竭动力、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重要保障等方面。新征程上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和基本任务，坚持党的领导同坚持人民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筑牢共同思想基础同立体制度建设相统一，提升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效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巩固团结与确立核心、加强团结与发扬民主、促进团结与坚持斗争、加强国内团结与促进世界团结、弘扬伟大团结精神与完善团结制度、保持政治团结与增进广泛领域的团结等多个维度，需要深化对“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的讨论。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统一战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儿女大团结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5-0022-13

DOI：10.13946/j.cnki.jcqi.2022.05.003

作者简介：李应瑞，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批判解构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22M710242）

引用格式：李应瑞.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国复兴的团结底色[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5）：22-34.

一、问题的提出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用“十个明确”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第二点为“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精辟概括，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方向指引。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相关文献从历史演进、发展逻辑、显著特征、世界意义等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有学者从“三阶段论”^[2]、“四阶段论”^[3]、“五阶段论”^[4]等角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进过程。有学者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思想^[5]、现代化构想^[6]、现代化观念^[7]、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8]、现代化话语体系^[9]等方面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思想观念的嬗变。有学者从历史逻辑^[10]、理论逻辑^[11]、实践逻辑^[12]、文明逻辑^[13]等维度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逻辑。还有学者从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及理论的超越^[14]、对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及理论的超越^[15]、推动现代化理论的变革与发展^[16]等方面探讨其理论意义，从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方案^[17]、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超越性意义^[18]、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19]、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0]、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2]等方面探讨其实践意义。一些文献通过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阐明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内涵、时代意义和实践要求。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开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还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1]。有学者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径、动力和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牵引和载体^[22]。还有部分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要求。比如，有学者强调发扬中国共产党的英雄文化有助于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23]。相关文献较为清晰地阐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问题，但待进一步拓展研究视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共同奋斗的产物，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格局，这种格局具有鲜明的统一战线底色，但目前鲜有文献从统一战线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统一战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决议》用“十个坚持”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其中第九条是“坚持统一战线”：“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

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1] 100} 2022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 5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强调“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4]。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25] 这些论断表明，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宏伟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和实践要求就是坚持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服务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能够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和力量。坚持统一战线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凝聚一切力量的社会动员优势，也需要全体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在我国的同心圆政治架构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同时通过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展“人民”的力量，动员最大范围的力量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在这个意义上，统一战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者之间形成关联结构。鉴于此，本文基于“统一战线—团结奋斗—强国复兴”的三维结构，分析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宝贵经验和实践要求。

二、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24]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奋斗史。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25] 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团结救国、团结兴国、团结富国、团结强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统一战线团结救国

民族独立是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

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26] 中国的现代转型是在外敌入侵形势下被动地开始的，近代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世所罕见，中国革命形势极其复杂，单单依靠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都难以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统一战线团结救国，取得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史，实质同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相一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经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进程，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一是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主张^[27]，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要“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27] 139}，为推动国共合作和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下，中国共产党联合其他社会各阶级中的革命力量掀起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二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便走向破裂，中国共产党在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提出了与农民建立联盟的主张，反抗封建压迫、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成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的”^[28]的苏维埃政权蕴含着工农联盟的团结底色，农民、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推动革命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人民共和国的阶级主体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29]，大大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统一战线“法宝论”^[30]，指明了统一战线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战略地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四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国共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6] 1237}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逐步建构起包括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4月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民协商建国的序幕。

经过28年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积极合作下，在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由此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通过统一战线团结兴国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便强调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继续完成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及伟大成就，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巩固了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承担着“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力量，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及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恢复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条件”^[31]的重要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统一战线视为继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重要保障。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强调，为了实现“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的目标，“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32]。中国共产党“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32] 184}，团结人民战胜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在各方面取得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1953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点说明》中指出，三年来的成绩是由于“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努力”，表示“除了那些反革命分子、不爱国的分子以外，凡是一切爱国者、能够团结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而且永远是这样”^{[32] 259}。同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以“一化三改造”为核心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33]统一战线由此从一种革命策略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战略。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学习优先发展重工业加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迅速打下了工业化基础。不过，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迷信苏联经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际“已经把如何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国是论衡的重大问题提上了日程”^[34]，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探索。1956年，毛泽东多次提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明确了“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35]。1956年9月，党的八大制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实践。党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关系、民族关系等方面作出重要论断，

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士的大团结大联合。中国共产党结合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创立了包括“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36]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拓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夯实了物质基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通过统一战线团结富国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入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明确用“小康”定义20世纪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现水平，形成“三步走”建设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在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三大任务”要求必须继续坚持人民大团结大联合。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1979年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强调：“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37]。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38]，把原来“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提法改为“爱国的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由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982年，宪法进一步明确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内涵和外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39]在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价值形成清晰认识的基础上，中共十二大对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作出新阐述，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不断扩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40]爱国统一战线发展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40]⁸⁹⁰的联盟，进一步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爱国统一战线凝聚各方面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撑。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统一战线团结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

思考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于强国复兴的重要作用。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进行全面部署，建立起空前广泛和包容的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崭新条件。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2015 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纳入统一战线范围，将统一战线性质发展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41]。统一战线进一步被纳入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全局，实现了由重要战略到治国方略的发展。2015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统一战线是“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力气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41] 556}。2018 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补充到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范围中，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法治基础。2020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强调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42]，赋予了统一战线“法宝论”新时代内涵。统一战线新“法宝论”的提出，深刻阐明了统一战线与民族复兴的内在关系，统一战线对实现强国复兴的重要作用得到进一步彰显。2021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强调，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用好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大多数，搞好大联合，不要四面出击，不搞关门主义”^[43]。2022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2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把统一战线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经过全体人民团结奋斗，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三、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宝贵经验

《决议》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十个方面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百年历程，实质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蕴含着深厚的统一战线底色。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奋斗积累的历史经验，也蕴含在其他“九个坚持”之中。这些经验深刻反映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内在规律。

（一）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

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关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发展的，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新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26] 1287}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25]在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围绕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实践探索。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准确地认识到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要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后“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放弃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而宣告破产，大革命也走向失败。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同盟者排斥在外，极大地削弱了革命力量，随之而来的是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土地革命的失败。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和抵制王明鼓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提出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革命事业不断走向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和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走向新胜利。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什么时候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或不能实现对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统一战线就会失败，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什么时候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统一战线就会不断发展壮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事业就会不断走向胜利。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发展的根本前提，同样是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伟大事业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只有围绕中国共产党这个圆心，以团结走向强国复兴才有主心骨。

（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同样始终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奋斗目标^[44]，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长远目标和前进方向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经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等发展形态，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任务、目标和要求，但始终贯穿着以大团结大联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主题。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具体目标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展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人民服务于“站起来”的目标，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参与“三大改造”、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我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从阶级

联盟转变为政治联盟，最大限度地团结各种积极力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于“富起来”的目标，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从重要战略转变为治国方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团结最广泛力量服务于“强起来”的目标，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阶段目标和主要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只有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共同目标，以团结走向强国复兴才能目标清晰。

（三）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为不竭动力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的根本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1] 96}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统一战线包括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劳动者同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基于特定目标而结成的暂时联盟两类，其中前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战略，后者是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实现特定目标的革命策略。中国共产党在 1922 年确立起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策略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实现的，但并没有简单地移植或照搬共产国际指示或苏联实践。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中国化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机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革命实际，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动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推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机制，实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向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稳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结合客观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不断拓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推进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创新，明确爱国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只有坚持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团结走向强国复兴才能守正创新。

（四）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重要保障

团结与斗争存在辩证关系。只有把握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善于斗争、增强斗争本领，才能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百年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是在不断斗争的实践中实现的。1940 年，毛泽东在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对以往统一战线政策作出详细的总结，指出：“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

的损失。”^{[30] 763}通过总结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30] 608}。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斗争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在领导统一战线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内部先后出现了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人士排斥在工农联盟之外，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等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务于统一战线”等错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善于同这些错误思想作斗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肃清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等错误思想，充分实现党内团结，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对象。二是对资产阶级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则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又在“三大改造”的进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对于愿意服从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采取逐步改造的方法，也就是统一战线的方法”^[45]，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对所有制和人的双重改造。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团结走向强国复兴才能行稳致远。

四、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儿女大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46]在新时代，要深化统一战线、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紧密关系，更好地团结走向强国复兴。

（一）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和基本任务

新时代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和基本任务。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25]。新时代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深刻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统一战线提出的新要求。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战略全局和宏伟目标，要求自觉地将统一战线

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要从世界历史视角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主张，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的国际统一战线”。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坚持大统战，坚持国内统战和国际统战相统一、国内团结和国际团结相统一，既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也要秉持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理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人民大团结。统一战线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团结条件。

（二）坚持党的领导同坚持人民主体性相统一

统一战线承担着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41] 562} 在新时代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相统一。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是确保统一战线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显著的优势，也是统一战线必须遵循的首要政治原则。在当今中国大团结大联合这一“同心圆”中，中国共产党居于“圆心”位置。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巩固和发展起来的，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巩固。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民主体性是确保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41] 556}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需要始终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只有将坚持党的领导同坚持人民主体性结合起来，才能构筑起最大同心圆，才能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三）筑牢共同思想基础同加强立体制度建设相统一

团结既要有政治保证和依靠力量，同时也需要思想支撑、制度保障。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坚持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立体制度建设“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指引下，最大限度地照顾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一战线既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致力于共同事业、共同目标。坚持统一战线领导人民团结奋斗，要求充分权衡社会共同利益和具体利益的辩证关系，既要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包括所有同盟者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也要包容、兼顾同盟者各自的正当利益，坚持共同分享、包容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实质体现的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共享发展，本身就是经济、政治的一种包容共享性安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目标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要推动社会各阶层、各政党、各民族、各团体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建立、巩固和发展更加平等互利的团结合作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共同实现、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47]，真正把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另一方面，新时代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相应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和保障，充分发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善于用制度促进大团结大联合。对此，要在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基础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等制度体系，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努力画出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

五、结语

统一战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存在内在统一关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形成的国家现代化方案，蕴含着深厚的统一战线底色。通过坚持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深度嵌入社会，建立同人民的密切联系，把个体整合为人民整体，在大团结中确立和巩固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领导核心的确立，使政治共同体的联结更加紧密，不断创造现代化所需的高度团结的政治秩序。围绕中国共产党这个圆心的大团结，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的中华儿女大团结局面，也难以形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前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丰富的内容，涉及巩固团结与建立核心、加强团结与发扬民主、促进团结与坚持斗争、加强国内团结与促进世界团结、弘扬伟大团结精神与完善团结制度、保持政治团结与增进广泛领域的团结等多个维度。为此，有必要深化对“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的讨论，为深入认识统一战线的战略性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6.
- [2] 段妍.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实践的世界意义[J]. 思想理论教育，2021（8）：38-43.
- [3] 宋学勤.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历史逻辑[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24）：82-89.
- [4] 任志江，林超，汤希. 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J]. 经济问题，2022（2）：17-26
- [5] 杨文圣，李旭东. 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思想的演进与启示[J]. 天府新论，2021（4）：1-10.
- [6] 成龙，郭金玲.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5-14.
- [7] 洪汛.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念的百年演进及其历史意义[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14.
- [8] 李腊生. 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5-11.
- [9] 罗永宽，齐娟.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百年建构与发展逻辑[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1）：19-26+51.
- [10] 杨凤城. 从中共党史看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J]. 教学与研究，2021（11）：5-13.
- [11] 荆克迪，逢锦聚. 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实践创新和基本经验[J]. 经济学家，2021（7）：5-16.
- [12] 唐爱军.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中国道路[J]. 教学与研究，2019（3）：14-22.
- [13] 唐爱军. 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J]. 哲学研究，2020（6）：3-13+127.
- [14] 徐崇温. 中国道路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1）：9-18.
- [15] 徐崇温. 中国道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2）：30-44+70.
- [16] 孙代尧. 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6-24.
- [17] 姚东. 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J]. 求是，2017（24）.

- [18] 黄建军. 唯物史观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与世界意义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 (6): 32-43.
- [19] 杨金海. 从世界潮流看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及其世界意义 [J]. 江海学刊, 2020 (3): 42-46.
- [20] 吴晓明. “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10): 5-16.
- [21] 林进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3): 1-5.
- [22] 颜晓峰. 全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内涵和时代意义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 (3): 109-117.
- [23] 韩云波. 论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3): 1-14.
- [24]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N]. 人民日报, 2022-07-28 (1).
- [25]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2-07-31 (1).
- [26]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87.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1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98.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8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50.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12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64.
- [30]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06.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145.
- [32] 毛泽东文集: 第 6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81.
- [33] 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5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521.
- [34] 顾海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辉煌与思想精粹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1 (3): 1-16.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 2 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50.
- [36] 毛泽东文集: 第 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05.
- [37]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87.
- [38] 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213.
- [39] 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218.
- [40] 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12-13.
- [41] 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39.
- [42]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N]. 人民日报, 2021-01-06 (1, 6).
- [43] 习近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J]. 求是, 2022 (17): 4-17.
- [44] 林华山.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逻辑、经验与启示 [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3): 5-11.
- [45] 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4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316.
- [4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8.
- [47] 罗振建, 张成明. 论合作共赢是统一战线的本质 [J]. 理论月刊, 2017 (2): 61-68.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 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海外认知与中国应对

原晨珈¹ 李凯林²

(1. 太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00;

2.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8)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 统战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其若干新特点引起海外学者的新关注。一方面, 海外学者普遍认可中国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新发展, 认为中国新时代统一战线着眼全球化 2.0 时代,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协商民主中的战略地位突显; 在组织系统方面进行了内政外交、上下组织和官方民间的新整合, 在工作方式方法方面进行了重点对象与共赢目标、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新拓展。另一方面, 海外视域中也存在以对抗冲突思维解读中国统一战线的内在逻辑, 以所谓“文化干预、民主侵蚀”论调污名化中国统一战线。这是西方意识形态偏见、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和霸权思维所致。海外学界是海外统战工作壮大知华友华力量的重要对象, 因为他们的言说状况事关中国话语权和形象建设, 对其认识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应积极给予应对。充分发挥海外统战工作促进中外友好的桥梁纽带作用, 要从凝聚多元主体、丰富工作载体、构建对外话语权和新型国际统一战线等四个方面, 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 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关键词: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 海外统战工作; 国际统一战线; 知华友华力量; 海外中国学

中图分类号: D613;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5-0035-13

DOI: 10.13946/j.cnki.jcqi.2022.05.004

作者简介: 原晨珈, 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李凯林,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辨正”(2019W023)

引用格式: 原晨珈, 李凯林. 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 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海外认知与中国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5): 35-47.

作为中国政治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统一战线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联盟的策略思想。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统一战线被中国共产党运用到中国的环境与文化之中，成为中国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统战工作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引起了诸多海外学者的新关注。他们的海外视角中有新知有偏见，反观其有关成果，利于我们自知与他知。

针对海外学者的相关认识，国内学界已有一些研究。关于海外学者对中国新时代统一战线创新发展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相契合的认识，是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李丹青认为，海外学者对中国当前统战工作的肯定表明中国拒绝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与政党制度，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体现^[1]。赵超指出，海外学者将统战工作的战略性调整视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党际交流的重要举措，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自我革新与提高^[2]。国内学者也指出海外学者对中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认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些西方学者“给我国海外统战工作扣上激进性和威胁性的帽子”，其污名化言辞与西方一些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新冠肺炎疫情”等众多涉华议题的炒作，呈现关联式、牵涉式的施污策略，具有污名交织的趋势^[3]。还有一些海外学者刻意忽视统一战线概念内涵的历史性变化，用革命时期统战工作的策略理解新时代统战工作，从而达到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目的^[4]。总体来说，目前国内关于中国新时代统战工作海外视域的研究尚不多见，系统性研究更是匮乏。

发挥促进中外友好的桥梁纽带作用、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是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海外学界是一支重要话语力量，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应重视了解这支力量的思想状况，加强对他们的团结。这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面向之一。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要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促进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鉴”^[5]。鉴于此，本文立足为新时代新征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对海外学界关于中国新时代统一战线的认知进行理论概述和评析，对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提出路径参考。

一、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统战工作的新认识

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成绩进行了高度评价，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对统战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推动统战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统一战线呈现出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6]。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引起诸多海外学者的积极评价。

（一）关于统战工作战略地位的新认识

新时代中国统战工作的战略地位为海外学者所关注。他们主要从致力于提升国际地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中国式协商民主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 致力于提升国际地位

海外学者认识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努力成为全球事务积极参与者、努力提

高国家软实力，统战工作对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发挥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主要从国内视角尤其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考量。新形势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在海外学者看来，统战工作视野的拓展是中国崛起的必然产物，体现了统筹“两个大局”背景下统战工作的创新发展。中国更加积极参与或主导的国际合作机制，为统战工作提供了战略契机与实践平台，利于扩大国际朋友圈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多位海外学者观察到统一战线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时，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效益“外溢”到其他领域，助力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中美基辛格研究院研究员安妮·布雷迪指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试图基于全新的经济和战略联盟，如‘一带一路’来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从而领导‘全球化 2.0 时代’”，并指出当前中国统战工作的发展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美国学者、世界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季北慈等也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大型基础建设发展项目，而且有着更多政治意义”，认为“一带一路”与统一战线相融合“有助于以有利于中国的方式塑造海外政治环境”^[7]。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副教授铃木隆认为，将统战工作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手段，有利于中国“提升其规则制定、议程设置的外交能力”，从而“增强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和国际软实力”^[8]。

海外学者还认为，加强国际学术文化和社会组织的交流也是统战工作借以创造对中国友好的海外公共舆论环境的重要途径。泰国清迈大学教授 Aranya Siriphon 等以中国在泰国、缅甸开展的“中华乡愁书院”项目为研究案例，认为中国积极运用多层次的国家政策工具和机制，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向国外传播“中国梦”，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9]。安妮·布雷迪指出，中国新时代统战工作与外交工作的深度结合，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建立多平台、国内外一体化传播体系的战略选择，对中国及其政府海外形象塑造和海内外相关公共领域管理有着重要作用^[10]。

在海外学者视域中，新时代中国统战工作紧紧围绕对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对外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有利环境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战略目标，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核心特质，推动中国和平崛起与全球共同发展有机结合，凸显了中国在构建国际格局新秩序中的战略主动性与创造性。

2. 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 世纪 90 年代，治理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成为当代政治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从传统的统治、管理转变为治理，不是术语的简单转换，而是公共权力获得和运行的结构性变化。中国统一战线深度嵌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并发挥制度性作用，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和重要制度安排。治理理论为分析中国统一战线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工具，海外学者也积极运用这一理论工具并形成一些理论观点。

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充分肯定新时代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独特优势。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教授劳拉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着眼，认为中国共产党善于利用统一战线将潜在的对立因素及上层精英纳入自身政治结构中，提出“当前统战工作战略地位的提升应被视为中国致力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应对合法性挑战的信号”^[11]。铃木隆认为，中国新时代统战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方面有两大功能，即面对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中维护社会和政

治稳定的功能，以及妥善处理港澳台地区一些力量“政治离心力”的功能^[8]。

海外学者认为，从治理主体来看，统一战线有助于协同多元化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埃迪·尤在《中国研究》杂志上撰文讨论了中国社会各界精英在国家治理中所承担的桥梁作用，指出“他们拥有的坚定立场与个人影响力推动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并在国家各项活动中展示了榜样力量”^[12]。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学者陈明璐等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作为考察对象，研究其作为统一战线群众组织在国家经济治理中作用的日益凸显。陈明璐认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政协提交的议案越来越多地转化为政府决策，表明统一战线体系下的社会组织不仅在国家“开门决策”中扮演“政策提议者”角色，而且推动着政策输入由下至上的发展^[13]。

3. 致力于推进中国式协商民主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构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专门渠道。海外学者对此普遍认为，以人民政协为专门渠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其理论和实践效果突破了西方政治理论的话语霸权，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意涵。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格里·格鲁特等指出，中国式协商民主“在调动投入与需求，满足人民生活要求方面展现了极具优越性的能力”^[14]。统一战线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则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具体实践场所。格里·格鲁特等认为，经统一战线推荐协商产生的政协委员，代表党外人士利益参与到政治协商中，构成了中国特色民主形式，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力量和利益代表的重视^[14]。劳拉进一步指出：“当前统一战线已成为实现中国式协商民主、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文化统一的战略性资产。”^[11]

（二）关于统战工作组织系统的新整合

统一战线战略地位的提升推动着统战工作组织化系统化程度的提升。劳拉认为：“当前‘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话语表明统战工作已成为中共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的一个结构性要素”，虽然官方将其溯源至邓小平时代，“但从制度化的角度来看，直到习近平以来，建设与发挥统战工作的基础性作用才被作为一项系统性工作开展”^[11]。总体来看，海外学者从内外、上下、官民整合三个角度进行了考察。

1. 内政外交的整合

当前国内外形势要求新时代统战工作统筹“两个大局”，将国内统一战线与国际统一战线进行有机整合，以发挥其最大限度凝聚力量的作用。一些海外学者关注到了 2018 年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简称《方案》）对统战工作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在统筹“两个大局”中推进统一战线发展的重要意义。《方案》将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并入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宗教工作、侨务工作，同时由中央统战部统一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季北慈等指出，涉统战工作部门的机构改革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际统一战线、宣传及媒体网络工作，同时建立崭新的、资源丰富的国际媒体平台，加强党对其的直接领导，这些变化都将对中国海外统战工作产生深远影响”，使统战工作有更多优质资源并更为积极主动^[7]。铃木隆认为中央层级统战部门的机构改革，意味着改革后的统战部在实际上对“五侨”（指中央专司侨务工作的机构或组织、团体，即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致公党中央和中国侨联）中除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以外的相关机构或组

织、团体都实现了直接管理，将使国内外统战工作更加协调、有效^[8]。

2. 上下组织的整合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统战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一度存在的“统一战线不统一”问题得到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步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战机制，使统战工作上下联动，充分调动了各级统战工作部门及相关方面的积极性。2015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更名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并成立“中央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有助于在统一战线领域发挥中央总揽全局、自上而下协调指导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简称《条例》）作为全面规范统战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其出台对于统战工作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条例》明确规定：“省、市两级党委统战部部长一般由同级省委常委担任，县级党委统战部部长由同级省委常委担任或者兼任，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按照同级党委部门正职领导干部配备。民族、宗教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具备条件的，可以担任同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由同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担任。高等学校党委统战部部长担任省委常委或者不设常委会的党委委员。”^[15]中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这些重大进展同样引起了海外学者的积极关注。格里·格鲁特等认为：“虽然《条例》中许多内容是对以往统战概念和经验的总结与重新强调，但其首次将统战工作纳入到所有党员干部的工作范围内，并明确了具体的职责”，这具有重要意义^[14]。他认为，《条例》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体现之一是自2015年8月后已有35个省份的统战部门进行了人事调整，其中30个有省级常委成员参与，且只有4个在60岁以上；一些省份更由“一把手”直接领导，一些地方则模仿中央建立了统战工作领导小组^[14]。海外学者的这些研究认为，统战工作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已经确立并产生重要作用。

3. 官方民间的整合

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复杂性要求其必须尽可能多地整合体制内外力量。海外学者注意到：“中国当前统战工作不仅要求各级党政干部参与进来，还要求其他如大学、研究机构、私营企业等社会组织积极贡献力量。”^[11]他们认为，在海外统战工作中，官方活动容易受到质疑，民间行为则更容易被接受，因此“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相结合越来越常见。

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官方民间整合形式多元有效，包括通过海外留学生协会及其支持的各种活动加强大使馆、领事馆同留学生之间的联系，发挥当地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在联系华侨华人中的直接作用^[16]，以及积极鼓励“侨民公共外交”^[17]等方式。面向社会的文化传播组织如孔子学院等在统战工作中的作用也受到海外学者广泛关注。他们指出，一方面，中华文化整合对于国家统一至关重要，尤其对于海外统战对象来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在信息传播上的有效性已被长期实践所证实，文化传播组织在加强与海外年轻人及本土居民联系上有独特优势，受到中国官方大力支持和推广^[8]。还有海外学者认为，港澳台统战工作的官方民间机制是“国家或更确切地说现任政权整合一切国家机构或官方行为来规范政治活动者，并利用非政府人员或组织在政治活动中对抗消极力量”^[18]。民间力量的多样性、灵活性、亲和性使其与统战工作的官方渠道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统战工作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稳固发展。

（三）关于统战工作方式方法的新拓展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利益诉求与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诸多挑战。

因此,统战工作方式方法在继承传统经验的同时也有创新发展。对此,海外学者关注到如下方面。

1. 重点对象与共赢目标的拓展

海外学者关注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统战工作在继续推动各领域关系和谐发展的同时,还依据新形势下时空环境的变化确立了重点对象和共赢目标。

他们注意到,《条例》规定“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为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并归纳了十二类统战对象。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的年轻一代、留学人员以及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被明确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点团结对象、着力点和创新点。新媒体从业人员首次被纳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为统战工作对象,反映了信息社会下加强网络统战工作的重要性。

有的海外学者指出:“《条例》中第十二类统战对象,即‘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包含的范围相当广泛,展现了中国政府力求赢取所有中国人民、少数民族、海外华侨民心民意的宏伟决心和目标。”^[19]实际上,共赢的目标对象远超于该学者的描述,还应包括与中国有共同利益或共同价值观念、可以实现合作共赢的一切海外人士和群体。安妮·布雷迪就论述了中国与新西兰商界、政界和知识界的精英人士通过商业合作、党际交流、学术研究等多种方式建立了广泛友好关系,以及两国之间基于“一带一路”实现的合作,在经济、电信、食品安全、教育、科技、旅游、气候变化甚至是军事等领域多方面扩展^[6]。

2. 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形式的拓展

海外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统战工作将原则性与灵活性进行有机结合,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高度灵活性和务实性。

有些学者从个案出发,对当前许多地方开展的“结对子”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于传统以组织为基础的统战工作模式,“结对子”以建立个人关系为基础,将相关干部与党外特定人士结成对子,建立朋友关系,以“加强地方统战工作,促进统一战线有效获得社会精英人士的政治认同,获取社会信息并维持社会稳定”^[20]。他们认为“结对子”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体现为:一方面,“结对子”的基本原则是使党外人士协助而非反对中共的治理;服务于中共的总体利益,而非追求干部的个人利益;另一方面,“结对子”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如谈心交友、沙龙讨论、联合考察等,目的是真正使党外人士受到中共的帮助,感受到中共的关心和热心^[20]。

他们认为,在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中,灵活性的特点更为明显。海外学者关注的主要方式包括:通过央视海外平台、微信等多平台信息媒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海外学者称之为“借船出海”“买船出海”);通过华人社团和政治家增强影响;通过合并、收购地方企业或与地方学校和研究机构合作的方式呈现地方面孔;通过孔子学院等文化项目提高文化认同等。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员周安澜等对活跃在堪培拉的华文媒体进行了梳理,认为三分之二的机构“被纳入中国统一战线”,涵盖网站、报纸、杂志、微信、微博等多种平台形式^[21]。针对港澳台统战工作,有海外学者归纳了整合、吸纳、合作等五种策略形式^[22]。还有学者强调工作网络结构上呈现分散化、多层次的新特点,以灵活应对特殊状况^[23]。海外学者的这些观点表明,中国新时代统战工作方式不仅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契合,还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使统战工作弹性空间更大。

二、海外中国统一战线研究存在的偏见及根源

海外学者对当前中国统战工作新进展有积极认知的同时，也有若干偏见。这些偏见受到意识形态、西方视角等因素影响。本着统战思维，加强对这些偏见及根源的辨析，增加对海外学者研究目的、模式的理解，可以为精准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提供参考。

（一）沿袭冷战视角，以对抗冲突思维解读中国统一战线的内在逻辑

大团结大联合是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但在一些海外学者的解读中，对抗而非团结成为他们眼中统一战线的内在逻辑。例如，一些研究中国国内民族话题的海外学者从统一战线出发讨论“多元”与“一体”的冲突矛盾。全球十大高校区域研究智库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学者罗伯特·巴内特声称：“中国国内民族矛盾源于永久战争与文化威胁的想象，及其形塑的排除一切异议的统战策略。”^[24]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教授詹姆斯·雷伯德等声称：统战思维下的中国国内民族治理由包容多样性转向强调单一性，治理方式也由“软”变“硬”^[25]。这些错误认识其实是用二元对立思维看待中国的民族关系及民族政策。他们将“多元”和“一体”进行二元对立，将少数民族利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视为零和博弈，却漠视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内在演进的历史逻辑和“一体多元”的现实与未来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更好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中华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26]。中国新时代统一战线始终将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作为基本原则。“一体”与“多元”的相互交融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事实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在新征程上再出发的现实立足点，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诉求。

上述海外学者二元对立式认知模式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西方视域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这在海外学者相关研究中呈现如下特点。首先，以鱼目混珠、嫁祸于人等方式巧妙隐藏其意识形态偏见。比如，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吉原恒淑一方面妄议中国统战工作的逻辑是意识形态对抗；另一方面在同一研究中又用“政治战争”，用美国曾用来称呼苏联的“黑暗艺术”的概念来分析中国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逻辑和方法^[27]。这种认识逻辑明显前后矛盾，是以己度人。其次，将意识形态偏见与历史虚无主义紧密结合，企图增强攻击效力。一些海外学者借助历史虚无主义手段，企图通过虚无统一战线历史达到污名化中国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目的。比如，一些海外学者将中国国内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诬称为“中国共产党密谋瓦解政治制度完整性的战术”^[27]，声称“从内部颠覆对手”是统一战线建立、发展至今的本质特征^[28]，试图以此证明“政治战争”作为中国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基因密码由来已久。最后，利用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概念对其认识模式进行学术包装。比如，有学者将新时代统一战线描述为中国进行所谓“威权主义、修正主义统治”的重要工具^[29]。这些认识模式背后反映的是西方话语霸权。

这些秉持意识形态偏见的海外学者不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道路，不能正视中国各界对爱国主义的高度认同。那些仍用冷战思维、两极对立视角看待中国政治和社会民情的海外学者，自然会把“认同”视为“屈从”，把坚持底线视为“扼杀异议”，把多元共融视为“吸收控制的权宜之计”。新时代中国尽管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各类

统战对象尽管有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实际，国际环境尽管处在诸多不确定性中，但这一切都不能抹杀中国稳步快速发展的事实，不能否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理想和价值目标的事实。这是中国新时代统战工作能够达成高度共识的客观基础和认识根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30]，“越是思想认识不统一就越要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31]。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其底线思维是反对一切分裂势力和危害中国稳定发展的意图，其共识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统筹考虑统一战线成员的具体利益。

（二）固守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思维，污蔑中国扰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一些海外学者从“文化干预”或“政治干预”角度非议中国新时代统战工作。例如，罗伯特·巴内特就将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诸多文化政策污名为利用统战工作“计划性地重塑或改造当地文化内核”^[24]。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则被少数海外学者污蔑为“政治侵害和干预的统战手段”^[18]。在此论调下，以维护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的统一战线被他们扭曲为所谓“压制、强权、分化的工具”。

所谓“干预说”既缺乏历史发展观依据，也无视国际法认可的国家主权理念。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同民族之间的双向自主流动，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势所趋。经济交往、文化交流、自由通婚等，明明是中国国家主权内增进民族和睦、促进互利共享的社会发展进步倾向，却被一些域外人士指责为所谓“文化干预”“政治干预”。究其缘由，这是他们固守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对人类历史发展大势和中国人民实际利益缺乏理解所致。观念的扭曲导致他们对中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积极意义和客观事实作出反历史、反现实的曲解。

所谓“民主侵蚀说”是一些海外学者对统战工作的又一种非议。他们诬称，中国海外统一战线的拓展是对民主的“侵蚀”。在这些学者的语境中，“民主侵蚀说”与“锐实力”紧密结合在一起。近几十年来，西方媒体和学者对中国崛起炮制出了许多概念，如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近几年，他们又开始使用“锐实力”这个概念开展新一轮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势。他们认为，“锐实力”与“软实力”不同，是中国、俄罗斯等所谓“威权国家”通过政治、文化、学术、媒体网络等途径扩张国际舆论影响的力量形态。在他们的论述中，“锐实力”这个概念往往与“侵略性、胁迫、操控”等负面词汇相联系，与所谓“威权国家”捆绑在一起，污蔑对民主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32]。统一战线则被他们诬称为中国拓展“锐实力”的主要方式，“一带一路”、孔子学院等都被他们认为是普遍借助的途径。一些西方国家的官员也如是观，如时任德国外交部部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在 2018 年 2 月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声称，中国正在试图通过“一带一路”来“推行一套有别于西方模式的价值体系，而这套价值体系并非基于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33]。甚至有海外学者污蔑中国海外统战工作是一种“输出专制”的运作方式，将中国视为民主倒退“第三次逆流”的潜在原因^[34]。总之，部分海外学者诬称，中国海外统战工作会扰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们鼓动西方国家采取更加协调统一的策略来抵抗这种影响。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它虽发端于西方，但并不因此就止于西方某些国家的一两种模式。民主制度是上层建筑，它的运行机服从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其优劣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能力。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成果，走出了适合中国

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在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优化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优越性世所公认。正是这种国际影响力才使得昔日止于一尊的西方民主模式受到质疑，所谓“民主侵蚀说”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在民主问题上的表现。历史的进步将对这种狭隘民主观的“侵蚀说”作出公正的结论。

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强权话语深刻地影响了海外学者的政治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使他们的相关认识存在多个层次的冲突和无力。在政治和价值观念方面，他们自诩西方为现代文明的“创立者和引导者”，试图正当化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扩张乃至掠夺行为。西方根深蒂固的“非此即彼”思维模式令他们一向痴迷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相关讨论，将中国统一战线的新发展视为“别有用心的挑战与进攻”。在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上，他们将进步与落后绝对化、永恒化，企图使“西方高于东方”的等级观念在人们意识中固化。为此，他们将中国基于自身历史发展与现实需求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统战法宝，污名为“落后、异质、分裂”。这种做法反映其惯用的“东方主义”话语表达伎俩。

这种认知模式还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属性。文化霸权背后实为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即为了维护西方资本集团的整体利益和强权政治，不断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非西方世界巩固自身意识形态权威地位。在西方文化殖民视野下，中国新时代统一战线被他们污蔑为“地区稳定发展与民主政治的破坏者”。实际上，西方学者眼中维护地区稳定的“战略平衡”是基于霸权利益的考量。西方对外推行的自由民主往往沦为通过“民主帮扶”实施分裂主义的政治手段，打着“普世主义”旗号对他国民族和地区文化自主性和独特性进行围追堵截。甚至，西方国家内部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也得让位于政治利益的考量。海外学者自己也承认，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越来越多地剥夺了中国移民合法结社的自由和政治信仰”，侨民组织近几年在美国遭遇的不公对待便是例证^[35]。

三、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的统战策略

海外学者的多维度考察展现了中国新时代统战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是一种积极认知。但同时，他们对中国统战工作的研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存有偏见，这种偏见从侧面反映了当前海外统战工作面临的困难与挑战。鉴于中西意识形态的冲突将长期存在，应树立持久战的思维，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过程，积极探索应对路径，涵养壮大海外知华友华力量，为国家安全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一）凝聚多元主体，形成国际国内双向联动的工作格局

要以大统战思维谋划海外统战工作新局面，形成国际国内双向联动。一方面，海外统战工作应以国内统一战线为基础，统筹好境内境外两种资源，实现叠加效应。具体而言，要加强顶层设计，采取多种路径强化亲缘关系纽带，充分调动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热情和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同时积极发挥海外留学人员、在海外活动的中国民间组织等的“民间大使”作用。另一方面，海外统战工作应不断扩展同心圆半径，推动“圆内”“圆外”全域发动。从海外学者的偏见可见，海外统战“圆外”工作任务重、难度大。因此，必须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发挥好海外华侨华人等多元主体的桥梁作用，探索以内引外的统战方式，鼓励、引导海外爱国同胞团结海外友华人士共同参与到支持中国现代化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中。

（二）丰富工作载体，增强中国道路的国际吸引力

做好海外统战工作需讲求工作艺术、改进工作方法，通过丰富工作载体提高团结效能。一是拓展海外统战工作的官方和民间新形式。建议在驻外领事馆设立开展海外统战宣传的相关部门，积极与当地官方、非政府组织开展交流合作，推动文化的双向流动。其作为专业机构，指导和帮助其他开展国际交流的中国官方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升交流质量和效力。二是拓展海外统战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依托现有文化主体，推动海外统战工作向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领域、交叉领域拓展，扩大共同利益和价值理念基础；创新孔子学院等海外文化交流重要平台的扩散机制，鼓励引导其向其他领域进行功能延伸。三是运用新媒体赋能海外统战工作载体。深入研究新媒体传播规律和海外受众特点，树立互联网思维，积极搭建新媒体宣传平台，增强海外统战宣传的互动性和针对性。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流模式有着独特优势。四是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等现有合作平台，主动搭建新型国际化海外统战平台，积极挖掘和整合统战工作中的优质国际资源。

（三）坚持刚柔并济思维，构建统一战线对外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36]。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新时代统一战线的认知实质上也关涉话语建设问题。当前构建统一战线对外话语权需刚柔并济，坚持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统一。一方面，构建统一战线对外话语权要“以斗争求团结”。一些海外学者利用“锐实力”等学术话语非议、诘难中国统战工作，其实质是西方政治话语霸权逻辑在统战领域的体现。正是借助学术的包装，西方话语成为所谓“科学的”，西方模式成为所谓“普世的”，企图在国际上赢得话语优势。因此，要加强统一战线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建设，及时正面回应相关理论关切，积极主动提出中国命题并进行系统的理论构建，夯实中国统一战线对外话语权的刚性基础。另一方面，构建统一战线对外话语权亦需“以柔克刚”。海外学者的诸多偏见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中国统一战线对外话语权建构则需避免掉入意识形态对抗的陷阱。一是针对我国在国际上引起较大舆论关注的理念、政策和实践，应多使用世界通用或当地惯用的概念和语言，做好对外阐述和沟通工作。二是灵活运用多种新兴话语载体，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传播核心，采用“和合文化”“知行合一”“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等既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利于表达中国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观的软性词汇，讲好统战故事，传播好统战声音。总之，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动下，统一战线对外话语既要“求同存异”，也要“求同求异”；既要弱化意识形态对抗，积极融入并主动设置国际议题，也要坚持底线、体现特色，主动传播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信息。

（四）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构建新型国际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构建国际统一战线已进行了百年探索，并形成了丰富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当前“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新形势下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应包含以下层面。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价值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国际关系演变中积累的主权平等、沟通协商、公正法治、开放包容、人道精神等公认原则，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这种世界性理念为我们摒弃旧式国际政治联盟思维，“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37]，提供了目标指引。第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核心路径。新型国家关系强调“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

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38]。围绕这一方向，中国奋发有为，主动布局，积极推动合作共赢的理念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方面对外交往中得以体现，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大，国际吸引力不断增强，为中国构建国际统一战线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第三，战略统筹是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根本方法。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需服务外交战略大局，洞察对外交往关系的变化与走向，把握国际统战工作的阶段性特征与发展方向。要运用统战思维团结一切积极力量，分化瓦解国际反华联盟体系，积极争取和转化国际中间力量，形成广泛性与针对性、稳定性与层次性相结合的国际统一战线新格局。

四、结语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纪疫情持续蔓延，大国博弈持续升温，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统一战线抵御渗透、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工作更为重要紧迫。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要更好地服务中国共产党统筹“两个大局”、用好“两种资源”。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要用好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大多数，搞好大联合，不要四面出击，不搞关门主义。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善于利用多边机制，更好利用国际体系的力量遏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要做好宣传特别是外宣工作，树立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最广泛地争取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39]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要进一步加强海外统战工作，充分发挥联系广泛、润物无声的优势，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 [1] 李丹青. 中共十八大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积极认知与评价[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9 (4): 111-121+159.
- [2] 赵超. 海外学界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与提高[J]. 国外理论动态, 2019 (9): 108-117.
- [3] 蔡文成. 西方学者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论调、危害及其正确应对[J]. 理论探索, 2021 (3): 55-62.
- [4] 刘佳, 文吉昌. 海外中共研究的代际演变与价值反思[J]. 理论月刊, 2020 (10): 41-49.
- [5]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N]. 人民日报, 2022-07-31 (1).
- [6] Anne-Marie Brady. New Zealand and the CCP's "magic weapons" [J].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8 (2): 68-75.
- [7] Bates Gill, Benjamin Schreer. Countering China's "united front" [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8 (2): 155-170.

- [8] Takashi Suzuki.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Xi Jinping era-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and activities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2019 (1): 83-98.
- [9] Aranya Siriphon, Jiangyu Li. Chinese dream, emerging statecraft, and Chinese influence in the Mekong reg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21 (2): 302.
- [10] Anne-Marie Brady. Magic weapons: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under Xi Jinping" [C]. *The corrosion of democracy under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2017 (9).
- [11] Laura DE GIORGI. United front [A]. in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eds.).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Canberra: ANU Press, 2019: 303-308.
- [12] Eddy U.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of the early Mao years [J]. *The China Journal*, 2012 (68): 39.
- [13] Minglu Chen, Dongya Huang.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policy influence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J].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2019 (3): 271-280.
- [14] Ray Wang, Gerry Groot. Who represents? Xi Jinping's grand united front work, legitim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nsultative democracy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8 (112): 569-583.
- [15]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EB/OL]. (2021-01-05) [2022-09-18]. <http://www.zyztb.gov.cn/xxgctzt1/351033.jhtml>.
- [16] Gerry Groot. The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front under Xi Jinping" [A]. in Gloria Davies, Jeremy Goldkorn and Luigi Tomba (eds.). *Pollution*. Canberra: ANU Press, 2016: 173.
- [17] Liu J M. When diaspora politics meet global ambitions: diaspora institutions amid China's ge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22 (1): 16.
- [18] Edmund W.Cheng. United front work and mechanisms of countermobilization in Hong Kong [J]. *The China Journal*, 2020 (83): 1-33.
- [19] Sonny Shiu-Hing Lo, Steven Chung-Fun Hung and Jeff Hai-Chi Loo. China's new united front work in Hong Kong [M].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12.
- [20] Xingmiu Liao, Wen-Hsuan Tsai. Clientelistic state corporatism [J]. *China review*, 2019 (1): 31-56.
- [21] Alex Joske, Lin Li, et al. United front work and propaganda: influencing people to influence content [R]. Canberra: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2020-12-01) [2022-09-10]. <http://www.jstor.org/stable/resrep27695.8>.
- [22] Wai-man Lam, Kay Chi-yan Lam.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civil society: the case of Hong Ko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2013 (3): 306-320.
- [23] Yuen S, Cheng E W. Deepening the state: the dynamics of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J].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20 (4): 137.
- [24] Robert Barnett. Imagining the borderlands: managing (to prolong) conflict in Tibet [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16 (4): 706-724.

- [25] Tao zhao, James Leibold. Ethnic governance under Xi Jinping: the centrality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 its implications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20 (124): 498-502.
- [26]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27] Toshi Yoshihara. Evaluating the logic and methods of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J]. *Orbis*, 2020 (2): 230-248.
- [28] Jesse S. Curtis. Springing the "tacitus trap": countering Chinese state-sponsored disinformation [J]. *Small wars&insurgencies*, 2021 (2): 237.
- [29] Gordy K A. Sleight of hand: understanding the true intentions of the CCP's united front operations [D]. San Antonio: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2021: 15-16.
- [30]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73.
- [3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105.
- [32] Christopher Walker. What is z" sharp power"? [J].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8 (3): 11-13.
- [33] Sigmar Gabriel. Speech by Foreign Minister Sigmar Gabriel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EB/OL]. (2018-02-17) [2022-09-18].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newsroom/news/rede-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1602662>.
- [34] Fong B C H. Exporting autocracy: how China's extra-jurisdictional autocratic influence caused democratic backsliding in Hong Kong [J]. *Democratization*, 2021 (1): 14-15.
- [35] Liu J M. When diaspora politics meet global ambitions: diaspora institutions amid China's ge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22 (1): 20.
- [36]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N]. *人民日报*, 2021-06-02 (1).
- [3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年10月18日)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1).
- [38] 王毅.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J]. *国际问题研究*, 2015 (3): 1-6+126.
- [39] 习近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J]. *求是*, 2022 (17): 4-17.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后疫情时代平台经济如何稳就业： 机制、现状与策略

李磊 钱育成 马欢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在疫情大流行与后疫情时代，平台经济的高速发展保证了社交距离，满足了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维护了社会稳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平台经济具有创造效应、溢出效应、平台与行业融合发展产生的互补效应，能够对稳就业产生正面影响。平台经济推动了就业总量增长，促进了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并深刻影响了就业结构。平台经济在稳就业方面也存在三个方面问题：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与利用不足，灵活就业缺乏稳定性和福利保障，部分平台在市场中形成垄断地位。针对这些问题，要引导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以平台经济助力就业，以平台经济促进发展。建议加大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技术发展；规范平台的用工机制，建立灵活就业保障机制；健全规范平台行为的法规体系，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和市场秩序。

关键词：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后疫情时代；稳就业；创造效应；溢出效应；互补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5；R1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5-0048-14

DOI：10.13946/j.cnki.jcqiis.2022.05.005

作者简介：李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钱育成，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马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工智能的社会经济影响：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721031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世界经济新格局下的创新保护研究”（18AZD001）

引用格式：李磊，钱育成，马欢．后疫情时代平台经济如何稳就业：机制、现状与策略[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5）：48-61．

一、问题的提出

截至 2022 年 9 月，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已经长达 2 年 10 个月。截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下午 6 时 35 分，世界卫生组织已报告 608 328 548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包括 6 501 469 例死亡^①。此次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参赞兼研究部主任 Gopinath 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巨大外部冲击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活动和群体社交步入后疫情时代，将迎来两大新趋势：第一，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生产率停滞，使世界经济走上脆弱且充满荆棘的道路，全球化趋势弱化；第二，新兴数字产业将与传统产业展开更深度的融合，极大地变革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模式，既对各年龄段的劳动力就业产生促进作用，更对就业者的收入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后疫情时代新趋势，将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带来就业波动风险。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7%，高于去年同期 0.5 个百分点；31 个大城市失业率均值为 6.0%，高于全国城镇整体水平；6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仍比去年同期高 0.5 个百分点，城镇外来农业人口失业率高 0.6 个百分点；16~24 岁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6 月份达到 19.3%^②。失业率各项指标相比于去年有所上升，显示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性。第一，新冠肺炎疫情自身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而为有效应对疫情不得不以经济活动暂时“放缓”为代价，导致需求收缩、供给断裂和预期转弱，从而影响了正常就业。第二，在疫情的冲击下，曾高效运转的全球产业链受到较大冲击，为了确保自身经济安全，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纷纷制定产业链重构战略，令遍布全球的产业布局向区域内乃至国家内收缩。经济全球化的大退潮将使中国的外部环境恶化，原来支撑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对外贸易企业将经历“由外转内”的改革，这将增加企业失败的风险，从而增加就业波动^[1-2]。第三，在疫情及以后时期，产业的数字化和自动化转型不断加速，一方面可以用机器替代日益昂贵的人工，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由“面对面”的经济活动带来的疫情扩散的风险。然而，数字化和自动化转型可能侵蚀中低端工作岗位，提高对高端工作岗位的需求。这将导致工资中位数停滞不前和收入不平等加剧，不利于就业稳定^[3-4]。

当然，危机中也往往孕育着新局和转机。汤铎铎等指出，灾难、战争和一些突如其来的社会经济环境巨变，其本身也是创新的发动机^[5]。此次疫情防疫要求尽力避免聚集性活动，这将导致“数字化生存”，使社会各方面都更加依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普及和应用。2022 年 5 月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稳就业作用”^[6]。2022 年 7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求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7]。借助平台经济的力量来稳就业、壮大国内循环，有利于后疫情时代经济健康发展。

平台经济以数字技术重塑双边平台，通过设计合理的价格算法，同时吸引供需两侧的参与者，

①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网址：<https://covid19.who.int/>。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网址：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207/t20220715_1886529.html。

帮助他们顺利开展经济活动^[8]。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是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具有网络外部性和多属性等特点。平台经济通过数字技术搭建了虚拟双边平台,变革了“面对面”的传统经济模式,在疫情期间为保障人们的正常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平台经济作为新的业态,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可以直接吸纳劳动力就业。此外,平台经济还可以形成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使社会各行各业经济活动高效开展,通过调动经济活力间接稳定就业。

现阶段,国内学界对数字经济的就业影响效应进行了一些研究,通过理论和经验证实数字经济将从“创造”和“替代”两方面对就业产生影响^[9-10],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4, 11]。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代表,对于稳就业意义重大。一方面,平台经济展现出技术进步的创造效应。李敏等运用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平台经济发展对保就业和稳就业岗位的正向作用^[12]。丁琳和王慧娟则证明互联网技术进步整体上能促进就业,尤其是促进第三产业的就业^[13]。另一方面,平台经济也展现出“创造性破坏”的替代效应。李力行和周广肃发现平台经济下的传统就业消亡和灵活就业增加现象,从而这种现象可能使社会就业出现波动^[14]。本文在充分总结前期文献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平台经济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实现稳就业目标,即论述如何放大创造效应的正向影响,规避替代效应的不利风险,助力实现就业结构优化和就业稳定。

另外,有学者研究平台经济在稳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其中大多从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入手。有研究认为,平台与灵活就业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是确保就业稳定和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9]。娄宇认为,对于灵活就业和长雇网约工,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医保、职业伤害保障、集体协商等领域的法律法规设计^[15]。严妮等通过问卷调查也提出,应强化平台经济从业的劳动关系认定、制度设计、政策宣传等方面的建设^[16]。然而,目前鲜有相关文献关注高技能数字从业者稀缺和数字平台垄断行为对就业的影响。本文在平台经济如何稳就业的研究中,将讨论上述问题。

本文的研究重点和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两点:其一,阐述在疫情时期及后疫情时代,平台经济稳定国内就业的理论机制;其二,及时发现平台经济实现稳就业中的潜在问题,为科学制定政策提供一定参考。本文对后续章节安排如下:第二节为平台经济稳就业的理论机制分析;第三节为平台经济稳就业的现状分析;第四节为平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稳就业的负面影响;第五节为实现平台经济稳就业的应对策略。

二、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机制

按作用的对象划分,平台经济对稳就业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数字技术下的平台经济可以创造新的岗位,可称其为稳就业的“创造效应”。其二,数字技术下平台经济可以改进上游生产型(或服务型)企业的营业模式,提高其生产效率,使企业经营更加稳定,可称其为稳就业的“溢出效应”。其三,传统平台可以主动谋取与数字平台的合作,打通“线上”“线下”两向渠道,可称其为稳就业的“互补效应”。

(一) 创造效应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Keynes 便推测在未来的 90 年中,迅猛的技术进步将导致技术性失业。Leontief 也认为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工人被替代^[17]。然而时至今日,技术进步引发

的大规模失业并没有出现。其原因主要在于，应用人工智能后，企业就业规模得到了扩张。“创造性破坏”理论对其原因进行了阐释，即技术进步是“以旧换新”的过程，虽然旧岗位随时代发展而被淘汰，但新岗位也在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该过程伴随着就业结构的变化，但最终会实现社会就业的供求平衡^[18-20]。

平台经济将数字技术、数字理念与传统平台相结合，创造出新型的双边市场。该过程将从两个方面实现新岗位的创造。首先，新兴数字技术研发管理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新技能劳动力投入^[9, 21]，如信息技术管理与计算机软件开发等岗位。其次，传统平台经过数字技术的重塑后，在管理方式、经营模式、技术支持上都有了新的变化，数字化平台经济在管理运营过程将需要更多拥有新技能的工人。更重要的一点是，新的岗位大多依托于网络技术的特性，打破了传统的就业时间和空间界限，围绕虚拟网络衍生而出。其工作通常可以通过网络远程完成，避免疫情期间的必要接触，有助于抗击疫情，并实现后疫情时代的就业稳定。

现阶段，关于平台经济能否创造就业岗位这一问题，鲜有学者开展实证研究，但关于数字技术进步是否拉动就业的研究一直存在。吴清军等运用倍差法和差值法证明了人工智能虽然短期会对就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但长远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22]。李磊等采用微观企业数据，发现进口工业机器人后，企业反而扩大就业规模^[20]。有的学者也开展了线上工作岗位能否规避疫情冲击的研究。Bai 等指出：“在家工作可行性指数”高的企业，其在大流行期间的各项经营指标表现均好于可行性低的企业^[23]。

（二）溢出效应

Hsieh 和 Rossi-Hansberg 研究指出，服务业正在经历“工业革命”，即通过数字技术打破服务业的时空局限，使其集中度不断提高，同时带来大量生产率提升^[24]。平台经济是“服务业工业革命”的典型表现，通过规模效应给上游的工业或服务业企业带来正向溢出作用。企业开展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则有助于正常经营，进而保障社会就业稳定。

平台经济之所以具有巨大溢出效应，是因为双边平台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具有更强大的“网络外部性”^[8]。第一，扩大供求双方用户覆盖。数字技术将传统的物理平台数据化，在虚拟空间构建“多节点、开放式”的数字平台。数字平台突破了时空的桎梏，将国家乃至世界的联网客户纳入网络体系。根据网络经济的特性，使用人数越多，则其经济效益将越高。第二，提高平台跨界生态复杂度。双边平台将供给方和需求方纳入同一业务网络，但业务不同，网络职能也不同。供需双方可以交换商品，也可以买卖服务，甚至可以雇佣劳动力和投资金融产品等。在虚拟空间，数字平台将更容易实现跨界合作，建立“超级网络平台”，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形成更巨大的规模效应。第三，促进数字平台企业规模集聚。数字平台被称为“服务业工业革命”，其核心在于：由于数字技术使平台覆盖了更广阔的时空，平台经济企业可以像工业企业一样，在服务的“生产”环节实现产业集聚以获得规模效应。

数字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将对社会的经济活动效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其一，数字平台将覆盖更多用户，构建“B—B、B—C、C—B、C—C”等模式，小微企业、个体农户甚至消费者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找到对应的买家，这将有助于加速“内循环”运转。其二，在跨界协作平台下，用户可在单一操作界面中“一站式”地获取多类别业务信息，这将极大提升企业开展相关经济活动

的效率。其三，数字平台的相关企业实现集聚，可以提高平台经济自身服务质量。例如，数字技术企业的软件联合开发、数据集中存储等，将提升算法合理度和计算能力；服务供应企业的集聚可以使服务质量提高。社会经济活动效率提高，有助于壮大国内大循环，实现稳就业的目标。

（三）互补效应

新兴产业会取代传统产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即“创造性破坏”中的破坏过程^[21, 25]。对比数字平台和传统平台，其主要任务都是使供需双方的信息在平台集聚，提供交易场所，协助经济活动高效完成。在新旧模式交替的背景下，就业替代效应的核心机制在于：就业结构发生变革，若劳动者未及时调整其技能以适应新的需求，则将产生技术性失业^[9]。

然而，数字平台对传统平台并非完全替代。数字平台与传统平台在服务用户时，其带给用户的主观效用截然不同。对于虚拟数字平台，用户足不出户即可高效便捷地获取大量交易目标的信息，但仅限于视频、图片和文字方面，缺乏真实触感和人性化服务体验。而对于现实的传统平台，用户可以亲临现场，享受平台提供的真实服务，但其缺点在于受限于时空、信息获取效率较低等。由此，在新旧两种平台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可替代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罗默式的内生技术进步理论，即通过研发增加了技术的多样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26]。因此，与创造效应相呼应，数字平台与传统平台的合作，将实现互利共赢，带来稳定传统就业的合作效应。

基于传统平台和数字平台不完全替代性特点，若传统平台在疫情冲击下，可以主动与数字平台寻求合作，在“线上线下”双渠道中取长补短，拓宽网络渠道，则可充分发挥数字平台在疫情期间的“稳运行”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传统平台的经营和就业。新冠肺炎疫情因其极强的传染性，严重冲击了需要“面对面”接触的传统平台模式，如餐饮、零售等部门。而上述部门又是经济社会中吸纳低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力量，保障其稳定经营对稳就业有重要意义。通过新旧平台的优势互补，线上和线下双渠道灵活转换、共同引流，可在疫情冲击下形成有效的平滑经营，稳定就业规模。

三、我国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一）我国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现状

2020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冲击全球经济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在此背景下，“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7]。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以“双融合”全面支撑“双循环”，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支撑。在此政策指导下，我国数字经济在疫情背景下加速发展。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提升并稳定增长。中国信通院的数据表明，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45.5 万亿元，相比于 2020 年增加 6.3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9.8%，同比名义增长 16.2%。数字经济在疫情冲击下仍保持高速增长，为稳定经济起到了重大作用。其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保持平稳发展。从总体上来看，2021 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 1.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2%。细分来看，网络零售业持续快速发展，2021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 1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1%，其中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3%。此外，网上外卖、在线办公、在线医

疗和网络视频等数字技术服务也蓬勃发展,用户量分别达到了 5.44 亿、4.69 亿 2.98 亿和 9.75 亿^[28]。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平台经济领域民营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大批优秀民营平台企业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的背景下迅速发展,对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一大批优秀平台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成为全球公认的数字经济发展领先的国家之一。

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一种独特形态,依托于互联网、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方便交易的模式,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元素。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平台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在实践中,一般把最近一次融资时企业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未上市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企业列为独角兽企业。2020 年末,全世界 26 家估值 100 亿美元以上的十倍独角兽企业中,中国有 8 家,其中字节跳动和滴滴出行名列前茅。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互联网独角兽企业总数为 219 家,较 2020 年底增加 12 家,增幅为 5.8%。2022 年 1—4 月,东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4 021 亿元,同比增长 2.5%,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0.2 个百分点,占全国互联网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90.6%;中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155.8 亿元,同比下降 13.5%,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3.5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239.8 亿元,同比增长 19.4%,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17.3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19.6 亿元,同比增长 26.4%,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34.1 个百分点^[29]。无论是从企业数量增减还是业务收入变化来看,我国平台经济都处在一个由发展走向成熟的阶段,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二) 我国平台经济对就业的积极影响

平台经济具有的无接触便捷交易特点符合防疫要求,使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快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平台推动了就业总量增长;另一方面,平台也促进了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并深刻影响了就业结构,引致就业结构向两级化发展。

1. 直接创造就业

平台经济通过两种方式直接创造就业:一是创造与数字研发有关的新职业、新岗位,扩大应用数字技术开展业务的人数;二是创造灵活就业和零工经济,令传统产业的失业者不断转变为平台产业就业者。

第一,数字平台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首先体现在“自带数字基因”的研发岗位上。根据全球知名招聘平台“领英”发布的《2021 年中国新兴职位趋势报告——探索关键趋势》,数字平台经济创造的研发类代表性岗位主要包括:数据科学和分析,从事企业大数据和分布式平台的研发和维护,以及算法和模型构建等,如数据分析师、数据工程师等;软件应用开发,是数字化的核心职位,将数字生态以及各项数字应用可操作化,为供需双方客户提供应用窗口,如前后端开发员、操作系统开发员、软件工程师、机器学习工程师、解决方案架构工程师等职位;数字产品,提供文字、视频、音频、游戏、软件等数字商品,以及相关测评和售后服务等^[30]。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对数字研发类岗位的需求,创造了数量可观的就业,甚至在上述职位中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2021 年《互联网人才招聘白皮书》显示,智能硬件工程师、游戏引擎开发师、ETL 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移动端工程师、算法工程师等岗位均出现了严重的人才缺口,其中智能硬件工程师的招聘供需比仅 2.7;HR 招聘一名有 10 年从业经验程序员的用时,超过一个月的概率从 64.7%增加到 75.2%^[31]。数

字研发等新兴岗位的缺口反映了在未来实现就业稳定的潜在力量，但是需要有关部门做好人才培养工作，将潜力充分开掘，实现社会稳定。

第二，传统产业的失业者转变为平台从业者的人数持续增长，催生了以线上为媒介的灵活就业。这种经济形态也可称为零工经济。一方面，电子商务、数字营销等领域，采用互联网技术并结合娱乐手段，在线上开展营销。例如，带货主播、电子商务专员、公众号运营员等职位主要吸引青年劳动者就业。数据显示，短视频、直播带货等网络营销行业在近年来高速发展，覆盖用户规模达到 8 亿以上。互联网营销从业人员以每月 8.8% 的速度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岗位数量从 2010 年的 185.8 万增长到 2019 年的 455.3 万，增长率高达 145.0%。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业务与新需求，形成了一批新的职业形态，创造了更为广阔的职业种类，丰富了劳动者的职业选择。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这些职业既有人工智能训练师、区块链应用操作员、信息安全测试员、互联网营销师等知识密集型就业岗位，也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截至 2022 年 7 月，我国标注为数字职业的职业达 97 个，其中既是数字职业又是绿色职业的有 23 个，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发展，提升全民数字素养，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就业吸纳能力。”^[32]

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在衣、食、住、行等服务中，不断扩大灵活就业规模。灵活就业是指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为形式的就业，是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一种新劳动关系、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具有工作时间灵活、收入多样化和劳工关系不稳定的特点。以外卖骑手为例，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而不必每天按时上班，收入由每单价格、平台和客户打赏共同组成，并非单纯来源于受雇企业；不具有稳定的雇佣关系，可以方便地就职或退出。这一和平台伴生的灵活就业形态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对后疫情时代稳就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已经达到 2 亿人，约有 8 400 万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 11%。根据国内两大外卖企业美团和饿了么公布的骑手数据，2020 年美团拥有骑手达 400 万名，饿了么拥有骑手约 300 万名^[33]，这为众多低技能劳动者提供了就业岗位。

2. 改造传统产业

数字平台经济与传统三大产业部门相结合，有利于传统产业变革经营模式，提升生产服务效率、稳定经营，从而对稳就业产生正向作用。传统产业受到数字平台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同，对于“可线上化”特质高的产业，其受到的溢出效应越明显，并表现出“专业技能+数字技能”的特性。目前，被数字平台改造的代表包括：工农业部门的供应销售渠道以及物流，通过搭建物流信息平台实现物流方和客户对货物的实时追踪管理，极大提高了物流效率，吸收了大量的就业。交易与物流效率的提高对新时代国内消费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此外，很多现代服务业也都与平台经济展开深度融合，例如人力资源、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科学技术服务、教育服务等，通过开发线上聊天软件、语音视频会议等，各类商务活动打破时空限制，避免了疫情的影响，并以更加高效的方式开展。根据“领英”发布的《2021 年中国新兴职位趋势报告——探索关键趋势》，多数“可线上化”行业在疫情期间依然有稳定增长，如 2020 年对外贸易从业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 56%，科学服务从业人数稳步增长，超过 11.5 万人^[30]。

当前，各部门数字平台改造后的影响幅度存在差异。第一产业无论是就业人员占比还是对 GDP 的贡献率均基本保持稳定，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对第一产业产生巨大的冲击，而受冲击较大的是第二产业，受冲击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尽管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比维持正增长，但原本高速增长的趋势在 2020 年被遏制了。2012—2019 年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的增长年平均为 1.38%，2020 年下降为 0.6%，2021 年变为 0.3%。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也产生了巨大的削弱，但在 2021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缓和期发生了大幅的反弹。可以看出，解决好第三产业的就业问题，对解决社会就业问题至关重要。而数字平台的溢出效应和互补效应，可以改造传统上游产业和传统平台经济，稳定第三产业相关企业经营，有助于稳定后疫情时代的国内就业。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上升和对 GDP 影响力下降这一反差有很多原因。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刺激了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常态化核酸检测增加了许多医护岗位；对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冲击，使得对 GDP 的贡献率在 2020 年与第二产业差距拉近。这一反差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能力、生产商品与服务的能力在降低，迫切需要新的经济模式来改善，平台经济正是这一关键模式。戚聿东等指出数字经济发展加速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显著增加了第三产业就业比重^[34]。武可栋等表示在全国范围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就业市场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对第三产业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增加了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劳动力的需求，促进了产业就业结构高级化^[35]。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疫情倒逼各个产业开始积极拥抱互联网平台来加强供需对接、高效生产和统筹调配，疫情成为我国产业平台化的加速器。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8.9%、21.0%和 40.7%，且自 2016 年以来渗透率连续 5 年增长^[33]。当务之急是加快平台与第三产业的结合，通过平台经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利用第三产业吸纳受疫情冲击而失业的劳动者，以较好达成稳就业的目标。

与第三产业结合密切的平台之一是在线协同办公平台。2020 年疫情暴发使得人们出门不便，为了维持正常的办公能力，远程办公需求随之增加，由此便出现了在线协同办公平台。在线协同办公是指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通过电子设备实现跨地域沟通、多方资源共享与协作的工作模式。帮助实现这一工作模式的软件则为在线协同办公平台。与传统办公模式相比，在线协同办公不会受到地域及时间上的限制。在疫情反复时期，在线协同办公可以保证人们完成基本的工作任务，保证公司运转，从而使得人们有工作可做、不会失业。由于在线协同办公具有普适性，可以和任何一种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结合，在线协同办公平台在改造传统产业和稳就业方面具有更好的作用。在线协同办公行业在 2020 年初疫情暴发期间开始井喷式发展，月活跃用户人数在 2020 年 4 月达到 4.68 亿。尽管在 2021 年疫情好转时，月活跃人数下降至 3.47 亿，但行业渗透率已经稳定保持在 60%以上，与各行业形成了长期融合的趋势^[36]。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2 年上半年，在线视频/电话会议表现向好，用户规模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5.9%。受疫情影响，一线城市用户在线办公使用率增长明显，半年提高 8.4 个百分点。在线办公在支持抗击疫情、复工复产、稳定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 2022 年 3 月，钉钉已经服务超过 2 100 万个机构用户；腾讯会议注册用户超 3 亿，月活跃用户数突破 1 亿。”^[32]永久化远程办公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新趋势，这也会促使更多企业加入在线协同办公平台，开始数字化转型。

（三）平台经济调整就业结构

从理论上说，技术进步会对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而产业结构变动又与就业结构改变密切相关。现阶段，数字平台经济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平台经济增强了就业极化趋势

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和对低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需求，而中等技术要求的岗位被机器替代，导致就业人数大幅下降^[37]。在高技能劳动力方面，平台经济作为最新兴的产业形态，要求从业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能，最终使得整体就业结构偏向高级化。首先，数字平台以创新性和前沿性的数字技术为基础，形成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其所需求的劳动力多是受过良好教育、掌握数字技术相关专业技能的高技能从业者。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20 年 4 月发布的《新职业——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2020 年云计算基础硬件综合服务型、应用研发综合服务类企业人才学历结构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分别为 62% 和 66%，这将促使劳动者更加注重自身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的培养^[38]。其次，易于被平台经济改造的“可线上化”行业，主要为商业服务、电子商务、汽车交通、先进制造、医疗健康五个高端行业。截至 2021 年 12 月，商业服务类企业组成第一梯队，占总体数量比重为 17.8%；电子商务类和汽车交通类企业组成第二梯队，占总体数量比重均为 11.9%；先进制造类和医疗健康类企业组成第三梯队，占总体数量比重分别为 10.5% 和 9.6%。这五个行业都是高端技术类行业，均要求从业者自身具备较高的素质和过硬的技术，这将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在低技能劳动力方面，数字平台生态具有就业岗位需求多元化、就业吸纳能力强等特征，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且这部分岗位的进入门槛较低，对技能要求也不高。专业知识欠缺的人群在数字技术帮助下，可以依靠平台的创新和自身的劳动能力快速融入平台完成就业。例如，微商、微信小程序的个人运营者中本科以下学历占比达 47%；而餐饮数字平台下的外卖员等从业者中，学历低的劳动者占比更大。平台提供的这类岗位只需要通过简单快速的培训，能够熟练使用数字平台的 APP 即可上岗，大大增加了低端劳动力的就业机会。现阶段，这些技能需求低的灵活就业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主力方式。数字化平台的发展加速了社会劳动力向低技能岗位集聚的趋势。

2. 平台经济使就业地理分布均衡化

在数字平台搭建的虚拟空间下，就业的区域分布结构将得到改善。一方面，线上平台打破了地域限制，则更大范围的供需客户将被纳入网络，这将有利于发展红利向中西部地区溢出。中国通信院发布的《2021 数字化就业——新职业新岗位研究报告》指出，数字平台生态下的就业机会虽仍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侧，但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潜力不断增加。2021 年中国首个微信小程序创新中心落户湖南湘潭，国家“东数西算”的产业布局也将促进中西部地区扩大就业。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带来的“万众参与”模式，也使就业向三线及以下城市下沉，使当地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获益。比如，在传统农业中，气候变化导致的作物减产或疫情带来的产品滞销都会带来农产品价格下挫，这会严重打击生产积极性。而互联网平台本身较低的加入门槛，可以吸纳农户并为其打开销路。中小微企业可以通过平台联合起来，扩大生产规模，达成规模经济，以平台企业发展带动中小微企业纾困。可见，互联网平台在缓解疫情冲击，带动中小微企业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拓展消费市场、有针对性地实现地区脱贫增收，从而在稳定就业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平台经济促进降低就业的性别歧视

数字平台经济模式下，劳动者的性别歧视下降，女性的就业和创新比重得到提升。平台经济的特点为女性就业和创业提供了更多便利：线上平台打破时空束缚，工作场所灵活性增加，可以在兼顾工作的同时照顾家庭。而且，平台经济下相关创业成本相对较低，减少了女性从业创业风险。以上因素将减少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扩大女性的社会价值，从而为家庭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有利于在后疫情时代促进社会和家庭的稳定。在平台经济下，女性就业创业主要分布在电子商务、在线平台等市场中。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数字经济与中国妇女就业创业研究报告》显示，2020 年淘宝网的女性就业规模达到 2 751.1 万人，电商直播就业人数达到 1 244.9 万人，微信生态下的微商人数达到 1948.4 万人，再加上外卖配送、出行服务、家政服务、在线教育、在线客服等职业，平台经济下的女性就业创业规模已达到 5 752 万人次^[39]。

四、平台经济稳就业存在的问题

平台经济在稳就业方面也存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与利用不足，二是灵活就业缺乏稳定性和福利保障，三是部分平台在市场中形成垄断地位。

（一）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与利用不足

我国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的发展创造出许多就业岗位，但由于其发展快和发展时间短，使得部分高技能职位人才缺口很大。平台致力于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场景问题，要求既要有场景创新，还要与技术融合。这便对人才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们往往需要具备数字技术和场景分析能力，把场景翻译成平台可以纳入的数字语言。比如，租房平台为了方便人们租房，满足客户看房的需求，把看房这一场景放在线上进行。3D 建模技术把待租房的整体布局和装潢显示在云端，客户便可随时用手机看房，减少了看房的机会成本。这一环节的实现，正是场景创新与技术融合的直观体现。正是由于技术要求高，此类复合型人才极为匮乏。据统计，在全国超 2 亿的技能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仅有 5 000 多万人，高级技工缺口高达 2 200 万人。除了复合型人才本身数量较少的原因，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增多也是导致人才缺口大的重要原因。2021 年《互联网人才招聘白皮书》显示，2021 年 1—9 月互联网新增企业 639.4 万家，同比增长 78%，其中电商领域新增企业 404.2 万家，同比增长 215%^[31]。如此高速的企业数量增长与相对缓慢的人才供应导致高技能人才缺口进一步扩大。未来随着平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势必会带来更多高新技术岗位缺口。

除了量上的不足，当前人才培养体系与方法亦难以满足对人才“质”的要求。数字平台是前沿性的新领域，旨在应用新技术解决庞杂的实际场景问题，适应此要求的创新型技术人才培养还需要重新摸索。而中国高校及职业院校对互联网人才的培养模式相对传统与滞后，学术课题与互联网平台行业需求差异较大，高职院校培养的毕业生跟不上行业需求。行业与企业对人才技能以及对应的培养模式亦处在积累经验的阶段，尚未摸索出行之有效且具有广泛示范作用的培养模式与体系。

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人才分布不均衡和流动性问题导致的人才利用不足。中国互联网协会的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主要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北京以拥有 34 家百

强企业名列前茅，上海拥有 16 家，其他城市均在 10 家以下。从互联网技术人才的省级分布来看，北京、广东和上海是最受人才青睐的城市，近 1 年人才增长数量在 1% 以上，上海甚至达到了 2.6% 的增长幅度。无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人才均集中在头部城市，流动范围也主要是在这些一线城市间。尽管这有效满足了头部城市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却使得二、三线城市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地，错失互联网发展的东风。部分人才因头部城市竞争压力大、带着建设家乡互联网产业的想法回家，却可能发现“无用武之地”，最终还是回到头部城市工作发展，这就导致了人才利用率不足。

（二）灵活就业的岗位缺乏保障

与传统工作岗位相比，灵活就业岗位往往具有不稳定性，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较少，多数情况下并未进入官方就业统计系统。由于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双向或多向交易的场所，许多用工单位可以形成“雇佣单位—平台—个人劳动者”的新用工模式，不是直接雇佣劳动力，而是借助于平台来实现外包。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将工作外包，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劳动者可以同时服务于多个雇主，获得更多收入。在工业经济时代，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建立劳动关系，后者被纳入公司组织体系成为正式员工，须遵守严格的组织规章制度，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关系会更加紧密。而在灵活就业下，这种紧密的联系开始向一种松散的组织形态转变。经济发展时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是一种高效率的方式，但一旦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就会发生反蚀，原来灵活的雇佣者很容易就变成了待业者。

我国的职工社会保险保费由职工和用人单位共同承担，但是由于灵活就业者与用人单位不具有直接的劳动关系，灵活就业人员一般以个人缴费方式参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这导致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意愿严重不足。现行的法律只对传统企业的社会保险具有规定和约束作用，明确要求用人单位缴费，但这一法律已经不再适用于有多个雇主或自我雇佣的平台灵活就业方式，这使得灵活就业者缺乏基础的社会保障。另外，部分灵活就业者非工作地居民，也难以获得本地居民享有的养老和保险福利，这更加剧了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问题的严重性。尽管有平台为灵活就业者推出了商业保险服务，但商业保险保障范围较低和保费由就业者自主承担，平台仅代缴的现状仍不能解决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平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的保险问题急待解决。

基于网络平台的灵活就业方式还没有被纳入就业统计以及与就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劳动合同法》仅就劳务派遣这一特殊的灵活就业方式设定了若干条款。而对灵活就业这一概念，我国就业领域最重要的法规《就业促进法》中也仍未提及。公共服务所提供的职业培训、职业指导等，仍然以存在传统劳动关系的专职劳动者为主，忽视了广大灵活就业群体的服务需求。

（三）部分平台在市场中形成垄断地位

互联网平台由于网络效应和方便跨界的特点，容易发生“赢者通吃”的现象，导致成长为巨无霸型平台，处于市场中的垄断位置，阻碍和扼杀其他中小型公司的生存。网络效应是指产品或服务对用户的好处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拥有较多用户的平台可以巩固其主导地位，新用户也会更倾向于选择大平台来满足自己的要求。这使得大平台越来越大，用户越来越多，最终完成自我强化的过程，乃至拥有垄断地位。如果本行业中存在一家垄断平台，对中小企业来说是比较严重的打击，在高昂的成本和微小的利润下，中小微经营者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以线上教育培训为例，传统的线下教育培训企业的扩张策略是在各个省市发展分部，设立培训班以

满足学生对课外辅导的需求。由于授课地点和教师资源的限制，很难有一家企业能够占领大部分线下教育培训市场。但是在互联网平台的加持下，企业很容易让来自全国的学生在线上听课，从而获得大量市场份额。这对全国各地的面授辅导服务产生严重负面冲击。

五、更好发挥平台经济稳就业作用的策略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平台经济所具有的巨大就业潜力尚未充分挖掘，要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互补效应和溢出效应，防范平台经济的负面问题，实现稳就业目标。平台经济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一个涵盖线上线下、就业民生、消费拉动与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大议题。通过平台发展来稳就业是关系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要引导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以平台经济助力就业，以平台经济促进发展。

（一）加大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技术发展

平台经济本身依赖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因此要强化对基础核心技术的研究，鼓励平台企业加快这些领域技术研发突破，促进平台企业发展，发挥其稳就业的积极作用。技术的研发本身就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又因为平台本身网络效应特点带来的万众参与模式，任何一次技术的创新都会拉动大量非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一方面，应优化劳动力供给，增强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适配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劳动市场的供需匹配，促进劳动者转岗再就业，加强对失业或即将面临失业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引导失业人员进入门槛较低的平台企业岗位。企业自身也不应故步自封，可与平台强强联合，依靠平台的创新完成自身转型与发展。同时，建议企业通过引入新型人才培养培训模式进入数字化转型轨道，并积极打造全球品牌形象，吸引海外人才。

（二）规范平台的用工机制，建立灵活就业保障机制

平台经济区别与传统经济的新特点让旧有经济制度规则难以适用。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是区别于传统雇佣形式的，与现有法律体系并不匹配。平台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和逃避责任，会选择将劳动雇用层层外包，以此来逃避员工社会保险和离职补偿。有的平台甚至滥用雇主地位，通过算法考核等机制，迫使劳动者不得不提升劳动强度。这种行为的结果是一方面平台企业通过劳动者获取了更多的收益，另一方面又通过制度漏洞转嫁大量风险给个人与社会，这是对市场正常运行的危害。因此，政府要规范平台的灵活用工机制，明确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确保劳动者权益得到保障而非被平台通过法律漏洞将成本转嫁到个人和社会身上。另外，要健全社会收入分配机制，保证劳动者合理的工作强度与和工作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制度。最后，政府也要落实平台的社会保险责任，使平台经济从业者在面临就业波动时顺利过渡。

此外，要建立健全适应平台经济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促进就业政策。社会保障上，需尽快研究出适应灵活就业特点的社保制度。针对参保意愿不足的问题，可以实行简化申报手续、允许异地参保续保等方式来促进灵活就业者参保，让就业者在工作地可公平享受各项社会保障。政府亦可要求平台和保险公司合作推出符合各类灵活就业者的多种类商业保险，并在保障范围、缴费方式和理赔手续上为灵活就业者提供特殊照顾来弥补灵活就业者的保障空缺。就业政策上，政府可以将灵活就业纳入立法内容，研究制定促进灵活就业的政策制度，支持企业灵活用工，支持发展各类共

享用工和就业保障平台,充分发挥平台在促进员工和企业供需匹配方面的作用。

(三) 健全规范平台行为的法规体系,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和市场秩序

最重要的是尽快出台监管机制,纠正平台不顾成本约束抢占市场、以补贴等不正当竞争方式压低行业边际价格的行为。平台初期倾向凭借自己提高生产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来获取收益。因为其具有无限限制吸纳商家和个人加入的特性,为了收益最大化,平台往往会选择先用低价和补贴抢占市场份额,然后随着平台的快速发展与对市场、行业的垄断,向平台内企业和个体抽取过高佣金。这一店大欺客现象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危害。建立平台的初衷是利用数据和技术手段来减少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不是利用数据垄断和技术壁垒来加剧信息不对称问题,甚至为了利润而允许欺诈现象发生。平台应该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上发挥引领作用,而不是借机攫取垄断利润。政府要尽快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与监督制度,监督和纠正平台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黄群慧. 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的影响与应对: 短期和长期视角 [J]. 经济纵横, 2020 (5): 46-57+2.
- [2] 唐宜红, 张鹏杨. 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策略 [J]. 国际贸易, 2020 (11): 4-10.
- [3] 孔高文, 刘莎莎, 孔东民. 机器人与就业——基于行业与地区异质性的探索性分析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8): 80-98.
- [4] 戚聿东, 刘翠花, 丁述磊. 数字经济发展、就业结构优化与就业质量提升 [J]. 经济学动态, 2020 (11): 17-35.
- [5] 汤铎铎, 刘学良, 倪红福, 等. 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 [J]. 经济研究, 2020 (8): 4-23.
- [6] 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 (国发〔2022〕12 号) [EB/OL]. (2022-05-31) [2022-09-20].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5/31/content_5693159.htm.
-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九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2-07-28 (1).
- [8] 李允尧, 刘海运, 黄少坚. 平台经济理论研究动态 [J]. 经济学动态, 2013 (7): 123-129.
- [9] 胡拥军, 关乐宁. 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替代效应探究 [J]. 改革, 2022 (4): 42-54.
- [10] 黄海清, 魏航. 数字经济如何稳就业——机制与经验分析 [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2 (1): 13-24.
- [11] 田鸽, 张勋. 数字经济、非农就业与社会分工 [J]. 管理世界, 2022 (5): 72-84.
- [12] 李敏, 刘采妮, 白争辉, 等. 平台经济发展与“保就业和稳就业”: 基于就业弹性与劳动过程的分析 [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0 (7): 84-95.
- [13] 丁琳, 王会娟. 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及国别比较研究 [J]. 经济科学, 2020 (1): 72-85.
- [14] 李力行, 周广肃. 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 变化趋势与政策应对 [J]. 国际经济评论, 2022 (2): 46-59.
- [15] 娄宇. 平台经济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的法理探析与制度建构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 70-81.
- [16] 严妮, 黎桃梅, 周雨, 等. 新就业形态下平台经济从业者社会保险制度探析 [J]. 宏观经济管理, 2020 (12):

- 69-76.
- [17] Lenotief, W. , Machines and Man, Scientific American, 1952 (3) : 150-160.
 - [18] Acemoglu, D. , and Restrepo, P.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6) : 1488-1542.
 - [19] 李磊, 何艳辉. 人工智能与就业——以中国为例 [J].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5) : 13-22.
 - [20] 李磊, 王小霞, 包群. 机器人的就业效应: 机制与中国经验 [J]. 管理世界, 2021 (9) : 104-119.
 - [21] Aghion, P. , and Howitt, P. ,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1992 (60) : 323-351.
 - [22] 吴清军, 陈轩, 王非, 等. 人工智能是否会带来大规模失业?——基于电商平台人工智能技术、经济效益与就业的测算 [J]. 山东社会科学, 2019 (3) : 73-80.
 - [23] Bai, J. , Brynjolfsson, E. , Jin, W. , Steffen, S. , and Wan, C. , Digital Resilience: How Work-From-Home Feasibility Affects Firm Performance, 2021, NBER Working Paper.
 - [24] Hsieh, C. , and Rossi-Hansberg, E.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Services, 2019, NBER Working Paper.
 - [25] Acemoglu, D. , and Restrepo, P. ,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0 (6) : 2188-2244.
 - [26] Romer, P.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5) : 71-102.
 - [27]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发〔2021〕29号) [EB/OL]. (2022-01-12) [2022-09-20].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12/content_5667817.htm.
 - [2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R].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22.
 - [29]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R].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2.
 - [30] 领英. 2021年中国新兴职位趋势报告——探索关键趋势 [R]. 领英, 2021.
 - [31] 拉勾招聘. 互联网人才招聘白皮书 [R]. 拉勾招聘, 2021.
 - [3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2-08-31) [2022-09-20].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bg/hlwtjbg/202209/P020220916626882289134.pdf>.
 - [33] 赵大威, 尤越. 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 [R]. 美团研究院, 2020.
 - [34] 戚聿东, 肖旭, 蔡呈伟. 产业组织的数字化重构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 : 130-147.
 - [35] 武可栋, 朱梦春, 阎世平.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 [J]. 统计与决策, 2022 (10) : 106-111.
 - [36] 极光: 2021年在线协同办公行业研究报告 [EB/OL]. (2022-03-07) [2022-09-20]. <http://finance.sina.com.cn/tech/2022-03-07/doc-imcwiwss4553788.shtml>.
 - [37] 莫荣. 应对数字时代工作性质和就业结构的转变 [N]. 中国经济时报, 2019-10-10 (4).
 - [38] 新职业——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 [EB/OL]. (2020-04-30) [2022-09-20].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009/t20200923_390930.html.
 - [39] 阿里研究院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 释放数字性别红利, 发挥数字经济“她”力量——数字经济与中国妇女就业创业研究报告 [R]. 阿里研究院, 2022.

责任编辑：刘伊菡



中国共产党关于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演进与经验启示

陈晓仪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关系我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对于资本的理论认识经历四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党对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的认识总体经历从排斥没收到区分利用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政策层面进行了对资本的改造尝试和曲折探索。改革开放后，党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将资本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新时代，党提出并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的重大课题，推进了在资本认识及治理上的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百年进程，反映出理论和实践的有机互动，为新的历史方位下资本问题探究提供了有益启示。这些启示主要表现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坚持站稳人民立场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演进；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5-0062-17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22.05.006

作者简介：陈晓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研究”（A2022011）

引用格式：陈晓仪. 中国共产党关于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演进与经验启示[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5）：62-78.

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一直面临的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紧密相关的重大课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进路时不容回避的问题。在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视为新发展阶段紧密关系我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 2022 年 4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1]。这不仅反映出新时代党对于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深化，也彰显了党和国家对于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高度重视。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学界主要从历史演进、阶段要点、制度比较等角度出发，对党关于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问题展开研究。其一，学界结合党史和新中国史概括党关于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不同认识阶段，主要有如下观点：一是基于政策视角，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资本政策划分为没收、利用、消灭、运营四阶段^[2]；二是从资本要素属性出发，将中国共产党资本观的发展归纳为从资本要素社会属性观到资本要素自然属性观，再到新世纪新阶段资本要素二重属性观的进程^[3]；三是从利用资本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入手，将其归纳为曲折探索利用资本发展经济时期，尝试探索利用资本激活经济发展的时期，以社会主义市场制度规制资本发展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资本发展的新阶段^[4]；四是从基本经济制度出发，将党探索驾驭资本发展的进程划分为社会主义制度保障阶段，挖掘资本作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载体的认识发展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阶段和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深入发展阶段^[5]；五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逻辑入手，指出党对资本的理解经历着从抽象理解到反思性认识再到辩证实践逻辑的交替过程^[6]。其二，学界针对特定历史阶段（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时期等）党关于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重点问题展开研究。其中既有党对外国资本、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等的态度演变分析，也有结合市场经济探究党对私人资本和私营经济的认识和利用、对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界定和区分等问题。其三，学界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异同展开了比较分析，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归纳和探索了党在新时代的资本观。既有研究从资本的逐利本性出发，归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相同点，从经济地位、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逻辑^[7]、约束条件、实践方式^[8]等角度分析两种制度下资本观的差异，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特点。近期亦有不少学者对激活资本的“文明面”^[9]、为资本设置“红绿灯”^[10]、防止资本无序扩张^[11]、使资本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12]等重要议题进行探析，为新时代党的资本理论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学理基础。

学界从不同角度拓宽了党对资本认识研究的理论视域，但尚存需要完善的空间。第一，部分研究在对资本的概念界定上存在混淆使用甚至模糊处理的情况。尽管有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

实实践对资本的“极限”或“消亡点”何在、资本是否应该受到限制等问题做出尝试性回应，但也同时出现将“资本”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本逻辑”“资本文明”等概念范畴直接关联甚至混杂使用的情况，较少在文章概念界定部分对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开展马克思主义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相关历史梳理呈现较多阶段性描述，相对缺乏递进式理论分析和回溯性理论反思。第二，既有研究对新时代党关于资本问题的研究尚待丰富。尽管当前研究新时代资本问题的理论文章数量渐增，但既有成果更多是对资本的政策性解读和对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现实呼吁，相对缺乏在新时代针对资本问题的系统性、学理性分析。为此，后续研究需要结合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探索和回应新时代党关于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特点、意义等问题。

本文在进行历史梳理和相关探讨前，首先明确两点理论前提。第一，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对于当前资本分析的有效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者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待资本、特别是大规模资本的问题，这只是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等理论者所处时代的相关实践经验无法直接地运用于中国的现实语境之中。回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者关于资本的深刻分析为不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认识资本的基本理论依循和实践拓新源泉。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国情和不同时期主要任务出发，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不断探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1]。第二，基于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把握马克思语境下的“资本”内涵。一方面，“资本一般”反映了资本一切特殊形式的“共有的规定”^[13]和最一般的抽象。资本一般的内在规定性包含资本这一经济范畴本身的规定性和范畴运动的规定性，亦即当前所谓的“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对于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是在资本一般的层面上做出的，此时资本可以理解为一种体现特定生产关系、能够实现价值增值的生产要素，反映出一个具有逐利性、竞争性和扩张性特征的动态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14] 28}，资本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制度和经济形式下会呈现特殊的、具体的样态，此时对于资本的相关认识也会受到生产力水平、政治制度、意识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呈现历史的差异性。这为梳理党对资本的百年认识提供了理论和逻辑上的依据。

综上，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待资本的认识进程归纳为1921年至1949年从排斥没收到区分利用、1949年至1978年的尝试改造与曲折探索、1978年至2012年的制度定位和概念拓深、2012年至今的规范引导和治理创新四个历史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党对资本认识的经验启示。本文旨在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资本理论问题的认识，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新时代课题，以资本问题为切入点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经济内涵。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对资本的初步认识：从排斥没收到区分利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外国在华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形态。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时局变迁和中国社会性质的把握中形成对资本的初步认识，经历了从排斥没收到区分利用的转变。

（一）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资本”同“主义”“阶级”紧密关联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尝试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认识资本。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介绍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陈独秀于1921年1月在《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存在着“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的缺点，其分配方法的“缺点就是剩余价值，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底名义掠夺去了”^[15]。李达结合《哥达纲领批判》分析了马克思的“过渡理论”，认为由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差异，致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元素的比比例亦因之不同”^[16]。这些思想认识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资本提供了立场和观点上的指引。

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党认为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不符合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将“资本”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紧密关联，笼统地将整个资产阶级都作为革命对象。由于尚未区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党的一大提出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17]¹的经济纲领。

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后，党暂时放弃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优先任务，提出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与此同时，党对外国资本及其代表的外国资本主义、外国资本家予以排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国军阀，故意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17]¹³¹的劣行，对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的剥削、积累和扩张整体持批判态度，更多看到的是“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现实，在处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简单化倾向。这反映出党在斗争环境相对复杂的发展初期的特定认知状况，其总体服务于救亡图存和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分析 and 利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过与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勾结，代表反革命势力的大官僚资本迅速发展，逐步垄断了国民经济。民族资本遭到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外国在华资本的多重打压。在复杂的局势下，由于党对国内主要矛盾和革命对象出现了认识上的反复，党对资本的认识和政策安排进入曲折探索期。

土地革命前期，国共合作关系彻底破裂，党对资本的认识受到“左”倾思想影响，错误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范围，认为“我们应很坚决的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并且还应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18]³⁸⁸，将暂时附和于大资产阶级的民族资本视为“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主义之一”^[19]³⁷⁸，混淆了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外国在华资本的差别和经济主张，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斗争和消灭特征的政策。

1933年春，党开始反思和调整对资本的认识，提出发展私人经济，主张“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20]。在民族存亡之际，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党改变了对民族资本的政策认识，再次提出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策略，肯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要相当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21]。与此同时，党从大局出发，转变了武装

反抗官僚大资产阶级的斗争目标，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实行联合以共同对外，实现了从消灭资本向利用资本的认识转变。

在土地革命和再次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党逐渐完成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党对资本的认识不再是“一刀切”，而是潜在地意识到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特定资本形态的生成特征及衍生的阶级性质。这为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深化对资本的认识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对资本政策的进一步明确和深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高举全面抗战的大旗，提出了同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路线。党明确区别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坚持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资本的政策。一方面，党对官僚资本的认识更加系统，指出其垄断国民经济命脉，是压迫民族资本发展的障碍，由此“主张扶助民族资本，反对官僚资本”^[22]。但反对官僚资本不等于立即消灭它，党以是否主张抗日为标准，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待在华资本和官僚资本：坚决消灭代表亲日投降派的官僚资本和在华资本，在坚决斗争的同时争取联合代表顽固派的官僚资本。在经济层面，党主张利用外资。1941 年 5 月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 21 条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活动。”^[23]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动摇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抗日参加者”^{[24] 1289}，是中间势力的主要代表者。对此，党在政治态度上坚持以批评和教育为手段、以团结和争取为目的的斗争策略，在经济政策上尊重和保护以民族资本为代表的私人资本利益，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24] 1285}，欢迎、吸引和鼓励民族资本到根据地开办实业，充分调动民族资本和其他私有经济的积极性。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权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全力投靠美国，出卖国家经济主权换取军事援助。美国资本及商品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官僚资本依靠没收敌占区的敌伪产业、严重超发货币和美国援助急剧膨胀，形成高度垄断并“达到了最高峰”^{[24] 1253}，民族资本和工商业遭受严重打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1948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将以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为主体的官僚资本及其阶级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将“国家垄断资本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作为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对外国独占资产操控中国经济的一贯立场，提出加强与西方政府及私有资本的经济合作，建立友好关系，以发展解放区经济的利用外资的政策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25]。针对新解放城市内的外国在华工商业，中国共产党出于保护生产力、防止矛盾激化的考虑采取暂不没收的政策，除非其妨碍国家主权，否则“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地还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的政策”^{[26] 88}。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纲领，提出了“利用、限制”的思想。为严格区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党对资本主义的工厂和管理制度作了科学分析，指出其“不仅有适应高度剥削需要的一方面，也还有适应高度技术需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不仅有不合理的一个方面，也有合理的一个方面”^{[26] 435}。中国共产党强调以是否有益于国计民生为判断私人企业的标准，除了带有垄断性质的由国民党各级政府所管理的官办企业和大官僚管理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外，“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

严禁侵犯”^{[24] 1324}，由此肯定了民族资本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提出坚持剔除不合理的和反动的、发扬合理的和进步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的主张，表明党已经充分认识到资本和资本主义的两重性，在政策上采取了不同的方针。

在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系统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全面科学地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状况、特点，剖析了社会各个阶级内部结构及其对待民主革命的态度，形成了没收官僚资本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进步因素发展我国生产力的主张。这表明党对资本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三、新中国成立后党对资本的政策演进：改造尝试与曲折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革命和战争时期的思维模式运用于社会建设，抓革命、促生产。在此阶段，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并使其融入世界现代化体系。1956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问题时，强调“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27]。在探寻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在思想认识和政策主张上持续开展对资本的改造尝试和曲折探索。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主张利用和节制资本

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28] 209}面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党坚持对内节制资本和对外统制贸易的基本原则，实行了清理和没收在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利用和限制民族资本的政策。在这一阶段，党坚持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生产力水平相结合，为全面开展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了准备。

一方面，针对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及企业大多依靠不平等特权发展起来，党提出“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28] 167}，取消其一切特权，清理了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官僚资本因其具有买办性、封建性而成为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破坏因素。对此，党进一步明确了没收和剥夺官僚资本的政策界限，没收和接管包括金融、工矿、交通运输以及垄断贸易企业等资本实体的全部国家垄断资本和绝大部分私人资本，把它们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由此，社会主义性质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民族资本转向依靠国营经济。

另一方面，党认识到过渡时期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29]²¹⁶一般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民族资本“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30] 206}。党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角度出发，实行限制、利用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防止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的民族资本操纵国计民生、过分剥削工人。党强调充分发挥资本在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商品生产、畅通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利用劳动保护、价格税收、统购包销等经济政策和“三反”“五反”的政治政策，逐步引导民族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转变。

（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主张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

在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消灭官僚资本的任务后，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与私营工商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是关键问题。党创造性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提出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

国家资本主义是过渡时期党在坚持尊重民族资本利益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结合的基础上，逐步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31] 291}，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31] 282}，主要采用以加工订货介入流通领域的初级形式和以公私合营介入生产领域的高级形式，在国家行政机关、国营经济领导和工人阶级监督下，通过赎买方式将生产资料所有权逐步过渡到国家手里。在“四马分肥”原则下，民族资本按照私股所占比重换取定额利息，逐步从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向职员转变，这是党肯定资本积极作用的重要认识成果和政策创举。

受国内外因素影响，在过渡时期后期，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31] 231}党提出要用工人阶级掌握的资金代替私人掌握的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党改造民族资本的速度。单个企业的有计划的公私合营迅速转向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原则、管理混乱等情况。针对上述问题，党重新承认自由市场、个体经济甚至是私营经济的合理性，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30] 170}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32]等朴素思想。但是，这种纠正主张始终未能在党内得到统一认识，改造民族资本的政策最终变为否定资本的倾向。

（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认识分离中否定资本

面对深刻和复杂的社会变革，党一度将“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视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唯一标准，将生产力标准排斥在社会主义本质之外，将公有和非公有、剥削和非剥削等同，否定资本的自然属性，全面取缔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残存的小生产者和个体工商户，限制其收入水平。这种急躁冒进的情绪进一步影响了党对资本的正确认识。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对资本的认识与我国社会实践不断互动，积极认识和消极主张并存，初步形成了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利用资本的观点。由于经验的缺乏和内外因素的影响，资本范畴被简单划归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层面。但不容忽视的是，党在这一时期的反复实践和多次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探索资本问题的僵化思维，为改革开放后党对资本认识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

四、改革开放后党对资本的创造性认识：制度定位和概念拓深

改革开放后，党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强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生产要素的范畴出发对资本进行了创造性的认识。

（一）从“排斥”到“补充”：党对资本认识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思想解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改革开放初期，党突破计划和市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实现形式之间绝对对立的认识，改变了排斥资本的态度。

其一，党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综合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否认价值规律、过度集中的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坚决实行按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33]写入会议公报。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34]的经济体制改革原则、方向和内容。1983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5]。这表明党开始摆脱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束缚，从根本上扭转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对立的想法，为认识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中立属性开辟了新的理论前进道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务、技术、生产资料市场相继出现。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概括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36]²⁷，打破了二者的“主辅”之分，不断优化市场调节的范围，开辟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

其二，党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在坚持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市场调节实质是价值规律通过价格、供求和竞争等机制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利用多方资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在政策上，党首先设立经济特区，吸收外国资金，“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社会主义”^[37]¹⁰³。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开启了以合资经营为主、直接投资为辅的利用外资之路。1984年开始，党在开放特区的基础上，相继开放沿海城市及经济开放区，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范围，丰富利用外资的方式。相较于外资企业，党对私营企业的认识更加谨慎。城乡个体经济在数量规模上的发展必然引发是否承认带有所谓“雇工剥削”色彩的私营经济的问题。如何对待承包和雇工大户，党中央采取“放两年再看”的默许和保护态度^[37]⁹¹，实行“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38]的“三不”方针。在当时，为了规避刻意的争论，私营经济采取“迂回战术”和“挂靠”方式发展，在农村反映为经济承包制的社队企业（1984年《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改称为“乡镇企业”），在城市企业实行劳动联合或资金联合，以合作经济的名义保护私营经济发展。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首次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39]。党的十三大是党对资本错误认识拨乱反正的重要里程碑。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36]³¹；公开鼓励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充分发挥其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等作用。这是党的经济思想史上首次承认私营经济的合法存在，其与外资经济一同被确立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虽然在这一时期，市场调节未被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心地位，多种经济成分仍处于附属地位，但党厘清“计划和市场”“公有和非公有”的核心争论，完成了对资本认识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对资本从“排斥”向“补充”的态度转变。

（二）从“补充”到“平等”：党对资本要素的积极利用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指引下，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

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40] 11}。这是党探索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科学成果，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进入市场取向改革的新阶段，为党正确认识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奠定了体制基础。1993 年，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党第一次从生产要素角度采用了“资本”这一重要范畴，提出“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强调“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40] 526}，正式确认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基于此，党进一步深化了对公有制企业利用资本进行运营的认识。1995 年底，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关于一九九六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强调，国企要“切实强化资金和成本管理，提高资本运营效率”^[41]。这标志着党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性质、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为党积极利用资本奠定了机制基础。

1997 年党的十五大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42] 18}，正式将作为社会主义“补充”经济的非公有制经济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42] 22}。这表明二者平等发展的方针不是某段时间内的临时性政策，而是一项长期性、全局性的制度安排。与此同时，大会首次将资本纳入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范畴，正式承认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基础性地位，提出“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42] 25}，进一步提出要以资本为纽带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为党深刻认识和利用资本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这一阶段，党在强化市场中性论并完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的理论认识基础上，提出了发展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营、承认资本要素的主张。这表明，经过 20 多年的理论发展，党突破了姓“资”和姓“社”的思想桎梏，将资本视为能够用于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从“平等”到“混合”：党对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

公有资本概念的提出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活力的迸发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两个毫不动摇”思想^{[43] 19}，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推进其在投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公有制经济公平竞争，鼓励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鲜明地主张各经济成分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平等统一体。2003 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层次和功能进行了明确规定，“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43] 466}，首次将“公有”和“资本”直接相连，区分为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明确将完善国有资本的进出流动机制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面。这打破了资本要素与多种所有制成分不可融合发展的传统认知，实现了党对资本认识的新飞跃。

在公有制组织形式方面，历经 10 余年的股份制试点探索后，除了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由国家独资以外，党创造性地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43] 466}，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放宽了非公有资本的准入范围，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

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为进一步发挥资本要素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这次全会首次全面阐述资本市场发展的目标、方向和主要内容，明确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43] 470}。2004年1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从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改组、加快非国有经济发展、完善金融市场等方面，明确指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对我国实现本世纪头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43] 747}。“国九条”首次将资本市场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任务的高度，系统提出了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意见。

在这一阶段，党对资本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化。这不仅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促进了制度和体制的不断完善。资本要素及其市场成为激活市场主体、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最为积极的力量。

五、新时代党对资本认识的发展与升华：规范引导和治理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资本和市场的作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资本作为一种市场要素的活力焕发问题，指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44]。此后党的多个政策文件和重要讲话都提及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如何发挥资本的市场功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资本性质的理解逐步深化，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对资本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入，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1]。党对资本的规范引导走向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创新发展阶段。

（一）新时代党认识资本的思维方法

新时代党对资本的认识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依循，强调“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1]。

其一，新时代党对于资本的认识贯穿着历史思维。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出发，深刻认识到世界历史尚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制并存的阶段。此时的“资本”不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机械绑定，各类资本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反映出的生产关系亦不再成为永恒的、超历史性的关系。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了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机制相结合并走向健康发展的现实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列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体现出历史视野和历史思维。

其二，新时代党对资本的认识始终坚持发展思维。党认识到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积极作用，不仅将资本视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认为“资本是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1]。这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对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调节以及人民福祉具有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党关注到资本本身在社会历史演进中发挥作用的范围延展和程度加深，强调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明晰资本的性质和定位，服务高质量发展。

其三,新时代党对于资本的认识体现出辩证思维。一是辩证地把握了资本一般的内在规定性和资本在具体的社会制度、经济形式中的特殊性。二是在对各类资本的特殊性分析中,深刻认识到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没有忽视资本逐利本性导致的消极作用与潜在风险。三是在资本的现实治理中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不仅注重发展规划的全局性和应对具体问题的灵活性相结合,而且强调国内市场的循序规制和国际市场的互促开放相统一,不断构建规范化的、国内和国际深度融合的资本市场。

(二) 新时代党对资本认识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资本的特性及其行为规律有了更为丰富和全面的认识。党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深化了资本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定位,在具体体制和机制的完善中提出了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加强资本领域反腐败等要求和举措,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视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新的时代条件下,党不断拓展和加强对资本这一经济范畴内在规定性以及运动规定性的相关研究。

其一,党充分结合新时代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来推进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纵深发展。党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阐述和社会实践动态发展的内在关系,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45] 6},强调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盛行的时代,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运动规律。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设想更多是制度愿景意义上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阶段上。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无法预见到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资本的具体境况。此后,列宁和斯大林虽然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并未直面大规模的资本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资本视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强调对各种形态的资本及其作用加以认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魄力。

其二,党在深刻把握资本一般的内在规定性的基础上,对“许多资本”的具体样态进行了认识和分类。党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五种形态,即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和混合资本。这一认识不仅进一步确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形式的历史特殊性,而且明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形式相结合之后产生各种形态资本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当下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党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既有发展阶段,指出各类资本呈现“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1],强调在明晰性质、定位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类资本之间的具体关系。

其三,党不断明晰同资本“打交道”的阶段目标和实践方向。党在辩证认识资本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45] 6}。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无序扩张等情况客观存在,但是党没有因为类似情况的存在就走向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退出论”或“离场论”,即不认为资本在阶段性地完成公有经济的发展任务后就应退出历史舞台。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作用^[46]。新时代,党明确指出资本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具有逐利本性,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

经济的基础上注重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47]，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强调为资本设置“红绿灯”^{[45] 6}，防止各类资本横冲直撞和野蛮生长，坚决打击资本领域的腐败行为。

其四，党强调资本治理及其效能提升，在规范和引导资本的进程中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坚持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探索创新，注重提高资本治理本领。首先，党关注资本治理的系统性和体系化，强调“健全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相衔接的全链条资本治理体系”^[1]。其次，党关注资本监管的科学性和协作化，强调在资本监管的体制机制改革深化过程中依法、公正、科学、全面地落实监管责任，将行业监管同金融监管、外资监管、竞争监管、安全监管等综合监管协调联动起来。此外，新时代党着重把握体制机制创新和资本风险治理之间关系，从“管企业向管资本”^[48]转变、强调把握“防范化解金融性风险”和“筑牢制度防火墙”^[49]、“精准把握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1]，到当下平台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对突出问题的认识^[50]和对平台资本无序扩张、低效发展和恶性竞争的防范，都凸显出新时代党对于风险防控的高度重视，并在此过程中贯穿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追求。

六、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认识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于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进程，反映出理论指导实践和实践反哺理论的有机互动，体现了思想认识的递进性、往复性和实践发展的曲折性、前进性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克敌制胜的法宝。”^[51]梳理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百年进程，能够为我们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理论研究、更好应对未来经济工作中的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益经验。

（一）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深化资本认识的根本保障

在认识资本的进程中，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1]认识资本性质作用、激发资本治理效能，首先有一个方向的问题，必须举旗定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历史和现实证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形式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诸多独特优势。最大的优势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即发挥党在经济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对资本功能的发挥与驾驭，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之一。”^[52]在百年进程中，党不断深化对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取得丰富经验。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不能“一刀切”地否定资本，而应有区分地加以利用；不能将资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机械割裂，而应将二者进行有限度地分离和结合；不能一味地照搬理论原理和嫁接外国经验，而应充分结合世情、国情、党情把握资本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有助于在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防范资本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发挥好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见微知著，抓早抓小，着力避免发生重大风险或危机。”^{[45] 7}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防范和化解资本在经济运行中的系统性风险，在资本的全链条治理中实现思想和行动的高度统一，提升资本监管能力和体系的现代

化水平。另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有助于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促使党在规范引导资本、驾驭资本的积极尝试中,既不因资本本身的逐利性而视之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也不为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侵蚀”,引导资本在阳光下运行。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把握资本规律的基本原则

党对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经历着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其中始终贯穿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其一,辩证认识“资本”这一经济范畴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都具有逐利性,只是其地位、作用、运动方式存在差异。由此,不能将资本简单等同于资本主义。资本在工具、手段和方式的意义上不存在姓“资”和姓“社”的区别。在较长的历史阶段中,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发展出强大的资本逻辑,成为总体结构中“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14] 131},为资本家带来了社会财富和经济权力的庞大积累和对外扩张的欲望。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体在认识资本的初期容易被其社会属性的强大外观吸引,将资本和资本主义绑定认识。这启示我们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条件,厘清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把握资本的一般和特殊、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关系。

其二,资本的内在规定性及其特殊表现样态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适配的空间,即社会主义存在着驾驭资本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证了各种形态的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尽管因其逐利性而存在无序扩张的现象,但在社会现实的经济进程中也存在着积极作用。从具体的资本样态来说,“作为以国家和集体为主体的公有资本,由于兼具公有性与逐利性,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利益平衡”^{[9] 141},以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对此,必须坚持党对资本认识的中国化,把握资本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来认识 and 对待资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其三,资本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存在仍具有历史长期性,应学会在渐进改革和灵活调整中同资本“打好交道”。马克思指出,资本在其对价值增殖的追求达到一定限度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4] 91}。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认识和利用资本的尝试中已经关注到资本本身的消极面或局限性,但不能急于求成地去消灭资本或在“资金”等词的替换下单方面宣布已经消灭或驯服了资本。应当认识到资本的产生和发展都经历着并会持续经历着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不断探索社会主义要发展什么样的资本、怎样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何全面驾驭资本等问题。

(三) 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是党提升资本治理效能的方法依循

党在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进程中,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不仅立足当前,而且着眼长远,在灵活的政策调整和对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的积极运用中发挥资本作用。

首先,坚持问题导向要求独立自主地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结合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条件,坚持主动把握和独立分析资本问题。其次,坚持问题导向要求在开拓创新中探求思路和解决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坚持总结经验和把握规

律，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如何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提出了诸多新理念新观点。例如，新时代提出为资本设立“红绿灯”的思想，体现出党健全资本发展法律制度、明确资本运行边界的治理主张。

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必须以系统思维提升资本的治理效能，坚持疏堵结合和分类施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提升资本治理效能的实践依循。长期以来，党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此过程中高度重视资本在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机制三者之间的衔接，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资本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作用，在具体经济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中市场功能的发挥。党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历程，是对资本在制度、体制和机制不同层次上进行动态规范的过程，也是坚持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和局部调整三者有机统一的实践进程。新时代的资本治理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国内和国际”^[1]等关系，在此基础上实现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性质区分和定位明确，注重发挥包括非公有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坚持站稳人民立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发挥资本作用的本质目的

从党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百年历程看，仅仅将生产力发展程度抑或社会财富的多寡视为衡量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标准是不够的。在认识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的基础上，还必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兼顾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明确资本是手段，生产发展是基础，人民幸福是中心和最终目的。

首先，党对资本的认识始终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不仅能够便利人民生活，而且能够发挥“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1]的积极作用。从资本和利益分配的问题来看，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必须在分配过程中兼顾效率和公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其次，党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不仅是为了实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创造，更是为了提升人民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制度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以人民为中心”则是一系列生产和建设活动的本质目的和价值依归，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最终目标。党不仅关注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利用资本和发挥不同类型的资本活力，而且强调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在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过程中，必须始终重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明确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把握好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的问题，加强资本领域反腐败，把驾驭资本的权力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里。

七、结语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当今世界尚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制并存的阶段，并且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式在全球范围内仍占据相对优势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结构中，资本占据支配地

位,是服务于资产阶级财富积累、政权合法性巩固和意识文化形塑的重要存在,也是众多理论者探求资本逻辑、发掘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中介范畴。与此同时,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攫取引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无序扩张和“资本极化”现象愈演愈烈。经济危机、劳资矛盾、贫富分化、生态破坏等问题亦逐渐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应对资本问题上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曾在对东方社会的分析中提出“跨越”理论,认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因其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53]。正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交流与合作、矛盾与冲突并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资本的认识体现出对世界历史发展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自觉把握,体现出对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回应和超越。党不仅认识到资本本身及其在运动过程中存在的消极作用,而且在实践中不断明晰资本仍然是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结构中占据支配地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扬长避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积极作用,有效控制资本消极作用,使各类资本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的认识和把握,鲜明体现出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懈追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孜孜求索,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开拓。

新征程上对资本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需明确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认识到资本在现阶段存在的必然性及其逐利本性的普遍性,又关注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在结构地位、表现样态和运动形式等方面呈现的特殊性。对此,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不断站稳人民立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进步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N]. 人民日报,2022-05-01(1).
- [2] 田永秀,张雪永.中国共产党资本政策百年变迁析论[J]. 社会主义研究,2021(6):1-8.
- [3] 刘忠和,石家铸.从资本要素属性看中国共产党人资本观的形成与发展[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5):23-28.
- [4] 胡博成.新中国70年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历史、经验和实践导向[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24-33+197.
- [5] 邱卫东,高海波.新中国70年来探索驾驭资本发展的历程、经验及启示[J]. 理论导刊,2019(8):28-34.
- [6] 速继明.改革开放四十年“资本”观的历史生成与实践发展[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4):67-82.
- [7] 程承坪,胡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待资本的异同[J]. 学习与探索,2017(11):8-14+191.
- [8] 陈广亮,王娟娟.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历史溯源、当代出场与新时代气象[J]. 学术界,2018(5):107-119.
- [9] 周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价值[J]. 中国社会科学,2021(4):128-145+207.
- [10] 董志勇,毕悦.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理论基础、实践价值与路径选择[J]. 经济学动态,2022(3):

- 12-20.
- [11] 肖潇. 正确认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4): 72-80.
- [12] 韩喜平, 王晓阳. 马克思关于经济制度与人民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分析——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J]. 经济纵横, 2022(6): 12-20.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40.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5] 陈独秀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19.
- [16] 李达全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64.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4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88.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5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78.
- [20]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33.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2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01.
- [22] 周恩来军事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358.
- [23] 毛泽东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37.
- [24]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5] 毛泽东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27.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25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第2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50.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26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22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16.
- [30] 毛泽东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31] 毛泽东文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32] 陈云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3.
-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6-7.
-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22.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568.
-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7]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3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1982—2014）[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8.
-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199.
-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791.
-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12.
- [45] 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J]. 求是，2022（10）：4-9.
-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673.
- [47]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9-11-06（6）.
- [48]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2018-12-22（1）.
- [4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N]. 人民日报，2019-02-24（1）.
- [50]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强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N]. 人民日报，2021-03-16（1）.
- [51]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1（7）：4-17.
- [52] 徐立京.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理论的重大创新[N]. 学习时报，2022-06-22（2）.
-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1.

责任编辑：龚静阳



“一国两制”的香港样本、法理要义与发展前景

——对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的理论解读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 香港回归 25 周年以来, “一国两制”香港实践展现出巨大成功和丰富内涵, 其法理完备性与制度韧性需要正确理解、认知和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一国两制”的历史根基、法理体系与实践取向进行了最为权威和富有理论深度的阐述。此次重要讲话抓住了“一国两制”法理建构和话语权塑造的关键, 从文明史角度确证香港与祖国的历史命运共同体关系; 在“一国两制”法理层面前所未有地强调“一国”在“一国两制”体系中的根本地位。此次重要讲话明确“一国”是具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社会主义中国; 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将爱国扩展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尊重与维护。此次重要讲话从三个具体方面总结了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以来取得的成就和贡献, 给香港社会与国际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制度稳定性预期和良好发展愿景。此次重要讲话使用“四个必须”总结“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规律, 阐述“一国两制”从抽象到具体的良性转化循环关系。此次重要讲话落脚在“四点希望”, 涵盖“一国两制”香港实践新阶段需要面对政府管治贤能化、发展功能体系化、社会民生破解化与社会团结重构化的关键议题, 是香港实现由治及兴的基本坐标与课题。

DOI: 10.13946/j.cnki.jcqi.2022.05.007

作者简介: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研究”(19ZDA12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涉外法治的规范原理与典型制度研究”(YWF-22-W-205)

引用格式: 田飞龙. “一国两制”的香港样本、法理要义与发展前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的理论解读[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5): 79-90.

此次重要讲话将对“一国两制”长期坚持和国家改革开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发展，起到权威而强大的信心释放和理论指导作用。

关键词：“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爱国者治港”；全面管治权；高度自治权；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5-0079-12

在中国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上，“一国两制”是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伟大创举。“一国两制”因台湾问题而设计，在港澳率先适用并形成经验先例。香港实践是“一国两制”最具原创性、制度与文化挑战性及经验丰富性的个案，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香港样本”，是我们研判“一国两制”是否行得通、如何行稳致远的主要参照系。香港回归 25 周年，“一国两制”伟大实践已经进入了“五十年不变”^[1]的中期，是进行法理、制度与成效评估的最佳窗口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亲自指导香港“一国两制”的制度演化与完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体现“一国两制”初心、法理与实践规律的新论述与新思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治港及其制度成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一国两制”层面的理论转化与实践落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国两制”新论述与新思维的最新篇章，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确立了新坐标与新气象^[2]。此次重要讲话理论内涵丰富，法理论述充分，实践指导意义凸显，呈现了香港与内地的有机共同体联系、香港回归 25 周年的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实践规律与法理要义以及香港未来发展的指导方针。站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目前学界逐步展开对此次重要讲话之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的学习与解读，但缺乏较为系统性的理论阐释。此次重要讲话对“一国两制”的权威阐释，为上述课题带来了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遵循。本文对此次重要讲话进行侧重法理和制度层面的解读，为提升关于“一国两制”的认知水准和实践共识，以及“一国两制”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发挥可预期的战略与制度杠杆作用^[3]提供参考。

一、讲透“一国”：历史与法理的澄清和塑造

“一国两制”有着丰厚的中国历史、思想与制度渊源，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与中国共产党治国哲学的有机结合。在“一国两制”的观念基础层面，“两制”是现实存在的客观事物，“一国”是作为共同基础的历史与政治统一体。通过历史与法理的澄清性阐释将“一国两制”建构成内在融贯的有机统一整体，是“一国两制”共识建构的关键理论任务。讲清楚来由，讲清楚是非，讲清楚利害，“一国两制”才能立得住，而其中的关键就是“一国两制”的“一国”之基础与前提如何获得共识确认与制度性深化。与 2017 在香港的重要讲话相比^[4]，此次重要讲话在讲透“一国”方面用力更深，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把握更为完整系统，有力推动了“一国两制”法理体系的清晰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的此次重要讲话，对“一国两制”香港经验做了精炼、深刻、权威的科学总结，对凝聚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理性共识，为香港未来校准战略发

展方向做出了权威指引。这次里程碑式的讲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亲自研判与推动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学习好此次重要讲话精神的要点，对“一国两制”的法理、制度、政策以及发展策略做通盘考量，推动“一国两制”开新篇^[5]。此次重要讲话最大的亮点是把“一国”讲清楚、讲透彻。只有厘清“一国两制”当中的“一国”以及“一国”与“两制”之间的有机联系，关于“一国两制”的疑问、斗争、冲突以及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新阶段的发展责任才能获得融贯性解释，才可能找到具体思路和方法打通“一国两制”的所有梗阻关节。

第一，从文明史角度确证香港与祖国的历史命运共同体关系。从五千年文明史的角度看，香港和祖国始终血肉相连。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一百多年近代史、中国人民百年奋斗史中，香港始终是祖国的重要一员。香港从未缺席过整个中国历史进程，香港与祖国是历史命运共同体。香港与整个国家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和历史共同性。“一国两制”的内在统一性和有机性需要关注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自觉与认同根基^[6]。这一基于文明史、国家长期历史的血肉联系，是“一国两制”最深刻的来源和基础。从历史的血肉联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展开阐释，“一国”具有最为强大的存在性和价值内核。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台湾问题，用以论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2022年8月10日，《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发布，该白皮书采用了同样的论证逻辑。这显示出“一国两制”范畴的国家本体论证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据和方法论特征。

第二，在“一国两制”法理层面前所未有地强调“一国”在“一国两制”体系中的根本地位。此次重要讲话提到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特别提到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的最高原则。这是一个很新的提法，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特别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激发和运用。这是将“一国两制”中“一国”的法理地位阐述得清晰透彻的理论表达。基于该前提性阐述，此次重要讲话又提到在具体宪制秩序的权力安排层面，要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体现出关于“一国两制”法理体系与权力体系的整体观和有机论。此次重要讲话特别提到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来源。虽然以前我们也讲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来自中央授权^[7]，但此次重要讲话具体说明了权是怎么授的、来自何处。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来自中央全面管治权，二者存在源流和高下关系，宪制名分与责任更为清晰可辨，秩序纹理更为井然有序。中央全面管治权由“一国”或者通常所称的代表“一国”的“中央”拥有和行使。国家作为主体行使全面管治权，是一种合乎“一国两制”宪制秩序的宪制性管治权^[8]，不是法外特权。

此次重要讲话从历史和法理两个层面论述“一国”，抓住了“一国两制”法理建构和话语权塑造的关键。香港回归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运用全面管治权、融合发展和“爱国者治港”等法理支撑点对香港乱局建章立制、政策重置。这一法理判断为未来中央治港实践中继续出台措施、做出决策，提供了法理正当性支撑。国家的历史归来与法理的现实归来，是此次重要讲话的逻辑主线。

二、明确“爱国”内涵：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

“一国两制”中的“一国”不仅在历史和法理上是真实的，在具体权力规范和宪制架构上也是

真实的。此次重要讲话深入“一国两制”内在而具象的层面，澄清“爱国者治港”中“爱国”的具体规范，凸显党的领导在国家宪制构成中的核心地位，为香港社会阐释与塑造了一个具象国家。此次重要讲话谈及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尊重和维护，不是简单的政治宣示或伦理性要求，而是具体法律依据——既是对守法、护法的呼吁，也是对潜在违法者的严正警告和惩戒警示。此次重要讲话是对“一国两制”在宪法规定基础上的进一步规范化、清晰化法理阐述，明确指出“一国”就是具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些法权要素环环相扣、紧密相连，诸要素不可拆解、不可或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社会要认同拥护“一国两制”，其中的国家是具体的、实在的。这内在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社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进而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对“一国两制”的领导。这样的“一国两制”才是完整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从宪法治理层面来看，国家必须是具体的和有机的，必须具有主权立法能力和惩罚功能。香港国安法是这一具象国家的典型法律建构。习近平总书记对具象国家的法理凸显和深度描述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斗争预期。香港社会长期存在“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对立，存在以“民主中国”为名义的“大批判运动”，存在“民主反共论”的言论和政治市场^[9]。此次重要讲话在解释“一国”之宪法内涵时，明确提及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将之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居民尊重和维护的法权要素。把“爱国者治港”进一步规范化和清晰化，有助于塑造和巩固“爱国者治港”的法理共识与社会政治基础。

将爱国扩展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尊重与维护，这是“一国两制”法理建构的新动向，是对“一国两制”法理的溯源性与根基性阐释^[10]。“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其关键和基础在于“一国”。“一国”不能被任意建构，更不能被污名化和颠覆化。“一国”不是抽象的“文化中国”，也不是抽象的、香港部分群体人为想象建构的所谓“民主中国”。香港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操弄“文化中国”与“民主中国”的话语和政治运动，其文化与政治后果是严重而需要警惕的：“文化中国”不能确保国家统一，“民主中国”则具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颠覆性。中国当然具有文化属性和民主属性，但不是与社会主义中国对立甚至敌视的那种颠覆性范式，而是社会主义中国自身的文化统一性和民主政治进步性。“一国两制”范畴的“一国”只能是中国宪法建构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具体、实在、有血有肉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而在社会主义制度范畴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本质的特征^[11]。“国”的具体化内涵、国家的根本领导体制与根本领导力量，都属于“一国两制”的规范范畴。拥护“一国两制”，就不能够“反共”，更不能意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回归后，由于缺失香港国安法之类的法律规制，香港反对派利用种种借口裹挟香港社会，毒害香港青年，煽动反体制的“抗命”之乱。一段时期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香港社会存在的反共反国家言论的处理，在政治防范与法律规制方面均有严重不足，暴露出“爱国者治港”的观念与制度赤字。实际上，以空泛的“民主”旗号煽动反共、反国家乃至颠覆特别行政区政府，完全是“颜色革命”的套路。香港国安法对此进行了立法上一锤定音式的界定和规制^[12]，并对香港社会以往种种乱象展开系统清理、甄别和司法处理，推动香港由乱到治。

此次重要讲话对“爱国者治港”的爱国者范畴有所扩展，涉及所有居民。“爱国者治港”中爱

国者的传统范畴仅包括香港的管治者，即在选举制度、政治委任制度中当选或被任命的公职人员，掌握公权力的人要符合爱国者的要求。此次重要讲话提高到社会性忠诚的广泛层面，要求所有在“一国两制”体系下还留在香港这个地方、从制度中获得权利与发展利益的人，都要拥护和支持“一国两制”的所有法权元素，不能做“两面人”。普通香港居民最低限度要做到守法。

三、有根有据：“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巨大成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国两制”是否行得通，需要具体实践来检验和证明。此次重要讲话从三个具体方面总结了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以来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将“一国两制”香港实践提升到国家治理与国家现代化的一般性层面，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好制度论”和“长期坚持论”，给香港社会与国际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制度稳定性预期和良好发展愿景。

（一）桥梁与窗口：香港连通内外的枢纽定位

此次重要讲话提到回归25周年里香港作为联系中国内地与世界市场的重要桥梁作用，这触及“一国两制”中深层次的国家理性。这个国家理性在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初步构思和探索港澳政策时表现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后，“一国两制”成为政策和法律，这一国家理性体现为“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具体方针政策、法律法规^[13-14]。这种国家理性是国家对地方的高度自治授权与地方对国家的持续贡献的理性结合。

香港与祖国紧密的血肉联系是香港生存与发展最深刻、最可靠的基础。1842年以来的香港民众，一方面在持续反抗港英当局的殖民压迫，维护华人主体族群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另一方面运用殖民地制度中的市场手段和竞争规则来形成自身的经济产业基础和社会优势地位。在受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对英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网络节点，尤其在现代化发展水平以及连通世界市场方面。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和据点建设，完全服务、服从于所谓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整体利益。香港的现代化进程固然有殖民统治的规划和投入，但真正打下根基和发展基础、作出贡献的不是殖民者，而是勤劳、勇敢、奋斗、进取的香港民众。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香港社会部分民众仍有浓厚的“殖民地情结”^[15]，对殖民主义压迫性和华人群体主体性认知不足。这种历史观的偏颇、倒错是回归以来香港社会出现矛盾冲突的重要根源，需要通过教育、法治与社会沟通加以治理和重塑。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华人资本、华人企业已经在香港经济体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在香港的中国人打下了香港经济现代化的产业基础，建立起香港与全球的复杂而高效的商业网络。这份产业基础与经济网络，在1997年之后成为服务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现代化发展、国际化进程的非常积极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一国两制”保留和延续了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就是为了让香港同胞艰苦奋斗所积攒的基业得到维护，他们的财产权及享有的自由得到保障，连通全球商业网络的已有基础和便利得到保护和促进，并以此为基础助力国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

“一国两制”是充分考量香港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佳制度安排^[16]。在香港作为国际桥梁与窗口的强大作用下，国家改革开放事业得到长足进步和突破性发展，并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更为优越的制度环境与产业架构。这样的良性互动机制必须继续保持和增强。

（二）全球化节点：香港国际地位的巩固发展

此次重要讲话提到香港法律制度得到保持和发展。法治保障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依托法治展现吸引力，二者形成良性循环，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得到巩固发展。回归 25 周年来，香港在全球竞争力主要指标上一直位于国际前列。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在全球经济体系当中的主要功能得到了保持和增强。2021 年 9 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了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份《香港营商环境报告》。营商环境报告以具体数字以及国际评级机构历年的评级结果为事实依据。报告显示：香港的固有优势得到保持，香港仍然是全球投资者最优选的投资目的地，香港也是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与研发团队设立地区总部、研发基地的首选目的地，香港还是全球最有投资实力的公司选择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中转站。这些都说明香港连通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的枢纽功能不仅没有削弱，而是得到了增强。在应对危机挑战时，香港特区具有快速修复、巩固发展的能力。正是基于对香港基础经济功能、制度功能与社会修复能力的信任，国家的“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建设香港“八大中心”的目标群，“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被赋予更为系统完整的国际化地位与角色^[17]，成为更加重要的全球化节点和全球化基础设施承载平台。

（三）良政善治：香港民主法治体系的探索进步

此次重要讲话强调了“一国两制”香港实践中的民主发展成就。香港回归开启了真正的民主进程，香港国安法的颁布与选举制度的改革让民主制度越来越完善。香港民主法治体系的探索进步是“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有力保障，是香港实现良政善治的规范性基础。香港的法治是“一国两制”下国家法治与普通法体系的有机结合，在探索中逐步形成香港普通法的规范基础和司法优势。在“一国两制”的保障下，香港的民主最终锚定“爱国者治港”，探索出适合香港的民主政制模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宪制地位，有利于维护香港居民民主权利，有利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香港回归以来，其繁荣稳定曾遭遇“激进民主化”的严重干扰。1997 年，香港泛民主派提出所谓“民主回归论”，即一种附条件和附期限的“香港民主运动”理论。最初的“民主回归论”及其政治行动与特别行政区政府、建制派甚至中央展开博弈，谋求不合实际的香港普选民主实现的路径。2012 年以来，非法“占中”、旺角暴乱、修例风波等本土主义极端化运动不断挑战“一国两制”宪制底线。外部干预势力同步加强打“香港牌”，将香港作为颠覆中国社会主义主体制度的政治基地，煽动“港版颜色革命”。在内外因素作用下，香港的“激进民主”陷入“抗命”漩涡而误入歧途。有关人士使用的暴力手段完全超出了“一国两制”制度容纳的极限，对香港繁荣稳定造成致命威胁。

面对“激进民主化”的威胁，中央审时度势、重拳出手、拨乱反正。中央重拳出手并不是把香港的“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而是要恢复“一国两制”健全的法治基础与民主秩序。中央治港组合拳最关键的抓手是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香港国安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用法律手段打击和排除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对香港法治与公共秩序的破坏，使香港回到繁荣稳定的安全法治秩序内，让全体居民和投资者有安全感和信任感。香港国安法实施两年多来，法治秩序迅速恢复，人民对香港的信心迅速恢复。新选举制度和“爱国者治港”实际上是要刹住香港“激进民主化”这一狂飙列车，使香港民主发展回到“一国两制”宪制秩序轨道内。香港民主必须与香港的宪制地位

相称，必须服务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民主要体现香港社会各阶层、不同地区、不同利益团体的均衡参与，成为结构化的优良民主体系，而不是民粹化的、被外部势力支配的代理人民主。中央通过香港国安法建章立制，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建立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确保了香港民主法治体系回到理性轨道，推动香港民主有序发展^[18]。由此，香港居民所享受的民主权利才能够有序展开。香港居民投票时，不用担心语言暴力、身体暴力或网络暴力，不用遭受外国势力操纵或者看他人眼色行事。这样的民主才是香港的好民主。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新选举制度开启了“爱国者治港”新篇章。

（四）好制度：“一国两制”长期坚持的规范理由

此次重要讲话总结指出，“一国两制”是一个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此论述的逻辑在于：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是因为它是一个好制度。好的才坚持，不好的就必须改革，而“一国两制”是好的，并且有能力在面对内外挑战时作出制度性修补和更新，是有充分理由长期坚持的。“长期”的概念实际上是给香港社会与国际社会一个长期的信心。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间点宣布“一国两制”长期坚持，其信心或自信的根据来自：“一国两制”是经过历史反复检验的好制度，它满足方方面面的合理化要求。“一国两制”既满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需求，同时满足香港繁荣稳定的需求，实际上也隐含着满足全球化层面对香港平台正当合理运用的期待。

从这个逻辑看，任何一个理性的、对市场有正确健全理解的机构与个人都有足够理由去维护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都会拥护和支持“一国两制”，都会珍惜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与世界市场桥梁与窗口的角色设定，而绝对不会以冷战的、遏制的、破坏性的脱钩或长臂管辖的方法^[19]来对待“一国两制”和香港。美西方打压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上是其“逆全球化”潮流的一部分，损人不利己。此次重要讲话特别感谢全球友好力量，就是对一切长期支持“一国两制”事业、支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友好团体和个人表达谢意。这些基于全球化理念、和平发展的共同核心价值观而对“一国两制”与香港表达理解与支持的各方人士，是我们要团结、争取的共同维护“一国两制”的重要力量，是统一战线可团结对象。“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与统筹国内统战与海外统战的长期工作及其成效分不开^[20]。

四、“四个必须”：“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重要讲话中指出：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在此次重要讲话中，“四个必须”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分量，是对香港回归25周年实践经验的规律性提炼和规范总结，是一种法理性质的规范表达，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法理体系。此次重要讲话使用了“实践规律”这个概念，意指“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经受住了考验，让我们从理性上获得了规律性认识。“一国两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总结和完善，这恰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际应用^[21]。根据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国两制”也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检验的结果就是“四个必须”。它既是由中央总结、

把握和运用的“一国两制”实践规律，也是法理体系的基本原则。

一是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实际上，“一国两制”方针乃至整个香港制度、香港实践，都需要上升到“道”的层次予以衡量和检验。“一国两制”方针是根本之“道”，香港基本法及其他基本法律是“制”。评价任何一部涉港立法或者一项涉港政策，评价香港制度与政策的任何变化，最根本的是要回溯到“一国两制”的根本之道与法理精义，看是否满足了“一国两制”完整的法理和功能追求。“一国两制”既要做到坚定不移的坚持，又要做到全面准确的运用，必须在实践中检验和把握，而不是僵化理解和教条式固守。“一国两制”的实践平衡性与完整性在于，既要坚定不移，又要全面准确，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错误，导致具体政策的变形走样与制度功能的内在紊乱。“一国两制”是检验一切涉港制度与政策合法性、合理性的根本之道。而在根本之道内，最高原则是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接下来才是高度自治权的确定和展开。

“一国根本论”“最高原则论”确立了“一国两制”方针的宪制根本法逻辑。此次重要讲话凸显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地位及香港的尊重维护义务，正是从“一国两制”宪制根本法逻辑推演而来的。

二是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这实际上是论述具体的“制”，将“一国两制”的“道”落实到具体的“制”，落实到具体制度的内容和形式上。其宪制规范的构成原理即中央全面管治权和香港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与有机统一^[22]。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两权结合论”。如果做不到两权有机结合、有机统一，“一国两制”的“道”就可能内在离散，就会出现偏差、变形走样。为此，必须用“制”层面的制度和政策展现两权是否互动良好，验证具体制度规范是否符合“一国两制”。这是由抽象之“道”到具体之“制”和“治”的制度现实化与合理化的持续性展开过程。中央治港使用组合拳，表明“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一个持续探索、评估、检讨和修订发展的过程。“一国两制”实践追求高标准的良好善治，这一过程未有竟期。

三是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这一原则是对高度自治权的边界规定，设定了自治的内在伦理与外在约束，任何偏离形态都不符合“一国两制”下港人治港的合法与规范的要求。邓小平指出，港人治港要有原则和界限，即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爱国者治港”对管治者的政治忠诚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伦理和法律标准要求。新选举制度将这些标准清晰化、机构化、程序化，使其成为可操作的法律要求^[23]。“爱国者治港”赋予香港高度自治权内在灵魂和方向感。“爱国者治港”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权之魂，具体实践如果不符合其要求就会失魂落魄，就可能出现混乱与颠覆性风险。没有内在灵魂和制度伦理的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只是徒有其表，且易遭到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的政治围堵和制度挑战，没有办法应对制度外的社会动乱与宪制危机。要重建、重塑香港高度自治之魂，建立健全“一国两制”宪制秩序，确保香港地位和优势得到增强。

四是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这是“一国两制”整个系统运行的基础性条件之一，也是运行是否良好的重要检验指标。“四个必须”之间的内在逻辑是清晰和严密的：前两者是中央对“一国两制”系统完整的法理阐释，谈及“一国两制”的根本之道与最高原则，而道变成制则呈现为两权结合的有机统一，从法理和制度上巩固了“一国两制”的观念根基和制度安全。但“一国两制”毕竟建立了授权式的高度自治体系，自治权层面需要确立制度灵魂和方向感，“爱国者治港”

填充了这一空白，使其不离散、不对抗、不变形、不走样。在满足以上从中央到地方相应的宪制要素之良好理解与匹配之后，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繁荣稳定就能得到保持与增强。这种繁荣稳定对整个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反馈性支撑效果也将得到呈现。如此，“一国两制”形成良性循环，充满活力且行稳致远。香港的地位与优势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到“背靠祖国，连通世界”，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定位以及“十四五”规划中的“八大中心”新发展纲领，其内在逻辑一脉相承。

“四个必须”实际上是阐述“一国两制”的本和利，阐述“一国两制”从抽象到具体的良性转化循环关系。“一国两制”是本和道，而这个本的内部关系必须确定清楚，就是要理顺“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一国”是“一国两制”法理体系的最高原则，在“一国”的前提之下才有“两制”的展开。“两制”的具体展开是有章法的，那就是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这是科学的制度方法论。这个“相统一”一定是良性的结合，同时回应与保障国家利益与香港利益。在上述从道到制的推进过程中，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本身如何构成呢？这事关“爱国者治港”的宪制功能和价值所在。通过“爱国者治港”，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了内在伦理和外在规定，能够完整、准确地领会到“一国两制”内在的法理精义与制度安全法则，并在治理过程中自觉准确地理解运用“一国两制”。我们要坚持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有这样具体、内在、系统、完整、科学的逻辑支撑，人民能够明白“一国两制”是好制度，长期坚持对所有参与方都是有利的安排。这样，我们坚持“一国两制”长期不变就有了受到人民赞同和认同的道理与法理，这就是“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这个强大而科学的内在制度逻辑立住了，“一国两制”的价值内核和人心基础就立住了。

五、“四点希望”：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国两制”

此次重要讲话落脚在“四点希望”：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共同维护和谐稳定。这“四点希望”涵盖“一国两制”香港实践新阶段需要面对的政府管治贤能化、发展功能体系化、社会民生破解化与社会团结重构化的关键议题，是香港实现由治及兴的基本坐标与课题。这是中央的权威性监督意见，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的施政指南。“四点希望”是基于两个理由提出来的。其一，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一国两制”的通盘规律与法理精义的把握，这些规律和精义在此次重要讲话的上半部分已有清晰、权威、系统的论述，而四点希望是具体运用。其二，习近平总书记对香港未来发展实际上是有更高的要求 and 期待的，有着一关于“新香港”的框架构想，四点希望是具体承载。

第一点希望有关香港贤能治理。此次重要讲话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做到贤能有为提出了具体建设要求，特别提到治理能力的提升和选贤任能体系的形成，要塑造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相结合的新政府形态。这应该成为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自我建设的重点与指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传统管治哲学强调积极不干预。该路线延续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小政府、大市场”的自由主义理念。香港回归以来，这种管治逻辑一方面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产业政策和全球竞争力打造方面错失

机遇^[24]；另一方面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回应社会民生、社会正义特别是住房、青年发展等社会矛盾问题上，政策的清晰性和执行力不足^[25]。长此以往，社会矛盾传递到政府管治领域，形成了很大的社会政治风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将高效率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要重新理顺什么问题应该由市场解决、什么问题应该由政府解决，政府责任不能推卸，市场的自由要得到保障。唯有如此，香港才能走向良政善治。

第二点希望有关香港的发展动能。香港要找准定位，调适再出发。完整的香港定位里面既有香港固有优势的保持及其政策的连贯，也有国家主体战略演变发展当中对香港提出的新发展要求。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香港定位已有战略性拓展，融合发展与技术转型的方向感基本清晰。在更加具体的“十四五”规划里，香港要建设“八大中心”，其中有些中心依托香港固有优势，像金融、航运贸易等；有些是新要求，像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在国家政策支持、国家主体经济战略拉动下，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及时发展转化自己的独特优势，香港的综合竞争力必定稳步提升，国际地位将进一步巩固，而香港在面对周边区域的更强竞争压力时可能出现新的优势。香港的“北部都会区”是战略性融合发展的杠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需要团结全社会与主要产业力量从中寻找新动能和新路径^[26]。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对“一国两制”香港实践同样适用。

第三点希望有关解决民生痛点。民生问题是香港回归以来深层次矛盾里的主要矛盾点。香港作为全世界最发达经济体之一，作为享受“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与发展红利的最佳平台，本应将发展成果惠及各阶层，但部分香港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却有持续性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民生政策上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规划与顶层设计，在具体政策推行上受到多重因素阻挠，缺乏清晰的方向和坚定有力的执行。此次重要讲话重提关于民生的希望，一方面会重新燃起香港基层民众、普通市民特别是青年人对“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管治的期待与诉求，另一方面向特别行政区政府赋予了管治与保障责任。民生保障不仅是施政伦理与正义问题，也是施政能力与贤能治理问题，是对“爱国者治港”的深层次要求。

第四点希望有关香港要实现和谐稳定。这指向政府和社会的同心协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爱国者治港”所塑造的贤能爱国者管理体系，已经初步成型。但是，香港社会仍然存在由过去所谓社会运动和外力干预造成的严重撕裂与民意对立环境，还有潜伏的本土极端势力和干预、渗透、破坏香港发展的外部势力。在这样一种复杂情况下，香港社会必须将和谐与团结作为关键事项。这需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香港社会尤其是香港的有领导力和影响力的团体、精英承担责任，寻找正确的政策方法，迅速形成对“一国两制”、香港再出发、香港融合发展、香港未来全球化地位和角色的基本社会共识。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香港社会预期实现的种种目标才能达成。社会和解与团结，永远都是社会发展进步最重要的基础条件。此次重要讲话特别提及青年认同与青年发展议题，切中香港“一国两制”新发展阶段的要害，并深刻影响“一国两制”的信心与未来。青年是香港的未来，也是“一国两制”的未来。这是“一国两制”结构性、根基性的问题，也是“一国两制”可持续发展、行稳致远的根本性问题。中央政府要为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制度、政策和配套服务的支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社会要在政策、教育上支持

与关心青年。青年的国家认同建构是重要挑战，也是巨大机遇，更是治理责任^[27]。

综合来看，前三点讲治理能力、发展动能、民生问题的解决，主要责任压在在特别行政区政府身上，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香港管治的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中央是最终责任人。第四点讲社会和谐稳定，既需要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相向而行，也需要社会自身反思、修复、和解与团结。只有特区政府和社会同心同德，“一国两制”的社会政治基础才能真正巩固，“爱国者治港”才能真正深入人心，获得稳定的社会认同，“一国两制”在新的发展阶段所承诺的相关目标与愿景才能有序达成。

六、结语

“一国两制”根源于国家统一与现代化的长期进程，是民族复兴事业的一部分，且属于特殊的杠杆性、功能性部分。在此次重要讲话结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将“一国两制”放在民族复兴伟大进程尤其是第二个百年目标当中予以战略性定位和期许。这一定位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一国两制”在整个国家发展大局当中的基本地位与角色判定一致。民族复兴必须依靠国家更大力度地改革开放，以及同世界更具创新、发展和自主地沟通互动。在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体系的长期进程中，香港会稳定而有效地作为桥梁平台来发挥连接性功能。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香港不能缺席，“一国两制”不能缺席。“一国两制”必然伴随民族复兴全过程，这也是“一国两制”长期不变的根本国家理性所在。“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丰富发展和创新活力，必然成为民族复兴的特色篇章，从而对澳门发展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起到正面启发和引导作用。此次重要讲话对“一国两制”长期坚持和国家改革开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发展，起到权威而强大的信心释放和理论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康玉梅. 香港2047怎么办：“一国两制”的变与不变[J]. 当代港澳研究, 2018(4): 167-186.
- [2] 齐鹏飞. 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7-14(1).
- [3] 伍俐斌. 试论和平统一后台湾地区高度自治权的性质：基于香港的实践经验[J]. 台湾研究, 2022(1): 48-57.
- [4] 田飞龙. “一国两制”需凝聚历史与法理共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J]. 紫光阁, 2017(7): 18.
- [5] 许陈静, 朱东君, 刘舒扬. 李家超, 同为香港开新篇[N]. 环球人物, 2022-05-16(10).
- [6] 王承就, 赖慧婷.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蕴与培育路径——基于对香港民众国家认同教育问题的思考[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1): 35-43.
- [7] 程洁. 香港新宪制秩序的法理基础：分权还是授权[J]. 中国法学, 2017(4): 88-103.
- [8] 郝铁川. 论中央对香港的宪制性管治权[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4): 5-17+125.
- [9] 大公报. 田飞龙：公民党“十年宣言”的错谬“香港史观”[EB/OL]. (2016-03-22)[2022-06-26]. <http://>

news.takungpao.com/hkol/politics/2016-03/3296891.html?hk=eikmd.

- [10] 罗燕明.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复兴的重大贡献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1 (4): 17-18.
- [11] 陈端洪. 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 [J]. 中外法学, 2008 (4): 485-511.
- [12] 王振. 论《香港国安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其“刑罚”的规定 [J]. 政法学刊, 2022 (3): 51-61.
- [13] 张尚清. “一国两制”对“一纲四目”的发展 [J]. 理论前沿, 1999 (11): 8.
- [14] 曹二宝. 抗战时期的香港与中国共产党 [J]. 中国法律评论, 2015 (3): 25-29.
- [15] 黄月细, 徐海波. 香港“殖民地情结”的成因分析 [J].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5 (2): 118-122.
- [16] 侯磊. “一国两制”: 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N]. 解放军报, 2017-06-29 (10).
- [17] 程实. 十四五的大局与香港金融的新局 [J]. 企业观察家, 2021 (11): 64-67.
- [18] 李晓兵. 让香港特区民主发展重回正轨 [J]. 今日中国, 2022 (1): 64-66.
- [19] 张庆波. “香港自治法案”是美方又一劣迹 [J]. 公民与法 (综合版), 2020 (7): 23.
- [20] 黄易宇. 对“一国两制”条件下港澳统一战线的初步认识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0 (3): 10-14.
- [21] 兰奎, 林伯海. “一国两制”: 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光辉典范——基于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系列论述文本分析 [J]. 邓小平研究, 2020 (1): 36-46.
- [22] 骆伟建. 论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 [J]. 港澳研究, 2018 (1): 14-24+93.
- [23] 刘兆佳. 完善选举制度 确保“爱国者治港” [J]. 港澳研究, 2021 (2): 3-9+94.
- [24] 阮北平, 危应华. 香港“产业空心化”与“积极有限干预政策” [J]. 当代港澳, 2005 (2): 30-35.
- [25] 黄元山, 叶文祺, 黄乐妍. 构建港人组屋 破解香港深层次经济社会矛盾 [J]. 港澳研究, 2020 (4): 61-72+96.
- [26] 宋丁. 关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九点观察分析 [J]. 特区经济, 2021 (10): 24-25.
- [27] 田飞龙. 香港国安法背景下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挑战与回应 [J]. 青年探索, 2022 (4): 101-112.

责任编辑: 龚静阳



香港通识教育科的最新发展与未来展望

——基于香港青年学生国家认同的视角

王飞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通识教育科是培养学生理性思考能力、提高国家认同以及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重要课程。其在开展过程中存在知识基础的联通与融合欠佳、基于证据的思维方式训练不够以及正向价值观的引导不足等问题,根源涉及港英当局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历史遗留和惯性、境外势力的炒作与干预、香港地区内部未形成共识等内外部因素。为了革除弊病,香港通识教育科开展了以下改革:改称“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更好体现课程本质;整合与删减课程内容,强化课程体系性;重视正向价值观教育,增强学生的积极态度和国民身份认同。由于通识教育科的问题积习已久,要达成改革目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内容,以文化历史为基石脉络,完善课程结构;提升教师自识意识与价值观培育能力,引领学生发展;增强教材审查和教学督导,保障课程科学实施。这些措施是保障通识教育科成为塑造理性、向上、爱国好公民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一国两制”; 政治社会化; 国家认同; 通识教育科; 全人发展; 正向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5-0091-10

国家认同是个体对所属国家的群体身份意识以及由该群体意识带来的情感及价值观上的心理归属^[1]。公民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个体获得稳定感、归属感和幸福感的必要条件^[2]。学界有关塑造与提升公民国家认同路径的探讨成果颇丰。有学者强调制度建设的重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22.05.008

作者简介: 王飞,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引用格式: 王飞. 香港通识教育科的最新发展与未来展望——基于香港青年学生国家认同的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5): 91-100.

要性^[3]，有学者突出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的价值^[4]，有学者主张法律手段在提升公民国家认同方面的核心作用^[5]。近年来，学界更多强调从公民身份来认识和建构国家认同，认为国家认同是基于公民国家身份的内功^[6]，而教育则是塑造公民身份认同、提升国家认同的关键^[7]。实际上，西方国家都非常重视教育在促进公民国家认同方面的作用。早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始，西方一些国家就开设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来加强公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9·11”事件后，西方一些国家增强了国家认同教育的强制性，陆续颁布系列法案，不断加强公民教育以塑造负责任的积极公民^[8]，增强其国家归属感^[9]。通过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提升公民的国家认同，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通识教育科是香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香港同胞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形成国家归属感、认同感的重要途径，是落实“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手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民会允许不爱国甚至卖国、叛国的势力和人物掌握政权。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10]“爱国者治港”的真正落实，不应该仅仅停留或作用于法律和政策维度，还应该透过系统化的教育方式，融入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少年群体的思想意识之中，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香港由治及兴的转变以及爱国爱港大氛围的形成。

在香港教育体系中，通识教育科便是使“爱国者治港”入脑入心的重要载体。香港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大学和大学预科阶段开展通识教育，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向下延伸至高中，成为高中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程。2009 年实施新学制改革后，香港教育局规定自当年 9 月新学期开始，将通识教育科列入高中升大学的四个核心科目之列，成为高考必考科目。不过，通识教育科在实践运行中问题频发。有学者指出通识教育科因过度关注争议性议题易导致学生思想偏激，是诱发青年学生非理性行为的重要教育因素；认为香港应该积极进行教育改革，首要改革“通识教育科”课程，以促进香港“由乱到治”^[11-14]。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增强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教育^[15]，为香港教育尤其是通识教育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通识教育科进行系统反思，并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精神为指导，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对通识教育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之更加符合通识教育科的本意。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最新的改革措施在解决通识教育科的主要问题方面仍有不足，亟待进一步改进。

一、香港通识教育科的既有问题

此前，香港通识教育科的专业性、课程内容的计划性、价值观教育等方面存在问题，曾被别有用心势力利用，打着“教育”旗号，对中学生进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加剧了学生港人身份与国民身份认同的对立，并对学生参加极端政治运动起到了蛊惑和动员作用^[16]。香港通识教育科的既有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知识基础的联通与融合欠佳

香港通识教育科的设计理念是“帮助学生在在学习过程中联络各科的知识，能从多角度研习不同

的课题，从而建构与他们所处现今世界直接相关的个人知识”^[17]。通识教育科的主题和内容设计应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重建知识的整体性，建立各学科间以及学科知识与社会和生活之间的联系，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的综合知识，以培养其“通”的能力。“通”不仅可以克服知识的割裂，还有助于引导个体理解生活之意义与人生之价值，使学生建立完整的人格，促进自我的解放。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开展通识教育时，都将“通”视为通识教育科的最基本要求，都非常注重其知识基础，强调通识教育必须建基于广博的学科知识之上。

香港通识教育科在主题设计上囊括六大学习单元（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能源科技与环境）和一个独立探究议题，涵盖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教育等多门学科、多个领域，课程内容广泛。但是，六大学习单元以及独立探究议题之间的关联性不强，各单元和议题内容实际处于割裂状态，学生难以系统把握和全面理解通识教育科的广泛知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将知识庞杂且缺乏系统性和连通性的内容讲解完毕，以及为了体现课程的综合性，大都采用最新社会事件来串联教材内容的方式开展教学。社会事件的发生具有随机性，以此为主题既难以保障议题的丰富性，也难以将广泛的知识基础进行系统关联和整合。同时，教师和学生对最新社会事件的把握深度、观察角度不一，不易充分掌握事件的来龙去脉，易于停留在简单分析与评论的层次，难以形成客观理性全面的认知，导致通识教育科被上成了“通俗课”，陷入浅层知识或常识堆积的境地。

（二）基于证据的思维方式训练不够

香港通识教育科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是香港 2002 年和 2009 年高中教育改革的重要宗旨和目标之一。为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识教育科鼓励六大学习单元以议题形式呈现，设置独立探究专题，提倡教学多采取辩论、争论、讨论等方式开展。但是，实际教学中出现了为批判而批判、只重形式上的批评而不顾批判本身的逻辑性与合理性的不足。

现代批判性思维运动之父爱德华·格拉泽强调批判性思维具备三项基本特质，即思考议题或问题的态度必须是审慎而理性的，探讨议题或问题的过程是基于证据的，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回答议题或问题^[18]。根据格拉泽的观点，要培养学生具备批判性思维的能力，首先需要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精神气质，即学生不应出于单纯的胜过他人的目的或态度而学习批判性思维，应出于养成不盲从、理性的思维习惯和态度而学习。在正确态度的基础上，学生摆事实、讲道理论证自己的观点并说服对方，不应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压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或阻碍对方陈述自己的观点，更不能简单地将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列为无知者或者有意与自己对抗的人。要寻找证据、运用科学的论证方法支持自己的观点或反对他人的观点，从而将学生的理性从偏见、谬误中解脱出来^[19]。香港通识教育科面向的对象是未成年的高中生，他们的心智尚不成熟，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量也较少。通识教育科的议题选择应该适当降低难度，并以社会共识度较高的主题为主，重点在于培养和提升学生运用科学方法、合乎逻辑地论证观点、得出合理结论的能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理性的辩论态度以及尊重多元观点的精神。但是，通识教育科议题倾向于最新的社会热点，这些热点之于专家尚且难以达成共识，对于以练习批判性思维为主的高中生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学生极易陷入浅表性的争辩或被事件的表面现象所左右，还可能被错误或片面报道激发不理性行为。

（三）正向价值观的引导不足

通识教育科作为香港高中四大核心课程，也担负着培育青少年正面价值观的重任。价值观属于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它指导着人们是非曲直的判断，同时对人们的行为起着规范和导向作用，是社会维持公正和谐的道德和精神支柱。教育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以善致善”的活动。健全的教育不仅包括知识的学习，还应包括道德、社会、审美等价值观意义的教育。教学实际上是“以善致善”的德行生活过程^[20]，是一种以知识、技能、经验为媒介的师生交往与正向价值对话过程。教育可以开发学生潜能，增长学生知识技能，陶冶学生道德情操，促使每个学生达到自己最佳水平的发展。

然而，在香港通识教育科实践中，教师偏好选取争议性的时事议题，并在教学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这种“价值中立”的教育立场会给学生暗示：价值观只有种类的差异，而无高低优劣之分。从个体发展的角度看，中学阶段是个体思想、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教学过程中脱离教师的引导，学生会误认为批判就是挑剔、否定甚至贬低，课堂就成了无意义的争执和泄愤场所。从道德价值的观点看，这样的学习结果有潜在危险，无异于给私见与偏见披上合理的外衣。如此一来，正向价值观教育在通识教育科教学中受到排挤，为负向价值观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这就违背了学校教育之本意，也违背了通识教育科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形成正面价值观和积极人生态度，成为有见识和负责任的个体的目标。

而在单元设计中，将“今日香港”与“现代中国”的并列设置，强化了青年学生港人身份与国民身份认同的二元分化。“今日香港”单元凸显了“法制与社会政治参与”议题在香港社会的独特性，忽略了这种政治与法治制度设置的历史背景及其与内地政治和法律的关系。此外，“今日香港”单元缺乏对中国文化相关议题的探讨，更注重对香港现代化内容的设计。这种课程单元设计导向容易使学生形成一种误解：今日香港的发展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关联不大，导致青少年学生忽视香港发展背后深厚的中华文化和智慧渊源。这些课程单元过分强调香港的独特性，造成香港部分青年学生将中国视为“他者”，导致所谓“只见香港、不见国家”和“两制在先、一国在后”等错误观念。

传统的香港通识教育科的设计与实施偏向以社会热点事件为焦点展开学生间的辩论，却轻视了深度思考与解读社会热点事件所需的学科知识基础的培养与运用。理性思维方式训练的欠缺加剧了“为争论而争论”的倾向，学校和教师对学生正向价值观的引导不足导致未成年学生易被别有用心力量利用。这使得通识教育科未能切实提升学生的国家归属感和认同感，加剧了香港青少年与国家民族的疏离感。

（四）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

港英当局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历史遗留和惯性、境外势力的炒作与干预、香港地区内部未形成共识等因素，构成通识教育科实践偏离的结构性矛盾。在香港地区受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港人从小被灌输“臣民”意识。英国统治者通过教育不断渲染英国政治和文化的“优越性”，并通过凸显资本和经济的重要性及增加相关内容的教育，淡化和消弭港人自治的政治诉求。随着中英两国有香港归属问题谈判的进行，港英当局为继续维持英国对香港地区的影响力、弱化港人对国家和中国人身份的归属感，处心积虑对港人进行政治性教育。港英当局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鼓吹为所谓“普适价值”，打着培养所谓“世界公民”的噱头压制港人对国家的情感认同。香港回归后，教育领域没有

得到深度改变，致使历史遗留的负面影响延续至今。这种负面影响不断扭曲着包括通识教育科在内的国民教育的开展，致使香港社会“重英轻中”现象相对严重^[21]。

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与中国抢占思想阵地、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态势日趋激烈，不断加大对香港地区的教育干预与渗透力度，以遏制和降低港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妄图达到“以港制华”的目的^[22]。同时，香港地区各界缺乏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成为影响通识教育科良好开展的内因。这深度影响了香港国民教育的顶层设计与有效推进。比如，回归后香港虽然强调国民教育，并将通识教育科作为关键改革列入高考必考科目，但在目标和内容设计方面刻意追求所谓“客观性和价值无涉”，模糊了青少年的国民认知，没有真正突出国家认同^[23]。

二、香港通识教育科的最新改革

2017年11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成立学校课程检讨专题小组，对中小学课程进行整体检视并对未来课程改革提出建议。2020年9月22日，专题小组向特区政府提交了最终报告，包括对通识教育科的检视与改革方向建议。2021年2月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向各中学发出通函，就优化高中四个核心科目（中国语文、英国语文、数学、通识教育科）的初始方案征询学校的意见和建议，并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于2021年4月1日公布优化高中四个核心科目的最终方案。优化方案突出强调促进学生的全人发展，优先注重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为学生减负以留下足够空间让学生自主选择多样性的课程^[24]。近年来，香港通识教育科的改革取得如下积极进展。

（一）改称“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更好体现课程本质

通识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它是在学生掌握比较丰富的各学科或领域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联系现实问题，帮助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从而实现知识之间的贯通。在知识贯通过程中，学生学会基于证据以及多角度思考问题的态度和能力，养成理性判断和行事的习惯，成为善于站在社会公义角度慎思明辨并做出对社会发展最有利选择的有责任感的人。虽然其最终目标是培养有理性和责任心的青年，但理性和责任心建立的前提是广泛且联通的知识基础，否则青年人学到的将更多是辩论的形式，甚至落入狡辩的境地^[25]。因此，无论是古希腊时期、中世纪还是现在，各国或地区都主要在大学阶段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在学生具备相对完整的知识基础上，引导其实现知识贯通，进而培养其理性和责任心。

为了克服基础教育阶段分科教学造成的学生知识割裂现状及由此造成的学生思考能力不足等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进行教育改革，强调基础教育阶段课程的综合化，设置了社会科、科学、综合实践活动、公民教育科等综合课程。中国香港地区的通识教育科与中国内地的综合实践活动，以及日本的“综合学习时间”、美国的社会科等课程均是世界基础教育综合化改革的产物。这类课程的初衷是通过跨学科学习，让学生研习综合性议题以贯通不同学科的知识，培养明辨思考的能力和正确的价值观。香港通识教育科的教学更接近大学的通识教育科，即它默认学生已经掌握了丰富的学科或领域知识，课程的开展只需要为学生提供争议性的议题，让学生运用之前所学知识发表见解即可。然而，高中生的知识基础不够扎实，且缺乏连贯知识解决问题的经验，在面对争议性较大

的问题时，学生很难做出深入和科学的讨论及学习。香港通识教育科的改革首先应该回归作为高中阶段综合课程的性质设定。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学校课程检讨专题小组建议首先应该修改通识教育科的名称。在香港社会各界给出的“公民与国家科”“国民与社会科”“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公民与文化科”“社会教育科”等命名建言中，“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提议最多，且得到了学界、学校和社会的广泛认同，最终成为取代原有通识教育科的新名称。新名称更贴合高中阶段综合课程的性质，有助于实现高中通识教育科课程性质的本质回归。

（二）整合与删减课程内容，强化课程体系性

为了腾出课时、减少学生的考试压力、增加高中课时的弹性、照顾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要、给学生提供更多元的学习经历，以达成全人发展目标，在学校课程检讨专题小组的建议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决定大幅删减高中四个核心科目的课时约 250 小时。其中，通识教育科的课时由原来的 250 小时缩减到 150 小时^[24]。配合课时的缩减，通识教育科内容设置发生了很大改变。

一是不再设置独立专题探究板块。独立专题探究板块原本占用课时约 82 小时，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将六大单元主题所学内容应用于最新社会事件或议题之中，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通识教育科所有内容均以主题或议题方式呈现，再单设独立专题探究板块的必要性不强。独立专题探究板块所选择的主题或议题以最新、最热的社会事件为主，这些社会事件发生不久，来龙去脉、真实缘由、社会影响等各方面均难以清晰说明，其结果往往只会挑起学生的激情而非理性。实际上，锻炼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更适合选择已经有一定社会共识的议题，这些议题经过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论争，并最终得到了较好解决。学生在学习这些议题时，其精力不是被激情所主导，而是着力于收集广泛的证据和信息，多方聆听、多角度思考，理解事件发生及最终结果的背后缘由和逻辑，从中提升理性思考的能力。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决定删除独立专题探究板块，既可以减少课时，减轻师生压力，也降低了因过度追求新颖议题而鼓动学生负面情绪和态度的风险。

二是将原来的六大学习单元整合为三大主题（“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原有六大学习单元按照个人、社会、自然三个维度设计，虽然全面，却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隔离。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只有将人的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它。只有将科技的进步置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才能理解其发展源头，避免工具理性的过度僭越破坏人的完整性。新的三大主题实际上将原有个人发展与科技进步部分融入社会发展内容之中，增加了知识的整合性，学生更容易了解各部分内容的关联。

（三）重视正向价值观教育，增强学生的积极态度和国民身份认同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注重培养学生的正向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引导其成为对社会、国家和世界有见识和负责任的公民^[24]。为增进香港高中生对国家的了解，增强其国民身份认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增加了 10 小时内地考察“中华文化与现代生活”选修主题。该 10 小时学习时数并不是指前往内地考察的时间，而是在考察前搜集阅览相关资料以及考察后总结与反思等的时间。该部分学时不包含在 150 小时的课时之内，也不作强制性要求，不列入学生考试的范畴。至于对内地考察的时间和路线及内容等，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未做强制性规定，由各校根据校情自主安排。

为增强学生对香港与祖国关系的认识,新方案在单元主题命名及内容设置方面做出调整。比如,香港部分的标题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明确香港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香港地区的高度自治权限于“一国两制”规定中的权限。内容则主要围绕国家与香港的宪制关系、香港回归祖国的历程、国家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香港国安法与促进香港发展的关系,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法治精神、居民的权利和义务等。与原有“今日香港”主题下的内容设置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增强了从国家全局视角看待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位、法律、社会等内容,更有利于香港高中生从国家角度审视香港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部分也更加客观,既有对改革开放后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描述,也有对国家在国际事务参与中角色的科学介绍,还有对香港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在国家参与国际事务治理中的积极角色的探讨。这有助于学生全面、客观地了解国家的发展现状,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重视推进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和爱国爱港教育。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支持下,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专门成立了爱国教育支援中心,更有针对性和有效地推进国民教育。李家超出席爱国教育支援中心揭幕仪式并致辞,强调特区政府将全力支持香港爱国教育的推行,要理直气壮、正义凛然地纠正青少年过往错误的价值观。这为通识教育科的最新改革注入了强心剂。李家超强调,通识教育科的课程内容要紧扣国家发展,让学生能全面和准确地认识国情、《宪法》和《基本法》、国家安全相关的课题,并要求教育局持续更新与优化课程内容,增加相关教师的培养与培训力度,帮助学校更好地推进国民教育,建立学生的爱国情操及国家观念^[27]。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对李家超的讲话进行了积极回应,承诺教育局将积极履行推行国民教育的使命,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并强调未来国民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是增强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教育,提醒年轻人向先贤先辈学习,继承中国人一代一代创建与发展下来的中华民族基因。在教师培养与培训方面,蔡若莲强调教师承担推动国民教育的重任,其专业能力和操守十分重要,教育局将为全港中小学举办国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师工作坊,更有针对性地提升教师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28]。可见,包括通识教育科在内的国民教育改革是本届特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未来,香港将进一步完善通识教育科内容,增加中国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不断提升国民教育任课教师的素养、职业操守和爱国爱岗情怀。这为通识教育科的进一步优化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香港通识教育科的未来展望

香港通识教育科课程开设已有十余年,遗留问题众多,而其承载的价值和意义又十分重大。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该持续革新课程,不断提升课程质量,为香港和国家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开阔眼界、博大胸怀、爱国爱港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一) 以文化历史为基石脉络,完善课程结构

培养香港青少年的国民身份认同,使其成为对国家有贡献、负责任的公民是通识教育科的重要目标之一。为了实现该目标,改革后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在内容体系方面增加了香港与祖国之间关联的主题,比如“一国”与“两制”的关系、香港发展与祖国发展的关系等。但是,这些内容

主要体现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国家与近年来香港发展的关系以及在法律、政治维度上国家与香港的关系。从提升青少年的国民身份认同角度看,这些内容还远远不够。国民身份认同的根本动力和来源是对民族和国家历史与文化的认同,历史和文化是民族之根,是国家和社会存续之魂,是个人身份认同之基。没有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深刻认识和体悟,人们容易陷入焦虑与迷茫。

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未来改革中,应该适度增加国家历史和文化内容。具体而言,建议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主题下适当增加与香港发展相关的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内容,并将香港的历史与文化纳入其中,提升学生的历史与文化认同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部分,除了现有的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待国家对香港发展的重要作用外,还应该体现现代中国在文化、教育、科技等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之于香港全方位发展的重要性。而在“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部分,则应凸显国家在香港国际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内地与香港合作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性等内容。

(二) 提升教师自识意识与价值观培育能力,引领学生发展

通识教育科的学习与其他学科课程的学习方式有很大不同,它要求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环节,在教学过程中基于证据勇敢发言,甚至开展多种形式的公开辩论,而教师需保持适度的中立立场,给予学生更多自由。但是,教师要保持中立并不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让学生随意发表见解而不加干预,而是指教师不要在议题讨论之初就鲜明地表述自己的立场,导致教师立场成为预设立场,妨碍学生进行理性思考、形塑价值观。

通识教育科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他们需要掌握所讨论议题的知识基础,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议题材料,引导学生在充分了解材料的基础上发表见解。同时,教师需要在学生陈述观点过程中有理有据地指出并纠正其明显有误或过度偏激的看法。教师要明确其有责任在学生出现错误或不当价值取向时进行纠正,引导学生形成正向价值观。在课堂教学和学校教育场域中,教师的言行代表整个职业群体。教师应该站在职业身份和责任的立场发表言论,而不是随意发表个人见解。教师不能因生活或工作的不如意以及个人的性格或情绪等影响学生正向价值观的形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育局、教育机构和学校在通识教育科教师的培养过程中,应该让教师清晰地知晓自己在引导学生形成正向价值观方面的责任,并着力提升教师正面价值观引领力。

(三) 增强教材审查和教学督导,保障课程科学实施

香港的教科书出版实行审核制,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颁发各门主要课程的课程指引,出版商根据课程指引的规定各自编写教科书,然后把教科书送到教育局审核。审核通过的教科书被列入“适用书目表”,供学校选用^[29]。但是,作为高中四大核心科目之一的通识教育科的教科书没有纳入教科书的审核制度^[30]。通识教育科的内容范围较广,且旧的通识教育科课程过于注重时事或最新热点议题,出版商需要经常变换教科书内容,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和成本,而教育局对教科书价格有限定,导致通识教育科教科书的利润不高,出版商的出版积极性不高。为了调动出版商积极性,该科未纳入审核。

最新的通识教育科改革已经明确不能以没有社会定论或普遍共识的社会争议话题或时事作为教学材料,并大幅缩减、整合了原有主题,降低了出版商出版相应教科书的难度。学校课程检讨专题小组明确建议教育局将通识教育科教科书纳入审核机制,并公布通识教育科“适用书目表”^[21]。香

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应该继续加大对通识教育教科书的审查审核力度，并就通识教育科的最新改革及相关要求等与主要出版商进行交流，对其作出适当指导。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应当严格审查教科书，确保其符合通识教育科最新改革的精神及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还应加大对各学校通识教育科教学的督导力度，通过视学、课程探访等途径监督教学情况，及时查收不符合最新改革精神的教材，纠正不合要求的教学模式，保障通识教育科的实施质量。

参考文献：

- [1] 杨晗旭，常乐．后殖民认知偏见与港人国家认同建构[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9.
- [2] 田飞龙．香港国安法背景下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挑战与回应[J]．青年探索，2022（4）：101-112.
- [3] 高永久，邢艺譔．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基于国家认同的研究视角[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19-27+181-182.
- [4] 吴玉军，郭妍丽．国家认同建构中历史记忆的书写——基于民族身份视角的考察[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8.
- [5] 丁轶．国家认同的宪法构建：实现机制与实施路径[J]．交大法学，2020（3）：5-25.
- [6] 薛博文．时代挑战与实践方向：国家认同教育的阐释与路径[J]．中国教育学刊，2021（8）：83-88.
- [7] 韩丽颖．青少年国家认同的主体基础、发展趋向和教育进路[J]．中国青年研究，2021（4）：38-43.
- [8] 张利国，郭立强．美国国家认同教育发展趋势与启示[J]．现代大学教育，2020（2）：78-86.
- [9] 於天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设：价值、困境与出路[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30-37.
- [10]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20）：4-7.
- [11] 李臣之，梁舒婷．国家认同教育研究热点及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计量分析[J]．中国教育科学，2021（1）：65-74.
- [12] 陈杰．香港回归以来港人“国家认同教育”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中国教育科学，2021（3）：38-46.
- [13] 涂敏霞，巫长林，孙慧．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实施机制研究[J]．青年探索，2021（3）：99-112.
- [14] 黄元山，郭凯杰，邓颖研．关于改革香港通识教育的思考[J]．港澳研究，2021（2）：66-74+96.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人民日报，2021-03-13（1）.
- [16] 蔡群青，夏海鹰．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下的香港国民教育发展策略[J]．中国教育科学，2020（3）：3-12.
- [17] 课程发展议会，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新高中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通识教育科（定稿）[R]．香港：香港政府物流服务署，2007：2.
- [18] Edward M. Glaser. An Experi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M]．New York: Advanced School of Education at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41: 5-6.
- [19] 张留华．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一个议题：教人论证，还是教人探究？——罗素、杜威和图尔敏[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6）：71-81.
- [20] 王鉴，王子君．论教学研究的独特性及其价值取向[J]．课程·教材·教法，2021（6）：37-44.

- [21] 屈宏, 梁闪闪. 香港教育去殖民化问题研究 [J]. 统一战线研究, 2021 (3): 62-72.
- [22] 沈本秋, 唐小松. 对“五眼联盟”介入香港的转型分析 [J]. 情报杂志, 2022 (3): 31-37+46.
- [23] 黄元山, 郭凯杰, 邓颖研. 关于改革香港通识教育的思考 [J]. 港澳研究, 2021 (2): 66-74+96.
- [24] 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 高中四个核心科目的优化措施 [EB/OL]. (2021-04-01) (2022-06-14).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1039C.pdf>.
- [25] 陆彩霞, 边玉芳, 梁丽婵. 国际公民教育评估体系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基于 ICCS 项目四轮国际调查研究的分析 [J]. 比较教育研究, 2021 (4): 67-73.
-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5.
- [27] 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 2022 年香港爱国主义教育高峰论坛暨爱国教育支持中心揭幕仪式教育局局长致辞 [EB/OL]. (2022-07-16) [2022-07-23]. <https://www.edb.gov.hk/sc/about-edb/press/speeches/sed/20220718101216.html>.
- [28] 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 教育局局长出席 2022 年香港爱国主义教育高峰论坛暨爱国教育支援中心揭幕仪式主题演讲全文 [EB/OL]. (2022-07-16) [2022-07-23].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7/16/P2022071600288.htm>.
- [29] 黄笑冰. 浅谈香港教科书角色的转变 [J]. 全球教育展望, 2020 (4): 37-40+53.
- [30] 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 教育局局长谈通识教科书、大学入学要求、自资院校收生及检讨研究政策 [EB/OL]. (2018-07-09) [2022-06-04].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7/09/P2018070900784.htm>.

责任编辑: 龚静阳



香港回归 25 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影响

郭永虎 王卓亚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香港回归 25 年来, 英国对中国香港事务的干涉始终没有停止。布莱尔和布朗执政时期, 英国的干涉手段主要集中在舆论攻击层面。卡梅伦和特蕾莎·梅执政时期, 除了延续前任的舆论手段, 还公开支持反中乱港分子, 策划乱港渗透活动。约翰逊执政后, 英国政府肆意诋毁香港国安法, 威胁实施涉港制裁。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具有以下特征: 干涉力度不断升级, 干涉手段集中在舆论攻击和外交施压上, 涉港立场具有鲜明的“两面性”, 干涉主体呈现“集团化”特征, 干涉行为以“民主”和“人权”为幌子。英国对香港事务的长期干涉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 破坏了中英关系健康发展。中国政府应深入贯彻落实香港国安法, 推进香港民生经济建设, 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推进香港社会的意识形态去殖民化, 提高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关键词: “一国两制”; 香港事务; 国家安全; 中英关系; 干涉主义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5-0101-12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后, 《中英联合声明》中与英国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均已履行完毕。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2.05.009

作者简介: 郭永虎,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王卓亚,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国会涉华法案文本整理、翻译与研究(1979—2019)” (19ZDA169)

引用格式: 郭永虎, 王卓亚. 香港回归 25 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5): 101-112.

从这时起,英国对香港再无任何管治权和监督权,《中英联合声明》也成为没有法律效力的历史文件^[1]。然而自香港回归以来,为了继续维护和扩大其在港既得利益,英国长期自诩对香港及其居民负有“强烈的政治和道义责任”,并以所谓“监督”《中英联合声明》的实施情况为由插手香港事务。近年来,在美西方加强对华遏制的背景下,英国频繁染指香港事务。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英国时任首相约翰逊在社交媒体妄称“英国永远不会放弃香港”,并声称“英国也会永远关注并保护香港市民的人权与自由民权利”^[2]。这类表态是英国自香港回归以来的一贯涉港立场。从布莱尔到约翰逊,英国历届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干涉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历史连贯性。为此,从长时段做历史考察更容易厘清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特征、规律和本质。

从研究进展来看,学界关于美国干涉香港事务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对香港回归 25 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研究则相对薄弱。已有成果分时段探讨了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情况。阮国英对香港回归前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政策进行了回顾^[3]。李环评析了 2016—2018 年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主要特征^[4]。周方舟从大国博弈、国家利益与外交传统视阈比较英美两国在干涉香港事务上的差异^[5]。刘诗琦和陈寒溪等学者对英国涉港活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探讨^[6-7]。总体来看,学界对香港回归 25 年来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缺乏系统的历史梳理。本文拟对香港回归 25 年来英国历届政府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特征、影响及对策进行探讨。

一、香港回归以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

香港回归 25 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大致可分为布莱尔与布朗执政时期(1997—2009 年)、卡梅伦和特蕾莎·梅执政时期(2009—2019 年)和约翰逊时期三个阶段。

(一) 布莱尔与布朗执政时期:殖民惯性的延续

布莱尔与布朗执政时期正处于香港回归初期,英国对香港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妄图继续操控香港事务。回归之初,香港政治、经济等领域仍未彻底摆脱英国殖民的遗留影响,这为英国染指香港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布莱尔和布朗极力推行“人权外交”和“价值观外交”,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旗号对别国事务进行干涉。布莱尔曾宣称:“只有进一步推广我们的价值观,才能不断扩展我们的利益。”^[8]英国政府在该阶段对香港事务的干涉以强行输出西方价值观、人权观为主要手段。

1. 干涉香港政制发展

回归初期,英国频繁对香港的政制改革进行干涉。1998 年 5 月,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期间,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约见部分选举人并讨论选票情况,此举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谴责。对此,英国政府辩称“与政党成员的日常低调接触是外国驻香港及其他地区领事馆的正常做法,并不构成干涉”^[9]。2002 年,为了尽快填补香港特区的安全漏洞,香港特区政府将基本法第 23 条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提上议程,在咨询期间遭到了英国的干扰。2002 年 11 月 18 日,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比尔·拉梅尔妄议 23 条立法,声称“第 23 条立法不符合法律程序”。2003 年 2 月,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关于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6 月 30 日,英国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与香港立法会中反对派议员针对第 23 条立法共同密谋向香港特

区政府施压^[10]。2003 年 7 月，香港一些乱港分子煽动针对 23 条立法的非法游行，而当时正在访华的英国首相布莱尔以“联合声明签署国”的身份表示“声援”^[11]。2004 年 4 月 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附件 1 第 7 条和附件 2 第 3 条进行解释。此次释法是在遵循民意、深思熟虑下提出的，然而却再次遭到英国的干涉。4 月 7 日，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拉梅尔发表声明，妄称此次释法“削弱了《联合声明》所保障的高度自治”。5 月 11 日，拉梅尔再次指责全国人大的决定“限制了香港政制发展”，并称将“兑现对香港历史承诺”与中国政府进行持续讨论^[12]。

2. 炮制并定期发布《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自香港回归以来，英国外交大臣每半年就会向英国议会提交一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这已经成为英国政府干涉香港事务的常规手段。1997 年 7 月，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向英国议会提交了首份《关于中英联合声明执行情况的半年报告》。这份报告评估了香港回归过渡阶段中国在联合声明所承诺关于法律制度、司法系统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执行情况。库克在报告中强调英国对香港负有“强烈的政治和道义责任”，进而提出在回归后英国依然会对香港“负责”^[13]。1998 年 1 月，英国外交部如法炮制第二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继续打着《中英联合声明》的旗号对香港事务进行所谓调查评估。除了关注金融、航运、教育等基本问题，英国还将重点放在香港的政治事务上，对香港政制发展横加干涉。在报告中，英国公然挑战临时立法会的合法地位，还在香港历史教科书内容修改、港人于内地所生子女居留权等问题上作梗^[14]。截至 2022 年 6 月，英国已经连续发布了 50 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这已经成为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惯用伎俩。

（二）卡梅伦和特蕾莎·梅执政时期：积极支持并参与乱港活动

在卡梅伦与特蕾莎·梅执政时期，中英关系和香港局势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了提振 2008 年经济危机后长期萎靡的英国经济，卡梅伦政府与中国展开积极的交流与合作。英国与香港地区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而在政治领域，英国则继续对香港事务横加干涉。

1. 公开支持反中乱港活动

2013 年，乱港分子开始酝酿非法集会，英国予以积极支持。2013 年 9 月 14 日，英国外交国务大臣雨果·施维尔在香港《明报》发文称英国将为其“随时准备提供任何支援”。施维尔的言论推波助澜，助长了乱港分子的嚣张气焰^[15]。2014 年 9 月 28 日，乱港分子发动所谓“占中”非法集会，进行袭警、破坏公物等违法行为^[16]。9 月 29 日，英国无视乱港分子的非法行径，竟以“行使示威权在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为借口粉饰乱港分子的暴行。当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迅速稳定秩序后，英国又从中作梗。10 月 2 日，英国表示对局势“十分担忧”，希望香港特区政府与学生代表“开会讨论政制发展的提议”。10 月 15 日，在香港警方驱散了特首办附近的乱港分子后，英国首相卡梅伦替乱港分子开脱罪责，声称英国要为乱港者“挺身而出”^[17]。10 月 22 日，英国下议院公开讨论香港事务，妄称对香港事务有“历史责任”。

2019 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活动不断升级。面对反中乱港分子的暴力违法行径，英国政府推波助澜，多次发表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论。6 月 18 日，英国议会下议院对香港局势和《逃犯条例》进行讨论，工党议员古德曼公开诋毁《逃犯条例》有违“一国两制”原则。保守党议员劳顿“呼吁”英国政府采取一定的手段予以应对^[18]。7 月 1 日，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妄称乱港分子袭警、堵塞交通等暴力行径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和平抗议的权利”。7 月 3 日，首相

特蕾莎·梅再次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中方随后对亨特和特蕾莎·梅的言论表达了坚决反对。面对中方的回应，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西蒙·麦唐纳辩称中国对英国的指控是“不可接受和不准确的”^[19]。7月22日，英国议会下议院又在会议中妄议香港事务：下议院议长约翰·伯考妄言中国政府的警告不会阻挡英国“作为联合声明签署国对香港的承诺”，工党议员古德曼叫嚣将对香港警方进行独立调查^[20]。

2. 幕后策划乱港渗透活动

英国除了公开支持乱港行为，在暗地里还通过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简称FAC）、香港监察等组织进行情报搜集、渗透破坏，并培育、扶持和包庇乱港分子，企图达到对香港的远程操控。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是英国议会负责监督外交部行动的常设机构，长期热衷于炒作“港独”“疆独”和“藏独”等议题。2014年12月，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企图进入香港搜集涉港情报并与乱港分子进行接触。中国政府识破了FAC的图谋，拒绝FAC进入香港境内。英国首相卡梅伦对此宣称“加剧了英方对香港局势的担忧”^[21]。2015年，FAC在没有经过实际调查的情况下，捏造《中英联合声明》三十年调查报告，诬称香港的高度自治“正在遭受严重破坏”，并以维护香港“基本权利”为由敦促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此外，英国还借助非政府组织开展乱港反华活动。其中，“香港监察”比较有代表性，它表面上是英国的一个调查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英国介入香港事务的代理人 and 智囊团，负责在香港进行渗透颠覆、情报收集，资助扶持“港独”分子等非法勾当。其执行主席为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贝内迪克特·罗杰斯。罗杰斯及该组织成员长期与乱港分子保持密切联系。罗杰斯曾以“香港监察”的名义，邀请李柱铭、戴耀庭、罗冠聪等乱港头目参与英国保守党年会的“边会”^[22]。2017年，罗杰斯企图经泰国进入香港境内再次进行颠覆行动时被香港入境处截停并拒绝入境。时任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对罗杰斯被拒绝入境进行评论，妄言“国际对香港高度自治的信心受到损害”并“要求”中国做出解释^[23]。

英国政府官员还与乱港分子保持密切接触，为其提供支持和庇护。2014年非法“占中”发生期间，英国驻香港领事馆曾与乱港头目戴耀庭频繁接触，仅一年内就与其进行了四次会晤，戴再三要求英国向中国中央政府施压。同年，英国副首相克莱格在伦敦与“祸港四人帮”中的陈方安生和李柱铭会面，克莱格表达了对乱港分子的“支持”^[24]。2018年9月25日，长期进行分裂活动的“香港民族党”被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取缔，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进行舆论干涉，为乱港组织公开“洗白”。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英国驻香港总领事贺恩德又与陈方安生私下会面，继续谋划乱港计划。而随着修例风波的平息和香港国安法的出台，乱港分子开始寻求英、美等国的政治包庇。英国成为乱港分子的避风塘，被香港警方以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通缉的乱港分子罗冠聪、郑文杰在英国政府的掩护下逃窜至英国继续从事乱港活动。

（三）约翰逊政府时期：全方位干涉香港事务

约翰逊上台后，英国的国内外局势正处于正式脱欧后的动荡期：脱欧“拉锯战”严重地冲击了英国经济、贸易，英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持续下降。为了应对内忧外困的局面，英国企图通过调整外交战略来重塑大国形象。一方面，英国将美国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和伙伴。在英国政府发布的《国防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中，英国将英美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5]，

并承诺两国将在国防、外交领域加深合作。另一方面，英国在报告中声称“中国威胁了英国的经济安全”，并强调价值观在对华政策上的重要地位。约翰逊政府一改卡梅伦与特蕾莎·梅执政时期的中英关系定位，将中英伙伴关系调整为竞争和对抗关系。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将香港地区作为反华遏华的“桥头堡”，不仅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煽风点火，还在香港国安法颁布等事项上不断诋毁、抹黑中国政府，并通过推动改革 BNO、暂停引渡协议和施压英籍法官离任等手段全方位介入香港事务。而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之际，约翰逊更是发表声明，妄称英国“不会放弃香港”，并指责中国没有遵守《中英联合声明》，这充分暴露了英国祸港乱中的殖民主义心态。

1. 诋毁香港国安法，威胁实施涉港制裁

2019 年 7 月，约翰逊政府上台后，英国对香港的局势保持高度“关注”，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幌子包庇乱港分子，无端指责中国政府并极力诋毁香港国安法，频频抹黑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警方，并以涉港制裁相威胁。8 月 9 日，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直接通话时，要求中国政府与乱港分子进行所谓“政治对话”。9 月 3 日，拉布在英国议会上颠倒是非，不仅妄议香港警方执法行动，还以“和平抗议”的借口美化乱港分子。10 月 4 日，香港特区政府订立并实施《禁止蒙面规例》来止暴制乱，拉布诬称此举会加剧局势紧张。10 月 7 日，英国外交部人权国务大臣艾哈默德在上议院会议上妄评香港人权事务^[26]。10 月 24 日，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声称要“从外部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2019 年末，中国开始筹备出台香港国安法。这预示着海内外乱港分子即将走到穷途末路，引起英美反华势力的强烈震动。英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向中国施压，企图阻止香港国安法出台。2020 年 4 月 18 日，香港警方依法拘捕黎智英、李柱铭等乱港头目，而英国迅速表态，以所谓“民主活动家”美化黎、李等乱港分子，表示对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6 月初，拉布连发两项声明企图干扰《香港国安法》的出台^[27]。在声明中，他一方面劝诱中国能够“从长计议”做出一定“让步”，以政治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放出狠话，以放宽海外国民护照、取消对香港的引渡协议作为威胁。6 月 3 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攻击香港国安法^[28]。6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正式出台。7 月 1 日，拉布发表声明极力诋毁香港国安法，称香港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29]，并表示英国将“负有历史责任”对中国政府进行制裁。2020 年 7 月 31 日，黄之锋、岑敖晖等反中乱港分子依照法律规定被取消立法会选举资格，拉布随即发表不当言论，污蔑中国“侵犯香港的民主与自由”^[30]。11 月 1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完善选举制度的决定，拉布又叫嚣“英国将为香港人民挺身而出”。12 月 1 日，乱港头目黎智英被逮捕，拉布又一次发表声明将黎智英美化为所谓“人权斗士”，并呼吁“释放”黎等反中乱港分子。12 月 13 日，黎智英因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被判处 13 个月监禁。次日，拉布发表声明，叫嚣要求撤回对黎智英的起诉，并以“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为由攻击香港国安法^[31]。

2021 年 3 月 11 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英国外交部亚洲事务国务大臣奈杰尔·亚当斯妄称该决定“侵蚀香港选举制度的民主元素”，并扬言要对林郑月娥等香港官员进行制裁。4 月 24 日，李卓人、何俊仁等反中乱港分子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正式起诉，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艾哈默德在上议院会议无理指责特区依法办案，诬称“一国两制”框架已被摧毁，工党议员柯林斯声称要与美国一起制裁中国政府。2022 年 5 月 12 日，许宝强、吴靄仪等

乱港分子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罪被香港警方拘捕，英国下议院表示要对香港官员实施单独制裁。6 月 29 日，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前夕，英国下议院再次妄议香港事务，并叫嚣要与其他西方国家共同对抗中国^[32]。

2. 抛出乱港“三板斧”

除了无端指责中国政府和香港国安法，英国政府还通过签证护照政策、取消引渡、施压英籍法官离任等手段干涉香港事务。第一，放宽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简称 BNO）政策。BNO 是香港回归前英国政府推出的特殊护照。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备忘录，持有该护照的香港居民将不再被赋予在英居留权，但可享受一定的英国海外公民权利。2020 年 7 月 22 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将向英国海外公民提供更多的居留权利。英国此举不仅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交换备忘录的承诺，还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因而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2021 年 1 月 29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布，鉴于 BNO 的性质已超出中英谅解范围，自 1 月 31 日起，中国政府将不再承认所谓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33]。面对中方的严正立场，英国仍继续操弄 BNO 政策。2 月 24 日，英国政府又宣布将放宽 BNO 的申请范围，允许父母持有 BNO、香港回归之后出生的港人申请移居英国，妄图将大批港人变成二等英国“公民”，此举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内政。第二，暂停香港的引渡协议。2020 年 7 月 20 日，拉布在向下议院提交的声明中宣布将立即无限期暂停对香港的引渡条约，拉布宣称这是对香港国安法的“必要和相称的回应”。拉布还声称，“除非有明确和强有力的保障措施能够防止英国的引渡协议被滥用”，引渡协议才会重新生效。英国利用引渡协议大肆诋毁香港国安法，将司法合作政治化、武器化。针对英国的错误行径，中国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7 月 28 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通知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将暂停香港特区政府与英国政府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34]。第三，施压香港的英籍法官离任。2020 年 7 月 17 日，在英国政府的指使下，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妄称香港国安法“破坏了司法独立”，并在“评估香港的司法独立和安全”后威胁将停止向香港派遣英国法官。同日，英国最高法院要求包括韦彦德在内的 10 名法官离职。在英国催促和施压下，部分英籍法官被“离任”。2021 年 3 月，英国故技重施，通过《泰晤士报》等官方媒体逼迫英籍法官集体辞职。2022 年 3 月 30 日，英国政府逼迫两名英籍法官韦彦德、贺知义正式离职。

2022 年 7 月，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职。9 月 6 日，保守党党魁伊丽莎白·特拉斯正式出任英国首相。特拉斯对中国的态度素来强硬，在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期间曾多次发表干涉香港事务的不当言论。3 月 30 日，特拉斯诬称香港国安法“破坏”了香港的民主自由，并支持英国政府撤走香港的英籍法官。6 月 30 日，香港回归 25 周年前夕，特拉斯又站出来妄称英国对香港“仍负有历史责任”。鉴于特拉斯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干涉主义”偏好，我国应高度警惕英国在干涉香港事务上的新动向，防范特拉斯政府打“香港牌”干预中国内政。

二、香港回归以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主要特征

在香港回归前，英国政府曾试图通过推进所谓“政制改革”、修改“社团条例”和“公安条例”等方式阻碍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管治权，其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呈现以强化英国对香港殖民统

治、阻挠香港顺利回归为主要特征。而香港回归祖国 25 年来，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始终未曾间断过，并且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一）干涉力度不断升级

香港回归 25 年以来，英国历届政府对香港事务干涉力度总体呈现不断升级的态势。在布莱尔和布朗执政时期，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主要方式是定期发布《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以及就香港问题发表言论，主要停留在舆论攻击层面。而卡梅伦和特蕾莎·梅执政时期的英国政府，不仅延续前任的舆论手段，更是深入香港境内进行渗透，勾结乱港分子策划和导演暴力示威活动，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事务。约翰逊执政后，英国政府极力诋毁香港国安法，并操弄“BNO 牌”、停止引渡和施压英籍法官离职等手段全方位向中国发难，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力度不断加强。

（二）干涉手段与美国有所差异

在涉港行动上，英美两国保持高度的步调一致。英国多次响应美国对香港核心事务的干涉，如干涉立法会选举、阻挠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2003 年，英国政府在美国众议院发表攻击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的声明之后也采取了类似举措。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期间，英国效仿美国利用非政府组织开展组织、策划、资助香港暴力示威游行等活动。2020 年 12 月，就黎智英被捕一事，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相继发文，要求撤控并“立即释放黎智英”。英国立即紧随美国并予以配合。拉布就黎智英案污蔑中方称，此系对民众权利自由的“持续攻击”。英国首相发言人也就黎智英案表达所谓“关切”。然而，由于国家利益和外交传统等因素的影响，英美两国对香港事务的立法干涉手段和力度具有一定差异。在干涉手段上，美国主要通过立法和制裁染指香港事务。据统计，在 1984—2014 年间，美国国会共提出 60 余项涉港法案对香港的多个领域进行干涉^[35]。2019 年修例风波后，美国更是分别于 2019、2020 年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所谓“香港自治法”。美国行政当局积极插手香港事务。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政府还发布了多项涉港制裁行政令。相较于美国，英国对于香港的干涉更加“圆滑”，尽管干涉的力度不断升级，但多停留在舆论攻击和外交施压范围内。英国定期发布的《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不具备法律效力，英国政府官网明确标注“政府认为该文件对议会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不具有强制性”^[36]。

（三）涉港立场呈现鲜明的“两面性”

英国在涉港立场上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英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多次表达对“一国两制”的认可。2003 年，英国政府在半年报告中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2016 年 4 月，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在访港期间，称赞“一国两制”运作良好^[37]。2018 年 9 月 28 日，英国财政大臣梅尔·斯泰德在香港贸易发展局晚宴上称“一国两制”为香港的成功保驾护航，“一国两制”对香港未来发展至关重要^[38]。另一方面，香港回归以来，英国却在不断破坏“一国两制”的良性运转。无论是布莱尔、布朗时期对香港政制改革的干扰，还是卡梅伦与特蕾莎·梅时期对香港暴力犯罪活动的纵容支持，都严重地破坏了香港法律和社会秩序。约翰逊执政后，更是全方位干涉香港事务。英国在涉港立场上长期的两副面孔，充分体现了英国涉港立场的虚伪性。

（四）干涉主体呈现“集团化”特征

近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呈现“集团化”特征。约翰逊政府上台后，英国主要通过七国集团和“五眼联盟”在涉港问题上共同对华施压。2020 年 6 月 17 日，在香港国安法即将颁布之际，七国

集团（英国是主要成员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诋毁香港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7 月 31 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出于疫情原因决定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8 月 9 日包括英国在内的“五眼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抹黑中国政府，妄称推迟立法会选举的决定是“不合时宜的”。12 月 20 日，“五眼联盟”外长再次发布联合声明，对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果表示所谓“关切”，要求中国政府撤回取消乱港议员资格的决定。2021 年 5 月 5 日，七国集团外长再次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歪曲“一国两制”并抹黑中国对港政策。2022 年 5 月 8 日，李家超成功当选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5 月 10 日，七国集团外长又签署关于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声明，对选举结果进行诋毁，妄称会“敦促”中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39]。

（五）干涉以“民主”和“人权”为幌子

香港回归以来，英国经常以联合声明签署国自居，以所谓监督香港“人权”“民主”状况向中国政府频频发难。对 50 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进行关键词检索，关于人权、民主的关键词频频出现：“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出现 1 116 次，“权利”出现 1 066 次，“民主”出现 323 次，“人权”出现 237 次。其频率远远超过其他关键词，如“经济”（489 次）、“金融”（426 次），“文化”（162 次）。此外，英国外交部历年发布的《人权和民主报告》也将矛头频频对准香港，屡次颠倒黑白地对中国进行“人权”抨击。通过对英国涉港文件中“人权”和“民主”话语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英国的人权观、民主观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和政治性，向香港强行输出西方价值观的图谋十分明显。此外，英国在海内外人权领域的种种劣迹更是证明其所谓保护“人权”和“民主”只是借口，真正目的在于干涉香港事务、操纵香港。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另一个重要“工具”是放大香港选举制度和法治建设存在的不足，采取针对性措施对香港事务进行干涉。英国培植的亲西方代理人利用过去的选举制度漏洞混入立法会、区议会等机构，与英国政府相互勾结，恶意阻挠特区政府施政，严重破坏了香港政制秩序。

三、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负面影响及中国应对之策

英国对香港事务的插手、介入与干涉对中国核心利益造成了消极影响，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已经成为破坏香港繁荣与稳定的一大外部因素。

（一）负面影响

1. 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美西方反华势力的干涉下，香港民主法治持续受到外部因素干扰。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受到英、美等国反华势力和乱港分子的一再阻挠，拖延 25 年都没有得以立法。外部反华势力频频以物质引诱、价值观洗脑的方式拉拢腐蚀香港个别立法会议员，并通过干涉立法会选举将反中乱港分子安插进议会。这些议员与外部反华势力互通情报，共同谋划实施乱港行动；他们通过“拉布”“搅炒”的手段干扰议会进程^[40]，使上百个惠及香港社会民生的法案被搁置，严重影响了香港的民生进程。2019 年，在英美等国反华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合力挑唆与煽动下，打着“反修例”旗号的游行示威升级成为暴力犯罪活动。在此期间，香港各种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损失超过百亿美元^[41]。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危害了香港的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秩序，在意识

形态领域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2. 严重阻碍中英关系健康发展

香港问题一直是中、英双方的核心问题，并直接影响到中英关系。通过中、英关系分值表（表 1），可以看出从香港回归至 2013 年，中英关系基本保持上升趋势。在这段时期，中英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较为克制，对中英关系的负面影响较小。然而在 2013—2015 年这段时期，英国开始高调干涉香港事务，在 2014 年非法“占中”事件中公开支持乱港分子。这导致中英双边关系有所下滑，直到 2015 年 10 月，中英两国决定共同构建面向 21 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才有所回暖。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英国对乱港分子进行资助、支持和包庇，导致中英关系大幅度下滑。修例风波过后，英国在香港事务上仍不断挑衅，公然反对香港国安法并采取撤回引渡协议、操弄“BNO”等手段，中英关系继续急剧下滑。截至 2021 年 9 月，中英关系分值为-0.1，降到了香港回归以来最低点。若英国继续干涉香港事务，那么中英关系仍将可能保持下降趋势。

表 1 中英关系表分值表（1997 年—2021 年 9 月）^①

年度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分值	1.9	2.6	3.0	3.5	3.7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分值	3.9	4.2	4.4	4.7	4.9
年度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分值	5.0	5.3	5.6	5.4	5.6
年度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分值	5.6	5.3	4.9	5.0	5.1
年度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分值	5.1	5.0	4.0	2.6	-0.1

（二）中国应对之策

在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时刻保持警惕，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策防范化解外部干涉所造成的风险隐患。

1. 深入贯彻落实香港国安法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国家层面对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做出顶层设计和总体的制度性安排，意义重大而深远。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在理念、范围和方式等方面要与时俱进，适应新时期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情况，全面熟知和深刻领会香港国安法的要求和规定，通过特别行政区立法、司法、执法等工作确保其全面落地、有效实施。要将香港国安法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结合，有力遏制英美等外部势力及他们的代理人通过介入香港事务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企图。参照中方对等反制美涉港制裁方式，可对参与反华涉港活动的英方人员和机构予以必要的反制。要尽快落

^① 数据来源：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网址：<http://www.tuiir.tsinghua.edu.cn/info/1145/5696.htm>。

实香港基本法 23 条的立法,进一步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2. 推动意识形态去殖民化

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期间培植大量亲英势力,对香港意识形态影响深远。香港回归以来,各种乱象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香港的意识形态仍未摆脱西方殖民影响,其方向严重偏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而英、美等西方国家操弄“教育牌”“文化牌”,通过意识形态攻击妄图不断加深殖民烙印。香港特区推动意识形态去殖民化势在必行,对教育、文化领域的去殖民化是工作重点。推进教育去殖民化,一方面要将家国情怀和国家安全意识作为最基本的素质考察,培养一批爱国爱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另一方面要加强香港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建立一套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通过教育去殖民化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3. 推进特区民生经济建设

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是应对外部干涉活动的内在基石。在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香港新一届管治团队的基本任务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特区政府、立法会要深入基层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广泛听取并采集香港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另一方面,要提高特区政府机关、立法会的办事效率,通过更多惠民利民的民生法案来解决基本民生问题。香港新一届管治团队要使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自身优势,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并构建具有香港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势。民生与经济的发展能够不断提高香港同胞的国家归属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参考文献:

- [1] 伍俐斌. 试论《中英联合声明》的法律效力[J]. 中外法学, 2021(6): 1445-1463.
- [2] 袁洁. 约翰逊称“不会放弃香港”, 外交部: 英方应正视香港已回归祖国 25 年的现实[EB/OL]. (2022-07-02) [2022-07-02]. http://news.cyol.com/gb/articles/2022-07/01/content_mx7YAfVvx.html.
- [3] 阮国英. 英国对港政策回顾及其变化缘由评析[J]. 国际观察, 1996(2): 21-25.
- [4] 李环. 近年来英国对香港政策评析[J]. 国际研究参考, 2018(11): 37-43.
- [5] 周方舟. 英美对港政策的比较研究——基于大国博弈、国家利益与外交传统视阈[J]. 港澳研究, 2021(4): 46-54+95.
- [6] 刘诗琦. 论英国对香港政策及其影响[D].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7.
- [7] 陈寒溪, 刘诗琦. 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及其对中英关系的影响[J]. 战略决策研究, 2018(1): 25-39+105-106.
- [8] 王玉婷. 布莱尔政府时期的英国安全战略: 1997—2007 年[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84.
- [9]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Six-monthly report on Hong-Kong: July-December 1998[R/OL]. (1999-04) [2022-06-25].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00962/1998_Jul-Dec.pdf.
- [10] Select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Letter to Foreign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R/OL]. (2003-06-30) [2022-06-25]. <https://>

- 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304/cmselect/cmfa/389/4022402.htm.
- [11] Kite M. Prime Minister says Hong Kong is more free now [N]. Times, 2003-07-23 (1).
- [12] UK Parliament. Volume 421: debated on Tuesday 11 May 2004 [EB/OL]. (2004-05-11) [2022-06-25].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04-05-11/debates/cbf0f45b-60c9-44bc-9042-3cda0ca5292e/HongKong>.
- [13]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SIX-MONTHLY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ON HONG KONG [R/OL]. (1997-07) [2022-06-25].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00937/1997_Jan-Jun.pdf.
- [14]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SIX-MONTHLY REPORT TO PARLIAMENT [R/OL]. (1998-04) [2022-06-25].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00964/1997_Jul-Dec.pdf.
- [15] 人民网. 港澳观察: 英国高调介入香港政改, 意欲何为? [EB/OL]. (2013-09-18) [2022-06-25]. <http://hm.people.com.cn/n/2013/0918/c42272-22964364.html>.
- [16]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The UK in the Asian Century [EB/OL]. (2014-07-16) [2022-06-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the-uk-in-the-asian-century>.
- [17] 马晓云. 卡梅伦政府对华政策述评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4 (9): 23-31+47.
- [18] UK Parliament Commons Chamber. Volume 662: debated on Tuesday 18 June 2019 [EB/OL]. (2019-06-18) [2022-06-25].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19-06-18/debates/D58B2F56-2C4B-4B75-9C06-538E588CB18B/HongKong#contribution-5A04B92D-AC55-4CFA-9FE6-CE17E073821F>.
- [19] Foreign & Commonwealth Office. Foreign Secretary's call with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Carrie Lam [EB/OL]. (2019-08-09) [2022-06-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oreign-secretary-call-with-the-chief-executive-of-hong-kong-carrie-lam>.
- [20] UK Parliament Commons Chamber. Volume 663: debated on Monday 22 July 2019 [EB/OL]. (2019-07-22) [2022-06-25].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19-07-22/debates/388E7E2B-03A6-4D84-A61C-F385F58678F2/HongKong>.
- [21] Cecil N. PM: China is mistaken to stop MPs' trip to Hong Kong [N]. Evening Standard, 2014-12-01 (6).
- [22] 郑言. 部分英国政客在幕后祸乱香港 [EB/OL]. (2019-11-29) [2022-06-25]. <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ko3dl>.
- [23]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oreign Secretary expresses concern over UK national denied entry to Hong Kong [EB/OL]. (2017-10-11) [2022-06-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oreign-secretary-expresses-concern-over-uk-national-denied-entry-to-hong-kong>.
-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香港反对派获英副首相支持, 中国要求英方停止 [EB/OL]. (2014-10-08) [2022-06-25]. <http://www.scio.gov.cn/m/zhzc/8/3/Document/1382592/1382592.htm>.
- [25] Cabinet Office.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EB/OL]. (2021-03-16) [2022-06-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lobal-britain-in-a-competitive-age-the-integrated-review-of-security-defence-de>

- velopment-and-foreign-policy/global-britain-in-a-competitive-age-the-integrated-review-of-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and-foreign-policy.
- [26] UK Parliament Lords Chamber. Hong Kong: Emergency Powers [EB/OL]. (2019-10-07) [2022-06-25].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Lords/2019-10-07/debates/A03C86B5-0E71-4307-BA69-1DCAA0B8A523/HongKongEmergencyPowers>.
- [27] Foreign Secretary. China's propos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Foreign Secretary's statement - Parliament [R/OL]. (2020-06-22) [2022-06-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foreign-secretary-statement-to-parliament-on-hong-kong>.
- [28] Johnson B. PM Boris Johnson article on Hong Kong: 3 June 2020 [N]. The Times, 2020-06-03 (1).
- [29] UK Parliament Commons Chamber.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R/OL]. (2020-07-01) [2022-06-25].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20-07-01/debates/7A4917D6-E522-4589-8649-B9537A1051EA/HongKongNationalSecurityLegislation>.
- [30]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oreign Secretary's statement on Hong Kong election disqualifications [R/OL]. (2020-07-30) [2022-06-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oreign-secretarys-statement-on-hong-kong-election-disqualifications>.
- [31] Philp C. Raab condemns Hong Kong expulsions [N]. Times, 2020-11-13 (1).
- [32] UK Parliament Westminster Hall. Hong Kong Anniversaries [EB/OL]. (2022-06-29) [2022-07-05].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22-06-29/debates/08E61E50-CCD3-44C4-87A4-BBD6310DE67F/HongKongAnniversaries>.
- [33] 英国对香港打 BNO 牌, 入戏不要太深了 [N]. 国防时报, 2021-02-05 (14).
- [34] 李理, 龚学鸣. 英国暂停与香港引渡协议, 中方强烈谴责 [N]. 大公报, 2020-07-21 (6).
- [35] 郭永虎. 美国国会干涉中国香港事务的历史考察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5 (2): 103-111+128.
- [36]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Six-monthly report on Hong Kong 1 January to 30 June 2008 Guidance [EB/OL]. (2008-09-10) [2022-06-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ix-monthly-report-on-hong-kong-1-january-to-30-june-2008>.
- [37]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oreign Secretary visits Hong Kong [EB/OL]. (2016-04-08) [2022-06-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oreign-secretary-visits-hong-kong--2>.
- [38] HM Treasury. FST speech to the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Dinner: 27 September 2018 [EB/OL]. (2018-08-28) [2022-06-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fst-speech-to-the-hong-kong-trade-development-council-dinner-27-september-2018>.
- [39] 朱超. 外交部——敦促七国集团停止污蔑抹黑中国 [N]. 三明日报, 2022-05-17 (8).
- [40] 影响民生: 揽炒派议会狂“拉布”阻觅地进度 [N]. 大公报, 2021-03-11 (5).
- [41] 大公网. 回归 25 年大事记 | 2019: 修例风波重创 香港成“哭泣的城市” [EB/OL]. (2022-06-23) [2022-06-25]. <http://www.takungpao.com/hongkong/text/2022/0623/734095.html>.

责任编辑: 龚静阳



大变局下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干涉： 意图、手段与特点

杜哲元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2249）

摘 要：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力度。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主要意图有四，即干扰中国新疆的稳定和发展、遏制中国的发展、分化上海合作组织、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主要手段有政治、外交、经济、舆论和准军事手段这五类。这五类手段又有三个作用对象，即中国、境外“疆独”势力和国际社会。美国已经从以“软干涉”为主转向“软干涉”与“硬干涉”并用。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干涉呈现八个新的特点，即战略化、实操化、精准化、“法制化”、联动化、联盟化、国际化和全政府化。美国的干涉既可能对中国新疆地区和中国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可能给中国新疆地区和中国整体的安全稳定造成一定的威胁，还有可能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的地缘政治挑战。对此，中国应采取进一步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百年变局；中美关系；美国干涉行为；中国新疆事务；边疆安全

中图分类号：G353.1；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5-0113-13

DOI：10.13946/j.cnki.jcqis.2022.05.010

作者简介：杜哲元，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变局下美国干涉我国西部边疆事务的手段与趋势研究”（21YJCGJW003）

引用格式：杜哲元．大变局下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干涉：意图、手段与特点[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5）：113-125．

一、问题的提出

“台独”“港独”“疆独”和“藏独”问题是影响当前中国安全稳定的四个主要的分裂主义问题，美国对这四个问题均有所关注，对这四个地区的事务也均有所干涉。但在不同时期，美国关注和干涉的重点对象会有所不同，这四个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也有所变化。就近期而言，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干涉力度正在大幅加强。冷战结束以来，在中国西部边疆事务上，美国关注更多、干涉更多的是中国西藏事务；而对于中国新疆事务，美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并未予以高强度的关注和干涉。不过，随着实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关注度和干涉力度在逐步上升，2004—2005 年的“热比娅事件”和 2009 年的“7·5”事件可谓是两个重要节点。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关注度和干涉力度大幅度提高大致始于 2017—2018 年。一方面，这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有关，大变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快速发展不可逆转，美国护持全球霸权地位的压力与遏制中国发展的难度增大，美国朝野普遍对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感到空前焦虑。另一方面，这与 2017 年特朗普政府的上台有关，它标志着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美国对华遏制政策走向公开化和加剧化。

国内学界对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研究起步较晚，公开发表和出版的研究成果主要出现在 2010 年之后。在 2017—2018 年之后，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度明显上升。以 2017—2018 年为界，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原因和目的，有学者认为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受国际反恐形势、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和中美关系的影响^[2]，其目的在于遏制中国^[3]。二是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手段与主导力量，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消耗战略、灰色战略和混合战略^[4]，而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主导力量是国会^[5]，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美国学界通过学术研究干涉中国新疆事务^[6]。三是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影响^[1]与中国的应对策略^[7-8]。此外，还有学者重点分析了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性质和本质^[9]及其演进逻辑^[10]。相对于这些既有研究，本文尝试根据 2020 年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最新的中美关系形势，从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角度出发，以更加综合全面的视角分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意图、手段和特点。

二、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意图

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显然不是为了所谓维护“人权”和“宗教自由”。近年来，美国加大对中国新疆事务干涉的主要意图体现在现实政治层面，即遏制中国的发展、巩固本国的霸权地位。这又可以再细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干扰中国新疆的稳定和发展

美国在国际上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系统性污名化，并且制裁新疆生产的棉花、番茄、多晶硅和

服装等产品以及相关企业。这将对新疆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影响新疆部分群体的就业和增收；美国支持境外“疆独”势力从事分裂活动，甚至撤销对“东伊运”是恐怖主义组织的认定^[11]，则有可能给新疆的安全稳定带来严重危害。新疆在中国安全和发展全局中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12]。一方面，新疆地处边疆，远离国内大型经济增长极，经济发展水平仍需提高。同时，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新疆总人口的 57.76%^[13]。新疆还面临着“三股势力”的威胁，是中国安全和发展全局中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环节。另一方面，新疆面积辽阔，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6，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陆上省区，而且它能源资源储量丰富，还与八个周边国家接壤，是中国向西开放的主要门户，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中国无论是与中亚国家共建新亚欧大陆桥和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还是与巴基斯坦共建中巴经济走廊，都需要以新疆为枢纽。因此，新疆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价值重大。第一点使美国的干涉相对易于得手，并能产生一定的放大效应；第二点使美国破坏新疆安全稳定能够产生一定的连锁效应，通过干涉新疆达到制约中国整体安全发展的目的。

（二）遏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意图绝不只限于干扰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它更大的意图在于通过新疆“以点带面”，企图以新疆为抓手和突破口，从内外两个方面遏制中国的整体发展。就内部方面而言，首先，新疆地区在中国安全和发展全局中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如果新疆地区的发展受到制约，势必会影响中国整体的发展；如果新疆的安全稳定受到不利影响，势必会波及中国整体的安全稳定。其次，从微观角度来看，美国不仅对新疆生产的诸多农产品、纺织品和矿产资源进行制裁，还对与这些产品有关联的企业进行制裁，这必然会牵连到新疆以外的其他中国企业。美国正是以干涉新疆事务为名，行对华贸易战之实，企图通过炒作涉疆议题打击中国经济、遏制中国发展。

就外部方面而言，首先，美国通过造谣和炒作所谓新疆“强迫劳动”与“种族灭绝”谎言，对中国进行系统性污名化，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削弱中国的国际声望，抑制中国理念、中国话语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一点有可能产生实际的地缘政治效应，尤其是在中欧关系方面。美国掌握着国际话语权，又有众多“非政府组织”为其宣传造势。美国还与欧洲有着广泛的文化和民间联系。美国把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诬称为“集中营”，甚至使用所谓“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话语。这些政治词语曾经被广泛用来形容纳粹德国的暴行，很容易刺激和挑起欧洲民众最敏感的神经。美国把这些政治词语嫁接到中国新疆事务上，意图把纳粹德国与中国联系在一起，误导欧洲民众把对纳粹德国的记忆和想象转移到中国身上。欧洲国家普遍奉行自由民主选举制度和分权体制，一旦欧洲民众接受了美国对中国新疆的造谣抹黑，即便欧洲政界的一些有识之士能够看清真相，也很难扭转被美国洗脑的欧洲民意，部分欧洲国家在其民意的裹挟下不得不随美起舞，采取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政策。美国不仅制裁与新疆的产品和企业有经济关系的中国企业与个人，还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制裁与新疆的产品和企业有经济关系的各国企业与个人，以此吓阻外国的投资和技术进入中国，从经济上遏制中国。

（三）分化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和人口总量分别

约占全球的 20%和 40%^[14]。一方面,该组织有助于增进中国与周边相关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改善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为“一带一路”建设在周边地区的推进提供政治和安全保障。另一方面,该组织对于促进亚欧国家的信任与合作,维护亚欧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巩固亚欧地区的和平稳定有较大的积极作用。再一方面,该组织提出并践行了上海精神,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调,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14]。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理念超越了西方旧的国际关系理念。

但是,上海合作组织这三个方面的功能和价值并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长期以来,由哈尔福德·麦金德等人开创、布热津斯基等人发展的古典地缘政治学说对美国的外交决策层有着较大的影响^[15]。该学说坚持亚欧大陆中心论,强调亚欧大陆上“心脏地带”的重要性^[16],坚决反对亚欧大陆形成一种一致性的力量,视这种力量为美国霸权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中俄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中俄两国又被美国视为“两大对手和竞争者”。在这种霸权逻辑下,美国不希望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继续提升,企图分化上海合作组织,抑制该组织影响力的提升。美国企图通过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找到分化上海合作组织的突破口。新疆地区位于上海合作组织覆盖区域的腹地和枢纽位置,既与除了乌兹别克斯坦以外的所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接壤,又与中亚国家和巴基斯坦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宗教相近性。一方面,美国试图在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中强调“伊斯兰特性”和所谓“突厥”特性,误导巴基斯坦和中亚五国的政府和民众对中国新疆事务的认识,误导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反对中国的治疆政策,利用所谓“新疆问题”在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制造裂隙,埋下不信任的种子。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拉拢印度,吹捧印度的“民主特性”,怂恿印度在攻击所谓中国新疆“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上随美起舞,企图使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行动,图谋分化上海合作组织。

(四) 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

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有三个不可或缺的支柱,即美式民主及其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美国强大的同盟体系、美国发达的经济。但近年来,这三根支柱都面临着弱化的风险。美国通过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企图使这三根支柱有所加固。首先,中国的快速发展已充分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和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了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真实亲诚、全球治理观和新安全观等理念。中国这一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正在国际上逐渐获得广泛认同。与此相对,美式民主和美国的价值理念正在走向祛魅。未来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很有可能演变为“权力+理念”的复合竞争,理念成为战略竞争的内在因素,理念竞争成为权力竞争的伴生现象,理念竞争在大国战略竞争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7]。为了赢得与中国的理念竞争,美国不惜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通过大肆造谣和炒作所谓新疆“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抹黑中国发展方式和理念,企图以此反衬和彰显美式民主及其价值理念的优越性,维护美式民主及其价值理念的独尊地位。其次,由于特朗普政府时期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美国的同盟体系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美国的欧洲和东亚盟友对美国的信任度有所下降,美国对其同盟体系的凝聚力和领导力遭到削弱。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高调倡导建立“民主联盟”,试图修补与其盟友的裂隙,而这又需要制造出一个共同的“敌人”作为粘合剂。美国通过造谣和炒作所谓“新疆问题”,妄图

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严重威胁人权和自由民主的邪恶形象，通过这种方式误导它的欧洲和东亚盟友对中国的认识，使其更加依赖美国，从而巩固美国对其同盟体系的影响和控制。最后，美国借口所谓“强迫劳动”制裁新疆地区的光伏产业，而新疆地区的光伏产业在全中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打击新疆地区的光伏产业也就意味着打击中国的光伏产业。美国政府企图通过政治化手段使其光伏产业取得更高市场占有率，实现其“清洁能源计划”的目标，进而助力其经济发展。

三、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手段

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干涉和间接干涉、软干涉和硬干涉等，主要的干涉手段可以分为政治、外交、经济、舆论和准军事手段这五类。这五类手段又有三个作用对象，即中国、境外“疆独”势力和国际社会，美国企图通过这五类手段逐步实现其上述四项意图。

（一）政治手段

美国使用政治手段干涉中国新疆事务，首先是在政治会谈中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相关官员施加压力。比如，2021年2月11日中国农历除夕，美国总统拜登在与习近平主席通话中，妄称对新疆所谓“侵犯人权”问题非常关切^[18]；2021年3月18日，在安克雷奇召开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美国对所谓“新疆问题”深切关注^[19]。

其次是对主政新疆的高级官员和政府机构实施定向制裁，禁止被制裁的对象及其直系亲属入境美国，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和实体，禁止美国人同被制裁对象及其拥有的实体进行商品或服务交易。2020年7月9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分别宣布对4名新疆官员及新疆公安厅实施制裁；同年7月31日，宣布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2名官员实施制裁；2021年3月22日，又宣布对2名新任新疆官员实施制裁。

最后是派遣高官为“疆独”势力站台，以抬高其政治地位、扩大其政治影响。2019年6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人为“世维会”头目颁发所谓2019年度“民主贡献奖”。“世维会”在美举办意图分裂新疆的会议，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众议员吉姆·麦戈文等人与会发言，并高调妄称加大干预中国新疆事务^[4]。同年8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出席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圆桌会议”，会见了“东突”等反华势力代表^[20]。2021年7月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以网络视频方式与7名所谓“曾在中国新疆地区被关押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会面，听取他们诉说“自己的经历”，并就如何最有效地向中国施压以制止所谓“在新疆的打压”咨询意见^[21]。

（二）外交手段

美国使用外交手段干涉中国新疆事务，首先是由国务卿出面对中国新疆事务以及中国的治疆政策进行攻击谴责和造谣抹黑。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任期内频频造谣抹黑中国新疆，并在其离任之前撒下“世纪谎言”，诬称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延续了前任的伎俩，屡次造谣抹黑中国新疆。2021年7月12日，他向国会提交了所谓《埃利·维塞尔种族灭绝和暴行预防法》报告。该报告首次将中国列入所谓“种族灭绝高风险”国家名单，并诬称

中国新疆是所谓“暴行高风险区”^[22]。另外,根据已经通过的所谓“维吾尔人权政策法”,美国或有可能在其国务院系统中增设“美国新疆问题特派调查员”一职,专职干涉中国新疆事务^[23]。

其次是对国际社会采用外交手段。这是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一大重点,而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利用国际多边场合,攻击和造谣中国新疆;第二个方面是怂恿、拉拢或胁迫其他国家一起攻击和造谣中国新疆,给中国施压。2018 年 11 月,美国怂恿 15 国驻华大使联名致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负责人,要求会面并表达所谓对“新疆状况的担忧”;2019 年 7 月,又鼓动 24 个国家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批评中国的治疆政策^[24]。2021 年 3 月 22 日,美国拉拢英国和加拿大发表专门的所谓“新疆问题联合声明”^[25];4 月 16 日,又借日本首相菅直人访美之际,拉拢日本在“美日联合声明”中抹黑新疆的人权状况^[26];5 月 12 日,拉拢英国和德国等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滥用联合国的资源和平台,召开视频会议讨论所谓“新疆人权问题”^[27];6 月 15 日,拉拢欧盟在“美欧联合声明”中抹黑新疆人权状况,造谣所谓新疆“强迫劳动”问题^[28];6 月 21 日,加拿大代表美国 and 英国等国在第 47 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就所谓“新疆问题”对中国进行指责,并要求中国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其他观察员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29]。

(三) 经济手段

美国使用经济手段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主要是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借口,制裁新疆的产品(棉花、番茄、多晶硅、服装等)和相关企业。一方面,美国借由其凭空捏造的所谓“强迫劳动”概念,根据本国的现实利益需要,将中国新疆的一些重要产品和企业列入其制裁名单。另一方面,禁止这些产品出口到美国,限制这些企业与美国个人和企业以及其他国家的个人和企业发生经济往来,限制这些企业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并且拉拢其盟友对中国新疆的产品和企业进行制裁。再一方面,美国不仅要制裁被列入清单的新疆企业,还要制裁与这些企业有经济往来的中国其他地区的企业,甚至美国还试图以新疆为突破口,把所谓“强迫劳动”的帽子肆意扣到中国其他地区的企业上。而随着所谓“防止维吾尔强迫劳动法案”在美国国会讨论通过并经过总统签署生效后,美国使用经济手段干涉中国新疆事务将实现“法制化”,成为一种常态化与机制化的手段。

另外,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经济手段还包括提高对境外“疆独”势力的经济资助,用这种方式保持对这些分裂势力的影响和掌控,使其能在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上发挥美国政府不便和不能发挥的作用。美国政府往往不会直接出面,而是通过一些有着官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对其提供资助。其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这些“疆独”势力最大的金主。该基金会 99% 的经费来自美国国会,而美国国务院和国会监管它所有的对外捐款与活动^[30],2018 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世维会”及其分支提供了近 66.5 万美元,2019 年则达到 96 万美元,增长近 50%。2020 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宣布自 2004 年以来为“维吾尔团体”提供了 875.8 万美元的资助^[31]。

(四) 舆论手段

舆论手段是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惯用伎俩。当前,美国这一手段有了新的变化,即转向系统性污名化。所谓“系统性”,是指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实施污名化的意图非常坚决、次数非常频繁、场合非常多样、主体非常广泛、策略非常卑劣、措辞非常恶劣。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实施系统性污名化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美国政府的总统、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国务卿、各部官员和国会议员通过发表涉疆声明或发布涉疆报告攻击抹黑中国新疆，为美国和西方的舆论营造政治氛围。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的所谓“中国人权报告”和“中国宗教自由报告”是这一方面常态化与机制化的代表。近年来，这两份报告中涉疆部分的地位均有明显提升。以2020年出台的这两份报告为例，它们在开篇就以较多笔墨对中国新疆进行造谣抹黑。

其次，美国政府支持本国媒体、“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智库等就中国新疆事务进行歪曲报道、发表不实观点。比如，在美国有着较大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就曾在2021年1月发表了一篇题为所谓“新疆发生种族灭绝，我才开始寻根”的评论文章^[31]。2020年6月，詹姆斯敦基金会发布德国人郑国恩的所谓“绝育、避孕环、强制避孕：中国共产党压制新疆维吾尔生育率的行动”报告^[32]。美国的部分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通过这些耸人听闻、与事实完全不符的评论、报告和报道，极力攻击抹黑中国新疆。欧美国一些保守主义色彩强烈的智库（如传统基金会、哈德逊研究所、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则在这些歪曲和错误的涉疆信息的基础上，鼓吹采取强硬而极端的应对策略，试图把舆情整合和转化为政策。

再次，支持或误导他国媒体和智库等就中国新疆事务进行歪曲报道、发表不实观点。在这一点上，英国广播公司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是典型代表。美国的这一手段甚至曾误导非洲媒体卷入对中国新疆事务的攻击抹黑。比如2021年6月11日，加纳主流媒体《每日写真报》网站就诬称中国在新疆犯下所谓“反人类罪”^[33]。

最后，支持和操纵境外“疆独”分子攻击抹黑中国新疆事务。“世维会”许多要员都在“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等反华媒体担任高级职务。如“世维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乌麦尔·卡纳特于1999至2009年担任“自由亚洲电台”高级编辑。“世维会”及其分支机构还伙同一些西方反华媒体不断炮制所谓“上百万人被拘禁于集中营”“墨玉名单”等假新闻，并与郑国恩等伪学者配合炒作针对中国的新冷战计划，呼吁将中国的新疆政策定性为所谓“种族灭绝”，蛊惑各国制裁和抵制中国^[31]。

（五）准军事手段

所谓准军事手段可以理解为介于直接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之间的方式，或是一种间接军事手段、半军事手段^[34]。美国使用准军事手段干涉中国新疆事务，部分已经有所显现，部分仍在酝酿之中。首先，在对华方面，针对新疆部署先进的卫星监视系统。这在美国与英国和加拿大的对“新疆问题”的联合声明中，美国已对此承认^[25]。同时，美国加大力度窃取涉疆情报信息，并利用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服务机构以及互联网等，加强对新疆地区的思想渗透和煽动。

其次，在对境外“疆独”势力方面，一方面，2020年7月7日，蓬佩奥妄称“东伊运”已不复存在，以此为借口，美国撤销了将“东伊运”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决定^[11]。美国的这一举动传递出一个危险的信号，既从法律上为“东伊运”这个主张以暴力方式分裂新疆的最具危害性的恐怖主义组织松绑，也为以后美国向其提供经济资助、武器和技术设备援助以及军事训练，支持其从境内境外作乱新疆铺平道路。另一方面，随着中美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对于以“世维会”为代表的另一部分谎称非暴力的“疆独”势力，美国除了继续为其提供政治支持和经济资助外，还有可能为其提供

武器和技术设备援助以及军事训练,促使其与“东伊运”等势力合流,共同从境内境外作乱新疆。美国的这一准军事手段在冷战时期曾频频使用,比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培训“藏人特工”,然后将其派遣回藏区从事破坏活动,并向西藏叛乱分子空投武器^[35]。这场西藏叛乱失败后,美国又帮助西藏分裂势力在尼泊尔靠近西藏的木斯塘重整叛乱武装,建立了一支 2 000 人的武装,给其提供活动经费、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要求他们经常渗透回西藏进行破坏,袭击解放军分散的营地和交通运输线^[34]。对于美国的这一惯用手段,中国应保持高度警惕。

最后,在对国际社会方面,一方面,美国通过“五眼联盟”和“美日印澳四国对话机制”等,谋求与相关国家在涉疆问题上的情报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美国还有可能在中国新疆的周边地区制造和加剧混乱,既通过混乱影响新疆内部的安全稳定,也利用混乱掩护其实施针对新疆的准军事行动。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后,阿富汗的安全局势相当脆弱,重新走向战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从美国对阿富汗变局不负责任的表现来看,不能排除它企图为阿富汗重建留下障碍和隐患,使阿富汗变局演变为乱局,从而利用阿富汗的乱局给中国新疆地区和边疆安全制造麻烦。再一方面,美国虽然从阿富汗撤军,但它显然不会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地区撤出它的全部影响,它仍会保留它在该地区必要的外交和情报存在,甚至谋求一定的军事存在,通过这些存在,美国有可能会以秘密方式威胁和破坏新疆的安全稳定。

四、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特点

当前,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干涉呈现出八个新特点。这些特点既是当前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方式,也是趋势。

(一) 战略化

2017—2018 年以来,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干涉开始上升到战略层面,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意图上讲,美国已经在国家对外战略层面上,明确把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抓手和工具,形成“以疆制华”战略,这一战略已经成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重要部分。从方式上讲,美国此前对中国新疆事务的零零散散、断断续续、事件反应式的干涉,已经表现得更为系统化和常态化,更加讲求战略主动性、战略系统性、战略持续性和战略统筹性。

(二) 实操化

不同于 2017—2018 年以前,美国主要通过话语上的攻击谴责和造谣抹黑来干涉中国新疆事务。2017—2018 年以来,美国的干涉开始转向实操化,试图通过实际行动,快速而明显地产生实际性破坏效果。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中国新疆事务的系统性污名化,使其话语上的攻击谴责和造谣抹黑能够产生实际的经济打击效果和地缘政治分化效果;其次是对中国新疆的产品和企业进行经济制裁,干扰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最后通过可能的准军事手段,破坏中国新疆的安全稳定。实操化体现了美国加大对中国新疆事务的“硬干涉”趋向。

(三) 精准化

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开始更加注重精准锁定打击目标。一方面,精准到那些对新疆经济社会

发展有着重要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包括棉花、番茄、多晶硅和服装等，这些企业涉及诸多新疆内外的科技、纺织与矿产能源行业。另一方面，精准到那些负责新疆安全稳定的政府机构和高级官员。美国频繁地运用这些精准定向制裁，既企图以较小的成本使其实际打击效果倍增，又企图使之产生政治威慑和政治羞辱的效果。

（四）“法制化”

长期以来美国在干涉中国台湾和西藏事务上表现出明显的“法制化”特点，而2017—2018年以前，该特点在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上表现得并不明显，但在此后，该特点迅速突显出来。首先表现在美国国会的涉疆法案数量剧增，除了通过所谓“维吾尔人权保护法案”和“预防维吾尔强迫劳动法案”之外，还有数项涉疆法案在酝酿之中。其次表现在美国行政系统以一种“欢迎”的态度看待这些涉疆法案，总统往往会在较短的时间内签署，使之快速生效。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走向“法制化”的破坏效应是相当深远的，因为其对外政策和战略一旦固化为国内法律，美国政府就要“有法必依”，执行法案中的规定，落实法案中的要求，而废除它们的难度非常大。“法制化”不仅能为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提供较为长远和系统的“纲领”，还能为它干涉的长期实施提供坚实的支撑和保障。

（五）联动化

首先是干涉手段的联动化。2017—2018年以前，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主要是舆论手段；2017—2018年以来，美国开始综合运用政治、外交、经济、舆论和准军事手段，以舆论手段为先导，继之以政治、外交和经济手段，再以准军事手段为后手。这五类手段相互配合、相互支撑，共同服务于美国的“以疆制华”战略。其次是干涉议题的联动化，即美国在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同时，往往会把其他三个影响中国安全稳定的分裂主义问题牵连起来，污名化中国新疆“人权状况”的同时，也会对中国香港和中国西藏的“人权状况”一起进行污名化，从广度上加强其污名化的效果，企图使国际受众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不只是局部性的，而是全面性的。

（六）联盟化

无论是为了通过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来巩固自己的同盟体系，还是为了使自己的干涉显得更有效果，美国都会以各种方式拉拢、怂恿或胁迫自己的盟友和战略伙伴，联合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甚至为此而结成一个议题联盟。美国在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上的联盟对象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其传统的西方盟友，这些盟友主要集中在北美洲和欧洲，特别是加拿大和英国；第二类盟友是其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战略伙伴，以“美日印澳四国对话机制”为基础；第三类是伊斯兰国家，特别是“突厥语系”的伊斯兰国家。就这三类而言，目前第一类国家追随美国干涉的步调最为紧密，第二类国家中除了澳大利亚以外，与美国干涉的步调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第三类国家目前还只是潜在的，但也是美国重点拉拢或胁迫的对象。比如在2019年与中亚国家外长的数次会晤中，蓬佩奥均刻意夸大所谓“新疆问题”对中亚国家的负面影响，美国还肆意在中亚国家和一些伊斯兰国家中散布新疆穆斯林群众“受迫害”的不实消息^[36]。

（七）国际化

与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相类似，美国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所谓“新疆问题”国际化。一方面，

美国借助盟友的力量一起干涉中国新疆事务，利用西方在世界上的话语优势，抢夺在中国新疆事务上的话语权和评判权，使中国处于被建构、被评判的位置。另一方面，美国在联合国等重要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多边会议上，单独、联合或指使其他国家对中国新疆进行指责攻击、造谣抹黑，既利用国际多边舞台的广泛代表性使其干涉显得更有“合法性”，又利用国际多边舞台的广泛关注度扩大谣言的传播和影响范围，增加中国澄清事实、还原真相的难度。再一方面，美国大力支持境外“疆独”势力走向国际化，帮助其提升国际曝光度、扩大所谓“国际活动空间”。

（八）全政府化

当前，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正进入全面动员实施阶段^[37]，这一点也体现在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上。不同于 2017—2018 年以前，美国政府内部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主力军”和“急先锋”是国会，行政系统对此则较为谨慎。在 2017—2018 年以后，美国政府内部的干涉“主力军”和“急先锋”已不再只有国会，行政系统的总统、国务卿以及各个联邦行政部门都积极参与进来。

在对中国新疆进行系统性污名化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在重要的国际场合表达对中国新疆的所谓“关切”，蓬佩奥在其国务卿任内大肆造谣中国新疆发生所谓“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谎言，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全面继承了前任的涉疆谎言。美国军方也加入到这场污名化的闹剧中。2019 年 12 月 7 日，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妄称，“中国政府给新疆维吾尔族人带来了痛苦”^[38]。2021 年 7 月 27 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公然污蔑中国在新疆实施所谓“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39]。在对中国新疆实施外交和经济制裁方面，2019 年 5 月 23 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宣布对中国新疆的一家政府机构和 4 名政府官员实施定向制裁；7 月 31 日，两部门又宣布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 2 名官员实施定向制裁。2021 年 6 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商务部、劳工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又对新疆所谓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和企业实施制裁。在支持“疆独”势力方面，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在出席“国际宗教自由圆桌会议”期间会见“东突”等反华势力代表，蓬佩奥则撤销了将“东伊运”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决定，布林肯又会见了所谓“曾在中国新疆地区被关押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在使用准军事手段方面，2020 年出台的所谓“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上的作用也予以了明确规定^[23]。

当然，美国国会在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中的作用并没有削弱，国会中的部分反华议员可谓是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中最为激进、最为顽固的一股势力。一方面，国会以立法的方式引导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整体走向。另一方面，它通过资助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组织，间接向“世维会”等“疆独”势力提供经济资助，并时常走向前台为这些分裂势力提供政治支持。再一方面，它通过政治和舆论造势，推动美国智库和媒体不断加大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关注。总之，在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上，美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府会一体、官民协作的全政府化局面。

五、中国的应对策略

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既有可能对中国新疆和中国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有可能给中国新疆和中国整体的安全稳定造成一定威胁，还有可能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的地缘政治挑战，

尤其是在中欧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方面。通过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美国有可能将一些欧洲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推入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阵营。虽然当前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手段方式颇多，但最主要与最核心的还是系统性污名化，为其进一步打压与遏制中国提供借口、增强合力、制造所谓合法性，这关联到美国的整体对华政策。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应对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干涉是一场国内国际的人心之争，中国应争取更多更大的力量相信中国、支持中国。

除了从外交和舆论上对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反干涉斗争外，中国还应从这四个层面采取进一步行动。首先，对内，应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凝聚人心为根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贴民生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切实提高中国新疆地区各级官员和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和新技术手段预防与反制美国对中国新疆地区各种形式的监视、渗透和煽动活动。其次，对于境外分裂主义势力，应善于实施分化策略，重点打击其中的顽固极端势力。同时，面向国际受众，广泛揭露这些分裂主义势力反和平、反人道的行径与实质。再次，对于国际社会，应主动团结国际上的支持力量，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反分裂、反干涉问题上的合作，积极构建反分裂、反干涉的国际统一战线，使中国在相关问题上的主张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更有力的支持。最后，对于国外民众，一方面要讲好中国新疆故事，既重视主流媒体，又充分发挥网络社交平台的作用，以理直气壮的姿态、客观翔实的内容、生动形象的形式、灵活多样的方式，多主体、多渠道地驳斥和揭露美国的造谣抹黑，展示和传递中国新疆地区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要完善“请进来”工作，适时扩大中国新疆地区的对外开放，欢迎各国友好政治人士、宗教人士、商务人士、学者、媒体和民众游客到中国新疆地区有序参观访问，使他们亲身感受中国新疆地区的真实情况，使美国的造谣抹黑不攻自破。当然，争取国外民众在涉疆问题上充分相信中国、支持中国不可能很快就实现，中国应保持战略自信 and 战略定力，做到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参考文献：

- [1] 仇朝兵. 大变局下美国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化”及其影响[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4): 135-164.
- [2] 顾国良, 刘卫东, 李枏.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356-367.
- [3] 李捷, 王婷婷. “疆独”、“藏独”的国际化路径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10(2): 25-36.
- [4] 郭永良. 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对美国炒作涉疆问题的应对[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1-8.
- [5] 刘卫东. 美国国会对中国新疆问题的干涉[J]. 国际资料信息, 2010(2): 1-8.
- [6] 许建英. 美国介入“新疆问题”的考察与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5): 78-83.
- [7] 郭永虎, 熊小艳. 美国国会涉疆立法活动的动向、特征及影响: 2017—2020年[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5): 52-59.
- [8] 李学保. 涉藏、涉疆外交面临的困扰及化解之道[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1): 7-14.
- [9] 靳晓哲.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 性质、解构及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1): 106-118.
- [10] 靳晓哲.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演进逻辑与中国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2): 78-88.
- [11] 2020年11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EB/OL]. (2020-11-06) [2022-09-15]. <https://www.mfa.gov.cn/zh/whw/2020/11/06/2020110601.htm>

- 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829984.shtml.
- [12] 杜哲元. “一带一路”建设与当代新疆地缘战略价值论析 [J]. 世界地理研究, 2017 (5): 32-43.
- [1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EB/OL]. (2021-06-14) [2022-09-15]. <http://tjj.xinjiang.gov.cn/tjj/tjgn/202106/4311411b68d343bbaa694e923c2c6be0.shtml>.
- [14]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532.
- [15] 杜哲元. 论美国的古典地缘政治观——基本内涵、战略影响与主要缺陷 [J]. 东北亚论坛, 2022 (3): 108-126.
- [16] H.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M]. Lond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1919: 91-194.
- [17] 徐进. 理念竞争、秩序构建与权力转移 [J]. 当代亚太, 2019 (4): 4-25.
- [18] Readout of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Call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EB/OL]. (2021-02-10) [2022-09-1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2/10/readout-of-president-joseph-r-biden-jr-call-with-president-xi-jinping-of-china/>.
- [19]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Director Yang And State Councilor Wang At the Top of Their Meeting [EB/OL]. (2021-03-19) [2022-09-15].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chinese-director-of-the-office-of-the-central-commission-for-foreign-affairs-yang-jiechi-and-chinese-state-councilor-wang-yi-at-th/>.
- [20] 2019 年 8 月 8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答记者问 [EB/OL]. (2019-08-08) [2022-09-15].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1908/t20190808_5417879.shtml.
- [21] 范凌志. 美又想借人权议题祸乱新疆 [N]. 环球时报, 2021-07-08 (3).
- [22] 2021 年 7 月 13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EB/OL]. (2021-07-13) [2022-09-15]. 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107/t20210713_9177395.shtml.
- [23] 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20 [EB/OL]. (2020-05-27) [2022-09-15]. <https://www.Congress.gov/congressional-record/2020/5/27/house-section/article/h2293-1?q=%7B%22search%22%3A%5B%22Uyghur+Human+Rights+Protection+Act%22%5D%7D&s=4&r=4>.
- [24] 曹伟. 美国: 涉疆问题国际化的幕后推手 [N]. 光明日报, 2020-06-19 (4).
- [25] Joint Statement on Xinjiang [EB/OL]. [2021-03-22] [2022-09-15].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xinjiang/>.
- [26] U.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S. - 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EB/OL]. (2021-04-16) [2022-09-1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
- [27] 《环球时报》社评. 抹黑新疆, 盗用联合国名义也难撑场 [N]. 环球时报, 2021-05-14 (14).
- [28] U.S.-EU Summit Statement [EB/OL]. (2021-06-15) [2022-09-1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5/u-s-eu-summit-statement/>.

- [29] 张朋辉, 范凌志, 刘欣, 等. 中国加拿大在日内瓦激烈交锋 [N]. 环球时报, 2021-06-24 (16).
- [30] 张磊.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个什么东西 [J]. 世界知识, 2020 (1): 53-54.
- [31] 中国日报社中国观察智库. 涉疆谎言是如何产生的? [EB/OL]. (2021-04-55) [2022-09-15]. <https://china.chinadaily.com.cn/a/202104/25/WS60850b21a3101e7ce974bd05.html>.
- [32]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 郑国恩所谓新疆维吾尔族“强制绝育”“种族灭绝”独立报告的分析 [EB/OL]. (2020-09-16) [2022-09-15]. <http://news.cri.cn/20200916/beb854a5-d828-92a9-b68d-29924987e08b.html>.
- [33] 非洲媒体也被 BBC 带歪了 [EB/OL]. (2021-06-20) [2022-09-1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23662.
- [34] 白建才.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探析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 98-107.
- [35] 程早霞. 50 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动 [J]. 史林, 2008 (2): 150-161.
- [36] 李捷, 杨恕. 遏制与干涉: 美国涉华核心利益法案分析 [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0 (4): 15-35.
- [37] 陈文鑫. 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探析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0 (7): 1-7.
- [38] 2019 年 12 月 10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EB/OL]. (2019-12-10) [2022-09-15]. 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723281.shtml.
- [39] Secretary of Defense Remarks at the 40t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Fullerton Lecture (As Prepared) [EB/OL]. (2021-07-27) [2022-09-15].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Speeches/Speech/Article/2708192/secretary-of-defense-remarks-at-the-40th-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strategic/>.

责任编辑: 刘涔菡



美国涉疆议题框架建构与中国应对

姜禹维 戴继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犯罪学学院, 北京 100038)

摘要: 涉疆问题不是人权问题, 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然而, 出于冷战思维与霸权逻辑, 美国联合盟友不惜编造所谓“拘留营”“强迫劳动”“强制灭绝”等骇人听闻的谎言, 抹黑与诋毁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工作, 破坏我国国际形象, 危害新疆社会经济发展进步, 企图达到“以疆制华”的目的。为了更具欺骗性与蛊惑性, 这些谎言被精心构建为一整套涉疆议题框架。该框架包括诊断式框架、预后式框架、促动式框架三个组成部分。诊断式框架通过虚假叙事无端指责中国政府存在所谓“侵犯人权”情形, 为其“以疆制华”战略提供正当性。预后式框架策动对华制裁和支持新疆分裂主义的对华战略。促动式框架对涉疆议题大肆炒作, 企图推动其国际化。此外, 涉疆议题框架还与涉港、涉台、涉藏议题框架相互勾连, 共同构成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斗争主框架。应对美国涉疆议题炒作, 必须发扬斗争精神, 对其进行针对性“反框构”回击, 揭露其虚伪本质, 指出其祸疆图谋, 提升各族干部群众的国家意识,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关键词: 新疆事务; 涉疆法案; 分裂主义; 人权; 框架建构

中图分类号: G353.1;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5-0126-10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2.05.011

作者简介: 姜禹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戴继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2021LL05 项目;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项目“当前我国宗教领域突出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2019JKF102)

引用格式: 姜禹维, 戴继诚. 美国涉疆议题框架建构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5): 126-135.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2022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新疆时指出，“要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推动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注重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和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顶住和反击外部极端打压遏制，开展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斗争，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2]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遏制中国发展进步，美国不断以人权为由干涉我国新疆事务。国内学界对美国涉疆议题研究取得了积极成果。郭永良认为，美国通过炒作涉疆议题，图谋实现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封锁^[3]。郑亮认为，涉疆人权议题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动员^[4]。靳晓哲认为，涉疆人权话语具有空幻性和虚假性特征，它配合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为污名化中国创造议题、载体与空间^[5]。李捷指出，随着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涉疆议题已成为其阻挠中国发展的重要抓手^[6]。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揭露美国涉疆议题炒作的本质及其危害，有助于全面认识美国“以疆制华”图谋。但是，当前学界少有从框架建构视角分析涉疆议题的研究成果，或仅将框架动员当作一个方面论述，缺乏详尽展开。因此，本文将结合框架建构理论，详细分析美国涉疆议题的框架构成，并提出我国的应对措施。

一、美国炒作涉疆议题的基本情况

所谓“拘留营”“强迫劳动”与“种族灭绝”是美国干预新疆事务最常用的三个谎言。这些议题在美国及其盟友的政府文件、新闻报道、调查报告中不断出现。美国与相关机构不断加大炒作涉疆议题的力度，编造涉疆谎言，欺骗国际舆论，企图阻挠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破坏民族团结，营造新疆存在所谓“侵犯人权”的假象。

（一）所谓“拘留营”问题

近年来，为了挽救被极端主义裹挟的部分群众，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下称“教培中心”）。然而，这种欧美普遍采用的去极端化措施却被美国及其庇护的反华组织与机构恶意歪曲。他们将“教培中心”诬称为所谓“concentration camp”（集中营）和“detention camp”（拘留营），并编造所谓“百万维吾尔族人被拘留、监视、洗脑、折磨”等骇人听闻的谎言。该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国的所谓“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2018年8月3日，该组织发布一篇名为“中国：大量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迫接受再教育”的虚假报告。仅根据对8名维吾尔族人的所谓“采访”，就得出新疆每个村庄有12.8%的人被关押于“再教育营”的荒唐结论，甚至“预测”出约200万南疆村民被“拘留”。在美国暗中操纵下，这份报告被提交至“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随后，大量媒体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编造“联合国称上百万维吾尔族人被拘留”等虚假消息。事实上，“教培中心”属学校性质，学员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律知识、接受职业技能教育等，不仅认识到极端主义的虚伪与危害，还可以通过学到的技能，毕业后找到合适的工作，获得稳定的收入，开始崭新的生活。

（二）所谓“强迫劳动”问题

继所谓“拘留营”问题之后，美国又炒作所谓“强迫劳动”议题。该议题与所谓“拘留营”问题具有逻辑上的延续性。它诬称“拘留营”设置在工厂附近，目的是迫使维吾尔族人人为工厂、农场提供免费高强度劳动。被指控的产业主要涉及棉花与西红柿种植业、太阳能多晶硅产业。该议题起源于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2020 年 3 月 1 日发布的名为“出售维吾尔族人：再教育、强制劳动与新疆的监视”的所谓报告。该报告拼凑贴吧、微博等社交媒体招工信息，比对所谓“拘留营”卫星地图，据此推断 2017 至 2019 年至少 8 万多名新疆维吾尔族群众被“强迫”到工厂劳动。该报告还称，这些工人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剥夺”劳动权益和宗教信仰，是“再教育营”剥夺人权的延伸。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一贯反华，并非其自我标榜的“独立”“严谨”组织。其最大海外经费来源为美国国务院，实质是美国金主操纵的反华工具。该报告发布后，立刻在国际引起一轮反华舆论。美国借此炒作所谓“新疆棉事件”，联合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五眼联盟”国家对华实施经济制裁。自 2022 年 6 月 21 日起，美国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正式实施，对我国棉花、西红柿、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出口造成阻力。

（三）所谓“种族灭绝”问题

近年来，所谓“genocide”（种族灭绝）一词频繁出现在外媒关于新疆的新闻报道中。在诸多涉疆议题中，“种族灭绝”这一谎言最为严重。该议题诬称中国政府通过所谓“强制堕胎、绝育、分离维吾尔家庭等方式意欲灭绝维吾尔族”。事实上，“种族灭绝”这一指控荒诞不经，但由于它极具煽动性，常常成为反华势力企图干预中国内政、破坏中国国际形象的借口。2022 年，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多次以所谓“种族灭绝”为由，鼓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甚至要求更换冬奥会举办地。“种族灭绝”议题起源于郑国恩的一篇所谓报告。该报告以偏概全，捕风捉影，肆意篡改数据，偷换概念，宣称 2018 年中国宫内节育器 80%用于新疆，从而得出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实施所谓“种族灭绝”的荒诞论断。

二、美国涉疆议题的框架建构

1986 年斯诺提出框架建构理论，该理论重视对社会现实的“解读”过程，而这种“解读”多受人的主观能动性影响。美国编造的涉疆谎言并非孤立性言说，而是由反华学者、媒体和政府等共同编造的污名化国际表达^[4]。美国通过虚假叙事蓄意制造涉疆议题，企图通过媒体传播推动国际化，体现出框架动员现象。从框架建构理论视域看，我们可从诊断式、预后式与促动式框架三个方面对美国涉疆议题炒作进行分析。

（一）诊断式框架：制造涉疆议题

诊断式框架的建构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是指出“问题”的所在；其次，指认“加害者”；最后，自证“代理人”身份为“受害者”发声。在该框架下，若人们因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差异不能就“问

题”“加害者”“代理人”达成共识，则需要对相关事物与现实进行渲染，从而改变人们的“问题意识”。因此，诊断式框架的构建是一个对抗性、互动性过程。美国涉疆议题诊断式框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组成部分。

1. 选取所谓“侵犯人权”议题

诊断式框架的第一步是问题识别，若不存在问题，就要把某种现状“渲染”成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为实现插手新疆事务的目的，美国选取所谓“拘留营”“强迫劳动”“强制灭绝”作为关键议题。这些议题的挑选具有极强的目的性、针对性与策略性，其实质是否认历史阴影的心理防御性机制，即将个体错误行为强加于他人，避免直接面对自身阴暗面的“投射心理”。在面对敌对者时，投射者往往将自己的心理阴影与历史情节强加于对方，通过情绪转移排除自身焦虑。心理投射并不局限于个体，当无数个体基于相同心理而形成集体认同时，便形成了集体性投射心理。美国对华政治传播便是利用本国的历史阴影，借助特定话术，丑化被传播对象^[7]。“拘留营”“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现象均是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犯下的罪行。我国外交部发布的《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历史事实和现实证据》指出，美国自建国就对印第安人进行屠杀、驱赶、强制同化，剥夺其基本人权，试图从肉体与文化上消灭印第安人，至今印第安人仍然面临严峻生存危机^[8]。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棉花种植园中的被迫劳动的黑人奴隶高达 400 万人，黑奴被视为主人的私有财产，可随意买卖，毫无人身自由人身尊严可言。美国正是借涉疆议题激发群众心理阴影并进行心理投射以转移注意力，企图在实现自身道德解脱的同时栽赃中国。

2. 指认中国政府为所谓“加害者”

在选取所谓“拘留营”“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谎言后，美国还需指认“加害者”，确认谁应当为当前的“问题”承担责任。为了制造所谓证据来源，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资助诸多反华“学者”与机构，编造一系列所谓涉疆问题报告。在一篇所谓报告中，郑国恩篡改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口出生率的数据，得出中国在新疆地区实施所谓“种族灭绝”的谎言。但事实上，2019 年《新疆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8 年喀什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6.93%，和田地区为 2.96%。同时，郑国恩将克州卫健委文件中数据的百分比改为千分比，将人口自然增长率目标 1.05‰篡改为 1.05%。这种恶意篡改数据的行为完全违背基本的科学研究原则和方法，也充分暴露了他蓄意抹黑新疆的险恶用心。2021 年 3 月 2 日，在詹姆斯顿基金会的资助下，郑国恩再次发表所谓“新疆跨地区劳动力转移中的强迫劳动与强迫转移”报告。报告列举所谓证据污蔑新疆劳动力转移政策符合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强迫劳动”的定义，符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危害人类罪”的构成标准。郑国恩的这些所谓报告漏洞百出，毫无“学术性”可言，但在美国主流媒体配合下往往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将其作为中国所谓“侵犯人权”的证据来源。

3. 树立所谓“人权捍卫者”形象

诊断式框架的前两步确认了涉疆人权议题内容，指认中国政府为所谓“加害者”。在此基础上，美国还需建立自身所谓“正当性”，即证明自己有资格代表“受害者”发声。美国长期以“人权捍卫者”自居，以保护人权为幌子插手他国内政。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对自我形象的感知往往受外界对自身评价的影响。自我形象的建立受到他者多方位、多层次评价的影响^[9]。对于国家形象，自

我族群内部心理是自我映射下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影响因素^[10]。尽管美国国内人权问题严重,但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误导,部分美国人作出了负面评价,认为美国应当对中国进行“干预”。2021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7 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趋势小组”就中国相关话题进行抽样调查,共抽样 2 943 名小组成员,回收 2 596 份问卷,回复率 88%。结果显示,有 3% 的受访者提到“维吾尔族”和所谓“种族灭绝”。可见,对于中国“人权问题”,部分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有义务以“人权捍卫者”身份对华进行干预。对于美国而言,“以疆制华”战略是其企图强化所谓“人权高地”国家形象的行径。

(二) 预后式框架: 贯穿“以疆制华”图谋

预后式框架与诊断式框架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即对特定问题作出什么“诊断”就会开出什么“药方”。美国涉疆议题的预后式框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以中国政府所谓“侵犯人权”为理由对华实施制裁;二是以所谓“保护维吾尔族权益”为由,支持“东突”分裂势力。

1. 对华实施所谓制裁

美国政客炒作涉疆议题虽然披上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等外衣,但充斥谎言与伪善,其真实目的是破坏新疆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阻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美国第 116 届国会以来,为借人权之由打压中国,参众两院针对涉疆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法案讨论。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在美国国会官网数据库以“uyghur”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到涉疆法案 82 条。在诸多法案中,“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已经美国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以“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为例,该法案颠倒黑白,将中国政府援助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歪曲为“侵犯人权”。法案第四条“国会建议”部分,涉及对象包括美国总统、国务卿、亚洲自由电台、联邦调查局、美国在华企业与个人。其鼓动美国总统“谴责”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要求中国关闭所谓“拘留营”;美国国务卿应依据《宗教自由法》联合美国盟国和多边机构谴责中国;亚洲自由广播电台应加强人权与政治权利方面的报道,助力维吾尔语的传播;联邦调查局和相关执法机构,应追究中国官员“骚扰威胁”维吾尔族人及美国公民的行为;在新疆销售商品和服务的美国公司及个人,需声明没有实施协助中方侵犯人权强制劳动的行为。该法案第五条修订美国《外交关系授权法》,宣称要将美国对华政策与新疆形势“关联”。第六条至第十条主要是“制裁”措施,包括限制相关商品流入、取消签证、限制相关人员入境、封锁资产等^[11]。2021 年 3 月 22 日,美国联合加拿大、英国等盟友基于谣言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12 月 23 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经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成法,该法案要求禁止进口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生产的棉花、番茄等商品,进口商需提供一系列证据证明所涉商品并非“强迫劳动”生产所得^[12]。美国限制打压我国棉纺企业,制裁新疆棉花及其棉纺企业,究其本质是攻击我国纺织产业链,企图达到重构全球棉花供应链、价值链的目的^[13]。

2. 支持新疆分裂势力

美国政府对新疆分裂的支持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的资本扶持,也有舆论的引导与造势。

首先,美国借部分非政府组织之手,直接资助“东突”恐怖势力。必须指出,某些非政府组织披上中立非官方组织伪装,实际上是服务于美国对外战略的“白手套”。美国民主基金会于 1983 年

成立，成立之初的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对苏联隐蔽战线。它依赖国会和白宫的资金支持，通过各种形式对外输出美国价值观，实施颠覆渗透破坏活动，是“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阿拉伯之春”、非法“占中”等事件的幕后黑手。依据该基金会官网公开信息，该组织2020年对包括“世维会”在内的7个“东突”组织资助1 246 998美元^[14]。通过分析美国民主基金会历年资助情况可以发现，2016—2019年，它资助涉及中国的项目共228个，资助总金额达29 240 779美元，大多与涉疆、涉藏、涉港和所谓维护人权、输出民主意识等内容相关。

其次，美国为“东突”分裂主义提供舆论支持。2019年6月，佩洛西在美国国会大厦向“世维会”头目多里坤·艾沙颁发“民主贡献奖”。2020年10月，蓬佩奥妄称没有证据表明“东伊运”持续存在，将其从恐怖组织名单除名。詹姆斯顿基金会官网设“中国简报”栏目，长期发布报告批判中国人权状况的虚假消息。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人权观察”等组织联合“世维会”多次宣称中国存在“人权侵犯”。CNN、BBC等西方媒体则采用“编剧式”策划采访、“阴间滤镜式”拼接剪辑等伎俩，大肆传播涉疆虚假新闻^[15]。“自由亚洲电台”下设“解读新疆”“聚焦维吾尔”等专栏，不间断推送涉疆虚假信息。2022年7月29日，“自由亚洲电台”在“专栏”解读中，引用郑国恩、“世维会”成员拉希玛·马赫穆提、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莱博尔德等人虚假论断，对我国治疆政策进行诋毁歪曲。

（三）促动式框架：炒作涉疆人权议题

在诊断式框架和预后式框架解决了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办之后，美国还试图额外提供一个促动式框架以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其中，媒体角色至关重要。媒体报道是社会运动传播其思想主张的重要渠道，对公众认知、大众支持度和运动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6]。美国不断编造、渲染、蛊惑的行为，很容易导致西方社会大众真伪莫辨、上当受骗。

首先，从媒体角度而言，在后真相时代，情感价值的影响力远高于事实真相，“弱信息、强情绪”成为突出特征，一些媒体倾向于通过争议性报道获取热度。当前，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仍然占据全球媒体主导权，拥有设置议程的能力和条件^[17]。以CNN为首的美国媒体报道内容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不断强化对华舆论包围圈。美国网络公司基本控制全球信息传播生态系统，无论Chorm、Safari等浏览器，还是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用户量均稳居世界前列。以YouTube平台所谓新疆“拘留营”报道为例，截至2022年8月5日，CNN上传的一篇名为“中国阻碍CNN记者进入集中营采访”的所谓报道，观看次数就有75万次，获得点赞1.7万次、评论6 995条；NBC NEWS上传的“泄露文件表明穆斯林拘留营内部令人毛骨悚然”所谓报道，观看次数达74万次，获得点赞1万次、评论3 178条；BBC上传一则名为“走进中国新疆思想转化营”的所谓报道，观看次数341万次，获得点赞6.6万次、评论35 165条。这些报道的评论内容多表达对中国的无端批判和对所谓“被拘留者”的同情。由此可见，一些西方媒体的选择性、误导性报道对涉疆议题炒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从受众角度而言，不少美国民众对新疆情况知之甚少，而所谓“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耸人听闻的报道直接冲击其情感，导致他们跟风附和、落入政客们预先挖好的陷阱。情绪性谣言折射了事件中群体的社会心理，成为人们情绪宣泄、互动和极化的重要推手。情绪性谣言的目的是

情感动员和价值动员，公众的情绪以谣言为媒介得到发泄，难以通过认知纠偏予以消除^[18]。当前，美国国内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种族对立严重，凡是涉及种族的话题均可能在美国社会引发大量热度。在此背景下，美国媒体抓住新疆地区多民族特点，利用“民族”“种族”符号大肆传播虚假信息。对于此类新闻，多数美国受众不会深挖信息来源是否可靠，而是仅仅关注新闻中的敏感字眼，在极短时间内形成负向情绪。美国一些媒体的“流量至上”思维助长了美国政府对涉疆议题的炒作。

（四）框架扩散与主框架：开展对华意识形态渗透

框架扩散是指同一时期多个运动框架互相合作和影响，进而形成一个共享的主框架。主框架为社会运动提供超越运动周期的“解读戏码”，即创造一套解读类似社会问题的模板，后续的社会运动可沿用模板高效构建框架。美国长期介入涉疆、涉港、涉藏、涉台问题，把对应的各个“议题框架”进行恶意拼接，最终构成对华意识形态渗透的主框架。当前，拜登政府将对华竞争归为不同政体间的较量，具有浓重意识形态底色^[19]。2021年3月3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声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构成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20]。2020年5月，《美国对华战略》声称“价值观挑战”“经济挑战”“安全挑战”是美国面临的三大挑战，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意识形态之争^[21]。在对华意识形态渗透主框架之下，美国蓄意推动涉港、涉藏、涉台议题与涉疆议题相融合，如出台“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2019年台北法案”等涉华法案，均把“人权”“民主”“自由”作为关键词。其最终目的是塑造中国的“他者”印象，制造与所谓“专制中国”的二元对立。

三、美国涉疆议题炒作的中国应对

当前，美国已形成一套严密的涉疆议题框架建构逻辑。对于不同框架建构的特点，我国需进行针对性的“反框构”回击，具体包括两方面，即采取“框架揭露”和“框架拯救”策略。在内容上，“框架揭露”指戳穿对方框架的漏洞，“框架拯救”指维护和恢复受对方诋毁的框架。

（一）强化外宣工作力度，化解国际负面认知

我国既应坚决反对美国及反华势力以任何形式挑拨中国民族关系、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还需强化国际传播能力、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首先，强化对外宣传，化解美国部分群体对中国政府与人民的刻板印象。宣传工作对维护国家和政府的形象至关重要。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的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22]。我国可通过各种方式多角度、多层面展现真实的新疆，批驳虚假的信息与谎言；还可适时邀请联合国有关机构与对华友好团体、人士访问新疆，让他们亲眼见到新疆的和平安宁、民族团结与社会进步。其次，充分利用好网络媒体，积极传播正能量。要用好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渠道，加强国际传播专业人才培养，尽快培育一批精通国际传播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媒体从业人员^[23]。要利用好微信海外版、抖音海外版等社交媒体软件传播中国声音，化解国际社会对涉疆问题的负面认知。第三，积极开展国际反分裂斗争领域的合作交流。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中指出：“安全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必须摒弃唯我独尊、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等狭隘思维。各方应该坚定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兼顾他国安全，努力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安全之路。”^[24]第四，要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广泛合作的基础上争取对华友好国家的支持，挤压反华势力的生存空间。

（二）揭露美国人权议题炒作的虚伪本质，强化新疆人权话语权建设

拜登政府的人权政策在美国国内重点迎合年轻人、女性、少数族裔等选民主体的政治诉求，在国外则将其作为维护美国霸权利益和开展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25]，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与伪善性。中国政府是促进人权发展、切实保护人权的真正践行者。中国特色人权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导向，将人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置于首位，注重改善民生，是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的有机结合，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26]。中国人权事业成绩斐然，具有建设人权话语权的现实基础。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22]一方面，要在叙事内容层面加强自身设定，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人民生存权发展权得到极大保障的新疆故事^[3]。另一方面，要对美国涉疆叙事框架进行拆解，揭露部分所谓学者、媒体、官员的谎言，揭示非政府组织与美国政府部门的实际关系，并对美国自身人权侵犯的情形进行揭露，使美国涉疆叙事框架失去合理性。在投射手段方面，除政府直接组织参与公共外交活动外，大众传媒、学者等也应加强相关方面的报道与研究，回击美国涉疆谎言。

（三）深入推进新疆去极端化工作，落实文化润疆工程

当前，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连续多年没有发生暴恐案件，社会长治久安，各民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但是，新疆维稳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尖锐性的特征，是一场反对美国与其他反华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斗争。必须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将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有机结合。我国既要严厉打击少数严重暴力恐怖犯罪，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也要开展源头治理，强化公民认同感。首先，继续保持反恐与去极端化高压态势，深挖幕后黑手，打击暴恐犯罪活动。要完善“访惠聚”工作机制，夯实基层组织，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精准到人”的去极端化格局。其次，强化宣传思想工作，揭露极端主义本质，教育信教群众辨明真伪，自觉抵制与举报非法宗教活动。最后，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疆时再次指出：“要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疆。”^[1]文化润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作，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在心理层面强化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自觉抵制美国反华势力与“三股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

（四）加强对美国战略目的研判，挫败美国“以疆制华”图谋

当前，拜登政府依托“印太战略”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军事经贸合作，试图与盟国找寻共同

利益出发点,加剧中国周边安全不确定性。美国持续介入涉台、涉港、涉藏、涉疆等中国事务,制造反华包围圈,以阻挠中国发展。新疆是美国对华包围圈的重要一环,必须结合美国“印太战略”研判其“以疆制华”图谋。美国不遗余力从政治、经济、科技方面干涉新疆事务,也是此背景的产物。政治上,美国不断炒作涉台、涉港、涉藏、涉疆问题,宣扬“中国威胁论”,拉拢盟友加强区域控制力。经济上,美国制裁新疆棉花,发动对华贸易战,意在干扰破坏“一带一路”倡议,拉拢更多国家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科技上,美国海关扣留我国出口的光伏组件,制裁新疆光伏企业,为“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节能减排制造阻力。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将更加不择手段。涉疆议题因具有强烈地缘政治属性与意识形态色彩,将不断被炒作与包装。我国要加强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研判,整体把握涉疆议题在美国对华战略主框架中的角色,积极防范,敢于斗争,坚决挫败美国“以疆制华”的任何图谋。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强调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 [N]. 人民日报, 2022-07-16 (1).
-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3] 郭永良. 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对美国炒作涉疆问题的应对 [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 1-8.
- [4] 郑亮. 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 现状分析与应对策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93-101.
- [5] 靳晓哲.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 性质、解构及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106-118.
- [6] 李捷. 美国对华政治极化与涉疆虚假人权叙事 [J]. 当代传播, 2021 (4): 69-72.
- [7] 王松松, 赵雪波. 投射性传播: 西方对华政治传播的心理学分析 [J]. 国际传播, 2022 (1): 18-29.
- [8] 外交部. 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历史事实和现实证据 [EB/OL]. (2022-03-02) [2022-04-03]. 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03/t20220302_10647118.shtml.
- [9] 徐明华, 江可凡. “自我映射”与形象建构: 外交格局调整下民众对国家形象认知的心理形成机制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6): 102-109.
- [10] 吴飞, 刘晶. “像”与“镜”: 中国形象认知差异研究 [J]. 新闻大学, 2014 (2): 1-9.
- [11] 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20 [EB/OL]. (2020-06-17) [2022-08-05].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3744/text?q=%7B%22search%22%3A%5B%22xinjiang%22%2C%22xinjiang%22%5D%7D&r=3&s=3>.
- [12] To ensure that goods made with forced labor in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o not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market, and for other purposes [EB/OL]. (2021-12-23) [2022-07-2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6256/text?q=%7B%22search%22%3A%5B%22xinjiang%22%2C%22xinjiang%22%5D%7D&r=1&s=3>.
- [13] 邓金剑. 美国限制进口新疆棉花: 供应链与产业链之争 [J]. 国际经济合作, 2021 (5): 79-89.
- [14] XINJIANG/EAST TURKESTAN (CHINA) 2020 [EB/OL]. (2021-02-25) [2022-01-24]. <https://www.ned.org/region/asia/xinjiang-east-turkestan-china-2020/>.

- [15] 罗昕, 赵小飞. 西方涉疆虚假新闻的议题框架与舆论操纵——以 BBC 报道为例 [J]. 新闻战线, 2021 (11): 116-118.
- [16]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44.
- [17] 何军. 智能时代国际政治谣言传播趋向及应对研究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1 (11): 16-20.
- [18] 何飞, 杨森. 情绪性谣言传播机制及演化机理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J]. 当代传播, 2022 (1): 90-93.
- [19] 赵明昊.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J]. 和平与发展, 2021 (3): 14-36.
- [20] U. S. MISSION CHINA.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2021-03-03) [2022-08-01].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united-state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 [21] U. S. MISSION CHINA.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2020-05-20) [2022-08-05].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united-state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 [2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N]. 人民日报, 2021-06-02 (1).
- [23] 何海翔. 中国在海外社交媒体的传播力建设困境与路径 [J]. 青年记者, 2021 (24): 65-67.
- [24] 习近平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第 86 届全体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强调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 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N]. 人民日报, 2017-09-27 (1).
- [25] 崔小涛. 拜登政府的人权政策: 动向、特点与困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3): 99-108.
- [26] 杨安琪. “人民中心论”人权观为当代国际人权事业发展树立新坐标 [J]. 焦作大学学报, 2022 (1): 1-10.

责任编辑: 刘涪菡



基于框架理论的新时代涉疆 对外传播路径优化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相关报道为例

吐尔孙·艾拜

（新疆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涉疆对外传播事关我国国际形象和声誉，事关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安全利益，在新时代开展好涉疆对外传播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框架理论为工具，对沙特《阿拉伯新闻报》涉疆报道趋势、议题、稿源和引用信源进行统计，并分析国际涉疆舆论特征、涉疆对外传播现状和挑战。研究发现，通过形成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和各类团体联动机制，以及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信息发布方式，我国在涉疆议题的主导权方面不断提升。但是，涉疆对外传播仍面临以“舆论战”为手段的国际政治博弈，西方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智库共同操控涉疆舆情，存在涉疆议题外交化、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重叠趋势，以及“泛政治化”现象。做好新时代涉疆对外传播要突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做好历史文化和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呈现中华文化在新疆源远流长的历史，并将伊斯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传播重点，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提升涉疆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涉疆对外传播；沙特《阿拉伯新闻报》；框架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5-0136-11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2.05.012

作者简介：吐尔孙·艾拜，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课题“海外媒体涉疆报道研究”（A200701）

引用格式：吐尔孙·艾拜. 基于框架理论的新时代涉疆对外传播路径优化研究——以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相关报道为例[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5）: 136-146.

2022年7月12日至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新疆时指出:“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开展涉疆对外宣传,完善‘请进来’工作,讲好中国新疆故事。”^[1]近年来,涉疆对外传播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权威性持续提升,党政部门和普通群众均参与涉疆对外传播过程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国际舆论场上,西方政府、媒体、智库和各类组织联手炮制系列话题进行肆意炒作,污蔑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形成舆论围堵,企图损害我国国际形象。一些国家甚至通过所谓“人权法案”“决议”“动议”,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给我国和世界经济造成损失。因此,讲好中国新疆故事既是一个富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更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维护我国核心利益和国际形象。讲好新疆故事需要国家、社会、个人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更需要认真分析国外媒体涉疆报道策略、叙事框架、话语特征以及我国涉疆对外传播现状,进而采取具体措施。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涉疆对外传播现状和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了探讨。马嫔认为:“多元传播主体为共‘话’新疆营造氛围,多样化信息为全面塑造新疆创造可能,多维呈现形式为立体展现新疆创造条件,智能推送为新疆信息的有效传播提供支撑。”^[2]有的研究认为,涉疆对外传播存在新技术应用和观念落后、把关意识淡薄的问题。周丽和聂丹认为,目前涉疆对外传播存在“视觉符号同质化、内容、形式缺乏创新”问题,并提出要“寻找受众共同关注点,引起情感共鸣,赋予新疆现代化特征,提升专业化运作水平”^[3]。张雪和郑肃提出,涉疆对外传播要采取“‘目标化传播’与‘定制化传播’相结合,以‘碎片化传播策略’应对海外社交媒体新格局,主动进行议程设置,注重解决‘新闻事实赤字’问题,关注西方偏见报道的深层原因”^[4]。刘东莱分析新疆媒体对外传播功能时认为,新疆媒体“在对外传播中要立足于自身文化特色,展现新疆本土化特征”^[5]。史玉江提出,在涉及新疆民族宗教议题时,部分疆内外媒体“自我设置‘敏感’而减少报道”^[6]。

在探讨如何讲好新疆故事时,贺鸽认为:“新疆发展取得的巨大成绩为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要结合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明确讲好新疆故事的主题、核心要义、内容和策略。”^[7]张建军等从讲述主体、故事内容和传播体系三个维度分析讲好新疆故事的路径,并提出“媒体要转变话语形态,创新传播策略,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线上线下结合,拓展新疆故事传播渠道”^[8]。俞水香认为,疆内外群众较为关注新疆故事,因此要采取平民视角,提升新疆故事的影响力和传播力^[9]。

此外,部分学者研究国内外媒体涉疆报道及其建构的新疆形象。其中,对国内媒体的研究以《人民网》《凤凰周刊》《中国青年报》《新疆日报》为主要对象。在研究方法上,这些文献选取相关媒体在特定时期的涉疆报道,并对其进行文本和内容分析。研究内容涉及媒体的话语策略、树立的新疆形象、涉疆对外传播现状、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对策建议。比如,孔璇和肖涛认为:“《人民网》对新疆的相关报道从新疆实际出发,但报道涉及领域不均衡,部分媒介形象与实际新疆形象存在偏差。”^[10]李书贞对《人民日报》2016年的涉疆报道进行分析并提出:“《人民日报》在对新疆进行报道时,全方位展示了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及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多维形象”,但存在“经济和科教文体类报道居多,政治、社会新闻和生态环境类报道较少,这影响到受众从整

体上了解新疆，因而所构建的新疆形象是不立体的”^[11]。迪娜·巴哈提对《凤凰周刊》涉疆报道进行分析时提出：《凤凰周刊》“通过对处于社会大环境下的新疆‘小人物’的个体命运进行忠实记录，同时用充满历史感的宏大叙事从国际化、专业化的海外视角对新疆议题进行全局化的关照方式，力争为其发声。”^[12]

研究国外媒体涉疆报道及建构的新疆形象时，国内学者更多关注英美国家的媒体，研究视角较为集中于这些媒体报道的扭曲及产生的因素。研究方法和内容沿用文本和内容分析法为主，对上述媒体特定时期的涉疆报道议题、数量、关键词和政治偏向进行分析。林冬梅、李智涛对英美主流媒体涉疆报道进行分析时认为：“英美主流媒体对新疆已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并具有强烈的偏见性，常在报道中将新疆置于对中国歪曲的框架中。”^[13]有的研究在对《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涉疆报道的比较分析中提出：“《纽约时报》涉疆报道的议题主要集中于政治和经济两类议题。在经济类议题上，该报以中立态度为主，报道相对客观公正。然而，在政治类议题上，却存在比较严重的主观和偏见。”^[14]

此外，随着国际社会对新疆事务的关注度增加，部分外国学者和媒体从业者着手研究国外媒体建构的新疆形象。他们的研究成果以论文集和研究报告的形式出版发行。目前，搜集到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美国《灰色地带》网站发布的系列调查报告，维也纳学术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它们围绕美西方媒体炮制的所谓“强迫劳动”“强制绝育”“少数民族人权”“种族灭绝”等谣言，对西方媒体涉疆报道的信息和资金来源、选题倾向和报道策略、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阴谋进行揭露。

总体来看，学者对涉疆对外传播的研究分为三类，即对实践经验和对外传播工作现状的总结，对国内媒体涉疆报道及其建构的新疆形象的分析，对英美国家媒体涉疆报道的框架和话语分析。关于涉疆对外传播的研究存在研究时间较为久远，对国内外媒体涉疆报道最新趋势和对外传播最新态势缺乏归纳总结，对英美以外国家和地区媒体关注较少的情况。研究提出的对策建议难以适应新时代涉疆对外传播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当下，涉疆对外传播面临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反华势力的舆论攻击相对集中并出现连续性，需要我国系统性的分析和应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与中亚、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更为密切，新疆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域起到桥梁纽带作用。研究和做好涉疆对外传播尤其是面向上述地区的传播，事关沿线国家和地区社会各界对我国的正确认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事关维护我国政治经济利益。因此，本文以沙特主流媒体《阿拉伯新闻报》的涉疆报道为例，分析国际涉疆舆论现状，探索做好新时代涉疆对外传播路径。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框架”的概念由人类学家贝特森提出。他认为“框架”是一种解释规则，即发送者向接收者提供如何理解符号的方法，框架是传播活动得以开展的前提，属于“元传播”层面的信息。戈夫曼将这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并提出“框架”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和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和归纳众多信息。20 世纪 80 年代，框架理论引进到新闻与传播学领域并出现“媒介框架”和“新闻

框架”的概念。媒介框架是媒介机构信息处理的组织框架，新闻框架是新闻的选择、加工、新闻文本和意义的建构过程。框架理论认为，新闻媒体的立场、编辑方针以及与新闻事件的利益关系均影响媒体的新闻选择，以及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基本态度和本质判断。媒体通过关键词或具有特定意义的图像符号形成对新闻事件意义的建构。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定性和建构的主导框架将会影响受众认识、理解新闻事件以及对新闻事件的反映。可见，框架理论关注媒体话语的意义建构，为观察媒体话语运作提供切入视角和分析工具。

本文以框架理论为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阿拉伯新闻报》涉疆报道进行梳理，并通过对报道内容的研读，按照媒体涉疆报道新闻框架和话语框架，对其议题、体裁、倾向、稿源和引用信源进行编码。《阿拉伯新闻报》（Arab News）创刊于1975年4月，总部设在利雅得，是面向社会精英群体并在沙特和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其涉疆报道将影响当地受众对涉疆议题的认知和价值偏向。为此，本文对该报从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1日的涉疆报道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在数据库中以“新疆”为关键词查询，搜集到的文章共有382篇，排除重复项和无效新闻后，得到样本数共计188篇。同时，另有61篇报道在涉及国际和地区事务、我国其他领域时提及新疆议题。本文将《阿拉伯新闻报》涉疆报道的框架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即对报道议题的定性、归因和语言符号的使用。它们分别体现在涉疆报道标题和引语、文本中的描述和观点以及言词的选用层面。

三、涉疆对外传播现状及成就

媒体获取信息的途径和范围影响其新闻框架的建构。党政部门作为涉疆信息的主要来源，其提供的信息和话语框架较易成为国内外媒体新闻框架的组成因素，从而影响国内外受众对涉疆议题的认知框架。近年来，党中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对外信息发布，推动官方叙事框架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可接受性。同时，我国不断完善涉疆对外传播工作机制、丰富传播形式，促进外界更好地了解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取得显著成果。

其一，涉疆对外传播在国家全局事务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020年9月，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理直气壮宣传新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势、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15]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时再次指出：“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开展涉疆对外宣传，完善‘请进来’工作，讲好中国新疆故事。”^[1]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涉疆对外传播的重视，涉疆对外传播在国家整体对外传播战略中的地位日趋提升。外交部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北京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参会澄清事实，帮助外界全面了解中国新疆。在中央新闻宣传单位的支持下，新疆实施了应急广播体系、广播电视户户通等一系列工程，有力促进了涉疆对外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和广电事业发展。

其二，围绕重大议题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和加强议程设置。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以所谓“民族矛盾”为涉疆报道主要叙事框架。2017年以来，西方媒体和一些国家的政府以所谓“侵犯人权和民族压迫”，甚至骇人听闻的所谓“种族灭绝”谎言作为主要叙事框架，频频攻击我国政府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对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连续发布《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新疆的人口发展》《新

疆各民族平等权利的保障》等系列白皮书，以历史事实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主要叙事框架，有理有据地批驳反华势力的不实言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 CGTN 全网发布 4 部专题纪录片，通过 30 余位恐怖袭击案件幸存者和目击者的故事，揭示新疆暴恐案件的实质。其中，《中国新疆，反恐前沿》全球阅读量超 10 亿次，视频播放 1.43 亿次。《巍巍天山——中国新疆反恐记忆》全球视频观看量超 5 亿次，《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全球观看量达 1.8 亿次^[16]。

其三，形成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和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联动机制。近年来，各级各地党政部门和团体进一步完善涉疆信息发布组织框架，形成合力，有效提升涉疆官方话语框架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外事工作部门，以及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等学术机构和人民团体，以及疆内各类社会组织围绕涉疆议题同时发表声明，共同谴责西方有关政客和媒体的无端指责。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新疆社科院和新疆大学等疆内外有关机构发布系列研究报告，从学术层面批驳反华势力的不实言论。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提及新疆议题的共有 116 场；我国驻外使节围绕涉疆议题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20 次，发表文章 23 篇，参加研讨会 5 次。这些举措起到了澄清事实、对冲西方舆论攻势的作用。

其四，线上线下新闻发布相结合，传播覆盖面逐步扩大。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提供权威信息是传递对外形象，使我国政府涉疆话语框架成为国内外媒体新闻框架的有效途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采取线上线下新闻发布会相结合的方式，及时提供权威信息，有关领导亲自到场解答记者提问，塑造公开透明的新疆形象。我国有关地区和部门还在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召开“新疆是个好地方”视频交流会。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7 月，新疆召开 77 场专题新闻发布会，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

其五，新疆地方媒体的综合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日益提升。以前，疆内报刊种类较多，实力较为分散。2021 年 11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将新疆经济报社、今日新疆杂志社、天山网并入新疆日报社，组建“一报一网一刊”，成立新疆报业传媒集团，有效提升党报党刊的传播力。新疆广播电视台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设立办事处并加强与上述国家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友邻》和《大陆桥》杂志推行本土化运营并扩大发行量。新疆地方媒体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在影响和建构周边国家受众对新疆的认知方面发挥较大作用。

四、国际涉疆舆论特征和涉疆对外传播面临的挑战

我国涉疆对外传播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不可忽视国际涉疆舆论新走向和面临的新挑战。在这里，笔者将结合框架理论对《阿拉伯新闻报》的涉疆报道进行梳理，分析我国涉疆对外传播面临的挑战。

其一，涉疆对外传播面临以“舆论战”为手段的国际政治博弈。事件的新奇性和重要性是媒体报道新闻事实的重要参考标准。2017 年以来，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没有发生暴恐事件。如果按照这一新闻规律，国外媒体对新疆议题的关注应有所下降，但事实与此相反。2017 年至 2020 年，国外媒体的涉疆报道迅速增长。2016 年《阿拉伯新闻报》的涉疆报道共有 14 篇，2017 年至 2019 年其

涉疆报道呈现连续上升趋势，到 2019 年达 71 篇。2017 年初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进一步完善各项反恐维稳措施，“三股势力”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西方反华势力出于“以疆制华”的战略图谋，不断制造话题抨击党的各项维稳措施，导致国际社会对涉疆议题的关注度升温。在这种背景下，《阿拉伯新闻报》开始转载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从媒介对新闻事件的选择框架分析，就会发现相关西方国家媒体的涉疆报道呈现反常性，与其对所在国家利益的维护紧密相连。受到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并试图借题新疆遏制中国发展的逻辑的影响，相关西方国家媒体报道涉疆议题的动机和立场即组织框架和新闻框架转为服务所在国家的对华政策，并影响发展中国家媒体。

表 1 《阿拉伯新闻报》2016—2021 年涉疆报道总体情况

年/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16 年	3	1	1	0	0	1	0	0	1	2	3	2
2017 年	7	0	0	2	0	1	2	1	1	3	2	4
2018 年	4	4	4	2	3	3	3	0	5	3	3	2
2019 年	5	6	5	5	6	6	10	5	5	8	7	5
2020 年	0	1	0	0	3	3	8	1	6	1	1	4
2021 年	4	7	3	2	2	2						

其二，媒体的议题选择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偏向性。媒体以其价值判断和新闻原则选择新闻议题，并影响受众对新闻事件和报道对象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报道议题的选择统领着新闻框架的建构和报道对象形象的塑造。笔者将《阿拉伯新闻报》的涉疆报道议题分为时政、宗教、文旅、自然灾害和其他五类，发现涉及时政议题的共有 158 篇，占总报道量的 84%，宗教议题共有 18 篇，占 9.6%。时政报道集中围绕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反恐维稳具体措施和人权保障话题，例如职业技能培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寄宿制学校等。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和人权保障理念存在差异，保护信教群众合法权益和正常宗教活动的措施各异，相关国外媒体偏向性地选择时政和宗教议题，不利于全面呈现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全貌。这种偏向性新闻框架的选择与强化，在受众心中建构单维度、高度政治化的负面新疆形象，所谓“民族冲突和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压制”反倒成为主导新闻框架。

表 2 《阿拉伯新闻报》涉疆报道议题分析

议题	时政	宗教	文旅	疫情和自然灾害	其他
数量（篇）	158	18	0	6	6
比例（%）	84	9.6	0	3.2	3.2

其三，西方媒体操控国际涉疆舆论。新闻稿来源体现媒体的政治和传播影响力，以及国际信息流通趋势。笔者对《阿拉伯新闻报》涉疆报道的新闻稿来源进行统计发现：其原创新闻只有 30 篇，

其中 21 篇为各国学者和研究人员的投稿；转载稿占总稿量的 84%，其中英法媒体稿件占 61.1%。可见，其涉疆报道和沙特社会各界对涉疆议题的认知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媒体，西方媒体实际上影响着当地涉疆舆论走向。

表 3 《阿拉伯新闻报》涉疆报道新闻稿来源

来源	阿拉伯新闻报	法新社	路透社	美联社	中国日报
数量（篇）	30	64	51	42	1
比例（%）	16	34	27.1	22.3	0.5

由于历史上英法两国殖民过阿拉伯半岛部分区域，并与其存在地理上的亲近性，“它们的媒体在中东地区已经得到了成熟的发展，对本土媒体也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17]。《阿拉伯新闻报》倾向于转载上述西方媒体的稿件。同时，虽然沙特本身面临着美国媒体的舆论压力和攻击，但可能处于新闻平衡的原因也大量转载美国媒体的报道。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媒体经济实力较弱，且大多数媒体在华未设记者站，缺乏在新闻现场搜集素材的能力，对涉疆议题的认知依赖于西方媒体，导致西方媒体成为国际涉疆信息的重要来源。此外，其所转载的西方媒体新闻稿件在标题中往往使用负面词汇表达立场。《阿拉伯新闻报》涉疆报道中标题使用“镇压”“监视”“迫害”“虐待”等负面词汇的共有 86 篇。在报道选题时，媒体和记者对报道议题本就持有负面倾向的共有 128 篇，新闻内容存在明显偏向性的报道共有 126 篇，且均为西方媒体的转载稿。在此背景下，西方媒体对涉疆信息的处理准则和原则以及价值判断和立场，成为发展中国家媒体涉疆报道的总体框架。西方媒体塑造的新疆形象成为发展中国家受众对新疆的基本印象。通过对新闻标题、文本呈现的话语框架和归因进行分析发现，西方媒体采取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建构所谓“少数民族人权和文化受到压制”的新疆形象，其新闻框架既违背基本事实，又违背新闻客观性原则。

表 4 《阿拉伯新闻报》涉疆报道倾向和新闻稿来源（篇）

来源	阿拉伯新闻报	法新社	路透社	美联社	合计
新闻标题含有负面倾向	14	32	19	21	86
记者对报道议题持有负面倾向	21	43	32	32	128
新闻内容含有明显偏向性	21	44	31	30	126

其四，西方各类非政府组织和智库成为媒体主要的引用信源。对引用信源的统计显示，《阿拉伯新闻报》在 188 篇报道中，共引用 397 个信源。其中来自我国的国内信源占 30%，国外信源占 70%。在国外信源中，政府官员、研究机构和学者占比最大。在国内引用信源中，外交人员占 40.3%，其次是政府官员和大陆媒体各占 18.5%。鉴于其 83.5% 的涉疆报道是西方媒体的转载稿，西方信源占多数在意料之中。这表明，在外国媒体涉疆报道中，西方信源尤其是学者、政府官员和各类组织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涉疆信息的重要叙事者和新疆形象的建构者之一。同时，笔者发现新闻

稿引用外国学者、人权和非政府组织、“东突”组织信源越多，报道的负面倾向越高。引用是媒体表达观念和立场的重要手段，但只有客观、全面的引用才有助于实现新闻客观性和平衡性。在新闻报道中，引用何方观点和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影响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西方媒体在原有的媒介框架和新闻框架下，倾向性地选择引用对象，将其观念隐藏在引用背后，营造看似客观公正和权威的叙事框架。

表 5 《阿拉伯新闻报》涉疆报道引用信源统计（%）

国外引用信源	政府官员	学者	媒体	国际组织	人权组织	非政府组织	其他	“东突”组织
	27.7	18	6.5	6.8	10.4	3.2	16.6	10.8
国内引用信源	政府官员	学者	媒体	外交人员	白皮书	匿名	其他	
	18.5	1.7	19.3	40.3	2.5	0.8	16.8	

其五，媒体的报道立场与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相对一致性。研究发现，《阿拉伯新闻报》报道中国新疆时，采取两种相对不同的叙事框架。在建构较为负面的新疆形象的同时，将我国描述为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经济迅速发展的负责任大国。这与中沙关系较为紧密有关。2016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建立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9 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华，中沙两国签署了文化、科教、能源方面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投资意向高达 570 亿美元。双方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及其与沙特“2030 愿景”对接，充实双边关系战略内涵，造福两国人民。此外，我国尊重和支持沙特作为地区大国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和发挥作用，肯定沙特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和措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始终站在和平、公理和正义一边，就促进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持久、公正解决提出倡议并得到阿拉伯国家的认可。我国通过中阿合作论坛等多种形式不断深化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加。

在此背景下，《阿拉伯新闻报》在报道涉疆议题时对我国推动中东和平发展的努力予以肯定。统计显示，另有 61 篇报道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涉及我国其他领域的新闻中提及新疆议题，其中相当部分报道对我国持肯定态度。例如，该报在谈到叙利亚和阿富汗局势时认为：“无论是在资金还是硬件建设方面，中国可能成为重建叙利亚的重要贡献者。”^[18]该报指出：“中国现在已采取积极的地区外交方式，与巴基斯坦合作，促进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的和平与和解。中国处于独特的地位，不仅可以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可以在阿富汗的和平与和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19]2018 年 11 月 3 日，该报刊发的报道引用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的发言称：“2013 年的中巴经济走廊只是一个想法，现在它已成事实，并引起了巴基斯坦人民的想象。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国家进步和吸引投资的大好机会。这给了我们一个提高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机会。”^[20]2019 年 4 月 25 日刊发的报道再次引用伊姆兰·汗的发言称：“互联互通一直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而中巴经济走廊使其在 21 世纪具有现代形态。”^[21]

其六，存在涉疆议题外交化、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重叠以及“泛政治化”现象。近年来，一些国家在各类国际场合和事务中逐渐增加涉疆议题，甚至将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事件刻意与中国新疆联系起来。涉疆议题不仅成为对外传播工作的一部分，同时逐渐成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呈现涉疆对内外传播重叠趋势。国外媒体往往也引述疆内媒体和政府网站的信息,将其作为引证材料。一些组织通过疆内网络平台搜集信息并对其进行歪曲。此外,国外一些媒体存在对体育、自然灾害和社会事务进行负面解读的“泛政治化”现象。例如,2020 年 3 月 3 日刊发的专家来稿《罗兴亚种族灭绝案是全球人权的分水岭》一文,在谈论缅甸罗兴亚人问题时,刻意提及新疆议题和所谓“种族灭绝”论调。又例如,2020 年 2 月 12 日转载的法新社文章《流亡的维吾尔族人担心冠状病毒在中国营地传播》一文,将新冠肺炎疫情与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联系起来,对我国进行攻击。西方媒体通过这种新闻炒作方式试图引起国际社会对所谓“新疆问题”的关注,达到抹黑我国国际形象的目的。

五、优化新时代涉疆对外传播的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媒体采取稳定团结的叙事框架,将新疆描述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援疆省市的支持下迅速发展的区域,但呈现的新疆形象相对仍单一,原有的新闻叙事框架难以适应新时代涉疆对外传播需要。涉疆对外传播要注重呈现各民族生活生产场景和面孔,做好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进一步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扩大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并将伊斯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传播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外传播,同时注重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

其一,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涉疆对外传播始终。从古至今,新疆是多民族多文化并存的地区,他们共同守护和开发祖国的边疆。涉疆对外传播要转变新闻叙事框架,注重突出各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贡献,呈现各民族生活生产场景和面孔,传达各民族的声音。要强化“中华民族”概念,凸显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走向共同富裕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局面,引导海内外受众正确全面了解新疆。

其二,做好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宣传,用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通过呈现中华文化在新疆源远流长的历史,让受众意识到新疆始终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在新疆有着长远深厚的基础。建党初期,毛泽民、俞秀松等一批共产党人来到新疆并在天山南北传播马列主义。因此,要注重挖掘红色资源,用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各族群众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关怀。此外,屯垦戍边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历史上开拓和治理边疆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兵团是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发扬传承,在新疆经济社会发挥巨大作用并已成为“安边固疆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大熔炉,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示范区”^[22]。因此,要注重传播兵团在新疆稳定发展改革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屯垦戍边艰难的创业过程和出现的先进典型人物,推动外界更好更全面地了解兵团。

其三,进一步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邀请各国政要、驻华使节、华侨华人和学者到疆访问,推动各国各界亲身体验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但是,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请进来、走出去”工作力度和覆盖面仍较低。长期以来,新疆对外交流以文艺为主要形式,在展示新疆多民族风采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但在有理有据地阐释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方面仍存在短板。因此,要加大力度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出访并围绕涉疆议题进行学术对话,全面正确阐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其四，实施定制传播。由于所处环境、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利益不同，各国受众对涉疆议题的关注有所区别。欧美国家出于“以疆制华”的战略图谋关注政治和人权议题，伊斯兰国家从宗教情感和“一带一路”倡议经济效应的角度关注新疆议题，土耳其和中亚国家出于“泛突厥主义”或跨国民族情感关注新疆议题。因此，应深入分析各地受众关注新疆议题的特点，提高对外传播的针对性。要从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改善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等层面，面向不同国家和群体开展针对性的涉疆对外传播。

其五，将伊斯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外传播的重点。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治疆政策的偏见难以尽快转变的情况下，可将伊斯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外传播的重点方向。目前，我国各大媒体均开通英文和阿拉伯文平台，“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阿拉伯国家日益关注中国媒体，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中国媒体对外宣传的机遇”^[23]。我国可以通过合作共办电视栏目、开通专栏等多种形式，借助阿拉伯媒体平台讲新疆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此外，当下更多的阿拉伯学者着手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中东掀起了“中国热”，其中相当部分学者对我国持友好态度，我国应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互动。

其六，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国外生活着相当规模的华人华侨，其中少数民族华人华侨占一定比例。他们长期生活在海外，熟练掌握当地语言文化，社会融入程度较高，甚至部分华侨华人在当地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工作，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了解我国包括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愿望，但可能缺乏对新疆的实际体验。因此，要发挥他们的桥梁作用，通过定期组织交流、开展寻根活动等形式引导华侨华人了解新疆，进而影响当地的涉疆舆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强调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 [N]. 人民日报, 2022-07-06 (1).
- [2] 马嫻. 新媒体时代新疆形象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J]. 今传媒, 2021 (11): 13-16.
- [3] 周丽, 聂丹. 新疆形象误读的符号学阐释 [J]. 新闻爱好者, 2019 (8): 72-75.
- [4] 张雪, 郑肃. 关于涉疆问题国际传播的创新思考——以 CGTN 新疆反恐纪录片为例 [J]. 国际传播, 2020 (4): 40-46.
- [5] 刘东莱. 新疆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现状及作用探析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0 (10): 240-241.
- [6] 史玉江. 试论“一带一路”舆情下如何讲好“新疆故事” [J]. 国际公关, 2022 (3): 13-16.
- [7] 贺鸽. 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路径探究 [J].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 2021 (4): 9-12.
- [8] 张建军, 赵萌, 孙小忙. 讲好新疆故事的三个维度 [J]. 新闻论坛, 2021 (2): 52-55.
- [9] 俞水香. 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现状调查及实现路径研究 [J]. 新疆社科论坛, 2021 (5): 47-49+56.
- [10] 孔璇, 肖涛. 人民网对新疆形象的建构研究 [J]. 视听, 2019 (9): 204-206.
- [11] 李书贞, 周丽. 《人民日报》报道中的新疆形象分析 [J].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 (3): 28-30.
- [12] 韦路, 迪娜·巴哈提. 《凤凰周刊》中的新疆形象研究 [J]. 新闻界, 2015 (21): 17-24.

- [13] 林冬梅, 李智涛. 英美主流媒体新疆形象报道研究 [J]. 绥化学院学报, 2017 (11): 102-105.
- [14] 方建移, 柳仁丹. 从涉疆报道看《纽约时报》的公正与偏见——兼谈对外传播的使命与受众意识 [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 307-317.
- [15] 习近平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 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N]. 光明日报, 2020-09-26 (1).
- [16] 周子其. 框架理论视域下 CGTN 新疆纪录片对国家形象的建构研究 [D]. 上海: 东华大学, 2022.
- [17] 潜旭明. 中国与中东媒体交流: 现状、问题与对策 [J]. 国际传播, 2018 (1): 29-37.
- [18] 中东的力量平衡继续波动 [N]. 阿拉伯新闻报, 2020-04-05.
- [19] 中国, 巴基斯坦, 阿富汗要求塔利班加入和平进程 [N]. 阿拉伯新闻报, 2017-12-24.
- [20] 着眼于援助, 巴基斯坦总理会见中国总理 [N]. 阿拉伯新闻报, 2018-11-03.
- [21] 巴基斯坦总理敦促中国加强互联互通 [N]. 阿拉伯新闻报, 2019-04-25.
- [22] 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 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疆和兵团激励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奋勇前进 [N]. 兵团日报, 2022-07-18 (1).
- [23] 张岩. 我国对阿拉伯国家宣传策略研究 [J]. 理论界, 2013 (7): 167-169.

责任编辑: 刘沛菡



历史与认同碎片化： 乌克兰国家建设的困境与镜鉴

刘显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北京 100007）

摘 要：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只有 30 年。当今的乌克兰地区曾因地缘政治变化经历了极为复杂和极为矛盾的政治整合进程。实际上，当今的乌克兰历史是彼此很少联系的一些地方历史的总和。复杂的历史进程导致了当今乌克兰复杂的民族、文化、语言特点，而其民族、文化、语言特点的复杂性又导致了乌克兰国家建设的深度困境。乌克兰国家建设的深度困境及复杂成因，对多民族国家建设提供了现实镜鉴：坚持立足国情，不能简单移植既有模式；坚持统筹兼顾，采取“多样一体”思路；坚持稳妥有序，实施科学合理的国家语言政策。多民族国家推进现代国家建设，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朝着塑造共同历史与整体认同的方向深入。

关键词：国家建设；国家认同；乌克兰；俄罗斯；政治整合；民族问题；语言政策

中图分类号：D75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5-0147-11

乌克兰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主权国家出现在世界版图上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现在乌克兰的面积为 603 700 平方公里，如果把俄罗斯也视作欧洲国家，那么乌克兰的面积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乌克兰的人口按 2013 年的统计是 4 500 多万。乌克兰是苏联最发达的共和国之一，其境内曾集中了苏联较强的工艺和科技含量大的生产部门，素有“欧洲粮仓”之称。乌克兰从苏联最发达的共和国之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2.05.013

作者简介：刘显忠，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规划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2020ZDGH017）

引用格式：刘显忠. 历史与认同碎片化：乌克兰国家建设的困境与镜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5): 147-157.

一演变到今天，除了受到苏联解体造成的原有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和大国博弈的影响外，也与乌克兰自身现代国家建设效能较低有关。

学界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研究主要从国际政治方向展开。不少研究分析了乌克兰危机产生的国际政治因素。比如，有研究指出，乌克兰危机既是一场在国际权力转移敏感时期发生的多方力量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国际冲突，同时还是 21 世纪以来牵动全球秩序重构、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重塑的重大事件^[1]。还有研究指出，新一轮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与发展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乌克兰内外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质上是俄罗斯与美国主导的西方围绕乌克兰争夺战而展开的一场战略博弈^[2]。少部分研究关注了乌克兰的内部治理状况。比如，有研究认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激进民主思潮是乌克兰内外交困的两大主因^[3]。还有研究认为，寡头政治是导致乌克兰国家形态从勾结型发展到俘获型，最终到达“失败国家”边缘的关键因素^[4]。

相关研究为理解乌克兰问题提供了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视角。笔者认为，乌克兰问题还应从历史视角加强梳理，分析复杂历史因素对乌克兰现代国家建设的深刻影响，探讨其对多民族国家有效推进国家建设的现实镜鉴。

一、地缘政治复杂演进：乌克兰国家建设低效的历史因素

当今的乌克兰地区因地缘政治变化而经历了极为复杂和极为矛盾的政治整合进程。实际上，当今的乌克兰历史是彼此很少联系的一些地方历史的总和，是受不同民族影响的接合部和交汇点地区的历史。有学者指出：“现今乌克兰的版图是东西边界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东西边界在不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带有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特点的西乌克兰、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三个地缘政治板块。西乌克兰在西欧地缘政治空间存在的历史期限共 700 年，东、南乌克兰在俄国地缘政治空间存在的历史期限是 300 年和 200 年。黑海沿岸地区在地中海空间存在了 2 000 多年。丧失一个外部方面就会导致国家多维联系空间的破坏。乌克兰是个交界处的国家，这不仅在其国名上有反映，而且也反映在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地位上，反映在西欧、斯拉夫和伊斯兰文明的超级民族交界线上。”^[5]乌克兰地区历史演进的复杂性滋生了历史和认同碎片化趋向。

基辅罗斯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共同源头。“基辅罗斯”是 19 世纪学者们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以表示 9 到 13 世纪以基辅为中心的政治实体。12 世纪基辅大公名存实亡，基辅罗斯历史上统一国家的时代终结，基辅罗斯分裂成许多公国。基辅罗斯的崩溃和蒙古人的到来，催生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也使乌克兰和俄罗斯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乌克兰及俄罗斯都脱胎于基辅罗斯，双方的王朝传承都来自基辅罗斯。当今的俄罗斯是以莫斯科为中心在东北罗斯发展起来的，而乌克兰民族的发源地则是从基辅罗斯分裂出来的加利西亚-沃伦公国。

蒙古人到来后，弗拉基米尔的王公和加利西亚的王公都服从于蒙古的统治。在 14 世纪 40 年代，随着蒙古的衰落及其家族血脉的断绝，加利西亚-沃伦成了波兰和立陶宛争夺的对象。14 世纪立陶宛获得了大部分基辅罗斯的土地，基辅城在 1363 年归入立陶宛统治。波兰于 1349 年占领加利西亚和利沃夫。立陶宛大公国不仅成了基辅罗斯的强大继承者，也成为大部分乌克兰土地的统治者。

1569 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通过卢布林联合建立波兰-立陶宛联邦。立陶宛正式把基辅地

区、切尔尼戈夫地区、波多利耶及其他地区划归波兰。乌克兰地区处于立陶宛统治时，立陶宛被罗斯同化，教会斯拉夫语甚至成了立陶宛大公国官方通用语言。乌克兰成为波兰的一部分后，罗斯文化再也无法与拉丁化影响和波兰语相抗衡。

1648年，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哥萨克反波兰起义对乌克兰的疆域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哥萨克酋长国由于没有能力与强大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对抗，转而寻求盟友。因为拥有共同的信仰，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与沙皇阿列克谢一世于1654年签订《佩列亚斯拉夫条约》，哥萨克酋长国并入沙皇俄国，此后300多年乌克兰的文化逐渐和俄罗斯统一。自《佩列亚斯拉夫条约》签订，俄国与乌克兰开始了纠缠不清的关系。为落实《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俄波斗争又持续了13年。在俄波争夺乌克兰的战争中，乌克兰的哥萨克人不断变换阵营，每次改变阵营都会失去更多的主权。根据1667年俄波签订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只有第聂伯河左岸原基辅省的部分及第聂伯河右岸基辅周围不大的一块地方转归莫斯科；赫梅利尼茨基“国家”的所有其余的右岸部分，近一百年间仍处于波兰的控制之下。

当时，争夺乌克兰的不只是俄国和波兰，还有土耳其。1672年10月，波兰国王在不能对土耳其入侵进行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布恰奇和约》。该条约把右岸乌克兰分成了三个部分：波多利耶（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由土耳其占有；布拉茨拉夫地区（现在的文尼察州的一部分和赫梅利尼茨基州的一部分）和基辅南部地区由土耳其的附庸右岸哥萨克盖特曼多罗申科掌控；右岸乌克兰的其他地区归波兰。

1686年5月6日，为了共同抗击土耳其，俄波两国缔结《永久和约》，不只是东部乌克兰，原先规定退还给波兰的基辅及其毗邻地区也永久归属俄国。波兰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俄国结束同土耳其和克里米亚的和平关系。1699年1月29日，反土同盟与土耳其在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维茨签订《卡尔洛维茨和约》。在该和约框架下，波兰收回了《布恰奇和约》中丧失的土地，其中包括波多利耶和右岸乌克兰的其他部分。

18世纪末，由于内部的政治经济深刻危机和外部新强邻出现，曾为中欧大国的波兰从欧洲政治版图上消失了。波兰的消失影响到西乌克兰的命运。1772年，俄普奥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使乌克兰的加利西亚的大部分，包括利沃夫和波多利耶、沃伦的一部分并入奥地利。1792年，俄普两国对波兰进行瓜分，俄国得到了德鲁亚-平斯克-兹布鲁齐一线以东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以及立陶宛的一部分，即明斯克省、维尔诺省、基辅省、布拉茨拉夫省、波多利耶省、沃伦省的东部和立托夫斯克-布列斯特省的一部分。1795年，俄普奥对波兰进行第三次瓜分，俄国获得了沃伦的西部。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和1686年的俄波《永久和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东乌克兰、基辅市及其毗邻地区、扎波罗热地区归属俄国。而对波兰的三次瓜分，使右岸乌克兰分属两个国家，大部分地区归属俄国，一小部分地区归属奥地利。

不过，当时各方争夺的乌克兰地区并不包括斯洛博达乌克兰、新俄罗斯地区及后来的克里米亚。《佩列亚斯拉夫条约》和后来的俄乌条约都不涉及这些地区。斯洛博达乌克兰是乌克兰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当今乌克兰版图上的哈尔科夫州、苏梅州、顿涅茨克州的一部分（到巴赫穆特卡河）和卢甘斯克州的一部分（到艾达尔河）。斯洛博达乌克兰从17世纪开始就受俄国直接管辖。早在17世纪中期，这里就建起了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团、阿赫特尔卡团、苏梅团和哈尔科夫团，后来又建起

了伊久姆团。这些军团构成别尔哥罗德防线，从南部保卫俄罗斯甚至波兰免遭克里米亚汗国军队的袭击。在沙皇俄国进行省制改革时期，1764 年在斯洛博达乌克兰地区设立了斯洛博达乌克兰省。19 世纪中叶，在进行新的行政区划调整时，哈尔科夫省成为单独的地区。然而，所有这些地区都是按南俄地区的逻辑发展。新俄罗斯地区在历史上是俄罗斯帝国扩张的结果。它主要指并入俄国的黑海北岸地区，这些地区在并入俄国前大部分实际上是无人居住的草原。克里米亚汗国的部队和土耳其苏丹的军队经过这里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进行经常性的袭击。在几次战争之后，这些地区根据 1739 年、1774 年、1791 年和 1812 年与土耳其签订的和约归入俄国。这些地区并入俄国后，新俄罗斯当局开始向新俄罗斯移民，移民来源主要是乌克兰族人及俄罗斯人、希腊人、犹太人和德意志人。克里米亚在 1954 年才划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一战中俄国的失败及十月革命的发生，为乌克兰提供了在废墟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机会。但由于传统的地区均势被打破，乌克兰地区成了各种势力的角逐场所。这个区域里既有乌克兰自身争取独立的活动，也有波兰、德国在该地区的争夺。相关国家都从各自的利益来考虑乌克兰问题。在 1917 至 1920 年这个时期，乌克兰境内总共成立了大约十几个不同的共和国：除了数个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还宣布成立了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国、敖德萨苏维埃共和国、塔夫利达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克里米亚边疆区政府、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加利西亚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也说明，一战后乌克兰的不同地区由于历史因素存在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同态度，但都希望在新实体包括的区域范围内独立。可以说，1917 至 1920 年期间的乌克兰区域是各种不同实体的“大杂烩”，各个实体往往是一些想要掌握政权并宣布自己为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冒险家活动的结果。各方斗争、妥协的结果是，一战前乌克兰地区分属于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两国；一战后乌克兰地区分属于四个国家——苏维埃俄国获得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波兰获得了加利西亚和从前曾属于俄国的沃伦的部分地区，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喀尔巴阡罗斯，罗马尼亚获得了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

1939 至 1945 年间，苏联通过各种途径把境内 45 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地区与分散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不到 15 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区域合到了一起。这时，多个世纪以来乌克兰人第一次统一在了一个国家组织境内。虽然从联合国诞生之日起乌克兰就是联合国成员国之一，但是乌克兰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主权国家出现在世界版图上却在 1991 年独立之后。

二、政治整合难以推进：乌克兰国家建设低效的结构因素

复杂的历史进程导致了当今乌克兰复杂的民族、文化、语言特点及其内部关系。乌克兰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对这些复杂的内部关系实现政治整合，建设统一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关系。然而，复杂的历史因素极大制约了乌克兰现代国家建设进程。

就乌克兰的民族构成状况看，乌克兰是多民族国家，有 110 多个民族。其主体民族是乌克兰族，占总人口的 77%；俄罗斯族是第二大民族，占总人口的 17%。其他民族如白俄罗斯族、犹太族、鞑靼族、摩尔多瓦族、波兰族、匈牙利族、罗马尼亚族、希腊族、德意志族、保加利亚族等共占 6%。

从民族文化角度看，乌克兰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人数大致相当的国家公民群体。第一个群体

是在乌克兰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熏陶下成长起来、母语为乌克兰语的乌克兰族人。实际上，西乌克兰的所有居民以及乌克兰中部地区的大多数农业居民都属于这一群体。第二个群体是从童年就说俄语、接受俄罗斯文化教育的乌克兰族人。这部分人群主要居住在第聂伯河沿岸的城市，以及斯洛博达乌克兰和波列西耶的村镇。第三个群体是以俄语为母语，世界观受到俄罗斯文化影响的俄罗斯族人^[6]。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乌克兰人口中约 23% 是俄罗斯族人，但 36% 的人是说俄语者。换句话说，占人口比例 73% 的乌克兰族人中，只有 64% 的人说乌克兰语。在国家层面，这同以家庭为单位的比例是大致平衡的：36% 是说乌克兰语的家庭，33% 是说俄语的家庭，不到 30% 是双语家庭。语言使用的地区分布也很复杂。在西乌克兰，只有 3% 的人是说俄语者；在乌克兰的中部地区，这一比例上升到了 16%；在东部和南部地区，说俄语者占多数，分别占 55% 和 56%^[7]。

不过，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尽管说俄语人口的比例较大，但只有在克里米亚俄罗斯族人的比例才占绝对多数。克里米亚的民族超过 125 个，有 80 多个民族群体，其中俄罗斯族人占 58.5%，乌克兰族人占 24.4%，克里米亚鞑靼族人占 12.1%。而在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地区，尽管说俄语的居民占优势，但俄罗斯族人的数量并不大。根据 2001 年的人口普查，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的俄罗斯族人占 39%，哈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和敖德萨州的俄罗斯族人占 25.6%。

就乌克兰的宗教状况看，乌克兰 88% 以上的居民信基督教，且大部分又是基督教的东正教信徒。但是，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是不统一的，分为三支。根据 2010 年的统计，2009 年乌克兰的东正教分支中，教区数量最多的是与莫斯科大牧首保持教规联系的乌克兰东正教会（有 11 790 个教区）。就宗教团体数量而言，在乌克兰国内居第二位的是基辅大牧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有 4 251 个团体）。第三支是在教会法规上不被承认的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有 1 197 个团体）。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莫斯科大牧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团体占绝对优势。在这个地区，乌克兰东正教会（莫斯科大牧首）成了与俄罗斯保持联系的实际纽带，尤其是在语言问题上。基辅大牧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和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在西部三个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捷尔诺波尔州和利沃夫州）占主导地位；而在罗夫诺州、沃伦州和基辅州，大约有 20% 宗教团体属于基辅大牧首^{[5] 131-132}。

除了东正教外，乌克兰的希腊天主教会对外部地区民众有巨大影响。根据 2009 年的官方资料，“93.3% 的希腊天主教团体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利沃夫州数量最多（1 496），捷尔诺波尔州（+769）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650）。如果说 1992 年初教会在国家的一半的州和基辅市都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如今（2009 年——引者注）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团体在乌克兰各个地区都有活动”^{[5] 131-132}。

除了上述主要宗教派别外，乌克兰还有其他宗教信仰。在西乌克兰有不少天主教会，在东乌克兰有不少新教团体，主要是传统的新教（浸礼宗、路德派、福音教派、耶和華见证人等）。乌克兰也存在一些信仰犹太教的团体（在南部较多）和信仰伊斯兰教（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其他宗教的情况。罗马教廷支持天主教徒和希腊天主教徒，而土耳其的穆斯林会支持克里米亚的穆斯林。根据 2010 年的统计材料，独立后乌克兰宗教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新教大规模传播。新教在乌克兰总共有 9 500 个宗教组织，占整个宗教网的 27.2%。根据乌克兰国家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的评估，与传统的教会相比，新教和新宗教组织的数量在加速发展^{[5] 131-132}。

就乌克兰的地区关系看，当今乌克兰的政治区域划分可从两个层面、三大区域进行。第一个层

面表现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第二个层面表现为自己“群体”内部具有某种独特性的区域次共同体。当今乌克兰地区可以划出三个大区域带——西部、中部和东南部，与外喀尔巴阡-加利西亚-沃伦地区（当今的外喀尔巴阡、切尔诺夫策、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沃伦和罗夫诺州）、小俄罗斯-右岸地区——传统的“乌克兰”（日托米尔、基辅、切尔卡瑟、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苏梅、基洛沃格勒和文尼察州）及新俄罗斯（敖德萨、尼古拉耶夫、赫尔松、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科夫各州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轮廓基本一致^[5] 176-177。

19 世纪中叶前没有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从 18 世纪末就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后来曾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一部分的乌克兰地区，应当视作西部大区的核心。西沃伦尽管因第三次瓜分波兰而被并入俄国，但受到了加利西亚的强大影响，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也归入西部大区。波多利耶（赫梅尔尼茨基州）在与奥斯曼土耳其斗争中曾是主要的“波兰堡垒”。这些地区形成了有别于乌克兰其他地区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政治上积极的精英的意识形态。而中部是以基辅为中心的第聂伯河左右岸地区，是博·赫梅利尼茨基的“自治国家”所处的地区。这是乌克兰的核心地区，即传统乌克兰的母体。东南部的历史命运以及区域开发特点与前两个地区不同。其结果就是形成人口的独特构成和文化。这是最晚开发的地区，在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发生过高强度的殖民化和发展进程。这个地区与波兰遗产关联不大，与俄罗斯特别是苏联的遗产关联最大。这是乌克兰工业最发达和最城市化的大区。除基辅外，所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敖德萨、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哈尔科夫）都集中在这里。在新俄罗斯，居民本身所固有的乌克兰认同要比中部乌克兰地区的居民少得多。绝大多数新俄罗斯人不认为“俄罗斯自我意识”和“乌克兰自我意识”之间及两种文化之间存在根本性区别。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化政策，如果对共和国中部地区来说是对自己文化的某种回归，那么对苏维埃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而言则是外部文化的介入。

这三个地带的社会经济面貌也不相同。东南区是工业（农业-工业）大区。除了基辅之外的中部和西部是工业-农业区，农业生产的作用很大，而工业生产的作用比较低。在东南部各个地区的城市人口都绝对优于农业人口；中部乌克兰的情况朝着有利于农业人口的方向变化。而在西部的大区，8 个州中的 5 个州的农业人口优于城市人口，只有沃伦、利沃夫和赫梅利尼茨基三个州，农业人口不占多数。乌克兰所有的大城市中心都分布在东南。

这三个大区域带内还可以分出次区域共同体。这三个地带中至少有两个可以划分一些“小地区”，它们有更为鲜明的特色，经常发挥作为自己地带文化政治活动中心的作用。比如，西部有地方性政治运动的基地——外喀尔巴阡、加利西亚，东部有顿巴斯和克里米亚。这是乌克兰文化政治地带的第二个层面。如果说加利西亚是西部地带的文化核心，那么外喀尔巴阡则是一个单独的独特边疆区，不觊觎中心地位，确切地说类似于克里米亚。而在这方面，顿巴斯就完全可以被视为加利西亚的政治反极，它力求对东南各个地区起到整合作用。

三、国家认同冲突断裂：乌克兰国家建设低效的重大后果

在历史上，乌克兰的各个部分曾长期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各个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特点，各个地区的历史面貌差别很大。这导致了乌克兰各个地区民族文化构成极为复杂，缺少民族文化上

的国家认同。由于国家层次认同的断裂和缺失，当今乌克兰在现代国家建设中面临深度困境。

其一，复杂外部环境对国家认同建设不利。历史学家浦洛基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乌克兰正位于东西方分界线上。这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界线，是中欧帝国和亚欧大陆帝国的分界线，也是这些帝国的不同政治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地处几大文化空间交界地带的状况让乌克兰成为一个接触区，在这里持不同信念的乌克兰人可以学会共存。这种状况也催生了各种地区分界，使之成为当下冲突的参与各方所利用。”^[8]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导致欧亚的中心地区出现了力量“真空”、地缘政治“黑洞”。

美国、欧盟和俄罗斯都把乌克兰视为与自身利益攸关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对美国 and 欧盟而言，他们认为控制乌克兰就可以遏制俄罗斯的发展。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斯蒂芬·皮弗曾明确提出：“华盛顿不应当也不能够放任乌克兰进入莫斯科的地缘政治轨道。”^{[5] 109}对俄罗斯而言，俄罗斯和乌克兰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基辅罗斯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共同源头，是它们的文化摇篮。同时，乌克兰是俄罗斯“对抗”西方的最后一道屏障，事关俄罗斯自身安全、民族利益和经济发展。所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发展也积极干预，以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21世纪前10年快结束时，俄罗斯提出了“俄语世界”的构想。“俄语世界”包括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得以传播的那些国家。作为一个具有政治含义的概念，“俄语世界”是针对“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提出的。“俄语世界”的地理边界除了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等斯拉夫国家外，还包括另外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独立教会的国家——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以及一些说俄语的伊斯兰国家，其中有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7] 232}。“俄语世界”这种新的俄罗斯身份认同模式对乌克兰的民族建构形成了重大外部影响。

除了美国和欧盟，各个相邻国家都有向乌克兰提出领土要求的政治人物或反对派活动。斯洛伐克存在对乌克兰领土觊觎的拥护者。匈牙利给居住在外喀尔巴阡的所有匈牙利人发放绿卡。此外，“大罗马尼亚”拥护者也支持对北布科维纳的领土要求。罗马尼亚政府已经开始给父母在1940年6月28日前是罗马尼亚公民的切尔诺夫策州居民发放护照。

其二，乌克兰国家建设依赖外力模式对国家认同建设不利。乌克兰的历史文化复杂，具有独立主权的乌克兰是苏联国内政治形势演化的结果，不是乌克兰全民族经过艰难的统一斗争获得的。因此，乌克兰独立后，乌克兰全民族思想并没有形成。正如有关研究指出的：“作为时代的反映、作为普通人能接受的思考方法的乌克兰民族文化至今还没有形成。我们这里目前还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捷克那样，既没有出现自己的哈谢克，也没有出现自己的恰佩克”^{[6] 169}；“它作为国家、甚至作为一个民族目前还没有形成。无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乌克兰都没有独立生存的经验”^{[6] 142}。乌克兰不同地区的居民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有统一文化和民族价值观的统一民族，由于各个地区的巨大差别，“有相当多的东西可以使乌克兰的各个区域分离”^[9]。

苏联时期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不是真正的内部文化-语言统一的共同体。独立后，乌克兰也没有真正形成共同目标联合起来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只是形成以国界为单位“拼装”起来的人们的共同体。乌克兰的地区精英没有提出不同地区在统一国家框架内相互共处的主张，没有提出能够令多数居民感兴趣的观点。不同的政治力量在过去和现在都为构建他们所想象的“自己”的“国家”而争斗。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居民开始大批地到西欧国家工作生活，所以那里的居民拥护

乌克兰向欧洲发展。乌克兰的中部和东部在同一信仰者的友好环境中发展。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或哈尔科夫在很大程度上以俄罗斯为发展取向。

独立后的乌克兰没有提出令国家各个主要居民群体都满意的全民族思想，区域差别也没有被克服，关于“建一个什么样乌克兰”的争论一直持续。“欧洲选择”和“欧亚选择”的拥护者互不相让，结果是使国家进一步撕裂，丧失更多的独立性。正如一位学者评价的：“经常丧失自己独立性的乌克兰人不要抱怨某人的诡计，只能怨自己。不愿意彼此达成协议以及习惯性求助外国仲裁法官导致了国家的解体。给人的印象是乌克兰获得独立后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安排。一些政治家声称‘欧洲选择’的必要性，另一些人谈‘欧亚选择’的必要性。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案——这是缩小独立性和丧失主权之路，尽管是部分丧失。”^{[5] 225}

其三，复杂的语言文化状况对国家认同建设不利。困扰乌克兰国家建设的因素还有语言文化问题。乌克兰除了加利西亚、外喀尔巴阡地区和北布科维纳外，其他地区都不同程度地与俄罗斯存在着某种历史联系。独立后，由于乌克兰政治精英在处理语言文化问题上的极端认知，俄语及俄罗斯文化被简单化视为乌克兰的“包袱”。乌克兰政治精英当中有这样一种认识占主导地位，即乌克兰只有当社会上达到了某种语言文化的一致性时才能成为现代国家。乌克兰政治精英甚至形成了一种共识：乌克兰不是两个或多个民族的国家，而是建立在乌克兰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国家。早在 1989 年，乌克兰语就被宣布为唯一的国语，要求只能用乌克兰语处理公文，高校绝大多数专业都用乌克兰语教学，逐渐减少俄语学校和幼儿园的数量等。他们建立新的乌克兰政治认同更加经常使用“对立的方式”——以乌克兰自我意识对抗俄罗斯自我意识。他们把乌克兰俄语、俄罗斯文化及俄罗斯看成对年轻的乌克兰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最重要威胁”。如何对待乌克兰的俄语及俄语居民问题，也就成了乌克兰政治精英不可回避的问题。库奇马竞选总统时的主要口号是宣布俄语为第二国语，但在他当选后没有兑现承诺。

苏联解体后头十年，乌克兰的“去俄化”尽管逐渐加速，但并不激烈和急剧。尤先科掌权后形势发生了改变。2004 年“橙色革命”后，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反对俄罗斯文化和乌克兰文化共存，乌克兰当局加大了乌克兰化的力度。2005 年春，乌克兰当局出台法令，要求各个司法和权利保护机关的活动只能用乌克兰语开展，其中包括在俄罗斯居民聚居地区。俄语学校的毕业生被禁止用俄语参加高校的入学考试。亚努科维奇 2010 年就任乌克兰总统后，试图解决乌克兰的俄语地位问题。2012 年 7 月 3 日，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法》，8 月 8 日亚努科维奇签署了该法律，8 月 10 日生效。该法得到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支持，使俄语在乌克兰 27 个州中的 13 个州成为地区官方语言。但是，这引发了乌克兰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抗议。2014 年 2 月 23 日，乌克兰最高拉达废除了《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法》，取消了俄语的地区官方语言地位。这一举措根本无助于危机的解决。语言问题也是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及顿巴斯地区大规模冲突的重要原因。

此后，乌克兰当局继续压缩俄语的影响。2019 年 4 月，波罗申科在自己掌权的最后阶段通过了《关于保证乌克兰语作为国语作用》的法律。就实质而言，该法中俄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作用被最大限度地压缩。根据该法，只有乌克兰语是乌克兰的国语和官方语言。该法规定，无视这一法律等同于亵渎国家象征：对语言的不恭敬要被处以罚金；乌克兰中央执行权力机关的代表、人民代表、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人、医务工作者、教师无一例外都要掌握乌克兰语；各种会议、活动、

权力机关的工作交往、在举办各种国家及市政活动期间，都要用乌克兰语进行；在国立幼儿园、中学和高校只能用乌克兰语授课。

从2020年9月1日起，乌克兰的所有俄语学校都改用乌克兰语教学。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只有小学五年级之前在教乌克兰语的同时允许教母语，而在中学要开始使用各种不同的学习乌克兰语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涉及不在自己的语言环境中居住、也没有国家归属的乌克兰原住民族。对他们而言，除了合理地学习乌克兰语外，从1年级到11年级（12年级）都用他们的语言教学。第二种方法涉及用属于欧盟语言的少数民族语言授课的学校。根据语族和语言环境，这种模式的使用可能会有所不同，尤其是小学孩子们在学习国语的同时，用母语学习；从5年级开始，要求每年不少于20%的课程应当转用乌克兰语授课，而到9年级时该比重应当不少于40%；在高中学校的课程至少有60%要用国语进行教学。第三种方法最具歧视性，涉及乌克兰的其他民族群体，主要是俄语群体。这个群体被要求在小学用他们的语言授课，同时要学习乌克兰语，而从5年级开始不少于80%的课程要用国语授课。

此外，乌克兰当局也在社会生活的多个场景推行这种语言政策。乌克兰当局要求，在剧院和电影院应当是乌克兰语居主导地位，外文的戏剧和电影应当伴有乌克兰语译文。社会活动（圆桌会议、会议等）被要求用乌克兰语或英语举行。大众媒体则被要求彻底改用乌克兰语：电视节目应当是乌克兰语占主导；规定外语电视广播节目和广播的总时长，对全国广播电台而言不能超过一昼夜广播时间的10%，对地区和地方广播电台而言不能超过一昼夜广播时间的20%。乌克兰法律还支持在商业、公用事业、医疗和医药领域使用乌克兰语。比如，要求所有的商店、饭店、理发店等机构都应当用国语提供服务，要求在医疗活动中接待患者和开具各种凭证都只能用乌克兰语。

乌克兰政府为了执行这种语言政策还专门设置了有关机构。乌克兰设置了一种职务——语言巡视员，负责“监督保护国语的语言法要求的执行”。乌克兰对违反语言使用法律所规定的罚金数额相当大。比如，在公文处理和执法机构罚金的额度为3 400~6 800 格里夫纳；在文化、教育和招贴广告领域罚金是3 400~5 100 格里夫纳；对出版媒体的罚金额度为6 800~8 500 格里夫纳。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反对俄语的国语地位，是对俄语及俄罗斯文化强大影响存有担忧，认为俄语是乌克兰国家安全的“威胁”。曾任乌克兰最高拉达主席的弗拉基米尔·利特温认为：“如果乌克兰再把俄语作为一种国语，那么乌克兰语就会丧失，而国家也会与它一起丧失。”“鲁赫”党的最高拉达代表帕夫洛·莫夫昌在接受“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采访时也表示：“俄语和俄罗斯文化比导弹还强大。乌克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俄罗斯人不战而胜。如今根本没有办法让乌克兰语真正像宪法所规定的那样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语。”^{[6] 105}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这种态度，很难说是出于对俄罗斯人的“天然仇恨”，实质上是对俄罗斯族居民和俄罗斯文化作为全盘乌克兰化道路上最大障碍的一种反应。

简单化排斥俄语、强行乌克兰化，既伤害了作为原住民的俄罗斯族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感情，加剧社会的分裂，也没有法理上的根据。乌克兰早在1999年就加入了《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该宪章认为，语言的多样性是欧洲文化遗产最宝贵的要素之一，在私人及社会生活中使用地区语言的权利是不可分割的人权。这一原则已经在宪章的序文中列出，也与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有关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主要文件规定的原则完全一致。2006年1月1日，该宪章在乌克兰生效。

根据该宪章的规定，在少数民族占该地区居民总人数 20%或以上的行政区域单位，该少数民族的语言在该地区应当与国语处于同等地位。因此，乌克兰东部及南部俄语居民占多数的地区把俄语作为地区官方语言的要求不是没有根据的。正如乌克兰历史学家托洛奇科所说：“我们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乌克兰。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西部乌克兰、东正教的东中部乌克兰、穆斯林的乌克兰（尽管它不大，但也存在）以及由人为并入乌克兰的地区组成的俄罗斯乌克兰（顿巴斯、克里米亚、新俄罗斯）。……这些人不是生活在我们的领土上，而是生活在成了乌克兰一部分的自古以来就是其自己的土地上。所以，要寻找共同语言，克服上述分裂线。……要赋予这些人愿意说的语言以地区语言地位。”^[5] 225-226

乌克兰当局推行的语言政策不仅无助于国内团结，反而加大了社会裂痕。乌克兰的一些政治人物千方百计地强调“乌克兰不是俄罗斯”。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强调“乌克兰不是俄罗斯”时，并没有把发展乌克兰文化作为自己的优先任务，而是把排挤俄语和俄罗斯文化、使乌克兰和俄罗斯脱离关系作为自己的目标。这种思路既不利于乌克兰民族文化的发展，还会引起很多新矛盾。乌克兰与俄罗斯曾在共同历史下相处了 300 多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乌克兰长期以来主要是通过俄语了解世界文化的，乌克兰的文化也是通过俄语传播的。实际上，俄罗斯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乌克兰文化的一部分，“如拒绝这份遗产，乌克兰历史和乌克兰文化就像荒漠一样”^[6] 112。另一位学者也曾指出：“否定俄语和文化会使乌克兰文化本身变得更贫困，使其丧失不可能完全为仓促编造的神话所取代的真正的历史根源。”

四、塑造共同历史与国家认同：乌克兰国家建设的现实镜鉴

乌克兰是地缘政治合力形成的国家。复杂的民族、文化、语言状况，给乌克兰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带来了很大困难。面对这种情况，乌克兰在推进国家建设中本应对自己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和多民族构成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保持清醒认识。但是，乌克兰当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由于存在不合理的安排，不仅不利于国家统一，反而加剧了矛盾，为外部势力利用。比如，2021 年 7 月 1 日，乌克兰议会通过泽连斯基提交的《乌克兰原住民权利法案》。该法案生效后，世代居住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族（占该国人口比例的 18%）、白俄罗斯族、德意志族、匈牙利族、波兰族、罗马尼亚族等少数民族不再属于乌克兰的原住民，不再享有与乌克兰族同等的权利，恶化了民族关系。乌克兰独立后国家建设实践的教训，对多民族国家如何塑造共同历史与国家认同提供了现实镜鉴。

首先，坚持立足国情，不能简单移植既有模式。在历史文化和民族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进行国家建设，一定要对本国的历史文化特点和民族构成有清醒的认识，提出能够为全国接受的统一的政治整合方案。这样才能使各方形成共识，形成一体的国家认同。公共政策制定不能从既有的观念和模式出发，一定要考虑本国的具体实际，从而制定出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符合各方利益的方案。

其次，坚持统筹兼顾，采取“多样一体”思路。多民族国家内含民族、文化、宗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广泛多样性，国家建设既要尊重多样性，也要加强共同性建设，科学把握多样性和共同性的辩证关系。就乌克兰而言，辩证处理多样性和共同性原则，要实行平衡的地区政策，把同时满足乌克兰东部和西部地区居民的经济社会文化需求作为突出目标。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消除乌

克兰内部的裂痕，促进“政治民族”的真正形成，形成全国民众都接受的统一的国家认同。

再次，坚持积极稳妥、科学合理的语言政策。语言事关国家认同和国家安全，稳妥有序地施行语言政策方能取得正面效果。乌克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简单化思路，使国家语言建设背离初衷。偏激且不符合实际的语言政策与社会政治纠葛，是造成乌克兰不稳定的重要诱因之一，给国家统一和安全带来危害^[10]。就乌克兰而言，要既支持乌克兰语，也支持俄语，而不应当人为制造两者的冲突。

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我国独特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政策和制度体系，实现了国家团结统一、和谐稳定和高效发展。在新时代，我国深化现代国家建设，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持国家建设的独立自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处理国家内部多样性和一致性的关系上，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做到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我国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在语言文化政策上，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

参考文献：

- [1] 冯绍雷. 国际秩序转型视野下的乌克兰危机——基于演进过程、深层结构、解决方案的分析[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2): 84-98.
- [2] 黄登学, 刘佩鹏. 新一轮乌克兰危机背后的大国战略博弈及前景[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1(4): 139-153.
- [3] 于洪君. 极端民族主义和激进民主思潮是乌克兰内外交困的两大主因[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16): 98-105.
- [4] 张弘. 国家形态与政治转型：乌克兰政治转型三十年评析[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2021(6): 42-58+153.
- [5] Григорьянц В.Е., Жильцов С.С., Ишин А.В., Мальгин А.В. Федерализация Украины: к единству через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 [M]. М.: Восток-Запад, 2011: 106.
- [6] Медведев Р.А. Расколота Украина [M]. М.: Ин-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 (ИНЭ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акад. исслед. будущего (МАИБ), 2007: 14-15.
- [7] 德米特里·特列宁. 帝国之后：21世纪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与转型[M]. 韩凝, 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5: 251.
- [8] 浦洛基. 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M]. 曾毅, 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9: 490.
- [9] 列昂尼德·库奇马. 乌克兰：政治、经济与外交[M]. 路晓军, 远方,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1: 100.
- [10] 李发元. 论国家层面语言政策制定对国内民族团结和睦的影响——以乌克兰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9): 56-62.

责任编辑：林华山



21 世纪以来的欧美极右势力： 历史溯源、发展趋向与影响镜鉴

俞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北京 100720）

摘 要：极右势力是欧美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力量。2007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极右势力在欧美社会迅速从边缘走向主流，对欧美国家政治生态与社会稳定的影响力迅速增长。极右势力的迅速发展源于欧美社会白人群体的不安全感，是欧美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后社会结构与文化危机的产物。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而言，欧美极右势力虽在形式上推崇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等，但在本质上仍然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欧美极右势力不仅通过传统的组织方式招募成员，还开始利用自媒体平台，形成亚文化组织来传播极右主义思想。就发展趋势看，鉴于欧美国家的多重治理危机不断加剧，极右势力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但受制于“适应困境”，难以对欧美社会造成颠覆性影响。欧美极右势力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欧美社会的分裂，不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甚至对我国的经济与政治安全形成潜在威胁。我国应当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共享发展，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密切党群关系，用好统一战线法宝来防范欧美极右势力抬升对我国安全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政治思潮；极右主义；极右势力；欧美社会；政治极化；治理困境；结构矛盾

中图分类号：D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5-0158-15

DOI：10.13946/j.cnki.jcquis.2022.05.014

作者简介：俞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特朗普时期中美全球治理的比较研究”
（2020YQNQD00137）

引用格式：俞风. 21 世纪以来的欧美极右势力：历史溯源、发展趋向与影响镜鉴 [J]. 统一战线学
研究, 2022（5）：158-172.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1] 欧美社会内部正在发生一些消极的变化，包括极右势力在欧美社会出现残渣泛起之势。一方面，美国极右势力推动下震惊全球的“国会山”暴乱、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枪击事件、美国德克萨斯州沃尔玛超市枪击案等极右暴力和恐怖主义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社会动荡，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另一方面，极右势力在欧美政治舞台上扩大了影响力，逐渐进入主流政治视野。例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袖勒庞连续在 2017 年和 2022 年总统大选中紧随马克龙之后进入第二轮选举；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自 2017 年起开始跻身议会；反欧盟、反伊斯兰移民的“荷兰自由党”在 2017 年成为国会第二大党。2022 年瑞典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极右翼瑞典民主党在本次大选中得势，以 20.7% 的得票率超过温和党成为第二大党。最新民调显示，意大利右翼联盟在 9 月 25 日的议会选举中将获得 46% 的选票，其中极右翼兄弟党将赢得 25% 的选民支持，这就意味着兄弟党党魁梅洛尼极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理，领导意大利第一个战后极右翼政府。右翼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欧美国家的迅猛发展之势，对欧美的社会文化甚至国际局势都产生了影响，引起了媒体和学界的关注。在欧美极右势力的内部推动之下，欧美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亦发生了一些变化，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鉴于此，欧美极右势力抬头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欧美社会的极右势力是极右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外部表现。“极右主义”（far-right）最初主要是一种适用于西欧环境的分析话语^[2]，因此在西方学界中早有不少关于欧洲极右主义的研究。这些研究中既有针对极右主义的概念、发展历程及表现形式的深入剖析，也有以法国、英国、德国等特定国家为对象的案例研究，更不乏对极右势力在欧洲得以发展原因的解析。随着“茶党”运动在美国的兴起和特朗普的当选，极右主义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关注，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极右主义、另类右翼、白人至上主义等主题的研究。我国学界目前亦有一些针对欧美极右主义（特别是欧洲极右政党）的研究，包括对欧洲一体化和难民危机背景下欧洲极右政党发展现状与趋向的研究，以及对美国另类右翼运动的研究。例如，赵海和陈展以美国的匿名 Q 运动为案例分析了美国极右翼生产和传播反智阴谋论的机制，并指出美国极右阵营由于在美国权力结构下处于边缘地带而容易成为“偏执心态”的理想宿体^[3]。张蕊芜分析了欧洲极右政党兴起的主要因素，包括采用民粹主义策略、政治纲领与体制内政党趋同、媒体曝光度的增加等^[4]。田焯讨论了欧洲一体化背景下极右政党的崛起之势，并指出这一现象导致欧洲政治日趋保守化，欧盟民族矛盾日渐激化和欧洲社会碎片化^[5]。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较少有针对“欧美极右势力”这一主题进行全面、系统和关联性研究。鉴于欧美极右主义之间虽有区别但存在不少联系的实际情况，且在当前国际政治环境之下颇有联动之势，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二者进行综合和全面的研究。本文将对欧美极右势力在近年来的发展进行分析，指出极右势力在欧美社会迅速崛起的社会性和结构性原因，分析其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向，就极右势力对欧美社会内部和国际局势的影响加以分析，思考其对我国内政治理和国际事务处理的镜鉴。

一、历史溯源：欧美社会不平等加剧和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转移

极右势力在欧美的发展可追溯至 19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极右主义以“法西斯主义”为典型代表。此后，它经历了三个发展波次，形成新法西斯主义、反共主义、极端反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多个变种。进入 21 世纪，极右力量在欧美社会日趋主流化。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欧债危机、难民问题等议题，借助新媒体造势，在政坛上迅速崛起。在美国，得益于“茶党”运动和另类右翼的帮助，特朗普获选总统刺激极右思潮的扩散和美国主流保守主义的“激进化”，导致美国政治进一步极化。欧美极右势力的迅速发展是对不同历史时期国内与国际形势变化的应激性回应，是其当下社会现实的直观体现。从表面上看，21 世纪以来欧美极右势力的迅速崛起有赖于位于社会底层、被边缘化的部分白人群体的支持。他们因感受到社会主体地位和文化主导权的丧失，而被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等极端思潮所吸引。但究其根本，欧美极右势力在当代复苏的根源在于欧美社会不平等加剧与内部矛盾深化。欧美社会内部的阶层矛盾、文化冲突和种族矛盾转移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和问题的关注，在客观上刺激了“排他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极端思潮的高涨，为极右势力的持续抬头提供了现实土壤。

（一）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化加剧欧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激化

当前欧美极右势力的迅速发展虽以国际金融危机为序幕，但其根源在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和内部矛盾。

经济全球化带动国际贸易的频繁化、资本流通的自由化，以及技术和服务跨国转移的便捷化，给欧美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助力。有研究表明，自 1947 年至 2003 年，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贸易自由化使美国的总收入逐年增长约一万亿美元^[6]。全球化为欧美国家的技术创新带来了优秀的人才和充足的资金，推动了经济转型和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欧美国家的各大企业通过跨国经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从而降低成本、开拓市场，赚取更多利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之上的金融资本新帝国主义体系取代了旧殖民主义体系”^[7]，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金融扩张的新周期。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等产业在欧美国家蓬勃发展，逐渐取代了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金融巨头和资本家更是在投资市场获得巨大经济利益。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美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政治经济结构导致受益不均衡，进一步扩大欧美社会的贫富差距。一方面，为了在全球化竞争中获胜，欧美国家将制造业外包，直接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和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失业。资本的逐利本质驱使企业将制造业从欧美国家转移到更加靠近原料产地、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致使曾经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在欧美国家日渐衰落，大量制造业蓝领工人亦从原有的“中产阶级”沦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败之人”，陷入经济窘境。另一方面，高新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和金融业、信息技术产业等对劳动力要求的提高，使得制造业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下降，收入水平也远低于从事这类服务业的白领工人。从 1945 年到 1980 年左右，投资银行业的普通员工的平均收入约为其他行业工人的两倍；而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这类员工的收入已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8]。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背景下，资本的逐利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平等本质决定了部

分工人群体经济社会地位的迅速下降，直接导致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社会不平等愈加严重。从 1979 年到 2020 年，美国最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中，收入最高的 1% 人口的工资增长了 179.3%，收入最高的 0.1% 人口的工资增长了 389.1%，而收入最低的 90% 人口的工资仅增长了 28.2%^[9]。欧洲社会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也日趋明显：自 1980 年到 2017 年，西欧国家中收入最高的 0.001% 人口的收入年增长率为 3%，而收入最低的 50% 人口的收入年增长率仅为 0.6%^[10]。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直接导致了欧美社会的内部分化与撕裂，引起了部分民众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特别是那些曾经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人运动中以斗争捍卫自身权益，并享受过制造业蓬勃发展红利的基层工人，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深刻体会到“相对剥夺感”。这部分群体的不满情绪为欧美社会极右主义运动的复苏创造了机会。

（二）种族矛盾与文化冲突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与矛盾

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美社会中精英与草根之间的阶层矛盾，本土白人和少数族裔（或外来移民）之间的种族矛盾，以及基督教文化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危机和基本矛盾。这使得欧美国家普通民众难以意识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反而将不满情绪发泄于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身上。这为极右势力鼓吹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提供了现实土壤。

欧美经济结构的变化、新管理方式的引进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移民浪潮，导致工人内部进一步分化。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经济的衰落使制造业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都有所下降，而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则让“白领工人”在心理上逐渐脱离工人阶级，跻身所谓“中上阶层”。新型管理方式的引入让资本家不再直接参与生产与管理，而是赋权“高管人员”帮助其对底层员工进行监管，从而使曾经显而易见的劳资矛盾被隐藏和淡化，代之以“精英管理层与底层员工”之间的矛盾。同时，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为欧美社会带来大量的移民浪潮，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后备军。自 1953 年到 2020 年，前往欧盟的移民增加了近 2 倍；2019 年美国的合法移民则是 1960 年的 4.61 倍^[11]。移民给在劳动力市场上地位本就下降的蓝领工人带来竞争，致使行业工资水平难以提高，加剧了本土工人和外来移民工人之间的矛盾。欧美国家工人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对立，掩盖并淡化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根本矛盾，分散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凝聚力。

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欧美社会的文化结构亦遭遇巨大冲击。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之间、盎格鲁新教文化与多元主义文化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欧美社会的撕裂程度，严重威胁欧美社会的稳定。前往欧美的移民潮作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个体的自由聚合，给那些以文化同质性为假设前提进行运作的传统形式的自由-民主治理造成了压力^[12]。在欧洲，随着穆斯林移民而来的伊斯兰文化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一定的“紧张关系”，宗教极端主义暴力事件偶有发生，加剧了社会危机。在美国，文化多元主义在平权运动之后成为新的“政治正确”，挑战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下的传统价值观^[13]。于是，当工人群体忙于不同种族与宗教间的文化与价值观之争时，也就更加忽略了自身遭遇的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和“文化失语”现状，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与根本矛盾更具隐蔽性。

（三）不安全感裹挟下白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成为极右势力发展的直接推力

在经济转型、人口结构和主体文化危机的多重刺激之下，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感急剧增强^[14]。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出现了部分无法应对现代化进程而陷入经济困境的白人群体（特别是

未受到高等教育的中下层蓝领)。他们因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社会主体地位日渐被侵蚀和文化领导力的弱化,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排外情绪。这种“被取代”的焦虑刺激了极右主义进一步扩散。

欧美社会人口结构变化对极右主义扩散产生直接影响。一方面,曾经在 20 世纪欧美工人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的蓝领工人被边缘化了,他们对主流政党的移民和社会政策极为不满。另一方面,白人群体在欧美社会中人口优势的丧失使之产生了不安全感。不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白人群体的生育率低下和老龄化问题都使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日渐下降。在美国的本土白人看来,他们面临着成为少数族裔的危机;在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本土白人看来,他们面临着“伊斯兰化”的危机。与人口结构危机相对应的是,白人群体自诩为主流文化代表的认知正受到文化多元主义的强烈冲击。文化多元主义被欧美的部分精英塑造成新的“政治正确”,形成“身份政治”。文化多元主义将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建构为弱势群体,进一步激化了欧美社会传统价值观认同者的不满。

文化冲突的加剧使得部分白人群体特别是被底层化和边缘化的中下层蓝领,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和“被取代”的不安情绪,并逐渐发展为“排外”甚至“恐外”的情绪和反全球化思想。处于政治边缘地带的极右势力抓住了欧美社会民众内部的这种不安心理,大肆兜售排外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纲领,在这些群体内部找到了扩散空间。

二、发展现状:意识形态整合、组织形式调整与影响力扩大

受到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极右势力在 21 世纪日趋撕裂的欧美社会内部迅速扩散,实现了对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等思潮的整合。它们以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获得部分群体的支持,除了借助传统的政党、社会组织和学术团体等组织形式,还利用信息技术和自媒体平台等新形式,以非正式形式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特别是自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以来,欧美社会的极右势力散播虚假信息,利用疫情造成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扩散极端思想,并在特定事件中完成力量的重组与集结,加强与国际上有关力量的联动。

(一) 以种族主义为底色的极右主义意识形态

极右势力本身是一个拥有不同成分、派别的伞状联盟,其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并不一致,包括白人至上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极端反政府主义等。鉴于此,学界对“极右主义”的定义也未达成共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极右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涵也不相同。例如,19 世纪初法国的“极右派”是一群拒绝资产阶级革命的“极端君主主义者”,声称等级制度要比自由平等更为重要^[2];20 世纪中期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推崇极端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极右主义”;当下欧洲的极右主义则主要表现为右翼民粹主义、恐伊斯兰主义和反全球主义。总体来看,当前欧美社会的“极右主义”主要具备民族主义(nationalism)、种族主义(racism)、排外恐惧(xenophobia)、反对民主(anti-democracy)和强势国家(strong state)等五大特点^[15]。其中,“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反民主和排外民族主义是界定‘极右主义’的基本属性,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则是它们的伴随特征”^[16]。

极右主义在本质上挑战资本主义“民主”所宣传的“自由价值观”。21 世纪以来,欧美的极右势力虽然都在自由主义民主的框架内行事,特别是欧洲的极右主义政党都积极参与选举、支持政治

平等和多元政府，但是欧美极右势力“在根本上依然挑战民主的关键机制和自由价值观，包括少数族裔的权利、法治和分权等”^[17]。伊丽莎白·卡特认为，反民主是“极右主义”最为显著的特点，因为欧美极右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一般强调高度的集权化，突出领导人的个人绝对权威。不仅如此，当代欧美的极右主义有着较强的排他性，对外来移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特别是伊斯兰教）和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等“民主基石”在本质上并不十分支持。但需要说明的是，极右势力出于功利目的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或者说，极右势力经常通过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来为自己在公开场合发出具有排外情绪、极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政治不正确”言论进行辩护，同时抨击左派媒体、政党和社交平台等对各类极端言论的审查。

极右势力对“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国家政策存有复杂态度。一方面，极右势力支持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强调国家应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要求减少税收等。另一方面，极右势力又批评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市场和多边组织的过度依赖与推崇，指责大量移民导致欧美社会的失业问题、文化和社会冲突，消极看待全球化的影响。例如，欧洲的极右势力指责“欧盟一体化”侵害了本国利益，反对包括欧盟在内的超国家组织；美国的极右势力要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强调所谓“美国优先”，质疑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有效性。在极右势力中盛行的“新秩序阴谋论”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含义不尽相同，但都质疑国际组织和支持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的精英；认为他们正在共谋颠覆国家主权，所资助的各类全球化和多元文化项目将会威胁欧洲和美国人民的种族和经济主权^[18]。

从具体内涵来看，当下欧美极右力量均以“种族主义”为意识形态底色和精神内核，辅之以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反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表现方式，本质上是对“白人优于其他种族、本土人优于外来移民”等级制的复归。欧洲的极右势力奉行排外主义的意识形态，从反对伊斯兰移民、反对难民逐渐发展到反对非欧洲的一切外来民族。他们声称，政治精英用“后现代主义”侵蚀社会文化，外来移民的增加侵蚀了本该属于本土欧洲人的福利，同时带来社会动荡。从政策层面考虑，他们指责“欧盟一体化”侵害了本国利益，导致本土欧洲人地位的相对下降。他们从追求全球主义的欧洲一体化退回到民族主义的本土保护主义政策，反对包括欧盟在内的超国家组织。归根到底，欧洲的极右势力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和对包括欧盟在内的超国家组织的反对，在本质上都是为了保护本土欧洲人的权益。美国的极右主义则突出表现为白人至上主义，声称包括非洲裔、拉丁裔和亚裔在内的外来移民抢走了美国本土白人的工作机遇，使之遭遇经济困境。他们质疑建制派政治精英，反对政府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认为这些政治精英从未真正考虑民众（特别是底层白人群体）的利益，表现出“民粹主义”和“反建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在国际上，他们反对全球化，要求恢复美国“昔日的荣光”。美国极右势力表现出的本土主义、民粹主义、反建制主义和反全球化倾向，在根本上也是为了维护美国本土白人曾经在经济与社会上的主导和优势地位，因此本质上也是种族主义的。

（二）以传统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网络为主的多样化组织形式

欧美极右势力不仅通过传统的组织方式来招募成员、扩大基本盘，还利用自媒体平台形成松散的亚文化组织来传播极右主义文化。

1. 传统组织形式。政党、社会运动组织和学术机构都属于极右势力的传统组织方式。极右政党

在管理结构上更加严格、集权化，并强烈依赖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就欧洲而言，包括法国的“国民联盟”、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奥地利的“自由党”等在内的极右政党都已经成为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极右组织。由于美国的两党制不利于第三党的发展，极右势力只能通过影响美国的主流保守派政党——共和党来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因而，美国尚未发展出影响力较大的极右主义政党。极右势力还通过组织示威、游行等“街头运动”方式扩大影响力，形成较为松散的社会运动组织。例如，美国的“白人民族主义组织”“种族主义光头党”“骄傲男孩”和欧洲的“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组织”等在近年来比较活跃。极右主义学术组织的管理结构比上述两者更加松散，通常是以个体、俱乐部和线上活动室的方式进行，通过组织会议、出版书籍和杂志等方式来教育内部成员，为极右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理论依据和合法性，并吸引更多受众。这类组织包括“欧洲文明研究小组”、美国的“移民改革联盟”和“国家政策研究所”等。

2. 非正式网络形式。进入 21 世纪后，极右势力紧随时代变化，以社交媒体网络为平台进行发声，炮制所谓“酷炫”文化来吸引年轻群体。欧美极右势力利用包括 4chan、8chan、reddit、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创建个性化群组，逐渐形成从属于极右主义的“亚文化”群体。这类组织以非正式的网络形式存在，管理松散，有些甚至没有所谓“意见领袖”。美国的“另类右翼”就是以这种形式发展起来的一股力量。该组织没有确定的政治理念，以“保守主义是新朋克”为口号吸引年轻受众，旨在取代主流保守主义和共和党的建制派力量。该组织由一群被边缘化、无组织的互联网活跃者和宣传者群体发起，通过支持 2016 年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而声名大噪。它创造了以图片和幽默为基础的亚文化，喜用幽默和讽刺的语言来表达白人至上主义或种族主义等极端保守主义的思想主张，以减少威胁性，试图与“3K 党”“新纳粹”这类传统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区别开来^[19]。在大数据时代，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线下组织的运行成本远超过非正式的网络组织，其严格的管理组织形式也不符合年轻世代的心理特点。非正式网络组织因其轻松的文化氛围和松散的组织形式反而扩大了极右主义的基本盘。受此影响，政党、社会运动组织和学术组织等传统组织也开始使用新媒体来增强影响力，进一步扩散极右主义思想，扩大极右政党的选民群体范围。

（三）借助社会危机实现极右思想的扩散和极右力量的重组

欧美极右势力利用金融危机、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给民众带来的压力与不安，借助信息技术和社交网络形成松散的亚文化组织，大肆宣传极右主义文化，试图扩大政治影响力。2020 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重挫欧美各国经济，加剧其国内危机与国际矛盾。极右势力借助疫情危机，散布虚假信息和仇恨情绪，组织“反封城”游行^[20]，推广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极右势力虽然曾因美国的“国会山暴乱”等事件遭遇一定打击，但也借此完成了力量的重组与集结，并加深欧美极右势力之间的联动。

一方面，极右势力利用民众对新冠病毒的未知与恐惧心理，将其与外来移民与其他人种所谓“灭绝白人种族”的阴谋论相联系，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建制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反犹主义等意识形态渗透主流文化，加剧社会撕裂。在美国，极右势力散布所谓“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的阴谋论，掀起美国社会反华、排华的种族主义浪潮，并在国际层面加剧中美关系的恶化。在欧洲，不少极右政党将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与外来移民、少数族裔联系在一起，以此煽动欧洲内部的排外思潮，为其反移民、反全球主义的政治纲领提供注脚。

通过制造“信息疫情”，欧美极右势力在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以种族矛盾掩盖了疫情所加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与欧美社会的结构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令各国政府都措手不及，但疫情在欧美社会未能够及时得到遏制则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党派政治的严重极化导致各政党为了自身利益或选举胜利而难以顾全大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加剧了个人主义的倾向，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合力共同抵制新冠肺炎疫情^[21]。不仅如此，疫情还使欧美社会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进一步凸显。然而，极右势力却抓住欧美社会底层白人群体因长期遭受“政治正确”的逆向歧视和社会主导地位遭受威胁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用“种族矛盾”和“排外主义”转移民众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关注。他们将“移民”和“少数族裔”作为新冠疫情的“替罪羊”，通过煽动“种族矛盾”来消减民众因疫情而加剧的经济不安全感，掩盖造成政府抗疫不利的结构性症结，以及疫情所激化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如此一来，社会危机不仅没能得到正视和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欧美国家内部的种族和民族矛盾也愈加严重，造成社会的进一步撕裂。

另一方面，以“弗洛伊德事件”为代表的社会事件引爆欧美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危机与矛盾，推动群众抗议运动发展。此类事件引起了欧美极右势力的政治反弹，他们以“白命攸关”（White Lives Matters）运动和“国会山暴乱”等行动进行反击，表达“不满与愤怒”。其中，“国会山暴乱”对美国的极右力量造成重创，不少极右分子因此被捕。但同时，它也为极右势力提供了一次力量重组与集结的机会，并使欧洲的极右力量产生“共鸣”。“国会山暴乱”被认为是对美国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颠覆，使不少较为温和的中间派保守人士离开极右主义队伍。但在部分“坚定”的极右主义者看来，此次行动极为成功，是对法治与建制派的挑战。在国际层面，欧洲的极右势力密切关注这场暴乱，并试图利用它所带来的极右主义的高涨抬升自身影响力。2020年8月，极右主义者试图冲入德国议会。德国极右主义杂志《Compact》的主编埃尔萨瑟声称这是“一次因计划不足而失败的光荣尝试”^[22]。在欧美极右势力联系日渐紧密的当下，类似“国会山暴乱”事件很可能成为加强二者关联性的纽带，进一步促进极右主义的全球化与主流化。

三、未来趋向：资本主义的“病理常态”与极右势力的“适应困境”

从长远来看，极右主义作为欧美社会的“病理常态”，将持续存在并加剧欧美的社会危机。但鉴于欧美社会极右势力存在着“适应困境”，它又不太可能在真正意义上超越政治“主流”或从根本上改变欧美社会的基本矛盾，只会进一步加剧欧美社会的极端化。

（一）极右势力反映资本主义的“病理常态”

不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极右主义政党或运动并非新鲜事物。研究极右主义的供给派理论学者汉斯-乔治·贝茨认为：“右翼激进主义存在于所有的工业社会之中，并且应被视作现代民主‘正常的病理状态’（normal pathology）。”^[23]卡斯·穆德则从供给-需求侧的角度综合考虑极右力量在二战后的迅速发展，指出由于战后的极右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与民主主义价值观一脉相承，因此应该视之为民主制度的“病理常态（pathological normalcy）”^[24]。考虑到极右主义的发展源流及其内涵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病理常态”的极右主义将长期存在于欧美社会中，

反映、掩饰并转移着欧美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危机。

在不同时期，极右主义思潮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回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引起的某些社会群体的“地位替代”问题^[14]，反映了那些无法理解、更无法驾驭当前复杂的社会现实群体的苦涩^{[24] 1167}。例如，美国的“一无所知运动”是熟练工人主导地位受到非熟练工人影响时所产生的以“本土主义”为表现形式的回应；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的“布热德主义”则是在工业化时期法国农村地区被城市所边缘化，小商人与工匠的社会地位被制造业资本家所取代时进行的“民粹主义”式回应。而在当下，欧美极右势力的高涨则是针对白人群体因社会主导地位被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所影响而产生的“身份危机”的回应。

从根本上来说，极右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主要矛盾与文化危机的回应与转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平等。换言之，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危机依旧存在，极右主义将与之形影相随。21 世纪以来的欧美极右势力就是在欧美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资本全球扩张带来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剧变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资本的逐利本性带动金融业的迅速发展，推动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促使各类跨国公司应运而生。通过引进外来移民作为经济发展的后备军、推广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手段，资本在盈利升级的同时也带来社会不平等的日渐加剧，导致劳工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在事实上被激化。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管理模式的变化，劳资矛盾变得更为隐蔽，取而代之的是底层草根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对立冲突。为使资本全球化更加平稳进行，同时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欧美国家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多元主义”的文化政策。平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少数群体抗议运动的迅速发展，对基督教文化和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形成影响。

西方选举制度的根本缺陷也决定了极右主义必然存在。竞争性选举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然而，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西方的选举制度日趋形式化，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暴露出弊端和局限性。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政党代表的总是资产阶级而非人民群众的利益。随着竞选成本的提高，西方的民主选举日渐沦为金钱政治，受到经济精英及其代理人的控制。选举政治中的相对多数原则使各个政党必在竞选中采取各种手段吸引选民，以取得政治领导权。他们以“本土主义”回应白人群体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被外来群体和少数族裔影响时的不安与失落，以“威权主义”来维护白人群体所怀念的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并以“民粹主义”表达出对精英的不满与反抗。但事实上，这些不过是极右势力用于转移资本主义社会根深蒂固且日渐加剧的劳资矛盾的“幌子”。

因此，导致欧美社会结构变化与文化危机、白人群体身份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极右势力将白人经济社会地位的相对降低归咎于“他者”——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以及政治精英的腐败统治，以此来掩盖欧美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根源——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及其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只要资本主义制度性社会不平等继续存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便将持续催生某些发生“地位变化”的群体，极右主义也便有了持续滋生的土壤。

（二）极右势力存在“适应困境”

极右势力在西方社会的存在是一种必然且长期的现象，但不太可能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产生颠覆性影响。作为一种内生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力量，极右势力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在发展过程中终

将陷入“适应困境”，并限制其进一步发展。就长远来看，极右势力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矛盾和危机，且极有可能在转嫁危机的过程中导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从而推动欧美社会走向极端化。

极右势力的发展动机与运动目标决定了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与危机的“视而不见”。欧美的极右主义运动多是“以价值为导向的政治运动，往往对于夺取政权感兴趣”^[25]。极右政党的目的在于影响社会中的保守派选民，取得选举胜利。针对此类选民的心理需求，他们投其所好，制定出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政治纲领。这看似以民为本，但极右政党本身就是与普通群体相对立的“政治精英”，其背后仍代表着大资本的力量。他们并不愿意去改变造成其目标选民痛苦根源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因为极右政党本身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为其带来的既得利益。

从极右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绝大多数的极右势力仅仅只能对公共政策和主流政党产生影响，而难以成为执政力量。其根源就在于极右势力面临“适应困境”：“为了被主流社会所接受，防止被国家压制，他们需要变得温和；但为了满足其核心成员的呼吁，并保持清晰的形象，他们又要保持极端”^[26]。

一方面，为了能够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欧美极右势力一直在努力地实现“温和化”。这是由于经历过二战和“法西斯主义”带来的灾难之后，欧美社会各界竭力反对政治极端主义并遏制一切反民主的政治运动。二战之后的极右势力通常在欧美社会的民主制度框架内进行活动。在意识形态和修辞方式上，极右势力也刻意使用更加委婉、温和的语言以使自己的价值观易于接受。虽然 21 世纪以来的极右主义在本质上带有“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色彩，但极右势力拒绝“对号入座”。他们用“本土主义”强调对本土群体的关注而非对外来群体的歧视，从而淡化意识形态中的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例如，欧洲的极右势力使用“民族多元主义”概念来反对“文化多元主义”。从表面上看，它强调对文化独特性的保护，强调人们拥有保持不同文化的权利，但其本质却是推广种族分裂主义。这类言语上的包装与修饰都是为了使极右主义意识形态不因过于极端而招致反感和镇压。

另一方面，极右势力必须使自己保持一定程度的“极端化”以吸引核心受众，否则会因同其他保守主义政党雷同而失去政治吸引力。为了迎合目标选民，特朗普在 2016 年的总统竞选过程中频繁发表极端言论，包括要求“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在美墨边界筑墙”等，得到了极右主义者的支持。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勒庞频繁发表反移民主义、反宗教激进主义的极端言论，以彰显其与主流保守主义政党的不同，吸引极端保守主义选民的选票。

总之，极右势力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与选举优势，不得不在“适应困境”中徘徊反复：为了能够在西方民主制度框架下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温和化”；为了在保守主义阵营中脱颖而出，保持选举上的优势，又保持一定“极端化”。这种徘徊反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极右主义力量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力。不仅如此，为了获得选举的胜利，在极右势力迅速发展并改变社会氛围的情况下，主流政党也会在战略上或言辞上模仿极右力量，以吸引支持极右主义的选民群体，继而弱化极右政党对其目标选民的吸引力。

四、影响：欧美社会的内部撕裂和国际社会的动荡不安

欧美极右势力的复苏对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极右力量近年来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壮大直接加剧了欧美社会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另一方面，极右政治力量的壮大使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呈现较强的“保护主义”和“反全球主义”倾向，加剧了国家间的摩擦与冲突，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展。

（一）极右势力对欧美社会内部的影响

1. 极右势力的发展加剧了欧美国家主流右翼政党的保守化倾向，刺激其他政党的激进化，从而导致欧美政治日趋极化。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根本性缺陷导致各大政党在选举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部分民众的需求制定“政治产品”，导致各大政党的竞选纲领和施政纲领存在很强的“群体针对性”。受到极右翼政党在欧洲社会日趋主流化的刺激，“主流政党需要迎合被极右势力鼓动起来的部分选民的期望，修正传统的执政理念，积极应对极右政党的政治诉求，从而在竞选纲领、执政理念等方面‘右转’”^[5]。例如，在 2019 年的地方选举中，为了防止选票流向极右阵营，马克龙不得不在移民政策上选择折中路线，宣布收紧移民政策的 20 条新规；德国、奥地利等国也逐渐收紧了难民和移民政策。极右政党为了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又不断地向主流右翼政党靠拢。从整体上来看，欧美社会的右翼力量日趋保守化。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区别于极右政党并与之竞争，传统中左翼政党也逐渐向更加激进化的方向发展，并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例如，在 2022 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的候选人梅朗雄主要利用社会公平和环保议题，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恢复巨税制、在宪法中纳入“绿色规则”等，成为许多拒绝马克龙和勒庞的年轻选民的选择；在 2020 年美国总统竞选中，推崇绿色新政、强调社会公平的桑德斯也在竞选中获得了一定成功。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欧美社会的政治光谱开始往“左”和“右”的两个方向偏离，继而加剧政治极化现象。

2. 极右势力的发展加速了欧美社会的撕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聚合。21 世纪以来，极右势力抓住底层白人群体的不安全感心理，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排外主义政策，在经贸问题上反对全球化，推行民族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在这些做法的影响和鼓动下，欧美社会对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的不满情绪日渐发酵，激化不同民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导致针对犹太人、穆斯林和亚裔的恐怖主义暴力事件频繁发生。例如，2022 年 5 月 14 日美国布法罗市造成 10 死 3 伤的枪击案，是年仅 18 岁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大替代理论”影响下酿成的惨案。相关研究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英国的仇恨犯罪上升 124 000 起，创历史新高，其中种族动机犯罪占了近 75%^[27]。仅在 2020 年，法国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事件增加了 53%^[28]。种族主义暴力事件的发生不仅给社会造成不安，也激起了少数族裔群体的抗议，进一步加剧欧美社会的内部撕裂。

（二）欧美极右势力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1. 极右势力在对外经贸政策采取“民族保护主义”，阻碍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持续发展。例如，英国的“脱欧”阻碍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并给欧洲的对外贸易、金融监管和人才流动等带来不确定性，造成英国和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特朗普在任期间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一切以美国的经济利益为首要考虑，致力于实现美国产业的“回流”。其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对中国开展并升级贸易摩擦；以双边经济贸易协定逐渐取代多边经贸协议，对欧盟、日本和韩国等施加关税压力，加速了美国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脱钩。欧美有关国家对外经贸政策的这些动向，导致各国之间贸易摩擦不断，阻碍了全球经济复苏。

2. 极右势力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倾向，阻碍全球治理合作的深入发展。这一点在欧洲表现为欧洲各国在难民和移民政策方面的收缩，而在美国集中体现为特朗普时期的“退群外交”和“孤立主义”政策倾向。在茶党和另类右翼的支持下，特朗普为了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回应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的利益诉求，在外交上表现出强烈的右翼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倾向。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核协议等，并以“退群”为威胁要求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重启北美自贸协定的谈判等^[29]。这些做法不利于以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发展，使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遭遇危机。美国还推行保守的移民和文化交流政策，包括严格限制部分伊斯兰国家的公民入境，对拉美的非法移民进行遣返，对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规定各种不合理限制条件^[30]。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各国之间交流往来减少的大背景下，保守主义的移民政策与种种留学限制进一步阻碍了国际社会的人文交流，加深各国之间的隔阂与误解。欧美社会极右势力崛起带来相关国家外交政策的保守化，也将可能刺激一些国家的“政治极端化”倾向，导致民族主义回潮和反全球主义抬头。

3. 欧美极右主义的外溢也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局部冲突，影响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展。欧洲与美国的极右势力在近年来已经形成一种跨国联动效应，包括极右主义思想的传播、暴力行动的扩散和极右分子的交流往来。例如，发源于法国的“大替代理论”在德国、英国、美国等地迅速传播，并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认同；发生在欧洲的极右主义犯罪刺激了美国的极右恐怖主义行为；美国南加利福尼亚的极右武装组织“崛起运动”（Rise Above Movement）在 2018 年前往德国、乌克兰、意大利等国同当地的极右主义组织成员会面，以期“改进战术，发展更好的反情报技术，强化其极端主义观点并扩大全球网络”^[31]。极右主义的外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剧国际社会的冲突。例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美社会的极右势力中就有相关成员作为志愿军前往乌克兰支援被视为“新纳粹武装”的“亚速营”。

五、结语：欧美社会极右势力抬头的治理镜鉴

极右势力之所以能够在欧美社会死灰复燃，根源在于欧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和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欧美社会结构的变化加剧了社会内部各阶层、种族和群体之间的矛盾，这种深化的矛盾以白人群体的不安全感为突出表现，并被极右势力所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欧美国家治理失能和制度失效的体现。一方面，受到大资本的控制和利益驱使，欧美国家未能真正实现公平公正的经济治理。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欧美国家一定程度上以牺牲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为代价实现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造成社会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加剧不同阶层和族群之间的矛盾，为极右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另一方面，西方民主制度的低效阻碍了政治民主的真正实现。西方自由民主制虽在形式上实现了政治公平，却在具体实践中受到资本力量的操控而违背民主初衷，忽略了占社会主体地位的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西方自由民主制导致国家精英

与草根平民之间出现了裂痕与隔膜,推动了右翼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思潮的抬头,为极右力量的复苏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欧美极右主义思潮与极右政治力量的推波助澜下,有关西方国家的涉华政策更具敌意和对抗性,对我国的经贸活动、国家形象甚至于国家统一大局都产生了负面影响,需要我国重视并严加防范。首先,受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发动了现代历史上对华的最大贸易摩擦,企图通过向中国多种商品(特别是智能科技和通信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对中国启动 301 调查和对中兴通讯、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等方式扭转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所谓“长臂管辖”和科技脱钩等措施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商、商业投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等都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给我国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制造困难。其次,美国极右势力和部分右翼政客反复炒作所谓“新冠病毒中国起源论”“世卫组织受中国控制”等阴谋论和谣言,加剧了中美关系的恶化。2020 年 7 月,皮尤研究中心的一次民调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不管高涨,约有 73% 的美国人 对华反感,并认为“中国需为新冠病毒的蔓延负责”^[32]。再次,在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等极右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不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将中国作为美国的“假想敌”,企图通过干涉内政遏制中国崛起。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并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并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形成了团结和谐的治理局面和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针对欧美极右势力抬头提出的教训与对我国安全发展的潜在威胁,我国要在经济社会治理方面、执政能力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和对外部风险防范方面予以加强。首先,要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共享发展,消除极端思潮产生的社会土壤。党中央已明确要求,在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竭力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 and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经济稳步增长和全面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稳定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其次,要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作风建设,密切党群联系。这要求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作风建设问题,在实践中纯洁党员队伍,防止脱离群众。最后,防范外部潜在风险,与西方反华势力开展持久斗争。面对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问题,我国应坚决反击。我国需“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进行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既要敢于斗争,勇于碰硬,又要善于斗争,讲究斗争艺术和策略。要用好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大多数,搞好大联合,不要四面出击,不搞关门主义”^[1]。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 2022(17): 4-17.
- [2] Jean-Yves Camus&Nicolas Lebourg. Far-right Politics in Europ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
- [3] 赵海, 陈展. 美国极右翼信息生产与社会动员机制——以匿名 Q 运动为例[J]. 美国研究, 2021(1): 102-117+7.
- [4] 张蕊莹. 欧洲极右民粹主义政党是怎样兴起的[J]. 人民论坛, 2016(36): 102.
- [5] 田焯.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极右政党的崛起及其社会影响[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 (8): 174-184.
- [6] S. C. Bradford et al., The Payoff to America from Global Integration [G] //C. F. Bergsten eds.,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Next Decade.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p.68-69.
- [7] 宋朝龙. 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与世界乱局的根源 [J]. 理论月刊, 2020 (7): 48-56.
- [8] Donald Tomaskovic-Devey&Ken-Hou Lin. Financialization:Causes, Inequality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M]. North Carolina Banking Institute, 2013: 176.
- [9] Lawrence Mishel&Jori Kandra. Wage inequality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 2020:Top 1.0% of earners see wages up 179% since 1979 while share of wages for bottom 90% hits new low [EB/OL]. (2021-12) [2022-08-31]. <https://www.epi.org/blog/wage-inequality-continued-to-increase-in-2020-top-1-0-of-earners-see-wages-up-179-since-1979-while-share-of-wages-for-bottom-90-hits-new-low/>.
- [10] Thomas Blanchet et al., How Unequal is Europe? Evidence from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1980-2017,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orkpaper [EB/OL]. (2019-04) [2022-08-31]. <https://wid.world/document/bcg2019-full-paper/>.
- [11]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U.S. Immigration Trends [EB/OL]. [2022-08-31].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programs/data-hub/us-immigration-trends>.
- [12] Richard T. Ashcroft and Mark Bevir. What is Postwar Multicultu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G] //Richard T. Ashcroft and Mark Bevir eds.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4.
- [13] 魏南枝. 美国的文化认同冲突和社会不平等性: 种族矛盾的文化与社会源流 [J]. 学术月刊, 2021 (2): 85-96.
- [14] George Michael. Confronting Right-wing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in the USA [M]. London: Routledge, 2003: 37.
- [15] Cas Mudde. Right-wing extremism analyzed: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es of three alleged right-wing extremist parties(NPD, NDP, CP' 86)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95 (2): 203-224.
- [16] Elisabeth Carter. Right-wing extremism/radicalism:reconstructing the concept [J].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18: 19.
- [17] Cas Mudde. The Far Right Today [M]. Cambridge: Polity, 2019: 10.
- [18] Emillie de Keulenaar. A dialogue-driven approach to address the partisan dynamics of online misinformation [EB/OL]. (2019-12-17) [2022-08-31]. <https://www.shrmonitor.org/misinformation-a-dialogue-driven-approach/>.
- [19] George Hawley, Making Sense of the Alt-righ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25.
- [20] Joe Mulhall and Safya Khan-Ruf eds. State of Hate:Far-right Extremism in Europe 2021[EB/OL]. (2021-06) [2022-08-31]. <https://www.amadeu-antonio-stiftung.de/wp-content/uploads/2021/02/ESOH-LOCKED>

-FINAL. pdf.

- [21] 刘力波, 张子崑.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美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斗争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1 (1): 90-97.
- [22] Northwest Arkansas. Riot at U.S.Capitol resonates in Europe:Far-right groups aid to see potential [EB/OL]. (2021-06-25) [2022-08-31]. <https://www.nwaonline.com/news/2021/jan/25/riot-at-us-capitol-resonates-in-europe/>.
- [23] Hans-Georg Betz.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M].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1994: 22.
- [24] Cas Mudde.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A Pathological Normalcy [J].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3: 1167-1186.
- [25]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Right Wing Extremism in America, 1790-1977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499.
- [26] Cas Mudde. Conclusion: Defending democracy and the extreme right [G] //Roger Eatwell and Cas Mudde eds., Western Democracies and the New Extreme Right Challenge. London: Routledge, 2004: 193.
- [27] OIC. Fourteenth OIC Report on Islamophobia [EB/OL]. (2022-03) [2022-08-31]. https://www.oic-oci.org/upload/islamophobia/2022/14th_Annual_Report_on_Islamophobia_March_2022_r2.pdf.
- [28] Daily Sabah. Islamophobic attacks in France increase by 53% in 2020 [EB/OL]. (2021-01-29) [2022-08-31]. <https://www.dailysabah.com/world/europe/islamophobic-attacks-in-france-increase-by-53-in-2020>.
- [29] 任琳. “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 [J].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1): 84-115.
- [30] 张文宗.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 [J]. 当代世界, 2019 (11): 62-68.
- [31] Seth G.Jones. The Rise of Far-Right Extre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EB/OL]. (2018-11-07) [2022-08-31].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ise-far-right-extremism-united-states>.
- [32] Pew Research Center. Americans Fault China for Its Role in the Spread of COVID-19 [EB/OL]. (2020-07-30) [2022-08-31].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7/30/americans-fault-china-for-its-role-in-the-spread-of-covid-19/>.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x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2年第5期 总第35期 第6卷

双月刊 2022年9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何晓栋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微信公众号

定价：15.00 元